

#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 ——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

高峰 著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若干趋势规律在当代的有效性。集中研究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认为,在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中,资本构成及其趋势带有支柱性质,是分析其它积累规律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既是理解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关键,又涉及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利润率的变动则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和剩余价值率变动决定的;利润率的变动对于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或周期波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分析这三个理论就抓住了马克思资本积累学说的核心问题。分4章。第一章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围绕这一理论的长期论战——代前言;第二章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第三章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第四章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每章首先分析理论的渊源和形成过程,然后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它学者的研究与争论,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探讨有关范畴、原理的确切含义和科学性质,最后,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尽可能系统的长期统计资料检验积累过程的有关趋势。讨论资本积累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原因与后果。(纪益员)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9月第1版

#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围绕这一理论的长期论战——代前言	1
第一节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1
第二节 围绕资本积累理论的长期论战	9
第三节 研究资本积累理论能否采用统计证明方法	28
第四节 本书的任务和方法	36
第二章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38
第一节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	38
1. 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提出	38
2. 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	44
3. 资本有机构成的两种公式	51
4. 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产量比率	54
第二节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	56
1. 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	56
2. 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	66
3. 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	74
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检验	81
1. 资本价值构成的计算方法	81
2. 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	92
3. 美国物质生产部门和全部私人经济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	112
4.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构成长期动态的比较	126
第四节 二十世纪以来影响资本构成动态的	

重要经济因素 .....	131
1. 物质生产部门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	131
2. 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 .....	137
3. 资本积累速度和科学技术革命 .....	144
<b>第三章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b>	<b>151</b>
<b>第一节 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原因和</b>	
<b>规模变动 .....</b>	<b>151</b>
1.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	151
2.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	158
3.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批评 .....	166
<b>第二节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失业人口形成条件的若干重</b>	
<b>要变化 .....</b>	<b>175</b>
1. 决定失业规模及其变动的主要因素 .....	175
2. 资本构成提高速度的放慢 .....	178
3.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 .....	181
4.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其他条件变化 .....	185
5. 第三产业对过剩劳动力的吸收 .....	188
<b>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分析 .....</b>	<b>194</b>
1. 美国的失业规模和长期变动趋势 .....	194
2. 美国失业人口趋于扩大的原因分析 .....	204
3. 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料 .....	215
4. 评所谓补偿理论 .....	223
<b>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的若</b>	
<b>干新特点 .....</b>	<b>236</b>
<b>第四章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 .....</b>	<b>257</b>
<b>第一节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形成和</b>	
<b>争论 .....</b>	<b>257</b>
1.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由来和形成 .....	257

2.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理论的批评 .....	268
3. 围绕“技术选择”问题的争论 .....	278
第二节 论证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不同观点和 方法 .....	284
1. 对一般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几种主要解释 .....	284
2. 方法论上的若干分歧 .....	299
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分析 .....	307
1. 美国剩余价值率的长期动态 .....	307
2. 美国利润率的长期动态 .....	326
3. 多种变量的综合观察 .....	335
4. 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料 .....	354
第四节 一般利润率变动的内在机制 .....	364
1. 利润率长期变动的分析 .....	364
2. 利润率周期变动的分析 .....	376
结束语 .....	394



# 第一章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 围绕这一理论的长期论战 ——代前言

## 第一节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学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资本积累理论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却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

人们通常把资本积累理论归结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内容。这一篇的标题是“资本的积累过程”。教《资本论》的教师习惯地把第一卷分为三大部分：劳动价值理论，包括第一篇各章；剩余价值理论，包括第二篇至第六篇各章；资本积累理论，包括第七篇各章。资本积累理论被看作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关于第七篇的研究对象，较多的提法是，它研究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等。

上面这些看法或提法，在许多《资本论》的解释书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它们在特定的意义上也都无可非难。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能否把资本积累理论局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内容？资本积累的直接含义是剩余价值资本化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按照这个解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似乎不应该排除在资本积累理论的范

围之外。同样，如果说积累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积累的规律，那末，《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似乎也应该属于资本积累理论的范围，马克思在那里明确指出，利润量增长和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性产生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性质和“积累规律”。<sup>①</sup>因此，把资本积累理论等同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内容，这种理解可能是过于狭窄了。

为了正确理解资本积累理论的内容，有必要对《资本论》的主题和结构作一个简略的分析。《资本论》的主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动规律，这要求抓住资本关系这个轴心，分析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本质及其神秘化的全部过程。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运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都是在这种关系的制约和支配下进行的。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和运行，就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然而，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本质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一方面，资本关系包含着一般商品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使资本关系的剥削本质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资本必须通过包括生产和流通在内的不停顿的运动，并且在市场竞争中转化为各种具体形式，其中表现出来的资本关系越来越远离它的本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使资本关系得以确立并逐渐神秘化的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条件。因此，对资本关系的剥削本质及其神秘化过程的全部分析，就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三卷《资本论》的结构是服从于它的主题而构造的，这是一个借助于抽象力所建造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结构。中心范畴当然是资本，但资本是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关系来把握的。资本的一般形式是货币，货币又不过是一种特殊商品。从商品到货币到资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3—244页。

本，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一当上升到资本，对资本运动的分析就始终包含着资本关系和商品关系两重关系的运动。对资本运动的分析也要借助抽象力。尽管资本的现实运动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离不开市场和竞争，但在理论分析上，必须首先舍象流通过程和市场竞争，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考察资本，通过分析，揭示资本剥削关系形成、维持和扩大的深层机制，以及资本剥削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构成《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任务。《资本论》第二卷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流通可以指资本运动的一个特殊阶段，也可以指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内的资本的运动。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显然是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流通过程。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为了说明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这里已经开始涉及到产业资本的比较具体的运行机制。《资本论》第三卷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所谓总过程的研究并不是对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考察，而是考察资本运动作为总体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决定性的因素是把市场竞争引入分析。通过引入竞争因素使我们触及到制约资本运行的更具体的表层机制，资本在市场上以各种具体形式互相对立，剩余价值也转化为各种具体形式而表现为不同资本的收入；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上，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尚可感触而在流通过程中已被模糊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从现象上消失了，资本关系完成了它的神秘化过程。这个过程恰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条件和机制；资本和它所体现的剥削关系，只有通过包括生产和流通在内的不停顿的运动，通过市场的复杂竞争过程，才能实际存在和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考察，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运行机制，一是它的发展趋势。运行机制的考察具有相对静态性质，发展趋势的考察具有长期动态性质。《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相应地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规律，如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经济危机规律，等等，它们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日常活动，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另一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如资本积聚和聚中规律、剩余价值率提高和相对工资下降的规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相对过剩人口增长的规律、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等等，它们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趋势。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sup>①</sup>他所说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恰当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两个方面和两类经济规律并不是互不相关的。日常的经济运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基本的运行机制和运转规律决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长期趋势，反过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寓于经济的日常运转之中，和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交织，并影响着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运动。

资本积累理论应该从这个总的框架来把握。积累意味着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本身不过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一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积累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当然要研究资本积累的一般运行机制（如积累的实质，积累的条件，制约积累的因素，积累的社会机构等等），但它主要考察的，是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长期趋势规律。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的话，那末可以肯定，资本积累理论决不

---

<sup>①</sup>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而是贯穿于《资本论》全书。直接与它有关的篇章除第一卷第七篇外，至少还有第一卷第四篇，第二卷第三篇，第三卷第三篇，第五篇第二十七章等等。广义地说，一切涉及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都属于积累理论的范围。它在研究资本积累一般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加速的趋势、生产机械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趋势、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日益社会化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增长的趋势、相对工资下降和剥削率提高的趋势、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经济危机深化的趋势，等等。广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作为写作《资本论》的准备，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对积累理论的各个方面有广泛而深刻的论述，联系《资本论》研究这些手稿，对于深刻理解积累理论的形成和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有关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文献是十分丰富的。在对积累理论的总体理解上，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值得重视。哈维认为，《资本论》中有三个主要的积累动态模式，分别反映了《资本论》各卷中构成“理论对象”的方式。在第一卷中，马克思试图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利润的来源，制定并详细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他把重点放在技术和组织变化过程，而舍象了资本流通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这使马克思能够构成他的第一个积累模式，来考察决定剥削率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这个模式在理论上应适于生产领域，同时涉及到新创造的价值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资本论》第二卷集中在资本的流通过程，重点转移到资本在形态变化的运动过程中和资本为实现价值而通过交换关系中出现的问

题，很少强调技术变化，阶级斗争的主线几乎完全消失。这样，马克思通过资本流通的扩大再生产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积累模式。这个模式在理论上以资本流通和交换领域为基础，同时关联到资本通过消费而实现的条件。《资本论》第三卷的意图是综合前两卷的研究，建立一个把生产—分配关系和生产—实现条件结合为一体的模式。这个资本主义动态的综合模式是围绕着“利润率下降和它的抵触趋势”的主题而建立的，它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导向破坏均衡的各种力量，为理解危机的形成和解决提供一个根据。遗憾的是，这个模式很少提及第二卷的研究成果，因而在生产和流通相结合的理论方面缺乏坚实的基础。<sup>①</sup>

哈维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从《资本论》第一卷扩展到第二、三卷是正确的，他在阐述各种积累模式时也有许多精辟见解。哈维认为马克思通过第一卷的积累模式，详细说明了剥削率能够不管资本积累的步伐如何而趋于提高的内在机制。生产的技术和组织变化成为资本面对劳动力短缺时保证持续积累的手段；通过提高资本价值构成，减少对可变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形成失业后备军，就能够压低工资率并允许实际剥削率有所增长。这样，积累过程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假定条件，就成为资本积累均衡发展的要求。第二卷的积累模式即马克思所展开的扩大再生产图式，阐明了社会总资本以交换为媒介进行自身循环必须遵循的比例要求，这是从资本流通方面所说明的资本积累均衡发展的条件。在这个积累模式中，技术进步等因素被舍象了，并且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可以无困难地永远继续下去。其实，马克思的意图是要展示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的矛盾。通过交换过程而进行的均衡积累只有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假定条件发生变化，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混乱。因此，强调扩大再生产均衡发展的客

<sup>①</sup> D·哈维：《资本的限制》（1982年英文版），第156—157页。

观比例要求，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会不可避免地背离这种均衡发展的条件，进而导致危机。总之，积累过程在生产领域中实现均衡的条件同它在交换领域中实现均衡的条件是矛盾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互相冲突的要求。

哈维把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完全归结为危机形成机制的说明，显然是片面的。危机问题固然是积累理论的重要内容，但积累理论要说明的不只是危机的形成机制，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长期趋势。哈维单纯从危机形成的角度去把握第三卷的积累模式，在评价上就不免有失偏颇。第三卷的积累模式不能看作是前两卷积累模式的简单综合。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基本意义，在于揭示反映在积累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矛盾，说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当然，利润率变动问题应该在生产和流通、生产和实现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考察。利润是资本完成其全部循环后所实现的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周转速度成为影响利润率的三个主要因素。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在分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没有考虑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呢？这不是偶然的遗漏。探讨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既然着眼于长期趋势而不是周期波动，一切影响因素当然也要从它们的长期变动来分析。但《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周转速度的研究，并没有得出关于平均周转速度长期变动趋势的明确结论。如果说有某种暗示，也只是意味着，随着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固定资本的比重增长，资本的平均周转速度则趋于放慢。由于这些缘故，马克思在论证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自然要突出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这两个主要因素的作用，而舍象资本周转对利润率长期变动的影晌。既然周转速度放慢和有机构成提高按相同的方向影响利润率，这种舍象至少不会损害马克思的命题。

应当承认，《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对积累理论的分析的确未能充分展开。第二卷第三篇没有写完；第三卷只是一个初稿，其中第三篇特别是第十五章的某些论述缺乏条理或不够清晰。这给我们带来理解上的某些困难和分歧，也给我们留下进一步研究的任务。尽管如此，马克思积累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分析线索，仍然是宝贵的理论财富，为我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既然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必然具有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特征。某些有见地的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看作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是有道理的。不过，马克思积累理论的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与西方学院派（特别是它的主流派）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在出发点、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都有根本区别。马克思经济学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过渡性；学院派经济学则视资本主义经济为人类社会经济的自然形式。马克思经济学侧重于生产关系的考察，它以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致力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深化趋势；学院派经济学则主要考察生产力和比较表层的经济关系，它以效用价值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基础，着重探求消除危机、实现充分就业和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强调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学院派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则是非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抹杀阶级差别，突出心理分析或均衡分析。两种经济学都使用抽象法。一般说来，这也是一切理论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不同，它们在经济因素的取舍、经济范畴的形成和经济变量的使用上区别极大。把握两种经济学说在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上的根本区别，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这当然不是说，学院派的经济理论没有合理因素和可借鉴之



处。事实上，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已发展到相当深入和精细的程度。它们的某些原理，某些方法，特别是有关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整理和系统分析等方面，我们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时不仅能够借鉴，而且必须借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利用学院派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

## 第二节 围绕资本积累理论的长期论战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包括资本积累理论，一直存在有各种异议和不同看法。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恶意攻击且不去说它，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在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认真研究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争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马克思的著作比较艰深难懂，《资本论》第二、三卷又具有草稿性质，人们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现象，人们在试图研究这些变化时也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

在资本积累理论方面，论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所谓“崩溃”理论问题。<sup>①</sup>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的确包含着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结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教条。考茨基曾指出：一种崩溃理论的概念以及崩溃这个用语本身是伯恩施坦的发明。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一度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代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发起了所谓修正主义运动。修正主义是伯恩施坦的一个委婉的用语，他的真

<sup>①</sup> 以下论述主要参阅P·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十一章。

正目的是要从社会主义运动中彻底根除马克思主义。为了这个目的，伯恩斯坦发现“崩溃理论”是他最方便的攻击点之一。他断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灾难性崩溃是马克思的一个教条。根据马克思逝世以来的经济发展，灾难性崩溃理论不再站得住脚而必须放弃。革命的策略只有在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假定下才是合理的。如果资本主义崩溃不是实际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陈腐的理论教条，一切革命的理由都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伯恩斯坦的逻辑和崩溃理论的由来。

伯恩斯坦对所谓崩溃理论的批判，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击。考茨基早期的反应代表了一种态度。他并不争论资本主义崩溃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对这个问题表示轻蔑。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伯恩斯坦意义上的崩溃理论，即一场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经济危机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道路。相反，虽然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必定趋于恶化，但他们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导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因素在于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成熟。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策略，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的渐进主义，强调必须为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而武装自己。

由于考茨基反击伯恩斯坦的试图并不成功，修正主义的攻势逐渐采取了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无限扩张的形式，如俄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在杜冈看来，马克思不仅有一种而是有两种崩溃理论，一种以利润率下降趋势为根据，另一种以消费不足为根据。杜冈认为他已经成功地驳斥了这两种理论，因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崩溃决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杜冈从未区别崩溃理论和危机理论。他确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所设想的是危机的严重性不断加强，以至一场具有崩溃强度的危机最终一定要发生。从本质上看，这种观点和伯恩斯坦的看法很相近。不用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非常明确而可用的崩溃概念。

另一个修正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Courad Schmidt）与

杜冈的观点不同。他也认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崩溃理论，但它的基本核心是消费不足。由于资本家力图压低工人工资而提高自身的收入并加速积累，消费力就不能和资本积累保持同步增长，商品的销售变得越来越困难。日益增长的销售困难引起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和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市场的状况也逐渐恶化，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将不断膨胀。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途径同样是它自身走向崩溃的途径。施米特的这种分析，虽然对消费不足的趋势是一种很好的叙述，但其弱点是明显的。他把利润率下降和产业后备军增长看作是消费不足的派生物，而不是把它们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并行的趋势。在这个基础上，他就有可能否定整个崩溃理论和它具有的革命含义。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全部困难产生于消费不足，那末，通过有效地提高群众购买力就能把它们完全消除。最终，施米特和他的修正主义同伙们一样相信，工人阶级将会由于充分的教育和强大而达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难以忍受的经济条件的刺激。不幸的是，施米特的整个论断忽视了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直接联系。提高工资以提高群众的购买力似乎可以克服消费不足，但会加速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这同样能引起危机。没有理由认为哪种因素最终只具有较小的危险性。

在围绕崩溃理论的争论中，有许多经济学家力图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各种改良主义论调。他们与考茨基较早对伯恩斯坦批判所谓崩溃理论时的反应不同，不是否认这个理论的存在，而是极力为这个理论提供新的证明和解释。但他们论证的方法很不相同。这方面有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值得提出。

一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卢森堡企图证明，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内，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她从讨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发现，一旦把某些舍象掉的因素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纳入图式，剩余价值的实现

就会发生困难。关键是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其需求从何而来？资本家和工人不可能是体现积累剩余价值的商品的购买者，或许可以想象这部分剩余价值存在于追加的生产资料形式上，通过资本家的相互购买来实现。但下一年生产出的更大量的商品怎么办？这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期推到下个时期，如此下去，“那末，我们就有一个旋转木马，它在天空中自我旋转。那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资本的积累，而是相反：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谬的”。<sup>①</sup>总之，困难并没有解决。摆脱困难的唯一出路，是抛弃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假定。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出售给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消费者才能被实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只有向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国内的和国外的）扩展，才能进行积累，没有第三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这个扩张过程不断地把落后的国家和居民阶层吸引到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中来。当它们最终全部并入资本主义体系时，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将在实际上形成，资本主义体系也将自动崩溃。这样，卢森堡通过否认资本积累的无限性，建立了一个机械的崩溃概念。卢森堡这个论断的理论基础连同它的其他政治含义，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另一位经济学家是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对格罗斯曼来说，实现问题并不存在。他进行推理的基础，是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为批判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书而计算的再生产图式。这个图式假定：工人人口和可变资本量每年增长5%，剩余价值率100%，因而剩余价值总量每年增长5%；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变资本每年增长10%。剩余价值分解为追加可变资本、追加不变资本和资本家消费部分的方式严格遵循上述假定条件，追加资本按规定速度增长，剩余部分供

<sup>①</sup> R·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年中译本)，第65页。

资本家消费。很明显，如果这个图式向前推算到一定程度，将会导致奇怪的结果，因为不变资本的增长比剩余价值快得多。鲍威尔只将图式推算了4年，还不足以显示它潜在的奇特性。但格罗斯曼却坚定地把它推进到35年。到21年时，留给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量开始下降，到第34年，它几乎全部消失。继续向前，不仅资本家要饿饭，甚至靠这种高尚的牺牲他们也不再能维持预先确定的积累率。换句话说，积累图式由于剩余价值短缺而崩溃。于是，通过一种惊人的思想跳跃，格罗斯曼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定会因为剩余价值的短缺而崩溃。卢森堡的剩余价值过剩论正好被颠倒过来。尽管有某些限定条件，这个从鲍威尔图式中得来的“剩余价值短缺”理论仍然是格罗斯曼有关崩溃问题见解的本质。对于格罗斯曼的这种崩溃理论，没有必要评论它的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一些假定条件的任意性和不合理），提一下斯威齐的中肯的批评就够了：“格罗斯曼的理论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显示了社会科学中机械论思想的危险性。再生产图式包括鲍威尔的图式，只是作为一种方法使某些关系的性质能够被理解，才有用处。但是，如果拿出任何特定的和必然是任意的图式，并且设想它如实地代表着实际资本积累过程的本质，那就要招致理论上的灾难”。<sup>①</sup>

“崩溃”问题的论战虽然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有一定关联，但是客观地说，马克思的积累学说并不包含有所谓的“崩溃理论”。《资本论》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②</sup>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资本积累理论在体现这个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必然深化的趋势，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和

<sup>①</sup> P·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211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sup>①</sup>的结论。但是，这些论断不过展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把这种必然性变为现实，还得依靠阶级斗争的作用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和反抗，是资产阶级的“被剥夺”，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行消亡。这同所谓“崩溃理论”毫不相干。“崩溃”概念的实质在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自行崩溃和死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因此，关于“崩溃理论”的论战，对于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某些理论（特别是再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和危机理论）虽然起过推动作用，却并没有真正触及资本积累学说的主要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繁荣时期，“崩溃”问题的论战也归于沉寂。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问题。帝国主义的根源问题是涉及资本积累理论的另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本世纪初，一方是罗莎·卢森堡及其追随者，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布哈林和列宁。

前面讨论有关“崩溃”问题的论战时曾经谈到，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还有其他的政治含义，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根源问题。她那引起争论的著作《资本积累论》似乎讨论的是些抽象理论问题，但如果考虑到1913年前后的历史背景（当时帝国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德国军国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和战争危险正在加剧），那就不难理解，这些看似抽象的理论问题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被提出，并卷入了激烈的政治争论。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提出的主要疑点，是积累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无法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生产的产品找到市场，这个市场只存在于那些还没有卷入资本主义关系的地区、部门和国家。因此，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老牌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竭力向世界落后地区和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根源就在这里。“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不管你如何解释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结构，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也是常识，即资本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新地区的扩张以及那些国家为了争夺世界的新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sup>①</sup>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在帝国主义根源问题上与卢森堡的思路截然不同。他们的出发点也是资本积累规律，但不是从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而是从资本集中形成垄断来说明帝国主义这种新现象，从金融资本的统治来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结构变化和性质变化，而不是资本积累机制的一般特征。

《资本积累论》1913年出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批评，这促使卢森堡于1915年在狱中写出《反批判》一文。“文章使用的轻蔑口气和高度论战性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卢森堡对于她遭到猛烈攻击感到的惊讶，但也一定同当时支持或反对战争的争论有关。由于当时严厉批评《资本积累论》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同时也是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人，毫无疑问，这使卢森堡在捍卫自己的理论主张方面产生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感觉，从而使她看不到她的对手们提出的某些正确的论点。毕竟当时关在监狱里的是她，而不是那些批评她的人。”<sup>②</sup>1925年，布哈林出版了《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对卢森堡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经济学说的观点看，布哈林的批评不仅有力

---

① R.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年中译本），第69—70页。

② 肯·塔巴克：“《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英文版编者绪言”，《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年中译本），第24页。

地揭示了卢森堡的错误，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

卢森堡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指责，以及她们所谓积累的剩余价值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的命题，主要是建立在两个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否认资本积累可以为自身提供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混淆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的积累。卢森堡在《反批判》一文中，曾假定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全部货物是一个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堆积，它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并满足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第三部分则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那末，谁是每部分商品的购买者呢？他认为头两部分产品的实现没有问题，困难发生在这个第三部分，因为这部分商品的购买者“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资本家”。<sup>①</sup>这里，卢森堡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必须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言而喻，“追加生产资料的购买者是资本家自身，追加消费资料的购买者是追加工人，他们的货币是从购买这些追加工人的劳动力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sup>②</sup>卢森堡确实也曾正确设想：需求会不会从资本家阶级扩大生产方面产生，从而需求的货物应该由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组成。但就在非常接近于解决问题的时候，她却认为：“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sup>③</sup>并用“旋转木马”一类的遁词来逃避问题。其实，生产一年比一年扩大从而日益增多的商品量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而实现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旋转木马”的比喻并不能证明再生产过程本身实际

---

① R·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年中译本），第64页。

②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1988年中译本），第275页。

③ 同①，第65页。



存在什么困难。阻碍卢森堡循着正确思路前进的障碍，是她认为这样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是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应该是货币资本的积累。

这就涉及她的另一个主要错误，把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的积累混为一谈。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不在于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而在于把日益增多的商品变成货币资本，变成越来越多的黄金。积累的总剩余价值转变为同等数量的货币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如果没有第三市场，仅靠资本家的互相购买来实现日益扩大的商品的价值，就不能使表现在黄金上的货币资本同积累的资本同等扩大，所以不能算作资本积累。卢森堡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一方面，货币依靠它自身的周转可以实现更大的商品价值，所以，认为商品价值的任何增加必然包含着货币数量的同样增加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应该积累的总剩余价值在每个既定时刻实际分别存在于不同形式上，因而也不能把总剩余价值同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等同。“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必定要通过自身运动的货币阶段，但是它不会立即实现，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即不是实现以同样大的货币堆积为对立面的全部商品堆积”。<sup>①</sup> 货币资本的积累同现实资本的积累也是很不相同的，它可以是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也可能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总之，“必须把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货币资本的积累……同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长（这一货币量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同现实再生产的增长决不成比例）区别开来。决不能把全部新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同货币额的新增加混为一谈。因为实现过程决不需要这样的货币额。另一方面，同样不能把资本的积累同货币资本的积累混为一谈。”<sup>②</sup>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1988年中译本），第285页。

② 同上，第283页。

布哈林在批判卢森堡的同时，还从一般市场理论的角度清算了两种处于极端形式的错误观点，坚持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正确的市场理论。同卢森堡的看法恰好相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实现的困难。他说：“把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概括起来加以考察，必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容量根本不决定于社会消费量的结论。社会产品不仅有消费品，也有生产资料。机器代替工人时，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当然减少，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却增加。同样，当资本家的收入由其个人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减少，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却增加。总而言之，只要社会生产比例适当，无论消费需求怎样减少，也不会使市场上产品供给总量超过需求。”<sup>①</sup>卢森堡和杜冈代表了市场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不能为自身提供任何扩大的市场，积累的剩余价值根本无法实现，因而，没有第三市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杜冈则认为：资本积累能够为自身提供无限扩大的市场，实现问题根本不存在，只要比例适当，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然而，杜冈的观点比卢森堡的观点更荒谬。他抹杀了一个根本问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联系。生产资料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消费品部门和社会消费能力而发展，但不是无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归根到底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预备阶段，日益扩大的生产资料归根到底要用来生产消费品，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脱离社会消费需求。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客观比例，本身就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杜冈在兜售他的谬论时虽然打着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幌子，实际上与马克思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卢森堡在坚持他的错误观点时，却指责《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导致了杜冈的荒谬主张。其实他们两人都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决不能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

<sup>①</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1982年中译本），第226页。

马克思的正确思想所进行的错误批评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罗莎·卢森堡本人的立场是无辜的。杜冈的错误不在于他认为实现是可能的，而在于他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必然联系。罗莎·卢森堡同志的错误不在于她坚持这种联系，而在于她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现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关于积累过程中的市场问题的不同观点，对危机问题具有直接意义。按照杜冈的市场理论，只要生产的比例适当，积累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剩余价值实现问题，资本主义生产也根本不会有危机。按照卢森堡的看法，没有第三市场，积累过程中的剩余价值根本无法实现，资本主义将经常处于危机中。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看法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危机”。<sup>②</sup>

卢森堡从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定义：“帝国主义乃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sup>③</sup>布哈林批评了这个定义。他指出卢森堡强调帝国主义只是争夺“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是不正确的，也和事实不符，但却与她的理论一脉相承。“这个定义没有把问题同资本作为金融资本这样一个具体特点联系起来。商业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些不同阶段都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消失了、融化了，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由银行集中起来、聚集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消失了”。<sup>④</sup>

本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这一场争论，到30年代前

---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1988年中译本），第316页。

② 同上，第323—324页。

③ R·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59年中译本），第359页。

④ 同①，第349页。

已基本解决。事实证明布哈林、列宁和希法亭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卢森堡的理论则是一个本质上错误的理论。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否认卢森堡的理论贡献。布哈林在清算卢森堡的错误时仍然肯定她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英明的思想家之一”，她的理论功绩在于“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关于再生产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还“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她的《资本积累论》“是一个大胆的理论尝试，是光辉的革命智慧的产物”，这本书的“历史部分对资本的殖民征服史的描述迄今还无人能与之媲美”。<sup>①</sup>现代英国经济学家阿米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在评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时正确地指出，应该把她提出的两个观点分别开。一个观点是，她以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为根据，认为资本主义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而只能同非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才能存在下去。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另一个观点是，她认为资本主义事实上是在被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包围的世界环境中成长起来，而竞争的压力驱使资本主义厂商和国家与这些“外部的”经济形态开展贸易，以至最终破坏它们。在这方面她遵循了马克思论述的思路，其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sup>②</sup>卢森堡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研究资本积累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第三，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利润率下降趋势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也最广泛、最激烈、时间持续最长，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由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不打算

---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1988年中译本），第252、363—364页。

② A·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68—69页。

在这里详细罗列和评论各种不同观点，只想把论战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近百年来，争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时起时伏、逐渐深化的过程，大体上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20年代。《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就有人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抱有不同看法。例如卢森堡就对这个规律持怀疑态度。另一位德国女经济学家娜塔莉·莫兹科斯卡（Natalie Mosykowska）在1929年也说：生产率的普遍增长必然导致投资货物的价格下降，有机构成的提高将被缓和，剩余价值率也会更快提高，因而利润率下降并不是必然的。<sup>①</sup>与此同时，另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竭力维护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命题，如希法亭和格罗斯曼等人。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讨论是很初步的，专门的著述不多。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到来，这一争论也暂时沉寂下来。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1942年，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发表了他的名著《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英国著名凯恩斯主义左派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出版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书同时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广泛争论。这一争论特别由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曼（Joseph Gillman）1957年发表的专著《利润率下降》而引向深入。1959年初到1960年初，美国理论刊物《科学与社会》开辟专栏，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发表意见讨论吉尔曼的著作。这次讨论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地前进了。讨论从单纯的抽象理论分析进展到数学方法的论证和历史统计的经验证明。特别是吉尔曼的专著，计算了美国制造业近百年的统计资料，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一次进行了长时期

<sup>①</sup> 转引自K·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第2卷（1979年英文版），第157页。

的经验检验，并对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作用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

第三次高潮发生在70年代至今。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战后最深重的危机之中，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双症并发的严重局面。随着危机问题的讨论重新兴起，围绕利润率下降问题的争论再一次活跃起来。和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左派经济学家把利润率下降问题置于危机理论的中心地位。这次大讨论的深化表现在：一般理论分析日益结合方法论来探讨，数学论证和实证分析大大增多，利润率变动的研究不仅限于宏观后果，而且涉及微观基础；不仅限于长期趋势，而且涉及周期波动。美国左派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在1972年和1986年出版的危机问题专号，大量涉及到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这段时间论述到利润率下降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其数量之多和分析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以前。

近一个世纪的长期争论，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利润率的长期变动趋势究竟如何，是否存在马克思所论证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否必然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二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否必然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各种理论观点和论证方法，归根到底离不开这两个根本问题。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也将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第四，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和经济危机问题。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必然性和变动趋势，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资产阶级古典学派否认失业必然性的理论以及同马尔萨斯主义歪曲失业根源的理论相比较，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的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失业状况至少从经验上证明了马克思的分析，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有关失业理论的讨论相对说来并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的相对繁荣，失业率很低，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劳动力不足。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也曾一度得意洋洋，指责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已经过时。但随着70年代滞胀局面的出现，这类指责开始销声匿迹。在战后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了一些有关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讨论，但和其它有关积累理论问题的争论相比，意见的分歧程度和讨论的激烈程度都相差甚远。

经济危机问题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危机的根源和趋势是积累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危机意味着扩大再生产的中断和积累过程的障碍，是资本积累过程内部矛盾的爆发和暂时解决，既涉及积累过程的内部机制，又涉及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问题本身比较复杂。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危机问题的分析分散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的许多章节，他的危机理论并不是很集中、很系统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左派经济学家内部，在危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争论。

本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学派分为两个主要的危机理论派别。一派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组织状态和比例失调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另一派别强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消费不足和实现困难。罗莎·卢森堡是后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她的剩余价值实现困难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看作一种常态，没有第三市场将经常处于危机之中。这种理论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危机只是周期地发生。属于前一派的经济学家则较多，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希法亭、布哈林等，他们的观点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基本上属于比例失调派。曾自命为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杜冈把这个理论发展到极端。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和民众消费不足与危机的发生完全无关。“假如生产组织得有条不紊，假如市场充分了解需求并且主宰生产的按比例安排，主宰劳动和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自由转移，那末，

无论消费怎样低，商品的供给也不会超过需求。可是，在国民生产毫无组织、商品市场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必然要导致危机。”<sup>①</sup>希法亭也明确反对用消费不足解释危机：“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而危机不能简单地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发生的现象不能由某种经常的条件来说明”。<sup>②</sup>布哈林曾经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批判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又批判杜冈否认生产最终依赖于消费的错误观点。但他把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比例关系被破坏的一种表现，从而提出下述论断：“危机是由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引起的，但是，消费因素是这种比例失调的组成部分。”<sup>③</sup>

到本世纪30年代，比例失调论似乎一直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危机理论。但在40年代初，保罗·斯威齐对这种流行观点提出挑战，指出比例失调不能作为“实现危机”的主要解释，他还分析了比例失调论可能具有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含义，以及它在第一次大战前后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斯威齐详细制订了一个系统的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斯威齐认为：消费不足理论的真正任务在于证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比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更快，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自身：当生产能力实际扩大而超过一定点时，必然发生危机；当生产能力未能充分扩大时，则表现为生产停滞。斯威齐如何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消费不足的必然趋势呢？他把剩余价值中用于再投资的部分称为积累（Accumulation），把积累资本中用以购买不变资本的部分称为投资（Investment），

---

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1982年中译本），第304页。

② R·希法亭：《金融资本》（1981年英译本），第242页。

③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1988年中译本），第321页。



提出两个命题：一是剩余价值中的积累份额趋于提高，因为资本家把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积累，以扩大剥削范围；二是积累中的投资份额趋于提高，因为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方法和实行机械化，以加深剥削程度。因此，虽然社会消费一直在增长，但由于剩余价值中的消费份额趋于缩小，积累中的工资份额趋于缩小，消费的增长率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增长率必然趋于下降，也就是说，消费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的比率在降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技术过程，在生产资料存量变化与消费品产量变化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联系。从长期看，生产资料存量的一定百分比增长通常伴随有产量的几乎是相同的百分比增长，也就是说，消费品产量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的比率大体是不变的。依据上述分析，可以非常简明地表述消费不足论的本质。由于消费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之比逐渐下降，而消费品产量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之比近于稳定，所以存在着一种消费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固有趋势。<sup>①</sup>在斯威齐的著作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兴。26年后，斯威齐和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又合作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把消费不足论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的理论。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总生产能力具有一种比内部形成的有效需求更快扩张的倾向，资本生产的“剩余”趋于增长而“剩余”的吸收日益困难。因此，资本的迅速积累和经济的相对繁荣，只能依赖于外部因素（重大的技术革新、战争等等）的刺激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扩大。“垄断资本主义能生产出比它所能吸收的更多的剩余的趋势，可以由主要的外部刺激予以中和，甚至加以克服；但当这种刺激减弱或消失时，它

---

① P. M.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80—183页。

又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sup>①</sup>当不存在这种抵销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sup>②</sup>

经过战后20多年的相对繁荣，资本主义世界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随着滞胀的出现和危机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危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次讨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消费不足论持批判态度，而把利润率下降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他们指出斯威齐和传统消费不足论者一样有一个根本性错误：把第一部类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第二部类的“投入”，由此推论，生产者货物生产的增长必定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但这是不对的，因为生产者货物也能用来制造生产者货物本身，并且扩大再生产也要求它们这样被使用。<sup>③</sup>如果生产资料的增长并不全部用来扩大消费品生产，那末，消费品产量就不会和生产资料产量按相同的速度增长。这个前提不成立，斯威齐推论的逻辑基础就崩溃了。对消费不足论的另一个重要批评是：它缺乏任何关于实际积累率的决定因素的理论。<sup>④</sup>如果资本积累经常导致生产能力扩大但却不足以购买资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或者说，经济剩余经常趋于增长但却不能全部被吸收，那末，面对经常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剩余实现的困难，资本家或垄断资产阶级为什么还不断扩大他们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究竟哪些因素直接决定整个资本的投资率和积累率？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论者曾对这个问题给予满意的理论上的回答。因此，这个理论仍是不完善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利润率下降规

---

① P·巴兰、P·斯威齐：《垄断资本》（1977年中译本），第212页。

② 同上，第106页。

③ A·赛克：“危机理论史导论”，《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第229—230页。

④ E·顿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47页。

律解释危机。“格罗斯曼是第一个把危机的讨论从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理论转移开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逻辑和政治两个方面严厉地批评了这类理论，而把利润率下降规律置于危机理论的中心地位。”<sup>①</sup>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45年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在传播这种危机理论上有一定贡献。但是，只是从60年代后期以来，才有较多的经济学家重视和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危机理论。大卫·耶菲（David S. Yaffe）、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安维尔·赛克（Anwar Shaikh）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坚持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作为决定利润率的主要的（或至少是重要的）变量，用利润率下降来说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时期。

这里需要排除一种可能发生的误解，即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和主张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危机理论，是两回事。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引发危机或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是利润率下降，但对于什么因素决定利润率下降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大体上有三派观点：一派强调生产领域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起决定作用。这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论者的观点。他们有时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者。另一派认为决定因素是分配领域中由于工资增长而引起的利润挤压。这一派被称为利润挤压论者。再一派仍注重流通领域中因总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这一派被称为消费不足论者或实现失败论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区分不同的危机理论，经济学家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属于投资过度论，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投资的过度膨胀

<sup>①</sup> A·赛克：“危机理论史导论”，《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第236页。

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派属于消费不足论，强调需求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基本原因在于消费赶不上投资增长引起的商品的实现困难和价格下跌。以上各派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局限于某一派的观点。他们采取比较综合的考察方法，以一种或两种观点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曼德尔、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J. Sherman）等。总之，围绕利润率下降这个中心问题，危机理论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以上从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有关资本积累学说的若干主要争论的情况。论战涉及的问题是广泛而复杂的。这些论战并不是学究式的无谓争吵，它们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情况的变化紧密相关。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发展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人们作解释，客观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经济学家去深入研究资本积累理论。产生各种不同看法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理论研究深化的表现；只有在这种联系实际的学术争论中，理论才能发展。为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理论，我们应该对西方学者的各种不同观点采取认真研究的態度。一概否定、简单批评、或盲目接受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利用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固然不行，不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可想象的。

### 第三节 研究资本积累理论能否 采用统计证明方法

吉尔曼1957年发表的著作《利润率下降》，运用长期统计资料对美国制造业的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经验上的检验。对于这种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家的反

映各异。例如，多布肯定吉尔曼的著作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希望人们“按照类似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考察”。<sup>①</sup>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马蒂克 (Paul Mattick) 则对吉尔曼的经验证明不以为然，断言只有理论才是利润率下降问题“能够进行辩论的唯一领域”。<sup>②</sup>英籍印度经济学家梅赫纳德·德赛 (M. Desai) 怀疑吉尔曼所使用的统计资料的精确性，认为“使用国民收入统计和普查资料包含许多衡量上的问题，甚至从主流派经济学的观点看它们也会使验证工作复杂化”。<sup>③</sup>这些不同看法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研究资本积累理论是否应该和能够运用历史统计的经验证明方法？

持否定回答的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至少是其中的某些规律（如利润率下降趋势等）根本无法用经验材料进行验证。有人说：利润率下降是一种“抽象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经验的趋势”，这个“建立在一定抽象水平上的命题本身并不能提供关于利润率实际运动的一般预测”，利润率的实际运动取决于下降趋势和抵消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sup>④</sup>有人说：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观察不到的”，它属于“抽象的价值分析”，并不涉及“具体实际”，<sup>⑤</sup>等等。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经验证明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想说明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抽象的运动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展开的‘具体的’历史中，仍然在起作用并可加以证实。因此，它与当前社会经济思想中的

---

① M·多布：“利润率下降”，《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1期，第102页。

② P·马蒂克：“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1期，第34页。

③ M·德赛：《马克思经济学》(1979年英文版)，第196页。

④ B·法因、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64页。

⑤ 同②，第34—35页。

两种基本趋向是直接相冲突的。它不接受那些人的假设，不论那些人是学院派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那些人相信，新凯恩斯派方法、国家干预、垄断势力、公私‘计划’，或任一个个别作者或个别学派所主张的上列项目的任何一种联合形式，能使资本的长期运动规律中立或使之取消。在另一方面，它也不接受对立面的（但在实际上是相反的）论点，这种论点认为，经济方面的这些运动规律是十分‘抽象’的，以致在‘真正的历史’中，这些规律根本不能自我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学家的唯一作用就是说明这些规律是如何和为何被歪曲或者在其实际发展中被一些意外因素弄得偏离了正道——而不是去说明在一些具体的、可见的过程中，它们是如何被表明并被证实的。”<sup>①</sup>

曼德尔的上述观点完全正确。经济规律反映客观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联系，是在经济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过程，所以经济规律必定是抽象的。说它抽象，是说它舍弃了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具体经济现象，舍弃了各种偶然性和特殊性所形成的暂时经济变动。这决不意味着，抽象的经济规律和具体的经济过程毫无联系。发现经济规律是科学研究的任务。科学怎样发现规律？是不是主观地推想或任意地抽象？当然不是，必须通过观察和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变动，借助抽象思维能力，通过若干中间环节，由表及里，才能最终发现隐藏在杂乱无序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必然性。“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sup>②</sup>既然经济规律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运动”，作为经济运动现实的抽象，必然会在可以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中得到表现，发生作用。例如，价值规律是一个很抽象的规律，价值自身不能直接表现，只能通过货币形式、通过价格相

<sup>①</sup>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83年中译本），第4—5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对地表现出来，价格又由于供求关系和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而经常变化和偏离价值，从现象看，似乎价格的确立和变动并无规律可循。但是，如果不局限于个别商品价格在个别时期的偶然变化，考察各种商品价格的长期变动，那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价值决定商品价格的客观必然趋势，终究会显示出来。平均利润的形成、垄断的出现、纸币的通行等等，都不会取消价值规律，只会使规律的作用形式有所变化，表现形式更加迂回曲折而已。

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发展规律，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长期趋势都是多种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经济因素往往按照不同的方向影响某种经济变量的运动，有些力量使它加强，有些力量使它减弱，有些力量使它提高，有些力量使它降低，实际发展趋势是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斗争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趋势就有反趋势，有推动因素就有抵销因素。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强调抵销因素的作用使它成为一种趋势规律，并不意味着别的发展规律就没有抵销因素，就不是作为一种趋势来表现。比如剩余价值率的变动，就有多种因素和力量作用于它：资本家力图提高剥削程度，工人则竭力反抗，加强劳动强度使它提高，缩短工作日使它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使它提高，实际工资增长使它降低，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推动剥削率提高的经济因素最终会占据优势。某些经济学家，例如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断言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明确预示起支配作用的是趋势还是反趋势”。<sup>①</sup>或者认为：下降趋势和反趋势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sup>②</sup>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

<sup>①</sup> M. 卡斯泰尔：《经济危机和美国社会》（1980年英文版），第19页。

<sup>②</sup> B. 法因、L. 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63—65页。

并且部分地抵销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sup>①</sup> 提出趋势和反趋势或抵销因素的区别，本身就说明趋势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各种抵销因素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如果把二者等量齐观，岂不等于说不存在任何趋势，还有什么趋势规律可言？积累理论的任务，无非是要揭示支配各种经济趋势的内在机制和决定力量，分析各种经济趋势及其内部矛盾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和揭示经济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科学地解释客观经济现象和自觉地干预客观经济过程。“一旦‘发展规律’被认为过于抽象而不再能够说明具体历史的实际过程的时候，那么，这些发展趋势的发现就不再是这种过程的革命变化的一种工具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理论社会经济哲学的一种退化了的·形式。”<sup>②</sup> 经济的发展规律既然被看作是·不可感触，无从观察的东西，它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就被割裂了，对规律的研究也就成为学究式的空谈。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辩说，他们强调经济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抽象性，也是为了说明现实经济运动，例如危机，因为危机不过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反作用趋势复杂矛盾的结果。<sup>③</sup> 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下降趋势和反趋势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那末，或者两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利润率将不发生变动（这当然只能是偶然的），或者反趋势占了优势，利润率将上升，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危机。危机恰恰是由利润率下降直接诱发的，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而利润率在危机期间的急剧下降，恰恰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强制贯彻自身的一种形式，是这种趋势从经验上可以感触到的一种表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断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6页。

②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83年中译本），第13页。

③ B·法因、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64页。



言抽象的趋势规律不能从经验上加以检验，这等于说规律的发现不能用来解释实际经济过程，规律的研究便失去了它的实践意义；或者肯定规律应该并且能够用来说明实际经济现象，那末规律就一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它的表现形式，决不单纯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抽象”趋势。

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价值范畴或生产价格范畴，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统计的直接依据是市场价格，即使不说官方统计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至少价格项和价值项经常不一致。那末，按价格计量的历史经济统计资料能否用来从经验上检验建立在价值范畴上的各种经济变量和它们的变动趋势呢？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对统计证明持怀疑态度的一个症结。必须承认，利用资产阶级统计资料进行经验证明存在大量的技术性困难，证明结果也只具有相对的、近似的性质。但是，绝对否定用价格项进行经验证明的可能性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利用价格资料计算过某些抽象的价值变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中，马克思依据恩格斯提供给他的资料计算了一家纺织厂的剩余价值率，并注明：计算所依据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sup>①</sup>。恩格斯在他补写的《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章中，又用这个厂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了利润率、年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恩格斯还指出：“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算，所以，统计学家对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只有美国的国情调查，才提供了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提供的情况，即每个生产部门所支付工资的总数及其所获利润的总数。尽管这种资料令人生疑，因为它只是以工业家们自己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为根据，但它仍然极为宝贵，是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资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6页。

料。”<sup>①</sup>经典作家尽管对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不无怀疑，但仍然把它们看作是十分重要的经验依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研究如何更合理更科学地利用经济统计资料进行经验证明，而不是拒绝进行这种经验证明。

总之，研究资本积累理论，不仅应该运用统计证明方法，而且能够运用这种方法。然而，肯定这一点还不够。为了正确理解经验证明的结果，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积累理论所揭示的趋势规律究竟包含什么样的经验上的含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经济趋势是经济变量向着同一方向的长期运动。由于任何一个经济变量的确定和变动都是多种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又具有周期性，这种长期运动当然不可能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只能是在波动中向着同一方向的长期变动。那末，应该如何从经验上理解贯彻在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呢？是不是说，挑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长时期，比如从1880年到1930年，或者从1920年到1970年，计算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资本价值构成，只有其终期的绝对值高于基期，才证明资本价值构成的长期趋势在起作用；或者，计算一般利润率，只有终期的绝对值低于基期，才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起作用。如果这样理解，那就会产生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任何时期挑选基期年份和终期年份都具有某种特殊性，比较两个年份的绝对值就显得不科学。任何年份都处在经济周期的一定阶段，不能不受周期波动的特定影响。例如，利润率在繁荣年份较高，在萧条年份较低，一个时期的起始年份和终结年份选择不同，计算出的利润率动态就可能大相径庭。第二，即使在时期选择上非常慎重，尽量避免始末年份可能带来的歪曲因素，甚至采用移动平均法计算各年的数值，或者计算各个周期的平均值来进行长期动态分析，也不能做到绝对合理。这些方法虽然不同程度地消除了周期

<sup>①</sup>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页。

波动的影响，但仍无法消除长期波动的干扰。长波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书不打算涉及，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波动，似乎没有疑义。承认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它对各个时期经济变量的影响。在长期波动的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繁荣的强度和危机的深度有很大差别，各种经济变量在各个时期的平均值也难以彻底消除不同波动阶段的特殊影响。第三，似乎选择的时期越长，越追溯到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早阶段，经济变量的实际动态越能反映它的真实趋势，但可惜的是，时期选择的长度受到客观统计资料的限制。相对说来，美国的经济历史统计资料是最详细、时期系列最长的。但即使在美国，比较系统的统计资料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80年或1869年。更早的一些估算资料则零散而不可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如果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算起，在它发展的第一个世纪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甚至一个部门的全面系统的统计资料。

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不能混为一谈。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的统计研究，发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若干长期趋势，比如国民生产总值趋于增长，劳动生产率趋于提高，资本存量趋于扩大，农业部门趋于缩小，等等。这一类经济变量各自向着固定方向的长期运动比较容易从统计上得到证明，原因是它们主要反映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生产力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关系的制约，但它本身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趋势几乎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共有。生产关系可能影响它们变动的速度，但一般不会改变它们运动的方向。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就不同了。积累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各种变量反映生产关系的变动规律，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强烈制约。它们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它们的变动轨迹也更加迂回曲折。

因此，从经验上检验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不能要求长期统计资料所显示的经济变量始终向着同一方向变动：不能单纯比较经济变量在终期和基期的绝对值。如果一种变量在大多数时间里表现为固定方向的运动，它的变动就应该说具有某种长期趋势。不要忘记，积累规律不过是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在总体上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变动。这是我们进行经验证明时应把握的基本出发点。

#### 第四节 本书的任务和方法

讨论了以上三节的问题以后，现在可以扼要谈谈本书的主要目的和所采取的主要方法。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心是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若干趋势规律在当代的有效性。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长期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和外部存在的激烈争论，都说明应该对积累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积累规律是否还起作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积累规律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其结果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资本积累理论包括的问题非常广泛。要涉及所有问题非作者的水平所能及。我们的研究将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在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中，资本构成及其趋势分析带有支柱性质，是分析其它积累规律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既是理解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关键，又涉及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产业后备军的伸缩作为工资变动和剩余价值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通过后者对利润率变动和资本积累速度施加影

响。利润率变动则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和剩余价值率变动共同决定的。利润率的变动无论对于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或周期波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集中反映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复杂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因此，分析这三个密切联系的理论部分，我们就抓住了马克思资本积累学说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实际紧密结合，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我们不仅要分析马克思积累理论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要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它学者的研究和争论，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深入探讨有关范畴、原理的确切含义和科学性质。与此同时，我们将非常重视实证分析，运用尽可能系统的长期统计资料来检验积累过程的有关趋势，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资本积累规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原因与后果。我们既不带任何偏见去看待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也不被马克思的理论结论和具体分析所束缚。积累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必须在实践中修改、丰富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符合实际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科学的理论才能成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尽管我们努力贯彻上述目的和方法，但必须承认，并有必要预先指出，本书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的理论探讨以逻辑分析为主；外语文献局限于英语出版物，由于涉及积累理论的论著极为浩繁，即使英语文献也远未穷尽；经验验证主要限于美国的统计资料，其他国家的材料比较零散，资料的处理方法也比较简略。因此，严格说来，书中许多分析仍具有例证或推断的性质。我们只想介绍更多的不同观点和实际资料，同时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推进我国有关资本积累理论的深入研究。

## 第二章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第一节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

#### 1. 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提出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和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一样，也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成果。

关于资本的构成会随着资本积累而发生变化的原理，巴顿、李嘉图、拉姆赛、舍尔比利埃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已不同程度地论述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巴顿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第一个指出：随着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是以同样程度增加的，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同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另一部分相比会相对减少，因而对劳动的需求或就业不会同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增长成比例。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前两版中，在这一点上本来是跟着亚当·斯密走的，认为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同资本的积累成正比。但在第三版中则采用了巴顿的说法，对原来的观点作了改正。拉姆赛进一步阐发了巴顿提出的命题。“他修正了巴顿的见解，但没有超出巴顿的论述方法。他实际上把巴顿所说的差别归结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但仍然把不变资本叫做固定资本，不过把原料等等也加了进去；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然而把所有不直接

花费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排除在外。”<sup>①</sup>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舍尔比利埃和拉姆赛一样，也认为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和资本的其他要素相比有减少的趋势，并断定这种趋势对工人是不利的。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形成资本有机构成范畴有直接影响，但它们本身包含着错误的因素。首先，他们对资本概念的理解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局限，总是把资本和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要素混为一谈，当他们把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归结为生活资料时，他们的错误更多了一层。生活资料尽管是工人生存的条件，但本身并不构成劳动过程中的物质要素。其次，他们没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只是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资本的差别。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往往把从直接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资本划分与从流通过程所产生的资本划分混为一谈，完全不了解这两种资本划分的根本区别。此外，他们考察资本构成变动的着眼点，局限在对工人状况的影响，而忽略了它们对资本利润率变动所起的决定作用。

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学派并没有科学的资本构成理论。这是造成他们一系列重要理论错误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曾经这样说过：李嘉图对“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密（特别是从重农学派）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误规律等等”。<sup>②</sup>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对古典经济学有关

<sup>①</sup>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60页。

<sup>②</sup> 同上，第423页。

资本构成的论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评论。这是马克思形成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一个重要阶段。至于这一思想的萌芽，则应回溯到4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早期研究。马克思1847年底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其中已有许多比较直观的描述：“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sup>①</sup>在紧接着撰写的题为《工资》的手稿中，相应的论述开始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作为真正的资本的资本，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这也就意味着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同用于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资本比较起来，则愈来愈少。”<sup>②</sup>这些论述无疑应该看作，当然也只能看作是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萌芽。

“生产资本各个构成部分”的划分在表述上还没有超出生产要素的物质形态。关于“各个构成部分的对比关系”的考察还只是着眼于对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状况的影响。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建立资本有机构成学说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手稿的货币章和资本章制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通过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提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就在研究“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关系”这一小节里，马克思提出并初步分析了他的关键性命题：“资本不变部分同资本可变部分相比的相对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表现”。资本不同部分的区分已被放置在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上。资本的构成也开始作为影响利润率的因素被提出。

<sup>①</sup>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1971年版），第40页。

<sup>②</sup> 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961年版），第654、653页。



资本构成变化在利润率下降中的决定作用得到初步论证。不过，这一切还不能作为理由，证明马克思已经建立了他的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严格区别影响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例的两组因素（不同生产要素的比例和要素本身的价值），也没有详细分析资本的物质要素比例和价值比例之间的相关性和差异。资本构成只是表述为“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比例”，还没有出现“有机”构成的提法。这表明，马克思还没有强调同生产力状况直接相关的物质构成所具有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资本有机构成学说的基本确立。这不只是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始提出“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有时称为“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资本的“有机比例”），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范畴的分析大大深入了。马克思详细研究了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率的提高和机器的采用等如何提高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技术比例（即资本的技术构成或物质构成），并称这种变化为资本构成的“有机”变化，而与单纯的要素价值变动所引起的资本构成变化相区别。不少地方甚至直接用资本有机构成来指资本的技术构成。他还具体分析了这两组因素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包括不变资本变动和可变资本价值变动对利润率的不同作用。此外，通过批判古典学派的资本构成理论，马克思强调了从直接生产过程得出的资本划分和从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划分的根本区别，指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不是同流通过程的现象相联系，不是从流通过程产生，而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产生，并且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别只以它们对活劳动的关系为基础”。①

“资本有机构成”一词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973年版），第659页。

论》中，终于被给予了特定含义：“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述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sup>①</sup>可以说，只是在《资本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才最终形成。

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思想发展，应从以下几点把握资本有机构成范畴的理论含义。

第一，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揭示了资本构成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理论含义。由于这种直接关系，资本构成的不同水平或资本构成的发展变化，就能反映资本推动活劳动的不同水平或资本推动活劳动的发展变化。这对于分析资本与它推动的活劳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资本与这个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资本应当怎样划分才能揭示它与活劳动的直接关系呢？由重农学派发现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形成传统观念的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不能显示这种关系，因为流动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和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厂房等等一样并不同提供活劳动的生产要素相交换。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差别，根源于这两个资本部分的周转方式不同，因而不能表现他们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为了揭示这种关系，必须从资本的周转方式转向资本的生产方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67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式。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本质区分，正是他科学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第二，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以生产资本物质要素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划分为基础。这是资本有机构成概念能够显示资本构成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的原因所在。资本有机构成表现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是生产资料，是物化劳动或积累劳动的体现。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是活的劳动力。这样，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比，就成为不变资本价值与可变资本价值之比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率，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资本的物质构成或技术构成，因为这两种物质要素之比受生产的技术方式或技术水平的直接制约，并不是任意规定的。生产的技术状况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比例也要变化。这两种物质要素表现为生产过程内在的一种有机差别，构成生产资本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

第三，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不是一个实物范畴。资本有机构成固然决定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实物比例，本身却只能是一个价值比例。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的全部分析，都以他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所有关于资本的范畴都直接出现在价值形式上。资本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必须通过资本不同部分的价值比例及其变化才能具体衡量。有的经济学家例如罗宾逊夫人，认为把资本有机构成“表述为所用每人资本 (Capital Per Man Employed) …就能迅免费解而又不违背马克思的意思”。<sup>①</sup>殊不知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就变成了一个实物范畴，或价值和实物的混合范畴。这和马克思的整个范畴体系是不相容的。罗宾逊夫人的修改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违背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sup>①</sup> J.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年中译本)，第10—11页。

## 2. 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有机构成虽然要通过资本不同部分的价值比例来表现，但不应该和价值构成等同起来，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差别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的价值构成，只有在它决定于资本技术构成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限度内，才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超出了这个限定条件，它就只是资本价值构成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价值构成的特殊的但又是重要的一种，即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那种资本价值构成。

从孤立的静止的观点，似乎很难看出一个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区别。但只要比较不同资本的资本构成差别或同一资本的资本构成变化，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事实上，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因素有两种：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比（即资本技术构成）和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即使两个资本的技术构成相同，它们的价值构成也可能由于生产要素的价值不同而有差别。即使一个资本的技术构成不变，它的价值构成也可能由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而有变化。因此，从不同资本的比较来看，“有机构成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价值构成的百分比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处于有机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从而可以表示劳动生产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sup>①</sup>同样，从资本的发展变化来看，“尽管技术构成保持不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也能发生变动”。<sup>②</sup>这表明，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化，除了决定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别或变化以外，还能由生产要素的价值差别或价值变化所引起，在这个限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64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22页。

内，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化就不能算作是有机构成的差别或变化。

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化是由技术构成的差别或变动所引起，还是单纯由要素价值的差别或变动所引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有必要稍微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先假定生产要素的价值不变，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由技术构成的变动所引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总量既定，那么，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会引起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导致资本雇用的工人减少，剩余价值量减少，利润率下降；当然这时剩余价值率可能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剩余价值量的减少程度和利润率的下降程度。反之，资本技术构成降低就会引起资本价值构成降低，导致资本雇用的工人增加，剩余价值量增长，利润率上升，当然这时剩余价值率可能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剩余价值量的增长程度和利润率的提高程度。

再假定资本技术构成不变，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由单纯的要素价值变动所引起。在这种条件下，就得区别变化是由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引起的还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引起的。如果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仅仅是由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所引起，那末，当不变资本价值提高时，资本的价值构成必然提高，这时若资本总量不变，生产规模和雇佣工人数量必然缩减，即使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相应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反之，当不变资本价值降低时，资本的价值构成必然降低，这时若生产规模不变，资本总量就会减少，即使工人人数、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不变，利润率也会提高；若资本总量不变，生产规模将会扩大，工人人数和剩余价值量都会相应增加，利润率也必然提高。如果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仅仅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即劳动力的价值变动或工资变动）所引起，那么，当可变资本价值提高时，资本的价值构成就会降低，这时若资本总量不变，

生产规模必然缩小，剩余价值量将会因雇佣工人减少和剥削率降低这双重因素的影响而减少，结果使利润率下降。反之，当可变资本价值降低时，资本的价值构成就会提高，这时若生产规模不变，资本总量必然减少，剩余价值量却会由于剥削率提高而增加，从而导致利润率提高；若资本总量不变，生产规模必然扩大，剩余价值量也会因为雇佣工人增多和剥削率提高这双重因素的影响而增长，结果导致利润率提高。<sup>①</sup>

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些繁琐，但它具体说明了一个问题：由单纯的要素价值变动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化，和由技术构成变动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化，有时会产生相同的后果，有时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因生产资料价值上升而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就和因技术构成提高而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一样，会使一定量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减少，使资本的利润率降低。所以马克思说：“有机变化和由价值变化引起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对利润率产生相同的影响。”<sup>②</sup>但是，它们有时也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作用。例如由劳动力价值上升而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下降，就和由技术构成降低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下降，后果截然相反。在后一场合，价值构成降低会增加一定量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利润率提高；而在前一场合，价值构成降低反而要减少一定量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利润率下降。

区别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实际上就是区别资本技术构成对价值构成的影响和单纯的要素价值对价值构成的影响。这种区别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了解它们的经济后果在某些场合也是必要的。可以看出，马克思谈论这种区别，或者是在比较不

<sup>①</sup> 上述分析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309—323页；第26卷Ⅲ，第421—427页。

<sup>②</sup>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25页。

同部门的资本构成的场合（例如《资本论》第三卷第八章讨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构成，第四十五章研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差别），或者是在分析同一部门资本构成短期变动的场合（例如《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十二章中关于农业部门资本构成短期变动如何影响利润率和绝对地租的论述）。在这两种情况下，部门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动确实会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而且有时确实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当马克思考察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时（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和第三卷第三篇），他不再谈论这种区别，不再强调和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相独立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动。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如果越出一个或几个生产部门的界限而从整个社会来考察问题，一个部门的资本物质要素的单纯的价值变动，可以归结为其他部门资本技术构成的实际变动。比如棉花价值的下降会引起棉纺工业部门资本价值构成的下降，这就棉纺工业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来说仅仅是一个由单纯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动所引起的变化，但就棉花生产部门来说却是该部门资本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撇开自然力的影响不谈）。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有机变化和由价值变动引起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对利润率产生相同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有如下的区别：如果价值变动不单是由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暂时的，那末它们就始终必然是由提供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要素的领域发生的有机变化引起的。”<sup>①</sup>可见，撇开自然力的影响不说，一切资本物质要素的单纯的价值变动，都可归结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变动，但是要分清，这种实际变动仅仅发生在提供资本物质要素的部门，而不是发生在把该物质要素当作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部门。

<sup>①</sup>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25页。

大体说来,对资本构成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部门的、短期变动的分析,一类是社会的、长期变动的分析。马克思进行这两类分析时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在考察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差别或部门利润率的短期变动时,他详细分析了单纯的价值差别或价值变动对资本价值构成的独立影响,因为这种影响虽然不同于资本技术构成对价值构成的影响,却同样会通过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动而影响到资本的利润率。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别了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表明客观上可能存在着不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别或变动,可能发生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技术构成在变动方向上的不一致。但是,当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他的着眼点便从个别部门转向整个社会,从短期变动转向长期趋势,因而完全舍象了单纯的价值变动对资本价值构成变化的影响。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动时,虽然不再考虑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在变动方向上可能发生的不一致,但没有忽视两者在变动程度上的差异。

他在《资本论》中着重指出了这种差异:“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sup>①</sup>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区别,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就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3—684页。



是指资本价值构成，马克思提出有机构成概念，只是为了表示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内在联系，并没有要区分两种资本价值构成的意思。“如果果真有两种资本的价值构成，一种与技术构成变化有关，一种与技术构成变化无关”，那又怎么能够在实际计算上来分别表示它们呢？<sup>①</sup>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实际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本是一回事，既无区分之必要，也无区分之可能。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回答了这种看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确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对资本构成进行部门比较分析或短期变动分析时尤为重要。当然，从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无法理解这种区别。但只要从比较的动态的观点看问题，资本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区别则是客观存在的。

在肯定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概念区别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的分析。按照他的解释，马克思使用“有机构成”一词是用来指那些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变化。企业内部的技术变化是资本价值构成变化的一个特殊源泉，是由个别资本家直接控制的。但资本价值构成也会由于个别资本家不能控制的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动，例如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使得本部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价值发生变化。

“企业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这正是马克思在区分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时企图抓住的论点。…马克思最终想要证明的是，在个别资本家方面似乎合理的技术选择，会威胁到积累的基础甚至资本家阶级本身的生存。马克思用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这对概念所要表明的就是这个矛盾。”<sup>②</sup>

---

① 仇启华、解德源、黄苏：“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219页。

② D·哈维：《资本的限制》（1982年英文版），第127—128页。

断言“有机构成”一词只是用来指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变化,是错误的。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看作是引起资本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他说的有机构成当然不是指个别企业,而是指生产部门或社会的平均水平。个别企业由于技术变化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利润率,只有部门或社会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变动才和利润率变动存在负相关关系。部门或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并不是个别资本家能够直接控制的。个别资本家尽管在企业内部可以选择技术,但他们既不能控制技术变革的总方向,更不能阻止新技术在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中的扩散。个别资本家的意愿和资本的社会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个别资本家似乎合理的技术选择确实会导致违背资本家初衷并威胁积累基础的最终后果,这一切都在资本有机构成本身的变动过程中得到体现。认为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概念区别正好和上述矛盾相对应,则是一种牵强的理解。

另一种观点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本·法因 (Ben Fine) 和劳伦斯·哈里斯 (Laurence Harris)。他们也强调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概念区别。在他们看来,这两个概念反映了马克思理论分析上不同的抽象水平。积累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一方面通过改变资本的技术构成直接影响资本的价值比例,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生产资料和工资货物的价值而间接影响资本的价值比例。价值构成概念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这种双重影响,有机构成概念只反映了生产率变化通过改变技术构成所施加的直接影响,而舍象了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价值所施加的间接影响。资本有机构成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基于它们的旧价值,资本价值构成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基于它们的新价值。前者的变化与技术构成的变化成正比,后者的变化则不然。由于生产领域中创造的新的生产率水平必须通过有关商品的交换才能作为新价值的决定因素被确立,因此,“VCC只能在

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形成。而OCC则存在于一个较高的抽象水平上，存在于舍象了交换和分配的生产领域”。<sup>①</sup>

法因和哈里斯所说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对资本价值比例的所谓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只有在分析个别部门的资本构成及其短期变动时才有突出意义。从社会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化来看，技术构成的变动和要素价值的变动同时对资本价值构成发生作用，但技术构成变动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也并非处于抽象分析的不同层次上。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时同时提出的。根据他的分析，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必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方向，但并不与之成正比例，而是以较慢的程度提高，从而已经把生产资料价值下降的抵销作用包括在内了。

上述分析表明，哈维和法因、哈里斯强调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概念区别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这一区别的理解和说明，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

### 3. 资本有机构成的两种公式

在《资本论》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公式被确定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 $C/V$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公式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如多布、米克、斯威齐、马蒂克、吉尔曼、曼德尔、耶菲等。但是7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用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率，即 $C/V + S$ ，来表示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如考格伊、麦吉、霍奇森、格林、赖特、置盐信雄、赛克等。这两种不同的公式，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教科书

<sup>①</sup> B.法因、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59—61页。

引文中VCC代表资本价值构成，OCC代表资本有机构成。

派和现代派。<sup>①</sup>那末，哪一种公式更符合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呢？

主张用 $C/V + S$ 公式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资本论》虽然使用 $C/V$ 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但不排除 $C/V + S$ 可以更好地表达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资本有机构成表现生产过程中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和推动它所需要的活劳动之间的关系或比率，这正是 $C/V + S$ 公式所具有的含义。第二，资本有机构成通常用来衡量生产技术上的资本密集程度。“C与V的比率不是资本密集性的合适的衡量尺度，因为V的水平部分地依存于剥削率，而不仅仅以生产中不变资本和人类劳动的相对量为转移”。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最实用的简单表述是生产中物化劳动（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比率”，即 $C/V + S$ 。<sup>②</sup>第三，采用 $C/V + S$ 公式可以舍象剩余价值率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如果生产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不变，剩余价值率的高低直接制约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进而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反之， $C/V + S$ 所表示的资本有机构成会“独立于剥削程度的任何变化”<sup>③</sup>，它和利润率变动的反向联系将表现得更为直接。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把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率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它来论证例如利润率变动趋势等问题。而在于， $C/V + S$ 能否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公式？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

① P·V·帕里斯：“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危机理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年春季号，第13页。

② 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26页。

③ G·霍奇森：《利润率下降理论》，《新左派评论》第84期（1974年），第81页。

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sup>①</sup> 粗略一看，这段话似乎支持了有机构成公式现代派的观点，其实不然。马克思只是说，资本构成最终由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量与活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至于资本构成本身，只能是分为生产资料与活的劳动力，或相应地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以资本为主体的价值范畴。它指的是资本的构成而不是产品的构成。如果把 $C/V + S$ 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公式，那末这个 $V + S$ 究竟代表什么呢？在生产过程中， $V + S$ 代表工人支出的活劳动，活劳动作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形成价值，其本身并不是价值，也不能作为生产资本某一部分的独立存在形式。在产品中， $V + S$ 作为凝结状态的劳动，代表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但这个价值量既然已经包含在产品中，又怎么能成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可见，用 $C/V + S$ 作为资本有机构成公式，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C/V + S$ 公式舍象了剥削程度的变化对比率本身的影响，这是不说自明的。如果认为舍象剥削程度的影响就能从 $C/V + S$ 公式中直接地推导出利润率的变动趋势，那么只须指出，马克思对利润率变动趋势的论证并不要求舍象剩余价值率变动的的影响。相反，他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揭示一般利润率变动规律的。他的目的是针对李嘉图混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剥削率下降的错误，来证明“一个同样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sup>②</sup> 因此，为消除剥削率变动的的影响而用 $C/V + S$ 公式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0页。

替C/V公式来论述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并不是什么优点，倒正好违背了马克思所使用的正确方法。

#### 4. 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产量比率

资本有机构成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近似地反映了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比，表现出一定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有机构成可以作为衡量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一个指标。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不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他们通常用来表示和衡量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程度的经济指标，是资本/产量比率（资本—产量比率）。在某些经济增长模式中，资本/产量比率是决定国民产品增长率或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变量。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产量比率虽然都可以用来衡量资本密集程度，但这两个范畴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较它们的区别可以加深对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理解。

首先，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价值比率，而资本/产量比率是一个实物比率。资本/产量比率表示生产一定产量所需要的资本量。不论以总量为基础还是以净量为基础，这个比率通常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它们代表生产资料实物存量与实物产量之比，实际上是一个实物比率。因此，这个比率所反映的关系属于物质生产内部的一种技术关系，即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为生产一定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量。它们与社会关系或制度因素无直接关系。资本有机构成则不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不仅决定于生产资料实物量与劳动力数量之比，同时决定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本身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既是两种不同的物质生产要素，同时又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因此，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所反映的关

系，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关系，它们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来代替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重要工具。为什么他不限于对资本技术构成的分析，而提出一个决定于技术构成但表现为价值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同时，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都偏爱资本/产量比率这个分析工具，而从不接受或采用资本有机构成概念。

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计算或使用资本/劳动比率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工具。但在他们看来，资本不过是生产资料的同义语，资本和劳动被归结为生产中的两种物质要素，资本/劳动比率被看作是实物生产资料投入量与按劳动力或劳动人时计算的劳动投入量的比率。显然，这个资本/劳动比率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是不同的，或者说，它更接近于资本技术构成的概念。

从数量分析的角度考虑，资本/产量比率和资本/劳动比率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在经验分析中，试图用资本/产量比率的长期变动趋势来证明资本/劳动比率甚至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他们认为，生产中的活劳动投入量相当于生产中的增加价值或净产量，因而按资本存量和净产量计算的资本/产量比率的长期动态，可以代表资本/劳动比率或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动态。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产量比率是实物资本存量与实物产量之比，当然不能代表资本存量价值与产量价值之比，更不能代表资本有机构成，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资本存量与净产量的比率能否代表资本/劳动比率或资本技术构成呢？答复似乎是肯定的。其实不然。

这里要弄清物质产量与两种所谓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资本

和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三种比率关系，即资本/产量比率，资本/劳动比率(资本技术构成)和产量/劳动比率(劳动生产率)。三种比例关系是互相制约的。只有在劳动生产率不变即产量/劳动比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才会与资本/产量比率的变化成正比例，后者的动态才能代表前者的动态。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那么资本/产量比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仅在变动的程度上可能有差异，甚至在变动的方向上可以相反。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即使资本/产量比率下降，资本/劳动比率仍然可能提高，只不过提高的程度小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罢了；如果资本/产量比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幅度将更大。既然劳动生产率增长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常规现象，那么资本/产量比率的变动也会经常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不一致。关于这一点多布曾经明确指出：“甚至资本对产量的比率不变或下降，资本/劳动比率也完全可能提高，不过这只有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工人平均资本量的增长一样快或更快时才能发生。”<sup>①</sup>

## 第二节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

### 1. 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是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一贯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他的逻辑非常简单：资本积累是资本家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带来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又必然引起资本价值构成不断提高。“特殊

<sup>①</sup> M·多布：“利润率下降”，《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2期，第102页。



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sup>①</sup>“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sup>②</sup>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论断，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详细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个命题：一是技术进步的基本特性，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关系，三是资本技术构成变动与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关系。这一节首先研究第一个问题。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马克思是最早对技术变革给予极大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曾用二、三百页的篇幅集中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变化问题，特别是机器的发展和运用。在《资本论》中，关于技术变革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分析，几乎贯穿全书的始终。马克思对技术变化的研究所得出的重要理论结论之一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具有用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即扩大生产资料，相对或绝对减少劳动力。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这就是具有耗费资本（指生产资料）和节约劳动（指活劳动）的倾向。西方经济学通常按照对生产要素组成比例的影响，把技术变化分为三类：劳动节约型（或资本耗费型），资本节约型（或劳动耗费型）和中性型。从微观角度考察具体的发明或革新，这几种类型都可能存在。问题在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长期发展，究竟哪种类型占优势？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节约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5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6页。

的比率不断扩大，资本的物质构成或技术构成不断提高。

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上述命题，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确实具有节约劳动的长期倾向，但也有少数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节约资本和节约劳动都是技术进步的正常特性，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早阶段，节约资本的革新已占有重要地位，市场调节机制也会支配技术变化过程使之从长期看并不具有任何显著倾向，节约资本的发明同耗费资本的发明相抵销的中性技术革命倾向是完全可以设想的。<sup>①</sup>

反对技术进步是有节约劳动倾向的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人们在两点上忽视了技术变革对节约资本的作用。一是“资本货物工业中所有降低成本的改良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节约资本”。<sup>②</sup>二是许多技术改良虽然要耗费大量固定资本，但同时也节约了大量存货与在制品，它们抵销了多少增长的设备投资是不可估量的。这些说法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包含着许多概念上的混淆。为了澄清问题，我们应该区分资本的数量和价值，区分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和不变资本价值的节约。所谓资本货物工业中所有降低成本的革新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节约资本，只能就节约资本价值的意义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说资本货物工业中所有降低成本的革新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节约劳动（节约劳动力的价值）。这并不能作为论据证明技术进步特别具有节约资本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资本货物工业部门的技术革新虽然会降低生

---

① 参阅：J·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1964年中译本），第12页；E·O·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34页；M·布劳：“技术变革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第227—243页。

② M·布劳：“技术变革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第232页。

产资料的价值和成本，但它既要以第一部类本身巨大的物质资本耗费和劳动节约为前提，也不排除第二部类在机械化过程中大量物质资本对劳动的替换。因此，如果着眼于两种生产要素物质数量的比例变化，说技术进步具有节约劳动的倾向，大概是不会错的。

谈到技术变革中固定资本的耗费可能被存货的节约所抵销的问题，那末这里不仅要区别资本的数量和价值，还要区别资本的使用和预付。企业或部门所使用的流动不变资本即原材料的物质数量，一般说来和生产的规模和效率成比例增长，而与资本的周转速度无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缩短或运输业的发展而受到影响。当然，存货与在制品的数量会随着周转速度的加快而相对减少，但它所代表的只是流动不变资本的预付量，它的减少意味着流动不变资本预付价值的节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周转速度加快既影响流动不变资本的预付价值，也影响可变资本的预付价值，使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得到同等程度的节约。可见，无论从实际使用的物质资本量看问题，还是从预付的资本价值量看问题，都不能证明周转速度加快会节省原材料而抵销固定资本的增长，使技术进步不具有耗费资本和节约劳动的倾向。

有些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调节机制对技术变化长期过程的支配作用。他们认为，如果一段时间内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占统治地位，总成本中的资本份额将上升而劳动份额将下降，同时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将相对降低而资本价格将相对上涨，这必然诱使资本家更多地转向节约资本的技术革新。如果一段时间内节约资本的技术革新占统治地位，成本份额和要素价格将发生和上述过程相反的变化，从而推动资本家回过头来更多地采用节约劳动的革新。由于技术进步的长期型式是对于成本份额和要素价格变动作出连续调整的结果，因而不会在任何显著程度上表现出哪种

特殊倾向。<sup>①</sup>

毫无疑问，资本家的技术选择必定要考虑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力图节约相对稀缺和昂贵的生产要素。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技术进步会因市场调节机制而不具有任何倾向。必须看到，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不同于普通商品。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供给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的一定限制，它的价值决定包含着历史的道德的要素，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从而实际工资具有上升的趋势，它的价格即使因供过于求而下跌时也会受到工人的有组织的反抗，这一切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变化和价格波动不象资本货物那样剧烈，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和工资具有刚性。因此，即使资本大量投入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使资本成本和资本货物价格上升，劳动成本和劳动力价格却不一定按相同的程度下降，并足以驱使资本家转而选择以节约资本为主的技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形正是这样。虽然长时期以来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占主导地位，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比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劳动成本一直下降很慢，至今仍在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资本家也不得不继续把节约劳动作为技术选择的主要考虑。

主张技术进步具有节约劳动倾向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以劳动价格或劳动成本的上涨来说明这种趋势。早在30年代希克斯就指出：发明具有一种节约劳动的决定性倾向，其原因在于劳动这种生产要素一直变得相对昂贵。<sup>②</sup>但是这个论点受到持反对态度的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劳动成本的增长不足以证明技术进步一定会倾向于节约劳动，因为“企业家关心的是降低总成本，而不是劳动成本或资本成本这类特殊成本。当劳动成本提高时，

① M·布劳：“技术变革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第239—240页。

② J·希克斯：《工资理论》（1935年英文版），第123—125页。

降低总成本的任何进步都会受到欢迎，而这一点是通过节约劳动还是节约资本来达到则无关紧要”。<sup>①</sup>从逻辑上说，这种反驳并不具有说服力。断言资本家关心降低总成本当然是正确的，但说他们特别关心降低劳动成本也完全合乎逻辑。既然劳动成本通常在总成本占有较大比重，通过变革技术来节约劳动费用也必然有较大的迫切性。这显然是资本家特别关心节约劳动的一个原因。不过，仅仅用这一点来说明技术进步的节约劳动倾向是不够的。这种趋势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根源。

从资本主义经营的角度看，单纯节约生产资料的革新只具有降低成本的作用；而节约活劳动的新技术或既节约生产资料又节约活劳动的新技术，不但会降低成本，还能提高劳动效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这是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和加强竞争能力的主要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意味着缩短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这又可以加速资本周转，相对或绝对减少预付资本，提高年利润量或年利润率。可见节约活劳动比节约生产资料的技术革新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节约劳动的革新通常以机器设备的大规模使用为前提，而机器设备一旦被使用，就要作为固定资本进入产品的不变成本。机器设备和工人不同，不能被“解雇”，处于闲置状态也要受到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也必须折旧。因此，即使出现有利于使用劳动力的市场条件，企业也难以回到原来的生产方式。所以节约劳动和耗费资本的机械化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这至少对已经采用机器的企业来说是如此。

技术进步倾向于节约劳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原因。与单纯节约资本的革新不同，节约劳动的革新和机械化会在生产过程内部和生产过程之间引起强制关联或连锁反应。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相互依

<sup>①</sup> W·E·G·索尔特尔：《生产率和技术变化》（1960年英文版），第43页。

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操作过程或生产过程因采用节约劳动的新设备而提高了劳动效率，会立即引起生产内部的不平衡，推动与之有关的其他操作过程和生产过程相应提高劳动效率，以保持生产的均衡运转。因此，节约劳动的新技术一旦在生产的某个环节上被采用，就会诱发一系列同类性质的技术发明和革新，迅速向整个企业、部门和社会扩展。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的节约劳动倾向，还应该看到这一倾向的制度根源和阶级根源。西方学院派经济学从物质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归结为两种单纯的生产要素或要素投入。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仅仅是两种物质生产要素，他们同时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形式，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资本的生命在于吮吸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加强剥削剩余劳动的基本方法不外两种：扩大总劳动量以绝对增加剩余劳动量；减少必要劳动以相对增加剩余劳动量。后一种方法作为资本主义具有特征性的剥削方法，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要求生产资料的效能和数量相对于活劳动量更快地增长。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趋势：扩大雇佣工人投入生产的劳动量，同时使活劳动不断被物化劳动所代替。“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sup>①</sup>“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必要劳动，即通过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造成剩余劳动。因此就产生了资本要造成尽可能多的劳动的趋势，也产生了它要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sup>②</sup>

这一矛盾趋势体现在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资本积累过程中，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9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1页。

使推动资本积累的技术进步过程必然具有耗费生产资料和节约活劳动的内在倾向。

西方激进派经济学家也试图从更深的层次论述这一命题。例如大卫·耶菲强调,机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根源于资本概念本身: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力图无限制地扩大自身,但工人人口作为资本扩张的基础却是有限的,因而资本在自我扩张过程中要求尽可能独立于这个基础,对这个矛盾的辩证的解决就是通过用机器形式上的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来扩大生产规模。<sup>①</sup>耶菲的论证突出了工人人口的有限性,但正如赖特所正确批评的,这个论点的基本弱点在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不足。<sup>②</sup>同时,从这一假定出发,还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用工资增长来说明机械化的同一逻辑。

安沃尔·赛克特别批评了用工资增长解释机械化的论点。他指出,实际工资增长确实会诱导机械化,但生产领域中的机械化首先是实际工资能够提高的原因。因此,工资增长对机械化的影响是第二位的,它会加速机械化,但不是机械化的根源。机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的生产率,力图“完善”劳动过程使之日益专业化和常规化,工人的生产活动因而也越来越成为机械的和无意识的,并必然逐渐被实际的机器所代替。因此,“机械化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它产生于对劳动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义控制。”<sup>③</sup>

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具有一种倾向,把雇佣劳动降低为无

① D·耶菲:“马克思的危机、资本和国家理论”,《经济与社会》1973年第2期,第195页。

② E·O·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33页。

③ A·赛克:“经济危机理论史导论”,《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第233—234页。

生命无个性的资本附属物。这一倾向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sup>①</sup> 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固定资本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因此，手工劳动被机器所代替，简单的机器被复杂的机器所代替，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对抗关系。劳动力不只是一种物质生产要素，同时也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和阶级对立物。作为有生命、有意志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反抗和罢工形成对资本的巨大威胁。这是促使资本家用机器代替工人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曾指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sup>②</sup>

总之，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的节约劳动倾向，虽然可以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中找到部分的说明，但决定性的根源在于资本关系本身。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对这种倾向作了详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个经验证明的问题。这种证明是不难的。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有一些统计指标，不同程度地接近于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比率，可以用来验证技术进步是否确实具有节约劳动的总体倾向。

首先是按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John W·Kendrick）等曾对美国生产率的长期趋势作过深入研究。他在计算两种所谓部分要素生产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8—20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页。



率即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投入量的产量）和资本生产率（单位资本投入量的产量）的同时，也计算了资本/劳动比率。他提供的资本投入量是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为基础，再用基期报酬率加权而求得的，可以代表生产资料的物质数量；劳动投入量则是用基期平均小时报酬率加权的总劳动人时。因此，肯德里克按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大体接近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比率。根据他提供的长期数字，美国私人国内经济的有关比率在几个不同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动如下：

**表 1 美国的生产率变动（1889—1976年）**

	1889—1919	1919—1948	1948—1966	*1966—1976
劳动生产率	1.6	1.9	3.0	1.9
资本生产率	0.5	1.6	0.4	0.3
资本/劳动比率	1.1	0.3	2.5	1.7

• 为私人国内企业经济。

资料来源：J·W·肯德里克：《美国战后的生产率趋势，1948—1969》（1973年英文版），第41页；肯德里克、格罗斯曼：《美国的生产率》（1980年英文版），第34页。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在近90年的长时期内，尽管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变动在不同时期差别很大，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均快于（有时还大大快于）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因而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这些数据证明美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代替活劳动的长期趋势，即技术进步具有耗费资本和节约劳动的长期倾向。不过，就我们的验证目的来说，肯德里克的数据在统计口径上并不完全合适。首先，他的统计范围是私人国内经济，除包括各类企业外，还包括家庭和非赢利机构，后两者显然不属于经济部门。其次，他归于资本项目的生产要素，除了已

生产出的生产性资本货物以外，还包括住宅、大地和所有自然资源存量。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住宅并不是生产资料，土地和自然资源也不属于作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范畴。

为了排除非经济部门和资本项目中的住宅和自然要素，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统计指标，即按雇佣职工或劳动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或投入量。这一指标的缺点是没有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但它还是比较接近经济部门中物化劳动对劳动力（或活劳动）的比率，可以用来检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趋势和技术进步的要素节约倾向。

首先是美国非住宅企业部门中按雇佣职工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设备和建筑物）投入量。这一人均固定资本投入量的年平均百分比增长率，在1929至1982年期间为1.25，各分时期为：1929—1948，-1.04；1948—1973，2.63；1973—1982；2.34。<sup>①</sup>这里的非住宅企业部门，排除了一般政府、家庭、非赢利机构和外国政府、住宅服务以及国际资产，在概念上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部门，尽管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按马克思主义概念仍属于非生产领域的行业。

其次是关于美国和其他六个发达国家按劳动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在1870年至1978年的长时期内，它们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见表2。

以上统计数据可以证明，技术进步具有耗费资本和节约劳动的决定性倾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推断，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

## 2. 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

在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对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的分析，是

---

<sup>①</sup> E·F·丹尼逊：《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1929—1982》（1985年英文版），第93页。

**表 2 按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3	1973—1978
美国	2.6	1.9	2.9	1.8
英国	0.6	0.8	4.0	4.3
法国		1.7	4.5	5.3
德国	2.1	0.9	6.1	6.3
意大利	2.3 <sup>a</sup>	2.6	5.4	6.3
日本	2.0 <sup>b</sup>	2.9	7.6	6.8
加拿大		1.8 <sup>c</sup>	3.4	3.0
算术平均数	1.9	1.8	4.8	4.8

a: 1882—1913; b: 1880—1913; c: 1926—1950.

资料来源: A·麦迪森, 《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 第109页。

从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这个事实出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标志是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量增加, 或者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减少。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指出,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自然条件不说, “那末,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 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 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 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 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sup>①</sup> 劳动材料(流动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 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扩大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sup>①</sup>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682页。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同一劳动量加工更多的原材料，把更多的原材料转化为产品。因此，“原料量必须同劳动生产率成比例地增长。”<sup>①</sup>另一方面，劳动资料(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扩大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使用更多或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等。不过，劳动资料的扩大却不一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比例。“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即原料等等，就数量来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不断增加，而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照明设备、取暖设备等等却不是这样。”<sup>②</sup>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如果劳动资料数量的扩大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劳动资料价值转移部分就会减少。马克思在分析大型机器代替简单的手工工具时说过：“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大为增加，以致分摊到每一个商品上的机器、建筑物以及为机器工作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的价值组成部分(损耗部分)，比用旧的方法即用手工劳动和旧的手工工具生产同一商品时要少。”<sup>③</sup>反之，如果劳动资料的增加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劳动资料价值转移部分就会增大，但这个增加的物化劳动量必须小于单位产品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减少的活劳动量，否则，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总量就不会减少(假定其中包含的体现为原材料消耗的物化劳动量不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

---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0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9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97页。

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下来的价值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sup>①</sup>

归结马克思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一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必然增加。这不过是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同义语。马克思不但认为资本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它们的变动程度也是接近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发生的生产资料物质数量的相对增长，有没有起抵销作用的因素？答复是肯定的。这种抵销因素就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过不变资本节约的两种途径：“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和“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sup>②</sup>前者节约生产资料的价值，后者节约生产资料的数量。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是劳动社会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必然伴随物，它“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结合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起作用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就是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sup>③</sup>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除了节省活劳动外，也要尽可能节省物化劳动的使用和耗费。“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sup>④</sup>利润仍然是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

② 同上，第97页。

③ 同上，第100页。

④ 同上，第103页。

资本家节省不变资本的决定性动机。

马克思虽然详细研究过不变资本节省的问题，但他在分析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趋势时，很少谈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对技术构成提高的抵销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工业化机械化的历史阶段，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引起资本技术构成急剧增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虽然已经随着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开始显示出自己的作用，但还没有成为缓冲技术构成提高的显著因素。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机械化接近完成，恩格斯已注意到不增添昂贵的机器设备而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他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所补写的第四章中指出：“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塞麦、西门子、吉耳克里斯特—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炼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需要让茜根长几年，等茜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sup>①</sup>

20世纪以来，情况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资料节约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机器设备的节约。大机器工业一旦建立起来，设备和生产工艺的革新就成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方法，这种革新并不需要大量投资来增添固定资本。其次是建筑物的节约。如果说工业化时期必须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为机械化生产兴建厂房、仓库等等，那末在用新型机器代替旧机器或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一般机器的过程中，建筑物的扩大或相应扩大并不总是必需的。第三是原材料的节约。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产品向小型化发展。产品的小型化减少了制造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使原材料耗费的增长可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5页。

能小于甚至大大小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

不变资本的节约意味着单位产品中物化劳动的节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物化劳动的节约不仅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加迫切。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经济学家们也开始重视核算和分析资本/产量比率和资本的生产率，对生产率的研究已不限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而是建立了一套生产率统计体系，提出部分要素生产率和全部要素生产率概念。部分要素生产率指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量的产量）和资本生产率（即单位资本投入量的产量），全部要素生产率（即单位总投入量的产量）则被当作衡量生产率的最重要的综合指标。这套概念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生产要素服务论”和“边际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同意，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统计指标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劳动生产率是产品量与劳动投入量的比率，直接反映单位产品中活劳动的节约程度。资本生产率是产品量与资本投入量的比率（它的倒数就是资本/产品比率即资本系数），直接反映了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或产品中物化劳动的节约程度。全部要素生产率是产品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的比率，综合反映了单位产品中全部社会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约程度。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生产率的高低，归根到底是由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总量的多少来衡量的。马克思说：“加入商品的劳动总量的这种减少，好象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都一样。”<sup>①</sup>

这样，我们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一个衡量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或物化劳动）耗费和节约程度的统计指标，即资本生产率或资本/产量比率。资本生产率是否提高和提高的程度如何，亦即资本/产量比率是否下降和下降的程度如何，反映了不变资本使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1页。

用上节约的不同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无论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资本生产率或资本/产量比率的变动在不同时期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以美国制造业部门资本生产率的变动为例。

**表 3 美国制造业部门按单位资本投入量计算的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1899—1953年各分时期）**

	1899 以前	1899 —1909	1909 —1919	1919 —1929	1929 —1937	1937 —1948	1948 —1953
资本的生产率	-1.8	-1.6	-1.9	4.3	2.4	2.1	0.8

资料来源：J·W·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166页。

在1919年以前，美国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是下降的，表明生产资料的节约还不显著，还没有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这和1919年以前美国制造业中一直进行着的生产过程机械化和大规模建厂有关。1919年以后资本生产率转向提高，但不同时期的提高程度仍有差别。肯德里克指出：“时间的先后虽有不同，但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存在着按单位资本投入量计算的产量变动的某种典型形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以资本的急剧增大为特征，这是由于机械化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或预期产品需求和设备利用率的逐步增长而大量建造工厂，这个时期按单位资本投入量计算的产量通常是下降的。而后，一当生产过程已经按照现行技术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所要求的资本量建立起来，资本就主要用于进一步改进设备和生产过程。这个阶段，节约资本的新方法大量出现，因为用这类方法降低成本的可能性由于资本相对数量的增长而变得更大，于是按单位资本投入量计算的产量开始上升。”<sup>①</sup>

那末，是不是实现机械化和工业化以后，资本生产率就不会

<sup>①</sup> J·W·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165页。



再出现下降或停滞的情况呢？不是的。就一个生产部门来说，虽然按现有技术实现机械化生产后会有一或长或短的稳定发展时期，但一当新的技术革命到来，原有生产设备就会变得陈旧过时，不得不再次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更新，这时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又成为必要，同时可能再度出现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或停滞。就一个国家的全部生产或全部经济来说，实现工业化机械化后经过一定时期，也会由于新技术革命而发生生产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旧生产部门要进行全面技术改造，新兴部门更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这一切必然使资本投资急剧增长，资本生产率的提高也会随之放慢甚至转向停滞或下降。

总之，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作为生产资料相对增长的一种抵销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比率，影响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一般的规律是：如果不变资本使用上节约的作用不显著，资本的生产率不变或下降，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速度就会接近甚至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反之，如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大大加强，资本的生产率趋于上升或上升较快，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速度就会小于甚至大大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这一规律很容易证明。如果把资本/劳动比率看作资本技术构成，它的变动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变动和资本生产率变动的综合结果。肯德里克关于美国私人国内经济的几个比率变动，<sup>①</sup>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关系。在1889—1919, 1919—1948, 1948—1966, 1966—1976几个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 1.9, 3.0, 1.9；资本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5, 1.6, 0.4, 0.3；而资本/劳动比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 0.3, 2.5, 1.7，正好是前两组数字的差额。<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表1。

<sup>②</sup> 有的时期前两数相减同第三数略有出入，是因为小数点4舍5入的关系。

由于各个时期资本生产率都是上升的，增长率均为正数，所以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小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般说来，资本生产率增长愈快，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就愈慢，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额也愈大；如果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在个别部门个别时期是可能的），资本技术构成甚至会下降；反之，资本生产率增长愈慢，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就愈快，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别也愈小。

归结起来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正确地看到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必然带来资本技术构成的不断提高。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未能充分估计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可能对生产资料相对增长产生巨大抵销作用，他也没有预见到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3. 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

关于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变动的关系，马克思的看法是：资本价值构成必然随着技术构成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程度较小。他指出：“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地减少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sup>①</sup>可以看出，马克思论断的基础，是生产资料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3—684页。

价值量的下降不能完全抵销生产资料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即“不变资本的量的增长比它的价值的减少快”。<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受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证明，为什么生产资料价值量的下降抵销不了生产资料实物量的扩大。既然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生产资料本身的价值降低，那末生产资料实物量的增长就不一定意味着生产资料价值总量的上升。“无疑，工人平均的机器、原材料、建筑物等实物量已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增长了。但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价值概念，而工人平均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否已经提高或有一种提高趋势，却是完全不清楚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晚阶段。”因此，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是“最成问题的”。<sup>②</sup>

那末，马克思到底是怎样论证他的这个命题的呢？我们看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论述舍尔比利埃一章中的几段话，正如罗斯道尔斯基所指出，这些论述曾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忽视。<sup>③</sup>“毫无疑问，机器变得便宜是由于两个原因：由于制造机器的原料是用机器生产的；由于在把这种原料变成机器时使用机器。但是，这样说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在这两个部门，拿它们采用的机器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相比，花在机器上的资本同花在劳动上的资本相对来说，在价值上增加了。第二，单个机器和它的组成部分变得便宜了，但是发展起一个机器体系：代替工具出现的不仅是单个机器，而且是整个体系，…尽管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73页。

② E·O·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31—132页。参阅：P·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03页；G·霍奇森：“利润率下降理论”，《新左派评论》第84期（1974年），第63页；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英文版第2版），第196页。

③ R·罗斯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第406—407页。

各单个要素便宜了，机器的总体在价格上却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的增长就是由于这个总体的不断扩大。”“因此，机器价值的增长（与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较，因而也是与劳动价值，可变资本相比较），同机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这种说法，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是同义反复。”至于原料，“很明显，原料量必须同劳动生产率成比例地增长；也就是说，原料量必须同劳动量成比例。”“在原料方面，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纺纱业的生产力提高十倍，也就是一个工人现在纺的纱和过去十个工人纺的纱一样多，那末，为什么一个黑人现在生产的棉花不可以和过去十个黑人生产的棉花一样多，也就是说不可以使价值比例在这里保持不变呢？”“对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如下：一部分原料，如毛丝、皮革，是通过动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而棉、麻之类是通过植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至今不能，并且永远不能象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样来掌握这些过程。…至于煤和金属（以及木材），它们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变得非常便宜；然而在矿源枯竭时，金属的开采也会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等等。”结论是“原料、辅助材料等的降价，使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增长变慢，但没有使增长停止。”①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当时生产资料贬值抵销不了生产资料数量增长的原因。但是也要承认，马克思的论证是相对薄弱的。他关于机器所说的话，在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否仍然有效，却有待于进一步说明。至于有关原料的论点，从19世纪来看也符合实际。但20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如此高度，不但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02—406页。

依赖自然条件的那些原料生产部门如农业、矿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提高得更快，而且许多原属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生产过程已经能够“象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样来掌握”，本身已变成了纯工业部门（如化学纤维、合成橡胶、人造皮革等等）。因此，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来看，马克思的论证就显得说服力不足了。

尽管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论点持批评态度，不少激进派经济学者仍然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论证和维护马克思的这一命题。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耶菲试图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原理来说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他指出：“不断扩大物化劳动以代替活劳动的必然性，在为使产品低廉而采用机器的条件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就是，生产机器的劳动必须少于因使用机器而代替的（有偿）劳动（劳动力价值）。机器的价值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确定了使用机器的限界。这一点可以用代数式表示如下： $C_{t+1} - C_t < V_t - V_{t+1}$ 。显然，要使所有可供剥削的劳动为资本的利益而被雇佣，就要求劳动分工（物质方面）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总社会资本（价值方面）中C必须比V以更快的速度增长。”<sup>①</sup>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当机器的价值低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机器才能被使用。耶菲以这个原理为根据来证明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必然性，实在令人费解。从一方面看，机器代替劳动力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与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限界无关。无论机器的价值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增加的机器和减少的劳动力来说，总是代表着不变资本的净增长和可变资本的净减少，而不以可变资本价值减少超过

<sup>①</sup> D·S·耶菲：“马克思的危机、资本和国家理论”，《经济与社会》1973年第2期，第197页。

不变资本价值增长为前提。因此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条件来证明采用新机器时技术构成增长必然带来价值构成提高，是根本不切题的。但另一方面，上述观点决不能证明，作为机器总量对劳动力总量之比的技术构成提高，会必然引起机器总量的价值对劳动力总量的价值相对增长。道理很简单：在增加使用新机器的同时，原有机器可能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贬值；在减少使用劳动力的同时，所余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可能上涨。如果原有机器价值的减少等于甚至超过新添机器的价值，机器总量的价值将不变甚至下降。如果机器总量的价值下降等于甚至大于因使用新机器而减少的劳动力价值（在实际工资提高时，劳动力价值总额或工资总额的减少程度会小于劳动力总量的减少程度），投在机器等生产资料总量上的不变资本价值与投在劳动力总量上的可变资本价值的比率也可能不变甚至下降。可见，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并未因此而证明为必然，耶菲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试图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宏观角度来论证价值构成提高的必然性。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进步是在竞争的强制下由经常存在的节约生产费用的压力所推动的，它的宏观经济后果不会不同于它的微观经济后果。节约成本但不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要以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为先决条件。一种情况是活劳动能够有利可图地代替日益复杂的机器。另一种情况是第Ⅰ部类能够生产出节约劳动的复杂机器而不提高机器本身的内在价值，或者新原材料的价值下降大于工资货物的价值下降。这就要求第Ⅰ部类的劳动生产率比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由于新设备是用现有的机器和技术生产的，它自身的价值决定于现有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将来在它帮助下提高的生产率，而且新设备在开始阶段也不可能大量生产，所以上面那种假定从长期看是不现实的。因此，单位成本的节约必然有一种节约劳动成本的长期倾向。成本的节约会经常伴随着商品价值

中工资成本份额的相对下降，并因此也伴随着总资本中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下降。<sup>①</sup>

曼德尔的核心论点是，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设备价值的相对下降慢于工资货物即消费品的价值下降，因为第一部类的生产率增长较慢，新的机器设备只有在广泛应用并大批生产时才会变得便宜。这种看法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点，为什么第Ⅰ部类的生产率必然比第Ⅱ部类提高得慢，曼德尔并没有从理论上予以说明。机器设备的价值决定于它们自身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而与由它们协助提高的那种生产力无关。新的机器设备所以要到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时才变得便宜，不是因为使用它们的部门较高的生产率已成为常规，而是由于生产它们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已经普遍提高。虽然新设备的价值要在它们大批生产时才能下降，但消费品也只有在生产它们的新设备广泛采用后才会变得便宜。因此在理论上，似乎还得不出一般结论，究竟哪个部类的生产率从长期看必然更快。由于西方国家的统计概念和口径不同，我们找不到按部类划分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变动资料作实际比较。从战后美国各类产品的价格动态看，资本设备价格的上涨快于消费品，说明设备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比消费品部门缓慢。原材料这部分资本货物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以提供原材料为主的农业部门和矿业部门，它们的生产率增长在19世纪比制造业慢，但20世纪以来已逐渐超过制造业。同时，原材料价格还受到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初，原材料对制成品的价格趋于下降，1973年能源危机后转向上升，但不同时期的波动很大。因此，我们也不能从经验上得出肯定结论说，整个资本货物的价值一定比消费品价值下降得更慢。

第二点，即使生产资料价值的下降慢于生活资料，假定曼德

---

<sup>①</sup>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30年英文版），第202—203页。

尔的论证成立，也不能证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因为还涉及到工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总量和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的比例变化问题。如果工人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增长慢于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即实际工资）的增长，那末，即使生活资料价值比生产资料价值下降更快，也不能保证不变资本价值对可变资本价值的比率提高。因此，还必须证明另一命题：资本技术构成（工人平均使用的生产资料）比实际工资（工人平均消费的生活资料）提高更快。

爱德华·沃尔夫 (Edward N. Wolff) 提出的有机构成公式反映了上述关系：
$$\sigma = \frac{c}{v} = \frac{\lambda_2 (kx)}{(\lambda_1 w) N} = T \left( \frac{\lambda_2}{\lambda_1 w} \right)$$

其中： $\sigma$ 代表资本有机构成， $c$ 代表不变资本价值， $v$ 代表可变资本价值， $\lambda_2$ 代表生产资料部类单位产品价值， $\lambda_1$ 代表生活资料部类单位产品价值， $kx$ 代表工人使用的生产资料总量， $w$ 代表工人平均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实际工资）， $N$ 代表雇佣工人人数， $T$ 代表资本技术构成。沃尔夫用这个公式把资本有机构成分解为资本构成与实际工资之比和生产资料单位价值与生活资料单位价值之比，并指出：“假如实际工资的提高和技术构成的提高一样快，并且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劳动）价值下降幅度在两个部类中同样大，那么有机构成就不会提高。”<sup>①</sup>

有没有根据假定技术构成会比实际工资提高得更快一些呢？一般说来，实际工资的增长要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通常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如果实际工资增长过快并超过劳动生产率，迟早会引起双重反应：一方面，资本积累速度因利润被侵蚀而下降，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进而抑制实际工资上涨；另一方面，资本为补偿工资过分上升而加紧采用新技

<sup>①</sup> E·N·沃尔夫：‘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有机构成和一般利润率1947—1967年’，《美国经济评论》1979年610号，第331页。



术，用机器代替工人，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所以从长期看，假定实际工资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速度并不一定一致。前面已经指出，在不同条件下，技术构成提高可能快于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慢于劳动生产率。因此这两个变量的变动从长期看究竟孰快孰慢，也不能从理论上给予肯定的说明。

总的看来，关于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必然性，马克思的论证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提出有份量的论据。某些赞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理论的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sup>①</sup>甚至有人认为，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本来就不能用数学推导来证明，而应看作是马克思的一个经验命题。<sup>②</sup>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在理论暂时不能作结论的地方，只好看事实究竟说些什么。

### 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检验

#### 1. 资本价值构成的计算方法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价值构成是不变资本价值对可变资本价值之比。但这两种资本价值究竟怎样计算，是按照资本的存量计算，还是按照资本的流量计算，《资本论》中并没有说明。这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责难。布劳抱怨说：“马克思总是在

① A·赛克：“经济危机理论史导论”，《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第234页。

② A·里皮茨：“危机的背后：一种积累方法的耗尽，关于法国经验研究的‘调节学派’观点”，《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5页。

存量定义和流量定义之间任意变换而不告诫读者。”<sup>①</sup>在实际处理上，有的经济学家把C/V看作是不变资本存量对可变资本存量之比，有的则看作是不变资本流量对可变资本流量之比。吉尔曼在他的经验证明中，认为可变资本应该取流量（即年工资总额），因为“人们不能设想一个实际上可以衡量的工资资本‘存量’”。<sup>②</sup>他在不变资本上采取了兼顾的做法，分别按“流量基数”和“存量基数”作了计算。但他认为按流量计算的不变资本C不能作为计算资本构成的充分的基础，而按存量计算不变资本更为合理。<sup>③</sup>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十分清楚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的区别。他曾详细研究了资本的周转时间及其对预付资本特别是可变资本的影响。他不仅区别了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资本），而且区别了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耗费的资本）。抽象地说，生产资本的价值构成可以按照三种方法计量，即预付资本的价值构成，使用资本的价值构成和耗费资本的价值构成。预付资本价值构成是不变资本存量对可变资本存量之比。耗费资本价值构成是不变资本流量对可变资本流量之比。使用资本价值构成是固定不变资本存量和流动不变资本流量之和对可变资本流量之比。马克思是否不懂得这三种计量上的差别，从而如布劳所说经常在存量定义和流量定义之间任意变换呢？当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照其抽象分析方法，在谈到资本构成的大多数场合，总是暗含着总资本每年周转一次的假定。在这一假定条件下，资本存量等于资本流量，从而资本价值构成无论是按照预付资本、或使用资本、或耗费资本

---

① M·布劳：“技术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3年英文版），第229页。

② 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44页。

③ 同上。

来计量，都不会有差别。

在现实生活中，总资本年周转次数恰好等于一的情况当然是罕见的，资本存量 and 资本流量经常不一致。那末资本价值构成究竟应该怎样计量呢？从理论上说，判断哪种计量方法比较正确，要看哪种方法比较符合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真正以资本的技术构成和实际生产技术状况为基础。我们计算价值构成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是否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动，只有舍象周转因素的影响而突出技术构成这个基础，所计算的价值构成才能合理地与技术构成相比较。下面就按照这个判断标准来分析几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首先考察按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这种方法就固定资本部分来说是合理的，因为预付的固定资本价值（即固定资本存量价值）所代表的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要素，是企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的劳动资料。但预付的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大体相当于企业存货价值）却不能代表企业生产中实际加工的原材料。如果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大于一，比如说一年周转两次，那末当原材料价格一定时，实际耗费的原材料将是预付不变流动资本所代表的原材料的两倍；反之，如果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小于一，比如说一年周转半次，实际耗费的原材料就只相当于预付不变流动资本所代表的原材料的一半。同样的道理，预付可变资本价值（即工资存量）也不能代表企业实际雇用的劳动力：如果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实际雇用的工人数量将比预付可变资本所代表的工人数量大，如果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小于一，实际雇用的工人数量将比预付可变资本所代表的工人数量少。可见，除了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正好等于一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预付资本价值不能代表企业生产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数量和实际被加工的原材料数量，因而也就不能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实际状况。考虑到大多数企业和部门的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

按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通常会夸大资本构成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固定资本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原材料消费量和雇佣工人数量以同等的程度缩小，会虚假地提高生产资料对劳动力之比，进而提高不变资本价值对可变资本价值的比率。不仅如此。由于资本周转速度直接影响流动资本预付量，资本周转速度又因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情况变化而经常变化，按预付资本量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比率必然经常独立于技术构成和实际技术状况的变化而变动。

苏联经济学家伏·普·洛佐沃依以恩格斯补写的《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章末尾的一个计算实例为根据，主张按预付资本价值计算资本有机构成，理由是：只有这样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数才能较准确地反映企业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资本技术构成水平；如果按照固定资本预付价值和流动资本年周转价值来计算，就会使资本价值构成指数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时低于其实际水平，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小于一时高于其实际水平。<sup>①</sup>其实，按照流动资本年周转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数，倒比按照预付流动资本一次周转所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数更加符合实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是由企业实际雇用的工人和他们实际推动的劳动资料、实际加工的原材料来表示的，按照工资总额（即可变资本年周转额）、原材料价值总额（即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额）和劳动资料价值总额（即预付固定资本价值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最接近企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的实际状况。当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构成一定时，企业的预付资本量却会随着资本周转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资本周转速度由于流通时间缩短而加快，预付资本量必然相应减少，按预付资本量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也会随之改变。实际情况和

<sup>①</sup> 伏·普·洛佐沃依：“恩格斯论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计算”，《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10期，第6—7页。

洛佐沃依说的恰恰相反：不是按流动资本周转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低于（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时）或高于（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小于一时）实际水平，而是按预付流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高于（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时）或低于（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小于一时）其实际水平。洛佐沃依正确地看到了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资本有机构成时存在着差别，但他在判断究竟哪种计算方法更符合实际的问题上误入歧途。

洛佐沃依强调按流动资本周转额计算的资本有机构成指标不能确切反映周转时间长短不同的工业部门的实际生产率水平。我们就从他例举的造船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较来看。如果这两个部门按流动资本周转额计算的总资本量相等，但造船工业的资本技术构成高于食品工业，同时前者的资本周转次数小于一而后者的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那末显然，在按照预付资本计算价值构成时，造船工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将会降低，因为它的预付流动资本量比流动资本周转额大；而食品工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反会提高，因为它的预付流动资本量比流动资本周转额小。这也表明，按照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反倒会歪曲周转时间不同的各个部门的实际资本构成状况。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章末尾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那个算例为什么要用预付资本计算呢？那是因为恩格斯想用实例表明，资本家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实际可变资本是多么少，而他们的年剩余价值率是多么高。在那个数例中，恩格斯算出了一个高达 $1307\frac{9}{13}\%$ 的年剩余价值率，和一个 $97\frac{1}{2}C : 2\frac{1}{2}V$ 的资本价值构成，并强调指出：“总资本只有四十分之一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八次以上。”<sup>①</sup>洛佐沃依把恩格斯这个顺便提到的算例提到资本有机构成计算的方法论高度，我们觉得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页。

是言过其实了。

其次再分析按耗费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不变资本周转额与可变资本周转额之比）。这种计算方法，就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着实际加工的原材料和实际雇佣的劳动力。但是从固定资本部分来看却又有问题。按年周转额计算的固定资本价值是一年中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即折旧，是所费的固定资本价值而不是所用的固定资本价值。既然所费的固定资本价值大大小于所用的固定资本价值，固定资本年价值周转额当然远远不能代表工人实际使用的劳动资料量，因而全部按周转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总是大大缩小了资本构成的实际水平。其实，按周转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相当于按产品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虽然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通常会在产品价值构成的变动上得到反映，但二者的变动程度是不一致的，按产品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总是低于按全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马克思说：“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sup>①</sup>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单个商品及其价格上表现出来的同一比率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了”。<sup>②</sup>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即全部按预付资本价值计算或全部按资本价值周转额计算，都是不合适的。全部按预付资本价值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考虑到大多数企业和部门的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大于一，一般会夸大资本价值构成的实际水平；全部按资本价值周转额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又总是会缩小资本价值构成的实际水平。那末正确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该按使用资本价值计算。这样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表现为固定不变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

本预付价值和流动不变资本周转价值之和，与可变资本周转价值的比率。固定不变资本预付价值代表着企业实际拥有的劳动资料，流动不变资本周转价值代表着企业实际消耗的原材料，可变资本周转价值代表着企业实际雇用的职工，所以这样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比较符合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的实际状况。

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样的计算方法在统计上不尽合理。作为比率分子的不变资本价值，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采用存量价值，流动组成部分采用流量价值，因此，这种方法“把某一瞬间（年初或年终）的固定资本价值和全年的劳动对象周转额不合理地综合在一起了”。①在统计原理上，时点数字和时期数字是不能加总的。在这里，我们遇到概念合理性与统计合理性的矛盾，同时应该承认这种计算方法是一个在理论上正确但在统计上有缺陷的方法。

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采用耗费资本计算资本价值构成必然受资本周转因素的影响，不符合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看作是不受资本周转影响的范畴，在论述利润率差别时把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作为影响利润率的并列因素。为了舍象周转因素的影响，应该按照一次周转期来计算资本有机构成，因而应该采用预付资本而不应采用资本的年周转额。②

这种批评和洛佐沃依的意见相同，都认为采用流动资本的耗费价值即周转额会使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受到周转因素影响，采用预付资本价值则可排除这种影响。但是，我们主张用使用资本

---

① H·H·伊诺泽姆采夫：《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年中译本）上册，第389页。

② 葛亮：“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和当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硕士论文，未全文发表），第35—36页。

而不用预付资本计算资本价值构成，也是为了排除周转因素的影响。为什么同样的出发点却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呢？问题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预付资本量已定的前提出发，资本的周转额当然受到周转速度的影响，从使用资本量已定（包括流动资本周转额已定）的前提出发，周转速度则会影响到资本的预付量。那末究竟哪种前提合理呢？应该从预付资本量已定出发，还是应该从流动资本年周期额已定出发？换句话说，应该以一个周转期为时间单位来计算资本量，还是应该以一年为时间单位来计算资本量？

根据抽象的理论分析，似乎应该以一个周转期为单位从而以预付资本价值已定为出发点。马克思的逻辑分析方法的确是先考察舍象了流通领域的直接生产过程，再引进流通和资本周转因素的影响。但他在分析周转速度对年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时曾提出：

“在生产规模已定时，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以及全部流动资本）的绝对量，按照周转期间缩短的比例而减少，…在预付资本的量已定时，生产规模会随着再生产期间的缩短…而扩大”。<sup>①</sup>这个生产规模显然是以一年中的使用资本量、就流动资本说就是以一年中的流动资本周转额来衡量的。在实际的经济分析和统计中，不可能以一个周转期为时间单位来计算生产规模、产量、生产要素投入量等等。这不仅因为企业的实际周转期间很难精确测定，即使能测定，由于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周转期间长短不一，以周转期为单位所计算的产量、生产要素量等根本无法加总，求出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有关总量或平均量。既然企业的生产规模、产量和要素投入量等只能以年为单位计算，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也只能以年为单位来衡量，因此，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使用资本价值构成，最接近技术构成这个物质基础，最符合资本构成的实际状况，真正排除了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49页。



以上分别考察了计算资本价值构成的三种基本方法。除此以外，还有几种可能的或已被使用过的计算方法，如：不变资本预付价值比雇佣工人人数；①不变资本预付价值比可变资本周转价值；②固定资本预付价值比可变资本周转价值，③等等。前一种方法作为资本价值构成或有机构成的计算方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价值比率。后两种方法则值得稍加讨论。

先看不变资本预付价值与可变资本周转额之比。由于不变流动资本的预付价值大体相当于西方统计中的“存货”价值，这一比率的实际计算公式表现为： $\text{固定资本价值} + \text{存货价值} / \text{年工资总额}$ 。吉尔曼在他的四种计算中认为这种计算是最合理的。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最近似地反映价值构成的指标是：“固定资本价值和流动资本价值（即年初或年终具有的劳动资料和物质生产储备的价值）对年度工资基金之比”。④这种计算方法与前面谈到的按使用资本价值计算的方法相比较，唯一区别在流动不变资本上，用预付额代替了周转额。这一代替在概念上不尽合理，因为代表生产中实际加工的原材料的是流动不变资本的周转额而不是预付额；但它在统计上却比较合理，因为它用时点的存量价值代替了时期的流量价值，能够与固定资本存量价值结合为一个不变资本价值总量。这两种计算方法尽管在概念上或统计上有着各自的缺陷，但相对其它计算方法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此外，由于有关存货的统计资料或者不易找到或者时间较短，有时为了进行较长历史时期的统计分析，只好用固定资本存量价值代替不变资本存量价值作为分子，与职工工资总额相比，来计算资本的

① 阿·维特洛夫、弗·丘尼辛：“认识马克思研究资本有机构成的方法论的三个阶段”，《经济学译丛》1983年第2期。

②③ 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H·H·伊诺泽姆采夫等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80年中译本）上册。

④ H·H·伊诺泽姆采夫等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80年中译本）上册，第386—387页。

价值构成。

不变资本预付价值与可变资本周转额之比的公式也受到一种批评，认为预付资本属于资本所有权范畴，资本周转额属于资本再生产范畴，公式的分子和分母在归属上不统一，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sup>①</sup>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的预付价值或价值周转额不过是生产资本价值的不同计量方式，都属于生产资本范畴。就不变资本的预付价值来说，并不是指用以购买劳动资料和周转劳动材料的货币额，更谈不到什么所有权资本，而是指体现在固定资本存量 and 存货上的价值额，它们不过是处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存量的价值表现。可见这种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比较了计算资本价值构成的各种主要方法及其合理程度。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分析具有相对意义。绝对合理或精确的统计衡量是没有的。尽管我们认为某些计算方法比较合理，但不绝对排斥其他方法的可用性。对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与资本构成长期变动有关的一些问题。

关于资本价值构成的经验统计分析，除了计算方法以外，还有计算范围值得研究。这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资本价值构成的统计范围，应限于物质生产部门，还是所有经济部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根据资本在价值增殖中的不同作用来划分的，因而资本构成是一个属于生产资本的范畴，只适用于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所以严格说来，资本构成的计算应该限于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则包括一部分生产性活动，如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与商品使用价值的包装、保管、储存和转移相联系的商业活动。这种部门

<sup>①</sup> 葛亮：“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和当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硕士论文，未全文发表），第27页。

内部的生产性活动范围的比重一般说来比较难以确定。通常的办法是估定一个大体的比例，或者把整个部门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处理。在研究资本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的关系时，有关的统计分析当然应该限于物质生产部门或物质生产领域，因为这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直接相关。但是，在非生产性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中，也有一个体现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与体现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问题，这个比率的变动对社会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和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定目的，非生产性经济部门中的这一比率也应该计算，我们可以称之为准资本构成。当我们计算或分析全部经济中的资本构成时，已经把这种准资本构成的含义包括在其中了。

其次是可变资本价值周转额的计算范围，应该包括全部职工的工资和薪金总额，还是只包括生产工人的工资总额？这关系到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不是生产性劳动，他们的薪金属不属于可变资本范畴的问题。通常的计算都是把职工的薪金除外，认为企业经理人员的高薪不属于可变资本，而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大多数职员排除在雇佣劳动力之外，又显然是不合理的。职员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虽然不象生产工人那样直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但就其劳动性质来看仍然属于生产劳动，就其阶级地位来看仍然属于雇佣劳动。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sup>①</sup>实际情况也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趋社会化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生产工人的比重不断降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重不断提高。以美国制造业为例：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1889年职工总数为458万，其中非生产雇员（即职员）45万，占9.8%；而1979年，职工为2106万，其中职员598万，占28.4%。<sup>①</sup>从近年的数字看，职员已占到全体职工的四分之一以上。因此，按工资和薪金总额计算，虽然会略微夸大可变资本量，但若仅按工资总额计算，则会大大缩小可变资本量。如果能找到高级职员薪金在职员薪金总额中所占比重而加以扣除，当然最好；如果找不到，权衡前两种统计范围的利弊，我们认为还是按工资和薪金总额计算比较合理一些。此外，为了计算的合理与精确，如果有可能，还应该把工资和薪金总额转化为职工可支配收入（即扣除各项税收，加上各项福利），作为可变资本周转价值。但这只有在能够得到有关资料数据时才能做到。

## 2. 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

### （1）吉尔曼的经验数据

根据马克思主义概念对资本构成动态进行的长期经验证明，<sup>②</sup>从接触到的英文文献看迄今为止只有两项研究成果，都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吉尔曼1957年的专著《利润率下降》，一个是麦吉（S·H·Mage）1963年末发表的博士论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此外还有苏联经济学家所提供的数据。遗憾的是，我们未能看到麦吉的论文。

吉尔曼的经验验证甚为详细，但只限于美国制造业。他以美国的官方历史统计为原始资料，分别按流量基数和存量基数对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三个主要变量作了四组计算。现将他计算的资本有机构成数据列表如下：

①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英文版），第666页；《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1年1月英文版），第24—25页。

② 我们把“长期”限定为50年以上。

**表 4 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吉尔曼数据)**  
(1849—1952年)

年份	流量基数 1	流量基数 2	存量基数 1	存量基数 2
1849	2.3			
1859	2.7			
1869	3.2			
1879	3.6			
(1880)			0.8	1.5
1889	2.7			
(1890)			1.1	1.9
1899	3.2			
(1900)			1.7	2.6
1904	3.4			
1909	3.7			
1912			2.3	3.2
1914	3.7			
1919	3.8	3.9	3.2	4.5
1920		3.4	3.1	4.3
1921	3.3	3.5	4.1	5.6
1922		3.5	3.5	4.7
1923	3.3	3.5	3.0	4.2
1924		3.6	3.2	4.4
1925	3.5	3.7	3.1	4.3
1926		3.6	3.0	4.4
1927	3.4	3.6	3.1	4.4
1928		3.7	3.2	4.5
1929	3.4	3.6	3.1	4.4
1930		3.6	3.7	5.1
1931	3.2	3.5	4.4	5.9

续表

1932		3.6	5.6	7.3
1933	3.4	3.7	4.9	6.7
1934		3.6	4.0	5.4
1935	3.6	3.8	3.4	4.7
1936		4.0	3.0	4.3
1937	3.5	3.7	2.7	4.0
1938		3.9	3.5	4.9
1939	3.5	3.7	3.0	4.3
1940			2.8	4.0
1941			2.2	3.4
1942			1.8	2.7
1943			1.5	2.2
1944			1.5	2.1
1945			1.9	2.5
1946			2.3	3.3
1947			2.4	3.3
1948			2.5	3.5
1949			2.8	3.8
1950			2.7	3.6
1951			2.6	3.5
1952			2.6	3.6

说明：流量基数1=原材料消耗价值/工资总额；

流量基数2=原材料消耗价值+固定资本折旧价值/工资总额；

存量基数1=固定资本存量价值/工资总额；

存量基数2=固定资本存量价值+存货价值/工资总额。

资料来源：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37页，  
40页，40—49页，55—56页。

以上是吉尔曼所计算的四种资本价值构成（他称之为有机构成）数据。我们已指出，按流量基数即耗费资本所计算的不变资本量不符合资本有机构成中的资本概念。即使如此，四种数据所表现的资本价值构成动态是基本相同的：1919年以前不同程度地迅速提高，而1919年以后则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对于吉尔曼的统计验证，经济学家的评论各不相同。有些人对吉尔曼所使用的统计资料的精确性表示怀疑。英籍印度经济学家梅赫纳德·德赛认为：“使用国民收入统计和普查资料包含许多衡量上的问题，甚至从主流派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它们也会使验证过程复杂化。这些资料涉及到不精确性、衡量误差和指数问题。它们虽不反映吉尔曼的工作质量，但却使得靠不充分的实际资料检验理论变得复杂。”<sup>①</sup> 美国经济学家维克多·佩洛在批评克里默等人计算资本/产量比率而没有充分调整原始统计资料时也指出，吉尔曼虽然意识到某些重要的歪曲因素并对原始统计作了适当调整，但却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些方面，例如他使用了固定资本估算的永续存货方法（Perpetual—Inventory Method）和资本净存量而不是总存量，导致30年代期间固定资本存量估计的过分压低。结果是，他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虽不如克里默等人计算的资本/产量比率下降得那样剧烈，但仍然是不精确的。<sup>②</sup> 尽管人们对吉尔曼的数据的确切性提出怀疑和批评，但作为第一个对马克思的若干理论进行长期经验证明的学者，他的努力得到了肯定。多布在50年代末便指出吉尔曼的著作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并希望人们“按同样的方

---

① M·德赛：《马克思经济学》（1979年英文版），第196页。

② V·佩洛：“制造业中的资本与产量的比率”，《经济学与商业评论季刊》1968年秋季号，第32—33页。佩洛有关批评的详细介绍，请参阅高峰：“评当代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论战”。

法作进一步的探索”。①

吉尔曼的研究所引起的最大反响，是人们发现20世纪以来资本价值构成的动态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上升转为下降。这不但为那些对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经济学家提供了经验数据，②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去探讨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吉尔曼本人就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他的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但是，自从吉尔曼的著作发表以后，借助于他的经验数据，即使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派经济学家也大多认为，20世纪以来资本价值构成已不再提高，而是趋于下降或稳定。

这一观点也为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持有。他们认为，“美国在19世纪，无论是加工工业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价值构成都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在20世纪则是其稳定的趋势，有些时期甚至是其下降的趋势占居优势。这可从下列材料中得到证实。美国加工工业中资本对工资之比是：1879年为2.38，1889年为2.51，1899年为3.62，1909年为4.12，1919年为3.26，1929年为3.67，1937年为3.51，1948年为2.49，1953年为2.30，1960年为2.45。…在美国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中，资本对工资之比是1929年为4.06，1937年为4.15，1940年为4.06，1950年为3.41，1958年为3.61，1965年为3.5，1968年为3.6。”所有资料都“证明20世纪资本价值构成稳定化的结论”。③

---

① M·多布：“利润率下降”，《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2期，第102页。

② 例如：G·霍奇森：“利润率下降理论”，《新左派评论》第84期，1974年；P·斯威齐：“资本积累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每月评论》第26卷第1期，1974年。

③ H·H·伊诺泽姆采夫：《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年中译本）上册，第387—389页。



对于西方或苏联所流行的上述观点应该怎样看呢？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至少有两个重要缺陷。第一，吉尔曼的统计序列只延续到50年代初期。从1920到1952这30年左右时间内，包括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特殊时期，资本积累的正常机制可能受到严重干扰，资本构成的动态能否代表正常趋势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不谈原始统计资料中的问题，仅靠这一时期的经验数据就断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已不起作用，未免过于轻率。

第二，有些经验数据虽然延续到60年代末期，但却没有对第二次大战结束前时期和结束后时期进行分阶段具体分析。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这种分段分析对于具体考察不同时期资本构成的动态变化及其长期趋势，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克服上述缺陷，提供更长期的经验证明，便是进一步研究20世纪资本构成变动趋势所必需做的工作。

## (2) 我国研究者的经验数据

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按不同时期重新计算了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构成，把时限延长到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虽然这些经验证明所使用的是未加调整的统计资料，计算程序也比较简单，但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得出某些新的重要结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项经验数据是不严格地按照使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sup>①</sup>时间起于1879年，止于1979年，分两个时期(1879—1929, 1929—1979)计算，并同时计算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以便比较分析。

---

<sup>①</sup> 高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表 5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构成变动**  
(1879—1929年)

年份	劳动生产率 (指数)		资本技术构成(职工 人均占用资本量)		资本价值构成	
	1929=100	1879=100	数量 (1929年 美元)	指数 1879=100	比率	指数 1879=100
1879	38.3	100.0	1764	100.0	2.87	100.0
1889	47.8	124.8	2433	137.9	2.58	89.9
1899	54.1	141.3	3400	192.7	3.34	116.4
1909	59.7	155.9	4496	254.9	4.12	143.6
1919	60.8	158.7	4686	265.6	3.24	112.9
1929	100.0	261.1	6524	369.8	4.14	144.3

(1929—1979年)

年份	劳动生产率 (指数)		资本技术构成(职工 人均占用的固定资本 量)		资本价值构成(按固 定资本量计算)	
	1969=100	1929=100	数量 (1958年 美元)	指数 1929=100	比率	指数 1929=100
1929	41.5	100.0	5027	100.0	1.17	100.0
1933	36.8	88.7	6300	125.3	1.71	146.2
1939	40.6	97.8	3999	79.6	1.09	93.2
1943	51.9	125.1	2335	46.4	0.46	39.3
1948	51.1	123.1	3812	75.8	0.88	75.2
1949	52.1	125.5	4273	85.0	0.99	84.6
1953	61.1	147.2	4160	82.8	0.86	73.5
1959	74.9	180.5	5199	103.4	1.05	89.7
1963	86.7	208.9	5284	105.1	0.96	82.1
1969	107.0	257.8	6030	120.0	1.03	82.0
1973	125.3	301.9	6579	130.9	1.12	95.7
1979	141.8	341.7			1.28	109.4

其中：1948—1979的增长指数(1948=100)

1948		100.0		100.0		100.0
1953		119.6		109.2		97.7
1959		146.6		136.4		199.3
1963		169.7		138.7		109.0
1969		209.4		158.3		117.0
1973		245.2		172.7		127.3
1979		277.6				145.5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美国统计摘要》有关各期，《国民收入，1954年》，《美国的收入和产量》，《商业现况》有关各期，《基本经济统计手册》

有关各期，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详细出处及有关计算数字请参阅高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第43—47页。

现将上表数据作一说明。1879至1929年期间用以计算资本构成的资本量，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用于技术构成）和按现行价格计算（用于价值构成）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总和。固定资本包括土地、建筑物和设备存量净值；流动资本包括除证券外的其它资产，主要是现金、应收的帐款和票据，以及存货。由于其中某些不属于不变资本的项目无法排除，资本量被夸大了，按此计算的资本构成会高于实际水平。1929年至1979年期间用以计算资本构成的资本量，因当时资料所限，仅限于按不变价格和现行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存量净值，这又会缩小不变资本量，使所计算的资本构成低于其实际水平。尽管上述两个时期所计算的资本构成指数与资本构成的实际水平不尽相符，但因各对比期都有同样不纯因素，对资本构成的变动趋势不会产生严重的歪曲。此外，由于1974年后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固定资本存量价值的统计数字当时未能找到，所以没有算出1974年以后的资本技术构成。

上述经验数据所提供的基本动态可先简要概括如下。第一，在1879至1979长达100年时期内，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但前50年提高1.6倍，后50年提高2.4倍，表现为一种加速提高的趋势。第二，同时期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是趋于提高的。但前50年提高2.7倍，后45年仅提高30%，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结果是，前50年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程度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程度，后50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大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程度。第三，资本价值构成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动态有很大变化。前50年价值构成趋于提高，增长了44%；后50年则趋于稳定，仅提高了9%。第四，如果把后50年进一步分

为两个时期，可看出在价值构成稳定趋势背后所隐藏的重大差别。以1948年为分界限，前20年价值构成下降了25%，后30年价值构成却提高了45%。第五，统观1879至1979年100年的长时期内，除了1929至1948这20年，绝大部分时间（前后共80年）内始终存在着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趋势，尽管提高程度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

第二项经验数据是严格按照使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sup>①</sup>时间起于1859年，止于1981年，共120年左右。也同时计算了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三组数据。

---

<sup>①</sup> 王庭笑：“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变动的长期趋势”（硕士论文，未全文发表）。

**表 6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 (1859—1981年)**

年份	劳动生产率		资本技术构成 (职工人均占用资本量)		资本价值构成	
	指数	指 数	数量	指 数	比率	指 数
(1869—1914) <span style="float:right">1929年不变</span> 1929=100 1869=100 价格,美元 1879=100 <span style="float:right">1859=100</span>						
1859					5.39	100.0
1869	35.5	100.0			5.94	110.2
1879	38.3	107.9	1764	100.0	6.53	121.2
1889	47.8	134.6	2433	138.1	5.34	99.1
1899	54.1	152.4	3400	193.0	6.68	123.9
1904	57.9	163.1	4105	233.0	6.99	129.7
1909	59.7	168.2	4496	255.2	7.36	136.5
1914	66.0	185.9	4890	277.4	7.31	135.6
(1914—1947) 1929=100 1914=100 <span style="margin-left: 100px;">• 1914=100</span> <span style="float:right">1914=100</span>						
1914	66.0	100.0	4885	100.0	7.31	100.0
1919	60.8	92.1	4887	96.0	6.48	88.6
1925			6522		5.15	70.5
1929	100.0	151.5	10176	133.5	5.03	68.8
1935	97.3	147.4	10990	144.2	5.78	79.1
1939	107.3	162.6	9300	122.0	5.06	69.2
1947	122.2	185.2	6472	84.9	3.59	49.1

续表

(1947—1981)

1958年不变

1967=100 1947=100 价格, 美元 1949=100

1947=100

1947	49.3	100.0			3.59	100.0
1948	52.1	105.7	14618	100.0	3.79	105.6
1955	67.1	136.1	17338	118.6	3.85	107.2
1959	74.9	151.9	19850	135.8	4.16	115.9
1965	96.6	195.9	24338	166.5	4.40	122.6
1970	106.8	216.6	29845	204.5	5.30	147.6
1975	123.5	250.5	31365	214.6	5.72	159.3
1979	142.0	288.0	37376	255.7	5.74	159.9
1980	140.9	285.8	40248	275.3	6.16	171.6
1981	144.6	293.3	29041	267.1	6.48	180.5

• 因资料所限, 1929年以前年份按1929年不变价格计算, 1929年以后年份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 故1929年有两个数字。为使两个阶段的数字具有可比性, 用指数将二者衔接和统一起来。

计算根据: 《美国历史统计: 1789—1945》, 《美国历史统计, 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 《美国统计摘要》有关各期, 《基本经济统计手册》有关各期,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有关各期, 肯德里克: 《美国的生产率趋势》。详细出处及有关计算数字请参阅王庭笑: “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变动的长期趋势” (硕士论文, 未全文发表)。

这一组经验数据与前一组数据相比较, 首先可以看到若干差别。第一个差别是资本构成的绝对值不同, 后者高于前者。这是因为前一组数据所计算的不变资本量在1929年以后只包括固定资本, 而这一组数据中的不变资本量是严格按照使用资本计算的,

包括固定资本净存量 and 流动不变资本消耗量。<sup>①</sup> 这样计算的生产资料量和不变资本价值，当然比仅仅按固定资本计算的相应数值大得多，以此为基础所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也必然要大得多。第二个差别是资本构成的变动程度不同。这是由起始和终结年份以及分期上的差别所造成的。严格说来，任何选定时期所计算的实际变动率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任何时期的基期年份和终期年份“就经济周期的阶段或短期需求压力方面而言是不可比的”，<sup>②</sup> 从而在实际产量和生产要素的实际利用程度方面是不可比的。就我们的数据来说，特别是在按资本存量计算不变资本量的场合，某些年份所算出的资本构成水平可能产生较大的歪曲。例如在危机年份，设备利用率大大下降，存货急剧增长，但闲置的厂房设备仍然要计入固定资本存量之中，多余的职工则会被解雇，这就使得资本存量的缩减程度大大低于职工的缩减程度，按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也会出现上升的假象。在高涨年份，由于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和存货的相对减少，资本存量的增长程度会小于职工的增加程度，从而使按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低于实际水平。因此，如果基期是危机年份而终期是高涨年份，该时期计算的资本构成增长率必然被压低；反之如果基期是高涨年份而终期是危机年份，所计算的资本构成增长率又必然被夸大。这表明基期年份和终期年份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两个不同的时期划分其基期或终期年份只相差几年，而计算的有关指标的变动率却相差很大。这就告诉我们，对不同时期的资本构成变动应该作谨慎的具体分析；而在观察或比较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动时，重要的不是某些数据的绝

① 流动不变资本价值通过用产品值减去“制造增值”而求得。产品值是产品在进入消费前实现的凝结在其中的全部价值。“制造增值”则是“商品值和生产商品时所使用的原材料或供应品的费用之间的差额”。前者减去后者，相当于生产中消耗的原材料价值，即流动不变资本价值。

② E. J. 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1985年中译本），第560页。

对值，而是它们所反映的基本动态。

如果立足于基本动态和基本趋势的比较，那末，这两组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从第二组数据来看，在第一个时期（1869—1914），劳动生产率提高约90%，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近1.8倍，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约40%。技术构成的增长程度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程度；价值构成的提高程度小于技术构成的提高程度。在第二个时期（1914—1947），劳动生产率提高85%，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都分别下降约15%和50%。在第三个时期（1947—1981），劳动生产率提高1.9倍，资本技术构成提高1.6倍，资本价值构成提高80%。后两个时期相比资本构成的动态存在着根本性变化，但它们同第一个时期相比却有一个共同点：资本技术构成已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或者下降或者只以较小的程度提高。尽管如此，统观从1859至1981这长达120年的时期中，除了1914至1947年这一时期，前后近90年内仍然一直是资本构成提高的趋势占主导地位。

第三组经验数据是严格按照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sup>①</sup>时期起于1880年，止于1979年，共100年时间。同时还计算了从1925年至1970年的劳动力资金装备率。现将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表 7 美国制造业的预付资本价值构成（1880—1979年）**

年份	价值构成 (比率)	指数 (1925=100)	年份	价值构成 (比率)	指数 1925=100
1880	8.27	68.4	1920	12.43	102.7
1890	6.84	56.5	1921	12.62	104.3
1900	8.79	72.7	1922	13.23	109.3
1912	11.58	95.7	1923	11.74	97
1919	13.97	115.5	1924	12.39	102.4

<sup>①</sup> 葛亮：“当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计算及其提高趋势的分析”，《世界经济》1985年第10期。



续表

1925	12.10	100	1958	11.01	127
1925	8.67	100	1959	10.58	122
1927	8.34	96.2	1960	10.59	122.2
1929	8.54	98.5	1961	10.73	123.8
1931	8.78	101.3	1962	10.28	118.3
1933	8.92	102.9	1963	10.22	117.9
1935	9.30	107.3	1964	10.20	117.7
1937	8.10	93.4	1965	10.33	119.2
1939	8.68	100.1	1966	10.01	115.5
1940			1967	9.98	115.1
	第二次世界大		1968	10.14	117
1946	战期间缺资料		1969	10.32	119
1947	9.17	105.8	1970	10.58	122
1949	10.86	125.3	1971	11.71	135
1950	10.17	117.3	1972	11.41	131.6
1951	9.75	112.5	1973	11.78	135.9
1952	9.22	106.3	1974	12.68	146.3
1953	8.99	103.7	1975	14.57	168
1954	9.74	112.3	1976	14.47	166.9
1955	9.96	114.9	1977	15.00	173
1956	9.71	112	1978	15.15	174.7
1957	10.52	121.3	1979	15.54	179.2

说明：由于找不到预付固定资本的长期延续数值，故以美国普查局的材料为主，以吉尔曼的材料为辅，分别对1925年以前和以后的资本价值构成进行计算。再把1925年的两种数据都化为100，用指数将两个系列连结起来。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美国统计摘要》有关各期，吉尔曼：《利润率下降》。

**表 8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资金装备率 (1929—1970年)**

年份	资金装备率 (百万美元/千人)	指数 (1929=100)	年份	资金装备率 (百万美元/千人)	指数 (1929=100)
1925	9.34	100	1954	10.58	113.3
1927	10.23	109.5	1955	10.61	113.6
1929	10.34	110.7	1956	11.17	119.6
1931	13.24	141.8	1957	11.72	125.5
1933	13.32	142.4	1958	12.73	136.3
1935	9.76	104.5	1959	12.30	131.7
1937	8.90	95.3	1960	12.57	134.6
1939	9.47	101.6	1961	13.19	141.2
1940	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 间缺资料		1962	13.12	140.5
—			1963	13.32	142.6
1946			1964	13.61	145.7
1947		7.85	124.0	1965	13.61
1949	9.18	98.3	1966	13.98	149.7
1950	9.21	98.6	1967	14.88	159.3
1951	9.31	99.7	1968	15.48	165.7
1952	9.78	104.7	1969	15.70	168.1
1953	9.67	103.5	1970	17.04	182.4

说明：劳动力资金装备率是一定量不变资本与它所装备的工人的比率，不变资本用不变价格指数计量。其中固定资本是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列；流动不变资本找不到相应的不变价格指标，是以所有物质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以1967年为100）推算出的不变价格数列。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

对这组统计数据，我们将着重分析按预付资本所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动态。至于劳动力资金装备率，虽然作者认为它不是资本技术构成的直接形式，而是价值构成的变种，但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它应该被看作是资本技术构成的近似指标，而它的动态同前两项数据中的资本技术构成动态是基本相同的。关于预付资本价值构成，作者的计算方法是，先用年产品值减价值增值求出年流动不变资本周转额，再以存货作为预付流动不变资本去除年流动不变资本周转额，求出流动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再以这个流动资本周转次数除年工资总额而求出预付可变资本。这种计算方法是可行的。那末，这样计算的预付资本价值构成数列同前面按使用资本计算的两项资本价值构成数列相比较，在动态上有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呢？

如果仔细地分析和比较，应该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在这项数列中，价值构成指数在1880—1919年期间是上升的，从68.4提高到115.5；在1919—1947年期间是下降的，其中各年有很大波动，但指数一直在100上下徘徊；在1947—1970年期间则又在波动中趋于增长，指数从105.8逐渐提高到179.2。这种资本价值构成动态的时间型式，与前两项资本价值构成数列相比基本是相同的。

按预付资本计算价值构成的研究者认为，应该用“近直线法”代替“点查法”来观察价值构成的长期动态。这种方法确实克服了前面已经指出的取点分期时不同年份缺乏可比性的缺点，并可舍象掉周期波动所引起的资本计算上的较大误差。但另一方面，这种“近直线法”也有一个缺点，即容易掩盖较长时期的实际动态变化。以预付资本价值构成这个统计数列为例，“近直线”不但舍象了危机和战争所造成的短期波动，同时也抹杀了某些较长时期中与基本趋势相反的动态，例如1919年到1949年间价值构成的波动下降。这个长达28年的下降趋势显然不是危机或战争所造成的短期波动所能说明的。该文作者根据“近直线法”得出结论

说：在考察的“这100年时间内，资本有机构成运动趋势没有什么大的曲折，而是持续上升的”。<sup>①</sup>这个论断与他的经验数据不相符。从数据看，价值构成指数不仅在1919至1947年间波动下降，而且在1960至1969年间停滞不前，可见这种上升趋势并不是“持续”的。

该文作者还认为，他得出的关于资本价值构成“持续上升”的结论与某些研究者的“基本稳定”或“提高缓慢”的论点之所以不同，还在于计算资本价值构成的方法不同：持“基本稳定”观点的人多用“预付不变资本/年工资总额”公式；持“提高缓慢”观点的人则是用“年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公式。他依据统计资料按不同公式作了计算，结果表明，60年代的“预付不变资本/年工资总额”的指数平均值比20年代的平均值低（89.7105.2）；同期相比的“年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平均值虽有所提高但微乎其微（101.9:101）；只有“预付资本价值构成”的指数平均值同期相比有较大程度的提高（118.6:101.3）。其实这种按不同公式所计算的价值构成和变动程度水平的差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可变资本的周转额和预付量不同以及它们的变动程度不同。根据该作者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计算，<sup>②</sup>20年代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总额为969亿美元，平均年预付可变资本为356亿美元；而60年代的平均年工资总额为7093亿美元，平均年预付可变资本为1925亿美元。这表明，60年代与20年代相比，平均年工资总额即可变资本周转额增长了7.3倍，而平均年预付可变资本量只增长了5.4倍。原因是不说自明的，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加快了，由20年代的2.7次提

---

① 葛亮：“当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计算及其提高趋势的分析”，《世界经济》1985年第10期，第28页。

② 葛亮：“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和当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硕士论文，未全文发表），第62—63页。

高到60年代的3.7次。既然可变资本的预付量比周转额增长得缓慢，按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与按使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相比，就必然不仅在绝对值上要高得多，而且在增长速度上要快得多了。

### (3) 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动型式

通过比较和分析上述四项经验数据，①可以概括出100多年长时期内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的若干长期动态。

第一，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呈现一种提高—下降—提高的长期变动型式。相应的三个时期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40年代至70或80年代。在第一个时期，资本构成的各项经验数据都表现为提高趋势。从资本价值构成的年平均增长率来看，按照数据1（存量基数），1880至1919年期间为2.7%；按照数据2，1879至1929年期间为0.7%；按照数据3，1859至1914年期间为0.5%；按照数据4，1880至1919年期间为1.3%。在第二个时期，资本构成表现为下降趋势。价值构成年平均增长率按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分别为1919至1947年为-0.9%，1929至1948年为-1.4%，1914至1947年为-2.1%，1919至1947年为-0.3%。在第三个时期，资本价值构成再次表现为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48至1979年间1.2%，1947至1981年间1.7%，1947至1979年间1.6%。

第二，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型式与价值构成基本相同，但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对比关系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和以后发生了根本变化。20年代以前，技术构成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20年代以后，劳动生产率比技术构成提高得快（在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时资本技术构成甚至于能下降）。根据数据2，在1879至1929年期间，资本技术构成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劳动生产率的年

---

① 下面我们把这四项经验数据按顺序分别称之为数据1、数据2、数据3和数据4。

平均增长率仅为1.9%；而在1929至197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2.5%，资本技术构成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6%。这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加速的趋势，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则表现为减速趋势。

第三，资本价值构成变动与技术构成变动的相关性以本世纪20年代为分界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年代以前，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变动方向总是一致的（虽然程度不同），不管从长期看还是从中期看，技术构成的提高趋势总是伴随有价值构成的提高趋势。从20年代开始，这种相关性削弱了。虽然从长期看两者的变动方向还是一致的，但是从中期看两者的变动方向可能出现背离。例如整个20年代和60年代，在制造业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同时，价值构成都表现为稳定中略有下降的势态。这种相关性的削弱不过表明，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持续性已被打破，提高的速度已经大大放慢。

上述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动型式，特别是本世纪20年代开始所发生的若干重要变化，正是我们要着重研究和分析的新问题。

（4）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制造业资本构成下降的某些直接原因

20年代至40年代，特别是1929年至1947年期间，包括了两个比较特殊的时期：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正常机制受到严重干扰，资本构成的变动也不能不受到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

在30年代的大危机和长期萧条时期，由于生产的急剧下降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停滞，大批企业倒闭，大量设备闲置，需求萎缩，存货剧增。不仅投资锐减，而且许多陈旧的设备被销毁和淘汰。因此制造业的固定资本存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急剧地减少了。从1929年到1938年，制造业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固

定资本净存量由538亿美元减少到418亿美元，下降了22.3%，将近四分之一。这当然要引起资本技术构成乃至价值构成的下降。另一方面，大危机期间由于职工的缩减大大超过固定资本的缩减程度，按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又会出现上升的假象。1929年到1932年制造业按（195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净存量由538亿美元减少到489亿美元，下降了9.1%，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净存量由188亿美元减少到133亿美元，下降了29.3%；而雇用的职工却从1070万减少到693万，下降了35.2%，工资和薪金总额从160亿美元减少到76亿美元，下降了52.5%。结果，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指标三年提高了40.4%，职工平均占用的固定资本量于1932年达到7050美元的高水平；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标三年提高了47.9%，固定资本价值与工资薪金之比也于1932年达到了1.73:1的高水平。这些在危机期间虚假的上升数字并不表示资本构成的实际提高，只不过使以后年份的资本构成下降表现得更为剧烈罢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需要，扩大国营军事经济，对私人资本投资进行限制，进一步阻碍了私人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从1938年到1945年，制造业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净存量几乎没有增加。与此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军事订货，战争刺激起来的经济繁荣，使制造业的生产迅速扩大，1938年至1945年期间职工大约增加了64%。由于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设备利用率很低，大批固定资本被闲置，所以大战期间制造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主要不是靠增加新投资，而是靠不断提高现有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来实现的。同时，战争经济的繁荣使就业迅速扩大，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形势提高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就业扩大的同时有了更迅速的增长。这一切，必然使得美国私人制造业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在大战期间以比大萧条时期更快的速

度趋于下降。

分析了上述历史背景，再来看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构成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反常的动向，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至于20年代以来资本构成动态变化的某些更深层的经济原因，待我们考察了其它经济部门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数据以后，再集中加以分析和说明。

### **3. 美国物质生产部门和全部私人经济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

#### **(1) 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动态**

虽然制造业是美国最大的物质生产部门，但仅仅考察制造业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分析美国私人经济中所有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动态。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这一经验验证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分析1869年至1929年的动态，限于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第二步分析1929年至1981年的动态，限于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第三步再详尽分析1947年至1984年的动态，将包括五个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总和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

第一步：1869年至1929年期间美国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动态。

这五个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农(林渔)业、制造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通讯及公用事业。各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动态均用指数表示。



**表 9 美国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指数  
(1869—1929年)**

	农业 (1869=100)	矿业 (1879=100)	制造业 (1869=100)	交通运输业 (1869=100)	通讯及公用事业 (1869=100)
1869	100.0		100.0	100.0	100.0
1879	107.7	100.0	131.8	109.1	151.1
1889	110.8	120.5	209.1	82.6	126.1
1899	121.5	156.4	263.6	75.0	145.5
1909	130.8	169.2	340.9	66.7	136.3
1919	150.8	189.7	422.7	65.2	111.4
1929	153.8	256.4	454.5	75.8	113.6

计算根据：J·W·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362—363、396、464、540、580页。

说明：资本技术构成指数是根据肯德里克提供的资本投入量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算出的。原指数均为1929年=100，转化为1869或1879年=100。他的资本投入量是以按1929年美元计算的资本存量为基础，用基期报酬率加权而求得的。资本存量包括建筑物、设备与存货，在农业中则指机器设备、存货与农业不动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在这60年中的动态是极不相同的，多数部门趋于提高，个别部门趋于下降，提高的部门增长程度也不平衡。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增长幅度最大，提高约35%，矿业次之，提高约150%，农业较慢，提高约50%，通讯及公用事业基本稳定，交通运输业则下降了约25%。

技术构成趋于提高的三个部门，由于资本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技术构成的提高程度大体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相对应。

表 10 美国农业、矿业、制造业的部分要素生产率指数  
(1869—1929年)

(1869或1879=100)

	农 业		矿 业		制造业	
	劳动生 产率	资本生 产率	劳动生 产率	资本生 产率	劳动生 产率	资本生 产率
1869	100.0	100.0			100.0	100.0
1879	117.3	109.3	100.0	100.0	110.5	84.7
1889	125.3	112.3	119.0	87.4	139.9	65.4
1899	142.9	117.9	160.3	87.1	161.1	59.1
1909	143.8	109.0	177.5	86.5	180.7	50.2
1919	154.6	102.1	210.2	90.3	195.9	41.3
1929	177.9	115.3	317.5	105.2	337.8	62.9

资料来源, J. W. 肯德里克: 《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 第362—363、396、464页。原指数为1929=100, 转换为1869(或1879)=100。

将部分要素生产率指数和资本技术构成指数加以比较, 即可看出这三个部门技术构成提高程度的差别与它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的差别是大体相当的, 但各部门自身两者增长程度的对比关系却不同。农业和矿业的劳动生产率略快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 而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却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因很简单: 农业和矿业的资本生产率在此时期略有上升; 而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却急剧下降, 因为19世纪60年代至1919年正是美国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建厂和实现机械化的时期。

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动态与上述三个部门

比较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个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从1879年开始趋于下降。这种下降并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相反，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迅速增长，问题在于，资本生产率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

为什么会**出现资本生产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呢？**这需要从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来说明。美国的工业化机械化进程和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是，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发展，包括交通运输、水电煤气、邮电通讯等等。美国铁路建设的高潮是在内战以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从40年代至70年代这几十年，美国的水陆交通运输业和通讯及公用事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可以推断，在此期间，这两个部门的资本生产率必然急剧下降，资本技术构成必然迅速提高，只不过由于缺乏早期的统计资料，没有具体数据加以证明罢了。一待大规模投资基本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基本建立，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充分发挥投资效益以迅速扩大生产的阶段，与之相应的则是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这正是前面谈到过的工业部门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和制造业比较起来，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特殊性有两点。第一点是，它们的发展阶段与制造业不是同步的，而是先行的，当它们基本完成第一发展阶段而进入第二发展阶段时，制造业正处于第一发展阶段。所以在1879至1919年期间，当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资本生产率迅速提高时，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正处于下降时期。第二点是，这两个部门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比制造业在1919年后开始的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要迅速得多。原因是，这两个部门在发展第一阶段所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相对于本部门的产量和就业来说，比制造业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在大规模投资时期它们的资本生产率下降程度和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程度，比制造业在相应时期的资本生产率下降和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要急剧得多。

**表 11 美国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资本技术构成  
和部分要素生产率指数 (1879—1929年)**

(1879=100)

	交 通 运 输 业			通 讯 及 公 用 事 业		
	资本技 术构成	劳动 生产率	资本 生产率	资本技 术构成	劳动 生产率	资本 生产率
187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889	25.7	133.0	179.5	83.5	100.7	118.4
1899	68.8	178.4	263.6	96.2	132.6	120.3
1909	61.1	194.3	327.3	90.2	197.9	198.5
1919	59.7	268.6	392.7	73.7	278.7	289.5
1929	69.4	378.8	454.5	75.2	354.6	375.9

资料来源：资本技术构成指数由表9的指数换算而来。部分要素生产率指数由肯德里克提供的指数换算而来，见《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540、580页。

从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虽然没有综合性数据，但由于制造业、农业和矿业在总产量和总资本中占有较大比重，可以断定，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平均资本技术构成在这六十年中是趋于上升的。

第二步：1929至1984年期间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两个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动态。

这个时期有关美国私人经济中固定资本的连续统计，是按照农业、制造业和非农非制造业这三大部门划分的，我们无法从非农非制造业这一综合类别中剔除非物质生产部门，故只能算出农

业和制造业这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又由于找不到相应长时期的连续存货统计资料，只好用固定资本代表不变资本作为计算的基础。计算结果见表12。

这组制造业资本构成数据与作者在1983年的文章中所提供的相应数据有两点改进之处。第一点，这项数据把终结时间从1979年或1973年延长到可能的最近时期1984年。第二点，作为计算根据的固定资本净存量结算数字是最新修订的，不变价格已由1958年美元改为1982年美元，现行价格的统计数字也有变动。

在192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本构成动态是很明显的。第一，两个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虽然在大萧条和大战期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长期趋势是提高的。两种资本构成提高程度的差别也符合一般规律：价值构成相对于技术构成提高较慢。第二，两个部门资本构成提高速度有很大不同：农业部门资本构成增长幅度极大，技术构成提高近八倍，价值构成提高三倍多；相比之下制造业部门资本构成增长幅度较小，技术构成提高一倍半，价值构成仅提高80%。第三，如果同1929年以前的60年相比较，两个部门各自的资本构成提高速度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制造业的资本构成增长速度放慢了，农业的资本构成增长却大大加快。比较不同时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农业部门在前60年提高了53%，年平均增长率仅0.7%，在后55年提高了784%，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0%；制造业部门在前60年提高了354%，年平均增长率为2.5%，在后55年提高了156%，年平均增长率降低为1.7%。

为什么在这110多年长时期内制造业资本构成提高表现为减速的趋势，而农业资本构成提高表现为加速的趋势呢？原因很简单：制造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过程是在1929年以前基本完成的，而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过程主要发生在1929年以后。农业部门在机械化过程中的资本构成提高程度所以大大高于处于机械化

表 12 美国农业、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  
(1929—1984年)

	农 业				制 造 业			
	技术构成		价值构成		技术构成		价值构成	
	数量 (1982 年美 元)	指数 (1929 =100)	比率	指数 (1929 =100)	数量 (1982年 美元)	指数 (1929 =100)	比率	指数 (1929= 100)
1929	5667	100.0	5.08	100.0	15000	100.0	1.00	100.0
1934	4525	79.8	5.89	115.9	16647	111.0	1.24	124.0
1939	4646	82.0	5.06	98.6	13949	93.0	1.13	113.0
1944	5089	89.8	2.99	58.9	9140	60.9	0.50	50.0
1949	9831	173.5	6.00	118.1	15381	102.5	1.02	102.0
1954	15290	269.8	9.92	195.3	16499	110.0	0.97	97.0
1959	17411	307.2	10.63	209.3	18813	125.4	1.06	106.0
1964	23133	408.2	11.71	230.5	20677	137.8	1.03	103.0
1969	34861	615.2	15.15	298.2	24472	163.1	1.18	118.0
1974	44057	777.4	14.59	287.2	28939	192.9	1.48	148.0
1979	56364	994.6	16.83	331.3	32386	215.9	1.65	165.0
1984	50121	884.4	22.10	435.0	38433	256.2	1.82	182.0

计算根据: J·莫斯格雷夫: “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 《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 《美国的国民收入和生  
产帐, 统计表, 1929—1965》; 《商业现况》1969年7月  
号, 1971年7月号, 1974年7月号, 1978年7月号, 1982年  
7月号, 1986年7月号; 《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号。

过程中的制造业，可能与农业部门的特点有关。农业因其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土地这种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有限性又使农业的发展不得不更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用更多的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等生产资料，更大规模地增加投资；而在投资大量增加时农业从业人员不仅相对减少而且绝对减少。因此，农业在实现机械化过程中资本构成的提高速度必然大大高于处于同类过程中的制造业。

第三步：1947至1984年期间美国各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总和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动态。

关于战后这个将近40年的长时期，我们可以得到较详细的统计资料，不仅能够计算出各个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总和的资本构成，而且可以计算出各个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准资本构成，为我们检验整个私人经济及其组成部分的资本构成动态提供了较丰富的经验依据。下面先看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动态（见表13）。

对表13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战后时期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除了个别部门的个别指标，总趋势都是持续提高的。第二，各部门的资本构成提高速度极不平衡，其中以农业最快，矿业次之，制造业再次之，而建筑业和交通及公用事业的增长速度则慢得多。第三，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提高速度，甚至快于1929年以前的60年。仅从我们提供的技术构成指数的比较来看：农业和矿业在战后37年中的增长倍数（分别为697%和386%）已超过1929年前60年的增长倍数（分别为153%和256%）；制造业在这37年中的增长百分数（292%）虽不及1929年前的60年（454%），但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超过，前60年为2.6%，后37年则为2.9%。这表明，战后是美国主要物质生产部门资本构成的又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

下面再看战后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平均资本构成变动情况。

表 13 美国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及公用事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指数\* (1947—1984年) (1947=100)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		运输及公用事业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194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49	130.8	134.6	114.3	112.8	117.0	112.1	112.9	121.7	111.6	109.2
1954	203.3	208.4	193.1	155.1	125.5	106.6	112.6	104.3	125.0	114.6
1959	234.1	226.7	270.7	208.3	143.1	116.5	105.6	104.3	141.1	124.9
1964	312.1	244.4	346.6	222.0	157.3	113.2	121.0	104.3	155.7	116.8
1969	469.9	295.2	375.9	236.0	186.2	129.7	138.8	104.3	165.9	117.7
1974	596.0	275.0	339.4	241.7	220.2	162.6	167.3	132.6	188.5	140.5
1979	771.6	304.6	314.2	245.5	246.4	181.3	176.7	156.5	197.4	140.2
1984	696.7	307.7	385.6	264.4	292.4	200.0	150.3	132.6	212.7	142.2

\* 资本量均按固定资本净存量计算。

\*\* 包括农、林、渔业。

计算根据：J·莫斯格雷夫：“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美国的国民收入和生产帐，统计表，1929—1965》；《商业现况》1969年7月号，1971年7月号，1974年7月号，1978年7月号，1982年7月号，1986年7月号，《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号。



**表 14 美国物质生产部门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动态  
(1974—1984年)**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固定资本净存量 (1982年美元)	指数 (1947=100)	固定资本存量价值与工资薪金之比	指数 (1947=100)
1947	17434	100.0	1.99:1	100.0
1949	19268	110.5	2.24:1	112.6
1954	22969	131.7	2.20:1	110.6
1959	24830	142.4	2.35:1	118.1
1964	26434	151.6	2.20:1	110.6
1969	30759	176.4	2.28:1	114.6
1974	33803	193.9	2.89:1	145.2
1979	36582	209.8	3.12:1	156.8
1984	34309	196.8	3.32:1	166.8

计算根据：同表13。

数据表明，战后时期美国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平均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趋于增长，但其增长程度低于农业、矿业和制造业，而略高于建筑业和交通及公用事业。这说明，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增长速度，是其中各个部门资本构成增长速度加权平均的综合结果。

#### (2) 美国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准资本构成动态

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我们只能算出战后时期美国各非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总和的准资本构成。尽管时期相对较短，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数据。下面是各个非物质部门和全

**表 15 美国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准资本构成指数**  
(1947—1984年) (1947=100)

	商 业		金 融 业 *		服 务 业	
	资本技 术构成	资本价 值构成	资本技 术构成	资本价 值构成	资本技 术构成	资本价 值构成
194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49	107.6	115.1	100.8	95.5	103.1	101.6
1954	114.0	115.1	109.6	94.6	127.3	122.2
1959	131.5	120.8	131.3	100.0	158.6	138.1
1964	160.8	126.4	156.8	105.6	186.3	142.9
1969	191.3	147.2	180.1	116.7	208.2	152.4
1974	219.7	167.9	195.6	142.5	231.7	171.4
1979	228.1	198.1	185.6	133.6	209.3	157.1
1984	268.9	220.8	201.4	119.5	211.8	136.5

• 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

计算根据：同表13。

部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计算结果（见表15和表16）。

以上关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准资本构成的水平和动态的经验资料，说明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现象。

首先，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也存在着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存在着劳动资料价值相对于职工工资薪金的增长趋势。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马克思的时代，非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舍象它是合理的。但今天，非物质生产部

**表 16 美国非物质生产部门准资本技术构成  
和价值构成动态 (1947—1984年)**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固定资本净存量 (1982年美元)	指数 (1947=100)	固定资本存量价值 与工资薪金之比	指数 (1947=100)
1947	10941	100.0	0.99:1	100.0
1949	11390	104.1	1.04:1	105.1
1954	12961	118.5	1.13:1	114.1
1959	15826	144.6	1.24:1	125.3
1964	18896	172.7	1.31:1	132.3
1969	21545	196.9	1.46:1	147.5
1974	23947	218.9	1.71:1	172.7
1979	22841	208.8	1.70:1	171.7
1984	24931	227.9	1.65:1	166.7

计算根据，同表13。

门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相当地位，例如1984年，在美国，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已占整个私人经济就业人数的50%，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总额的35%。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资本构成变动的分析，就不应该再舍象掉非物质生产部门。

其次，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准资本构成水平一般低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水平。1984年，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固定资本净存量（34309美元）相当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相应数

字（24931美元）的138%；物质生产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价值与雇员工资薪金之比（3.32：1）相当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相应数字（1.65：1）的两倍。这意味着，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机械化程度比物质生产部门低，是劳动密集型的经济部门；同时雇员的平均工资薪金也较物质生产部门为低，因而它们在资本价值构成水平上的差距大于它们在资本技术构成水平上的差距。

第三，非物质生产部门准资本构成提高速度在战后时期已经加快，已赶上物质生产部门资本构成的增长速度。1947年至1984年，非物质生产部门准资本技术构成年平均增长率为2.3%，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1.8%；非物质生产部门准资本价值构成年平均增长率为1.4%，和物质生产部门的数字相同。某些部门如商业，其准资本构成的增长速度已和制造业不相上下。这说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也在不断增长，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正在迅速提高，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过程已经加快。

### （3）美国全部私人经济的资本构成动态

下面，我们将美国全部私人经济的资本构成动态，分三个长时期（1869—1929，1929—1947，1947—1984）列表如下，均用指数表示。

表 17 美国全部私人经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长期动态

年份	资本技术构成指数	资本价值构成指数
(1869—1929)	(1869—1978=100)	
1869—1978	100.0	
1889	117.4	
1894	146.1	
1899	150.8	
1904	165.4	
1909	173.2	
1914	187.4	
1919	196.1	
1924	208.0	
1929	217.9	
<hr/>		
	(1929=100)	
1929	100.0	100.0
1934	103.0	120.7
1939	85.8	97.0
1944	69.0	53.9
1947	73.1	69.8
<hr/>		
	(1947=100)	
1947	100.0	100.0
1949	108.5	110.5
1954	126.7	111.7
1959	139.7	118.5
1964	151.9	113.6
1969	173.8	119.8
1974	190.3	145.7
1979	195.5	151.9
1984	208.8	151.2

计算根据：J·W·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J·莫斯格雷夫：“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美国的国民收入和生产帐，统计表，1929—1965》；《商业现况》有关各期；《基本经济统计手册》有关各期。

上表中的指数，都是从计算出的资本构成绝对值转换而来的。第一个时期的计算根据，是肯德里克提供的资料，其中资本量包括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等全部资本存量，但只有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也没有相应的工资薪金资料，所以只能算出逐年的平均资本技术构成，即从业人员人均占用的资本量。后两个时期计算中所使用的资本量，只包括固定资本存量，所有计算方法和资料来源和前面分部门的计算完全相同。

美国全部私人经济的社会平均资本构成动态，从长期趋势和变动型式看，同制造业或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动态相比较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社会平均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是十分明显的，尽管有30年代至40年代的下降，但增长的趋势在大部分时期始终占主导地位，平均增长速度战后甚至超过1929年前的工业化时期。社会平均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由于未能计算出1929年以前的数据，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至少可以说，在战后时期是趋于增长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1929年以后的整个时期来观察，那末也不能否认，社会平均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速度显然低于1929年以前的工业化时期；社会平均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程度也比战后时期所显示的小得多，基本接近于稳定的水平。这就是我们从全部私人经济资本构成长期动态数据中所得到的总印象。

#### **4.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构成长期动态的比较**

上面，我们从制造业到物质生产部门到全部私人经济，详细考察了美国经济中资本构成的长期动态。但是，美国的经验数据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它所表现出的资本构成提高趋势究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趋势，抑或是美国经济的特有现象，这在我们没有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材料之前，还不能下断语。因此还有必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状况。

下面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中的

资本技术构成长期动态比较，均用指数表示（见表18）。

尽管由于缺乏资料未能算出各国的资本价值构成，仅比较资本技术构成的长期动态，已能得出若干重要结论。

在1870至1913年期间，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资本技术构成都趋于增长，但增长的程度差别很大。美国和德国的情况相似，资本技术构成增长较快，美国提高了一倍半，德国提高了一倍；但英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技术构成增长缓

**表 18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非住宅固定资本物质存量指数（1870—1984年）**

	法国 (1913=100)	德国 (1870=100)	日本 (1913=100)	荷兰 (1913=100)	英国 (1870=100)	美国 (1870=100)
1870		100.00			100.00	100.00
1913	100.00	219.25	100.00	100.00	112.19	253.93
1950	170.79	260.89	247.77	144.32	109.88	280.03
1960	223.59	393.09	347.40	182.52	139.20	361.69
1973	434.16	851.66	1206.47	297.11	245.26	476.67
1984	670.08	1280.49	2429.44	411.37	329.72	515.43

计算方法，麦迪森提供了六个国家在上述年份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指数（1950=100），以及各国在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数字均已按边界变动进行调整。我们的方法是，先将各国各年份的就业人数换算成以1950年为基准期的指数，再用就业人数指数除资本存量（法德英美采用净存量，日荷采用总存量）指数求得就业人员平均占用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指数。最后将这个以1950年为基准期的指数换算为以起始年份为基准期的指数。

计算根据，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5、691页。

慢，43年中仅提高12%。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不难解释的。英国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它的工业化机械化过程从18世纪后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已初步完成。从1760年到1870年，英国的非住宅有形固定资本总存量增长了521%。<sup>①</sup>1870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投资增长速度和资本构成提高速度的放慢，则是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的必然现象。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同，它们的工业化过程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至本世纪初基本完成的，因而在1870年至1913这段时间，资本投资增长很快，资本构成也迅速提高。可见，这一时期美、德两国同英国在资本构成提高程度上的差别，不过反映了这三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时期的差别。在1913至1950年期间，几乎所有国家（日本例外）的资本技术构成增长都十分缓慢，英国的资本技术构成甚至下降了。在将近40年时间里，增长最快的国家不过提高70%（法国），最慢的国家只有10%（美国）。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30年代大萧条期间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投资的增长被抑制，造成资本构成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另一方面，实现机械化工业化后若干经济因素的变化，可能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扼制了资本构成的迅速增长。这些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节着重讨论，这里暂不多谈。

1950至1984年，是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技术构成的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34年中各国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幅度分别为：美国不到一倍，荷兰近两倍，英国两倍，法国近三倍，德国近四倍，日本近九倍。不少国家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工业化时期。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美国战后的资本构成提高速度在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缓慢的。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只要把各国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技术构成

---

<sup>①</sup> 根据指数值计算，见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231页。



表 19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和  
资本技术构成增长速度比较（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1950—1984年)

	国民经济 (G D P)	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 时平均的 G D P)	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非 住宅固定资本存量
法国	4.2	4.6	4.1
德国	4.5	5.0	4.8
日本	7.5	6.2	6.9
荷兰	3.7	3.6	3.1
英国	2.4	2.9	3.3
美国	3.3	2.0	1.8

计算根据：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2页表A—1，第683页表A—5，第691页表A—16。

增长速度，和它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以比较，上述差别的经济背景便一目了然了。

从上表的数字可以看到，各国的资本技术构成增长速度大体上与各自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最快，它的资本技术构成也提高最快，其次是西德，然后是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情况有点颠倒：前者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后者的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稍快，这可能与它们的产业调整和技术改造的时期差别有关。但美国的情况是明显的，它的生产率增长在六个国家中最低，经济增长速度也慢于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因而它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率是最低的。

其实，不仅在战后时期，即使从1913年算起，美国的资本构

成增长率也大大低于英国和德国。1913年至1984年期间的资本技术构成增长幅度，德国为584%，近五倍；英国为294%，近两倍；而美国为203%，仅一倍。

通过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本世纪以来（至少是从1913年以来，）美国的资本构成增长速度最慢，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大高于它。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过去国内外经济学者仅仅根据美国的经验资料所得出的一些理论结论。从吉尔曼到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仅仅根据美国制造业或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统计数据，就断言本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构成动态发生了转折，趋向下降或基本稳定，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这一论断所依据的经验资料不仅受到时间系列过短的限制（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分析），而且受到国别特殊性的限制。由于美国的长期经济统计资料比较完备，人们自然倾向于用美国的资料作经验验证。但恰恰是美国，它在本世纪的资本构成变动并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它所表现出的资本构成提高趋势是普遍具有的，但资本构成相对缓慢的增长却是美国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从这个不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经验资料中得出某些看法，当作适用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结论，当然是靠不住的。

这并不是说，20世纪以来影响资本构成变动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确实存在着一些使资本构成增长趋于缓慢的新因素，需要我们去探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促使资本构成增长加速的因素，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这同样需要我们去研究。深入分析影响资本构成变动的这些经济因素，便是下一节的任务。

## 第四节 二十世纪以来影响资本构成 动态的重要经济因素

### 1. 物质生产部门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本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业化机械化过程，从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产业革命，经过19世纪后半期的扩展和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基本完成，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更高层次的社会化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矛盾的加剧，迫使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机构发生变化，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迅速发展。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又反过来暂时缓和了这一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我们的研究目的，下面主要分析影响资本构成变动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

20世纪以来影响资本构成变动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大加强了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省。所有关于资本形成和资本存量结构变化的研究都表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完成，产业部门耐用资本中建筑物的比重不断趋于下降。以美国制造业为例，从1929年到1984年，按1982年美元计算，建筑物净存量由907亿美元增加到2341亿美元，增长约一倍半；设备净存量由698亿美元增加到5188亿美元，增长约六倍半。固定资本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筑物的比重从56.5%降低到31.1%，设备的

比重则从43.5%提高到68.9%。<sup>①</sup>结果是，职工平均占用的建筑物量增加甚微，仅40%，而职工平均占用的设备量却上升了近四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劳动生产率急剧增长，而建筑物存量增加很少，职工平均占用的建筑物存量的提高更为缓慢，这充分表明了建筑物使用上节约的巨大作用。

从美国整个经济中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两个组成部分的变动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指数计算，在1870至1913年期间，建筑物的增长快于设备的增长，前者提高了627%，后者提高了561%；而在1913年至1984年期间，建筑物的增长却变得大大慢于设备的增长，后者提高了890%，前者仅提高了357%。<sup>②</sup>英国经济中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两个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和美国基本相似，稍有不同的是，由于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比美国完成较早，所以1870年后建筑物存量的增长相对于机器设备的增长已开始逐渐变慢。从1870年至1984年，机器设备净存量提高了954%，而建筑物净存量仅提高416%。<sup>③</sup>考虑到在这期间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八倍，<sup>④</sup>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约也是十分显著的。

为什么建筑物相对于设备的增长速度，在工业化时期较快，而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则趋于缓慢，其使用上的节约会大大加强呢？这既有产业部门内部的原因，也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前面曾经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主要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这必然以建筑物的较快增长为特征。当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生产的继续扩大更多转向发挥现有物质资本的

① 计算根据：J·莫斯格雷夫：“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第63页。

② 计算根据：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9年6月，第692页表A—17。

③ 计算根据：同上。

④ 计算根据：同上，第683页表A—5。

作用，进一步的技术变革也主要涉及机器设备的更新，并不需要大量的建筑物投资。与此同时，生产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发展，使企业的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必然带来规模经济的效益，节约建筑物的使用。库兹涅茨曾以资本/产量比率的变化来说明这一过程。他以铁路部门为例指出：在发展的较早阶段，铁轨、车站等等的建设构成它的耐用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因而建筑物对产量的比率较高并且趋于增长。而当铁路网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建筑物投资的需要减少了，但技术进步仍然刺激着对新的生产设备的需求。这时，建筑物对产量的比率会显著下降，而设备对产量的比率则下降较慢，或者趋于稳定，甚至可能提高。他认为这种变动型式对于铁路部门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部门和许多制造业部门都是典型的。<sup>①</sup>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在工业化时期，建筑物对设备比率较高的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如初期迅速发展的交通运输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而后急剧扩大的重工业部门等等。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些产业部门的比重逐渐缩小。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初级金属和简单制品的老式工业，越来越为生产组装式轻便产品的现代型工业所代替，后者所具有的建筑物对设备的比率比前者低得多。这种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固定资本结构，降低建筑物的比重，使全部生产资本中建筑物的使用更节约更经济。

其次是设备使用上的节约。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和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为新的技术革命和充分发挥大企业的资本优势和投资效率，促进生产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垄断资本的有利地位，不仅在于它能控制市场和产品价格，还在于它占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大规模生产的利益，能够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应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生产率。垄断组织力

<sup>①</sup> S·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1961年英文版），第172页。

图阻止价格的竞争性下降，同时极力降低单位成本，以便使利润最大化。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便是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电力逐渐代替蒸气成为工业生产的动力；工业仪表开始得到广泛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用电量，1902年仅为12.5亿千瓦小时，1912年达到92.5亿千瓦小时，1920年已接近270亿千瓦小时。1912至1920年间用电量年平均增长率相当于1902至1912年间年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随着电力在工业中的推广使用，工业仪表的生产量迅速增长。工业仪表的销售指数(1929年=100)计算，1909年为1.8，到1914年才提高到4.4，但到1916年急剧上升为10.3，1918年达到26.6。四年间竟增长三倍以上。<sup>①</sup>

工业仪表有三种主要类型：控制器、指示器和记录器（以家庭仪表为例，温度计是指示器，煤气表是记录器，恒温器是控制器）。工业仪表特别是控制器的使用，使电力传动的机器成为可测量、可调节和可控制的，大大提高了机器的生产效率。借助电力和仪表的自动控制，可以使用更大和功率更高的机器，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保持机器运转的连续性和均匀性，及时发现潜伏的故障。仪表还可以自动控制温度、压力和原材料流动的速度，检查配料和制成品的质量。例如纸浆的制造，在粉释和冷却的操作阶段，自动的温度控制保证了质量的均匀；在纸张的压制和干燥过程中，仪表便自动调节压力、温度、湿度、密度和厚薄度。<sup>②</sup>

通过工业仪表的安装，常常在不增添新的主要设备的条件下，即可大幅度提高原有机器设备的生产效率，扩大工厂的生产能力。不仅如此，新技术还改善了建造厂房设备所需要的基本材料，使固定资本更加持久耐用。新的合金钢可以制造更坚固的工具。处理过的铁路枕木比未处理过的枕木使用期长一倍。内燃机

<sup>①</sup> J. 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75—76页。

<sup>②</sup> 同上，第77页。

车比之蒸气机车不仅有更大的牵引力，使用的燃料较便宜，需要维护的次数较少和费用较低，而且使用的寿命也 longer。<sup>①</sup>

机器设备使用上更加节约的趋势，可以从职工平均占用的设备量的增长和职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变化中大体得到反映。在1870至1913年期间，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3%，年平均增长率为2.00%；职工平均占用的设备净存量提高了135%，年平均增长率为2.01%，大体相当。但是，在1913年至197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6%，年平均增长率为2.45%；而职工平均占用的设备净存量只提高了256%，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8%，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慢得多。<sup>②</sup>可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美国经济中机器设备的资本系数降低了，为取得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只需要增加较少的设备数量即可达到。

第三是原材料使用上的节约。新技术的采用和均匀有效的操作，也节约了不变资本中的流动部分，大大减少了原料、材料和燃料的浪费。在美国，中心电站每生产1千瓦小时电，1902年需要6.5磅煤，1920年需要3磅煤，30年代只需要1.5磅煤。在1947年到1954年间，钢锭的产量增长了40%，但制造钢锭的主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耗费，铁矿石减少4%，煤减少13%，石灰石减少6%，废金属减少9%。<sup>③</sup>随着机器质量的提高和机器运转的自动调节与控制，生产中的废料大大减少，各种利用废料的新

---

① J. 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78—79页。

② 计算根据和方法：A. 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结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第683页表A—5，685页表A—7，692页表A—17。表中提供的就业人数为绝对数，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设备净存量为指数。先将就业人数化为同期指数，再用就业人数除设备存量求得职工平均占用的设备存量指数，最后算出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设备存量在两个时期各自的增长幅度和年平均增长率。

③ 同①，第78页。

技术也发展起来。大量生产的排泄物被重新加工转化为各种有价值的副产品。废料的再利用也减少了原材料的浪费，提高了原材料的利用率。除此之外，产品的小型化和轻便化的趋势，也极大地促进了原材料使用上的节约。人们只要想象一下最初的晶体管收音机和当今半导体收音机在体积上的差别，想象一下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微型电脑在体积上的差别，便可意识到产品小型化在节约使用原材料方面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应该特别提到管理科学的发展。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于劳动组织的革新和改善，依赖于更加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这种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的改进，即使在既定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也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相对节省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使用，降低资本/产量比率。本世纪初期装配线生产的出现和推广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新的组织生产的方法最先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1913年，亨利·福特尝试性地实验用传送带系统装配磁电机，类似的方法很快应用于装配汽车底盘。福特公司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决定装配线的最佳速度，工人的最佳位置，各项操作的最方便的高度，原材料发送的最有效的方法，以及机器的布局，等等。1920年，福特汽车公司把每一辆汽车的生产周期从21天缩短为14天，到1931年更减少到50小时，公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却没有相应增加大量的固定资本。<sup>①</sup>在1916年，美国生产的小轿车总量为150多万辆，单福特公司一家就销售了50多万辆；到1923年，轿车生产总量已高达360万辆，七年中翻了一翻多。<sup>②</sup>产量如此迅速的扩大，应主要归功于装配线的运用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种技术依次应用于日益扩大的产品

① J·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78页。

② L·戴维斯、R·伊思特林、W·帕克主编：《美国经济增长：一部美国勤俭者的历史》（1972年英文版），第259页。



范围，包括和电气工业相联系的许多产品如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电话、收音机，一大批耐用消费品，一些生产者耐用物品如农业机器和设备，以及加工过的食品等等。<sup>①</sup>

总之，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已成为本世纪以来扼制资本技术构成迅速提高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 2. 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

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价格变动直接影响资本价值构成，这是马克思多次指出过的。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时，他主要强调不变资本贬值会部分抵销生产资料物质数量的增长，使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相比提高较慢。这个判断显然是根据19世纪70年代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那末，二十世纪以来，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价格）变动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首先，看一下固定资本特别是机器设备的情况。毫无疑问，和19世纪相比，机器设备贬值的速度加快了。这又要归因于技术进步的加速。本世纪初发生的以电力技术为中心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的速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姑且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种近似的衡量。<sup>②</sup>根据肯德里克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内私人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1889—1919年为2.0%，1919—1948年为2.4%，1948—1969

① L·戴维斯、R·伊思特林、W·帕克主编：《美国经济增长：一部美国勤俭者的历史》（1972年英文版），第260页。

② 技术进步不会全部反映在生产率变化上，也不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唯一因素。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节约劳动、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表现为创造新产品和改善现有产品的性能与质量。后者只能部分地和间接地影响生产率。同时，劳动者的年龄、性别构成、教育水平和生产积极性等等也对劳动生产率有一定影响。还有各种经济因素可能影响生产率的短期变化。

年为3.2%。①麦迪森关于1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数据反映了类似的动态，它们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870—1913年，1.6%；1913—1950年，1.8%；1950—1973年，4.5%。②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加速趋势，大体反映了技术进步加快的步伐。

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加快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更新期的缩短和贬值的加速。有大量的经验材料可以确证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据美国税务当局估计，从30年代以来，机器的有形寿命总的缩短了大约33%。按照乔治·雅西的计算，美国制造业中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固定资本实际平均持续时间，1945年为12年，1950年为10.3年，1953年为9.4年，1961年为8.5年。据弗里曼研究，在电子资本货物工业中，产品的寿命在3与10年之间，平均大约6.5年左右。计算机的平均寿命短到只有5年，航海雷达则为7年。在1971年，西德纺织工厂使用的机器，大都是1965年才使用的最新装备。③这些数字可能不一定精确，但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则是肯定无疑的。

劳动生产率更快增长和更新期缩短导致机器设备贬值的加速。不但生产原有机器设备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还不断有更加精良和效率更高的生产设备被提供到市场上，加剧了原有机器设备的无形磨损和贬值。这些效率更高的设备甚至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它们本身的价值也不断下降。在这方面，美国电子工业中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价格动态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小规模

① J·肯德里克：《了解生产率—生产率变化动态导论》（1977年英文版），第41页。劳动生产率指标按人时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② 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96页。劳动生产率指标系按小时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六个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

③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83年中译本），第261、282页。

线性集成电路的单位平均价格从1963年的88美元下降到1976年的22美分，小规模数字集成电路的单位平均价格从1960年的450美元跌落到1976年的12美分。①苏联经济学家布宁还根据1965至1975年的业务资料计算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若干机器产品的生产费用动态，以基期年份的费用指数为100，10年后相同结构技术产品的无形损耗指数，以费用指数表示，蒸汽涡轮下降到63，拖拉机下降到45，泵下降到43，继电器下降到30，船舶下降到63，汽车下降到47，集成电路下降到10，上述机器产品平均下降到52。②

固定资本贬值的加速，不一定表现出劳动资料价格的绝对下降或下降速度的加快。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通货膨胀（缓慢的和有时是急剧的）已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物价上涨的趋势是经常存在的。总的看来，劳动资料的价格仍然趋于上涨。只有用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再把劳动资料实物量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以比较，才能看出价格上涨背后所隐藏着的劳动资料加速贬值的内在趋势。这种加速贬值现在表现在价格总指数上升的相对缓慢上（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若干产品价格的强制性的绝对下跌），假如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劳动资料的价值下降，它们的通货膨胀价格将以快得多的速度提高。

另一方面，如果比较劳动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动态，劳动资料的价格上涨仍然快于消费品。从1947年到1984年，美国的成品价格指数，以1967年为100，消费品从80.5上升到290.3，增长360.6%；资本设备从55.4上升到294.0，增长530.7%。③这个事实不过说明，资本设备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比消费品部门的生产

① E. N. 布宁：《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价格》（1982年中译本），第38页。

② 同上，第44页。

③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21页。

率提高得较为缓慢；但它并不排斥整个生产（其中包括生产设备生产）中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加速，当然也不否定资本设备本身贬值的加速。

其次，看一下原材料这部分不变资本的情况。原材料的价值或价格动态比资本设备较为复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原料并不都是本国生产的，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不发达国家，世界市场上的原料价格受各种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剧烈。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和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曾使原料价格迅速上涨。结果是大量资本深入到原料生产领域。随着1973年开始的资本主义萧条，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原料价格在1873到1893年期间急剧下跌。19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了原料价格的回升，到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速上涨。整个20年代原材料价格基本上处于停滞，并从大萧条开始转入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使原料价格迅速上涨，但从1947年后原料价格重新进入停滞时期，直到70年代初期。

战后50—60年代原料价格的相对停滞与成品价格的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从1947年到1970年，资本设备价格上涨了102%，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7%，原料价格仅提高了11%。<sup>①</sup>原料对成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比较世界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世界出口价格，原料价格与成品价格的比率从1951年的100下降到1970年的71。<sup>②</sup>战后20多年原料价格的相对下跌不是偶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合成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多种人造原料成为天然原料的代用品和强有力的竞争者。同时，由于大量投资和新技术的应用，农业和矿业的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以至超过了制造业。下面是美国几个产业部门生产率变动的比较。

---

①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21、322页。

② E. N. 布宁：《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价格》（1982年中译本），第139页。

**表 20 美国农业、矿业、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变动的比较**  
(平均年增长率%) (1889—1969年)

	1889—1919	1919—1948	1948—1969
农业	0.5	2.0	5.8
矿业	1.9	2.9	4.2
制造业	1.1	2.9	2.7

资料来源：J·W·肯德里克：《了解生产率—生产率变化动态导论》  
(1979年英文版)，第41页。

农业和矿业是生产天然原料的主要部门。它们战后的生产率增长大大超过制造业，表明天然原料的贬值程度比制造业成品的贬值程度更大，它们与成品的相对价格也必然要下降。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竭力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原料价格，通过不等价交换的贸易关系掠夺不发达国家。许多不发达国家独立后仍长期保持畸形的经济结构，以一种或少数几种农矿产品作为主要的大宗出口商品，很难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长时期来，垄断资本集团按照很低的垄断价格，操纵着发展中国家约百分之四十的出口原料。低下的原料价格使垄断资本大发其财。例如，在美国每桶石油的价格，1913年为2.5美元，1929年为3.5美元，1950年为2.5美元，1970年为3美元。如果把近六十年中美元贬值的因素考虑在内，实际意味着石油价格下降了许多倍。同时，由于未加工的原油价格规定更低，垄断资本的石油产品价格仍可保证它们获得高出原油买卖数倍的利润。<sup>①</sup>正是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使政治上取得独立的不发达国

<sup>①</sup> E·N·布宁：《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价格》(1982年中译本)，第141页。

家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重要性，许多原料生产国纷纷建立联合组织，维护合理的原料出口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补偿产油国长期遭受的损失，使市场价格适应供求状况，也考虑到石油蕴藏量的有限性，毅然决定在1973年9月将石油价格提高三倍，引起了一场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具有深远的经济影响和政治意义。

原料的价格变动对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从20年代开始原料价格的相对停滞，特别是战后到70年代初原料价格的相对下降，成为阻碍资本价值构成迅速提高的一个因素。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通货膨胀加剧过程中，原料价格上涨最快。从1970年到1984年，美国的原料价格提高了195%，近两倍，不但改变了战后长期的停滞状态（1947—1970年仅增长了11%），而且超过了同时期成品价格的增长幅度（144%）。<sup>①</sup>原料对成品的相对价格从下降转为提高，对70年代后资本价值构成的迅速增长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最后，看一下劳动力价格的变动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工资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剥削程度的大小，也直接影响着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主义国家工资演变的总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工资趋于下降。一个英国工人为了挣得一年所需要的面包钱必须劳动的时间，1495年为10周，1593年为40周，1684年48周，1726年52周。英国泥瓦匠的实际工资指数，1475—1480年为110—115，1600年45，1700年55，1800年38。<sup>②</sup>英国整个工业中工人的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以1900年=100，1810年为73，1820年为65，1830年为62，1840年为67，1850年为67，1860年为72。<sup>③</sup>

①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22、321页。

② E·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1979年中译本），第143页。

③ 《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1978年英文版），第72页。

1860年仍低于1810年的工资水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工业革命初期工人工资的长期下降，主要是因为大批小生产者被剥夺所造成的劳动力严重过剩，产业后备军急剧扩大，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程度很低并缺乏组织。

19世纪中期是一个转折点。从60年代起，工人工资开始缓慢上升。英国工业中的货币工资指数，从1860年的72，提高到1914年的108。德国工业中的货币工资指数，从1860年的53，提高到1914年的134。<sup>①</sup>美国非农业雇员的年平均实际工资，按1914年美元计算，从1860年的457美元提高到1900年的573美元，增长了25%。<sup>②</sup>20世纪以来，工人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加快了。英国工业中的货币工资指数，以1929年为100，从1914年的53提高到1938年的105，增长了近一倍；以1955年为100，从1938年的39提高到1907年的250，增长了约五倍半。<sup>③</sup>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美国全部雇员的年平均实际工资，按1914年美元计算，从1900年的496美元提高到1960年的1750美元，增长了两倍半。<sup>④</sup>无庸讳言，战后至7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这种情况，和战后工人阶级力量的相对壮大，以及因经济迅速发展一度造成产业后备军的相对缩小，显然是分不开的。

工人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升虽然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价值下降，但它对劳动力价值的变化确实有直接作用。劳动力价值是实际工资（工人所得到的消费品）和消费品价值（决定于

---

① 《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1978年英文版），第72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英文版），第165页。

③ 同①。英国1914年后的工资上涨主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2年后工资趋于停滞，大萧条的30年代转为下降。

④ 同②，第164页。

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综合结果。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总趋势下,实际工资上涨越快,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程度越小,一定时期劳动力价值甚至可能上升。这不能不影响到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从总体上看,本世纪以来工人工资的上涨趋势已成为抑制资本价值构成迅速提高的一个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在资本技术构成迅速提高的条件下,因工资上涨所造成的资本价值构成的增长幅度较小,不但不会缓和资本对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下降程度,反而要加剧这种下降。其中的道理在第一节中已经作了说明,下一章还要结合实例进行分析。第二,本世纪以来实际工资总体上的上涨趋势,不排除工资在一定时期的下降或停滞。20—30年代和70—80年代,就是这样两个时期。工资的下降和停滞如果和一定的资本积累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相结合,就会加速资本构成的提高。这是70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构成增长速度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从固定不变资本、流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本世纪以来各生产要素价值或价格变动的若干特点,以及它们对资本价值构成所产生的影响。和这些因素直接相关的不是资本的技术构成,而是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偏离程度。这种偏离程度就是各要素价格变动综合影响的结果。

### **3. 资本积累速度和科学技术革命**

经济增长速度、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构成提高速度,有很高的相关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变量之一。投资的较快增长不但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总需求的迅速扩大和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且通过资本存量的较快增长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扩大,提高资本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因此一般说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通常伴随有较快的资本构成提高速度。



观察19世纪初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本积累速度，在几个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请看下表。

**表 2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速度（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820—1979年）**

时期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
1820—1870	2.2 <sup>a</sup>	1.0 <sup>a</sup>	
1870—1913	2.5	1.4	2.9
1913—1950	1.9	1.2	1.7
1950—1973	4.9	3.8	5.5
1973—1979	2.5	2.0	4.4 <sup>b</sup>

注：除特殊注明外，均为十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算术平均数。

a：13个国家的平均数；b：1973—1978年。

资料来源：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91页。

**表 22 按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1870—1978年）**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按净存量和总存量平均计算）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3	1973—1978
加拿大		1.8 <sup>a</sup>	3.4	3.0
法国		(1.7)	4.5	5.3
德国	(2.1) <sup>a</sup>	(0.9)	6.1	6.3
意大利	[2.3] <sup>b</sup>	[2.6]	[5.4]	[6.3]
日本	2.0	[2.9]	7.6	6.8
英国	0.6	0.8	4.0	4.3
美国	2.6	1.9	2.9	1.8
算术平均数	1.9	1.8	4.8	4.8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仅指净存量，方括号中的数字仅指总存量。

a：1882—1913年；b：1880—1913年；c：1926—1950年。

资料来源：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109页。

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不难想象，这个时期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也应该是快的。七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按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大体上可以表明这一事实。

比较上面两个表格中的数字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资本积累快慢与经济增长快慢之间的相关度，远不如资本积累快慢与资本技术构成提高快慢的相关度为高。资本的迅速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密切联系的。1870年后的40多年和1950年后的30多年，资本积累的速度较高并非偶然，这正是发生科技革命的两个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工业部门结构的急剧变化，推动了资本的加速积累。

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资本高速积累，加快了资本构成的提高。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是电子技术的兴起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自动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演变的一个新阶段。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在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的转变中实现了第一个飞跃，机械化转变为自动化则是第二个飞跃。60年代中期麦克格劳—希尔公司的一次调查即表明：美国雇用100人以上的32000家制造公司中，有21000家使用了某些自动控制 and 测量装置以及资料处理系统。石油、仪器、计算机和控制设备工厂中约有90%使用了这类装置。三分之二的装备机械和金属制品厂也使用了控制系统。在1963年，制造业总投资的18%近70亿美元用于购买自动化设备或先进设备，约占机器投资的三分之一。<sup>①</sup>生产自动化要求大量资本投向自动化设备和自动化工厂，带动了资本的迅速积累，提高了资本的技术构成。

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工业部门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工业的重要性下降了，一些高科技的新兴产业部门迅速兴起。随着计算

---

<sup>①</sup>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80年英文版），第194页。

机、喷气式飞机、合成材料等等的出现，电器设备、飞机制造、仪器设备、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急剧扩大，例如在1948—1976年期间，美国制造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3%，而运输设备产量的年增长率为4.8%，仪器设备为5.4%，化学制品为5.8%，电气和电子设备为6.4%。<sup>①</sup> 欧洲各国也不例外。战后发展最快的部门相对说来都是技术密集型的。如化学制品、塑料制品、电气设备、电子设备、仪器和交通工具等部门。它们的产量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

**表 23 新增价值的平均年增长率 (%) (1960—1973年)**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迅速增长的部门	7.2	9.0	7.6	5.3	11.9	9.3
全部经济	4.2	6.0	5.3	2.7	5.2	4.8
缓慢增长的部门	1.9	2.3	1.8	-0.4	1.4	-0.3

资料来源：C·弗里曼、J·克拉克、L·索伊特：《失业和技术革新——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1982年英文版），第130页。

这些迅速发展的部门都是现代高科技产业部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和技术的密切结合，从私人及国家的研究和发展费用（Expenditure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简称 R and D）的急剧增长中可以得到反映。仅仅在1945年到1963年期间，美国工业企业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即从13亿美元激增到127亿美元；政府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从4亿美元增加到24亿美元，大学和其他非赢利组织支出的研究和发展费用从2亿美元增

<sup>①</sup> J·肯德里克、E·格罗斯曼：《美国的生产率——趋势和周期》（1980年英文版），第39页。

加到22亿美元。①急剧扩大的上述高科技部门，它们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大大高于一般工业部门的水平。以1961年为例，当一般传统工业部门中研究和发展费用仅占销售额的1%左右时，这个比例在机器工业中为4.4%，化学工业中为4.6%，仪器工业中为7.3%，电器和电子设备工业中为10.4%，飞机制造工业中为24.2%。②1964年，传统工业部门中研究和发展费用不过几千万美元至多两三亿美元，而这类费用在化学工业中达13亿美元，在电气和电子设备工业中达26亿美元，在飞机和导弹工业中达51亿美元。③

新兴的高科技部门不仅仅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要求大量的资本投资。在1948—1976年期间，资本投入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数是3.0%，而运输设备工业为3.8%，化学工业为3.9%，电器和电子设备工业为4.5%，仪器工业为5.4%。④这种超过平均水平的资本投入量的迅速增长，并不只是由于产品的迅速扩大所致。从人均资本量的增长率来看，这些工业部门大都达到或超过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同一时期，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为2.3%，而电气设备工业为2.2%，化学制品工业为2.3%，运输设备工业为2.5%，，仪表工业为3.0%。⑤在欧洲，发展最快的部门也都是耗费资本最多的部门，它们在资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都高于整个经济或整个工业的平均水平。

高科技产品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导致这些部门资本成

---

① E·曼斯菲尔德：《技术变化的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第53页。

② 同上，第56页。

③ 同上，第57页。

④ J·肯德里克、E格罗斯曼：《美国的生产率—趋势和周期》（1980年英文版），第39页。

⑤ 同上，第43页。

**表 24 西欧五国资本存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比较 (1960—1973年)**

	西 德	法 国	英 国	荷 兰	比利时
资本存量的相对增长 (整个经济=100)					
迅速增长的部门	130	125	126	143	105
全部工业	123	102	98	83	78
缓慢增长的部门	70	56	64		24
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 (%)					
迅速增长的部门	5.1	6.5	4.7	8.6	7.6
全部经济	4.6	5.4	2.7	4.3	4.2
缓慢增长的部门	4.7	6.0	2.3	5.2	3.9

资料来源：C·弗里曼、J·克拉克、L·索伊特：《失业和技术革新——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1982年英文版），第130页。

本和投资需求的迅速上升。生产高科技产品需要昂贵的研究设备和生产设备。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加速了生产设备的无形损耗，经常要求更先进更昂贵的设备来替代。例如在飞机制造业中，战后由于采用喷气发动机和电子技术，使新型商业飞机设计的开发成本惊人地上升。DC-2型飞机的开发成本大约15万美元，DC-8型飞机的开发成本增加到1亿美元，而波音767型飞机的开发成本则超过10亿美元。<sup>①</sup> 电子部门集成电路(Integrated—Circuit,

① D·莫沃里，N·罗森伯格：“商用飞机工业中的技术变化，1925—1975”《黑箱之内：技术和经济学》（1984年英文版），第167页。

称IC) 产业中超大型集成电路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简称VLSI) 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鲜明的例证。新型集成电路产品不但功能极高而且价格昂贵, 但随后价格逐渐下降, 以致单位功能的成本急剧降低。然而, 这种单位功能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不过反映了高额投资和迅速发展的技术革新。不断提高集成电路元件密度必须依靠更复杂的加工设备, 这些加工设备由于日益复杂而变得非常昂贵。因此, 集成电路生产的资本成本一直在急剧增长。一个晶片工厂的成本在1970年为200万美元, 1979年已增加到5000万美元。与此同时, 多数集成电路的价格也和单位成本一起迅速下降。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 迫使集成电路厂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生产。而且, 为了生产出比其它大规模生产的厂家更具有竞争性的产品, 还必须经常革新自己的工厂以生产密度更高的新型集成电路。创造1美元新增销售额所需要的投资, 1970年为30美分, 1979年已提高到70美分。②

由此可见, 生产自动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 以及与之相应的高速资本积累, 已成为战后推动资本构成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构成的变动趋势时, 不但要看到抑制资本构成迅速增长的因素, 还要看到促进资本构成迅速增长的因素。这样, 我们才能对20世纪以来资本构成的实际趋势作出客观的判断和解释。

---

① N·罗森伯格、W·斯坦因米勒: “超大型集成电路革命的经济含义”, 《黑箱之内: 技术和经济学》(1984年英文版), 第181页。

## 第三章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 的存在原因和规模变动

#### 1.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广泛，涉及到资本主义失业人口的存在原因、社会性质、类型特征、经济作用、规模变动，等等。但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经济根源，二是过剩人口规模变动的长期趋势。

在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涉及到失业问题。他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研究，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异化现象，其中包括工人劳动被机器所代替的问题。例如《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资的变动趋势时，便谈到分工的发展和机器的运用如何排挤手工工人、成年男工和熟练工人，如何把他们抛向街头，同时批判了“补偿理论”的若干观点。不过在这个时期，由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他对失业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简单和直观的，还没有从理论上充分深入和展开。到50年代和60年代，当马克思在伦敦重新系统研究政治

经济学时，他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形成的决定性著作，其特点是，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直接推导出过剩人口产生的必然性，揭示了生产资本的发展所造成的两种互相矛盾的人口变动趋势，深刻论证了这种人口过剩的相对性质。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最集中的系统阐述，是在《资本论》中，这个系统分析主要是作为资本积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展开的。他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基础，指出：“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象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sup>①</sup>

这里我们打算过多谈论大家比较熟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只想着重分析一下通常被人们忽略了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的论点，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经济学手稿中的分析和《资本论》中的分析统一起来？

前面已经指出，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直接从剩余价值生产推导出过剩人口产生的必然性的。他说：“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生产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1—692页。



动·劳·人·口·的·减·少”。<sup>①</sup>“工作日中的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最初比例，可以而且也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必要劳动限于越来越小的部分。人口的情况相应地说也是这样。<sup>②</sup>这两段话无非是说，作为资本主义主要剥削方法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价值降低为基础，它意味着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方法同时表现为，为获得既定量的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从而所必需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马克思用一个具体数例说明了这一原理。假定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长度不变，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比（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为10：2，则每个工人劳动一天可提供2小时剩余劳动，6个工人劳动一天可提供12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假设，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把工人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提高到9：3。每个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由10小时缩短为9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从2小时延长为3小时。在这种条件下，资本家只需雇用4个工人，而不必雇用6个工人，每天即可无偿获得12小时剩余劳动。这里，“6个工作日可以被看作一个72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24小时，那就会省出2个工作日，即2个工人”。<sup>③</sup>也就是说，资本家要得到12小时剩余劳动，原来需要72小时的工人劳动，相当于6个工作日，或6个工人劳动一天，而现在只需要48小时的工人劳动，相当于4个工作日，或4个工人劳动一天。这就节省了24小时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1页。

② 同上，第46卷上，第378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0页。

的工人劳动，等于两个工作日，从而使两个工人不再为资本增殖所需要，成为过剩人口。

上面这个数例还可以换一种形式来表示。如果每个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从10:2改变为9:3，那末，6个工人劳动一天共72小时，原来只提供12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却可提供18小时剩余劳动，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50%。但是，如果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率不变，为提供18小时剩余劳动，本来需要90小时必要劳动，一共为108劳动小时，相当于9个工作日，或9个工人劳动一天，这就必须增加3个工人。但现在由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提高到9:3，不需增加工人，便可提供18小时剩余劳动。

上述同一数例的两种表示，具体说明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既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又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减少的道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无非表明，用较少的必要劳动可以提供既定的剩余劳动，或用既定的必要劳动可以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这同时便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人口可以生产既定的剩余价值，或用既定的劳动人口可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两者都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只不过前者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因为生产一定量剩余价值只需要较少的工人，后者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相对减少，因为不增加工人即可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人口变动的两种趋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家加强剥削的两种主要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使资本家力图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且力图雇用更多工人来扩大剥削范围。由于延长工作日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和工人的反抗，所以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的工作日，即从空间方面增加大量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一个人的活的

工作日所形成的自然界限”。<sup>①</sup>另一方面，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又使资本家力图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必要劳动人口。由此便引起了资本的两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资本的趋势在于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同时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把必要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sup>②</sup>

根源于剩余价值生产的上述两种倾向，包含着资本主义人口变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一方面是资本雇佣的劳动人口的扩大，另一方面是被资本抛弃的过剩人口的增长。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趋势是“既要不断扩大工人人口，又要不断减少工人人口的必要部分，即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过剩人口是后备军。实际上，这只是在考察单个工作日时所作的论述的应用。因此，这里就包藏着现代人口理论所提出的，但是并不理解的全部矛盾”。<sup>③</sup>显然，只有同时看到并理解上述两种趋势，才能全面了解资本主义人口运动的矛盾和规律。而理解这一矛盾和规律的关键，在于把握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抓住剩余价值规律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来阐述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而在《资本论》中，则主要以资本积累学说为基础来阐述这一规律。两种理论在分析过剩人口形成的必然性时，具体的推理过程似乎有所不同。剩余价值理论从工作日两部分构成的变化来论证这个问题，强调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9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5页。

③ 同上，第552页。

资本积累理论从生产资本两部分构成的变化来论述这个问题，强调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下降。那末，这两种分析方法是不是互不联系互不相关的呢？不是的。由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是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补偿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因此，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生产资本中可变组成部分的减少，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两重表现。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般特征是，一定量活劳动与较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被当作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即通过降低单位产品价值而降低劳动力价值进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它必然同时表现为，较少的必要劳动和较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提供较多的剩余劳动，用价值范畴来表示，也就是较少的可变资本和较多的不变资本相结合以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可见，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同时包含着两重结构变化：一方面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于剩余劳动时间的缩短，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本中可变组成部分相对于不变组成部分的下降。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表明，同一资本用较少的劳动会创造出同一价值，或者，较少的劳动用较大的资本会创造出同一产品。较少的必要劳动生产出较多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同资本相比减少了，这种情况对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来说显然和下述情况是一样的：资本同它所推动的必要劳动相比增加了；因为同一资本推动的剩余劳动增多了，推动的必要劳动就减少了。”<sup>①</sup>

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这两个角度对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论证不仅是统一的，而且表明，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积累理论的前提和基础。离开剩余价值学说，就不能深入理解

---

<sup>①</sup>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4页。

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规律，甚至会产生误解，以为过剩人口产生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好象机器的采用本身必然导致人口过剩与失业。这就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归之于技术性原因，把失业看作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产物，看掉了问题的实质。

实质问题不在于技术进步和用机器代替活劳动本身，而在于这一技术因素被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作为加强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换句话说，资本采用机器和新技术，不是要为社会节约劳动，而只是要为资本节约成本，即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扩大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需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sup>①</sup>

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个根本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必然趋向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降低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因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作日的缩短和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这里说的限制不应从绝对意义上理解，不是说工作日不能缩短和实际工资不能提高，实际上，工作日的缩短和实际工资的增长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说的限制是指：工作日的缩短必须不致妨碍剩余劳动时间的扩大，实际工资的增长必须不致阻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这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所设置的限制。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个社会限制，在采用机器和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相应地提高实际工资和缩短工作日，为生产者和全社会谋福利，那末，实际工资就可能充分提高以致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缩短，工作日也可能充分缩短以致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不

<sup>①</sup>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5页。

扩大，因而也就不会导致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不过这样一来，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资本主义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于技术进步成为资本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

## 2.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要了解马克思的失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把它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加以比较。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不同，失业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专有的，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和非学院派经济学几乎都有自己的失业理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研究各个学派的各种复杂而具体的观点和方法，而只是在探讨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的限度内，把它同西方经济学的几种最基本的失业理论作一简要的比较。

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学院派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失业理论是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的著作几乎没有谈到失业问题，他相信资本主义财富的不断增长将保证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的自发调节也必然使劳动达到供求上的均衡，因而充分就业是经济生活中的正常状态。李嘉图则认为，工资是劳动的市场价格，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工资的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人口的供给，使劳动的市场价格趋向于符合劳动的自然价格（即劳动者的生产费用）。由于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的这种自发调节，当然不会有长时期的严重失业。他还信奉工资基金理论，确信劳动的自然价格由社会现存的消费品供应与工人及其家属的数量之比来决定，因而只会影响工人的生活水

平而不会影响工人的就业状况。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李嘉图接受了巴顿的思想，承认机器的采用有可能造成工人失业，对劳动阶级有害。但他同时又强调，不能由此推论机器的采用不应加以鼓励。购买机器的资本通常从利润的积累中提供，而不是从现有的用途中转移出来；从根本上看，使用机器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加速积累，从而扩大投资和对劳动的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在有关采用机器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某些观点的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他的就业理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继承了古典学派的传统，几乎没有对失业问题给予严重的注意，他们仍然把充分就业看作经济上的常规。新古典派就业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萨伊定律，即商品的供给会创造对商品自身的需求。依据萨伊定律，出卖商品所得到的货币收入，必然用来购买商品。如一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则会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因而生产资源归根到底都会得到充分利用，不是生产消费品便是生产资本品。如果出现工人失业，那主要是由于工资未能按照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只要降低工资率，便会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需求和产量，保证充分就业。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趋向于充分就业均衡，除磨擦性失业外，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古典和新古典派失业理论的核心，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失业的内在必然性。它在方法论上的第一个特征，是抹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各种矛盾，崇拜私人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按照这种理论，卖和买，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都是直接同一的；即或有暂时的脱节，通过利息率和工资率的自动调整，即可恢复均衡，从而也不会有生产资源和劳动资源的长期闲置。这种理论确实很美妙，但可惜的是，与资本主义现实相距太远，它不仅抹杀了资本主义关系，甚至忽视了商品货币关系。难怪凯恩斯批评说：“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

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sup>①</sup>其实，马克思早已揭示了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他在抨击穆勒和萨伊关于“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的说法时指出：“经济学辩护士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sup>②</sup>马克思的方法与此根本不同。他的着眼点恰恰在于商品经济的一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矛盾的交织，并从这种矛盾的对抗性质中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的经济根源。

古典和新古典派失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强调供给方面而忽视需求方面。他们从萨伊定律出发，认定供给创造需求，从而认为不论产量和就业量处于何种水平，社会产量的总需求恒等于其总供给，故而除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制约着就业量之最高限度外，无其他力量阻碍充分就业。这种把总需求仅仅看作是总供给的派生物，无视需求本身的某些独立决定因素，否认需求方面可能具有的对产量的限制作用的观点，必然导致否认失业的存在。凯恩斯正确指出：“总需求函数可置勿论，——这是李嘉图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百余年以来，我们所领教的经济学，都是以此观念为基础。”<sup>③</sup>与古典或新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基于分析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统一与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而生产和销售是两个互相依赖而又相对独立的经济过程，各自受不同因素的制约。“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63年中译本），第2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

③ 同①，第33页。



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sup>①</sup>在涉及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这个关于失业的核心问题时,马克思着重分析的恰恰是需求方面而不是供给方面。他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推导出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的趋势,并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失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和决定失业规模的基本因素。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对古典和新古典派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在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中实现了一个革命。凯恩斯断然否定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机制会自动保持整个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他认为,在就业不足时,降低工资率的主要影响是削减总需求,这不是增加就业的有效办法;有效办法应是提高直接决定产量水平从而就业水平的社会总需求。而利息率的降低,在转化储蓄为投资过程中虽有一定作用,但投资更受到利润预期的影响,因而降低利率并不一定能刺激投资增长达到保证充分就业的水平。在凯恩斯看来,决定产量和就业水平的直接因素,是社会总有效需求,它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组成。在资本主义经济自发运转条件下,若干规律必然造成总量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国民收入增长时消费的增长落后于储蓄的增长,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为弥补消费需求与充分就业产量水平的差距,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以提供足够的投资需求。但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使人们预期利润率下降,“灵活偏好”规律和货币数量偏低又造成利息率过高,结果是储蓄并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形成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总量需求低于总量供给是一种常态,经济通常只能在低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均衡。萧条和失业根源于经济制度本身的缺陷。除非有政府合理的政策干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页。

和新古典学派相比较，凯恩斯失业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强调需求方面而忽视供给方面。他断定萧条和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研究影响总量需求的各种规律和因素上。他认为投资不足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刺激投资，萧条和失业即可避免。但是他忽略了，投资行为虽有扩大需求和缓和销售困难的作用，也有扩大产品供给和加剧销售困难的后果。多马关于“投资过程的二重性”的分析，正是针对凯恩斯论点的上述缺陷而提出的。多马的下述说法完全正确：“私人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当失业是它的实际收入和它的生产能力之间差额的函数时，趋于提高国民收入的标准措施（即投资）也扩大生产能力。……就失业问题来看，投资一方面可以医治疾病，但同时也会引起将来更大的疾病。”<sup>①</sup> 马克思坚决反对各种投资不足论的危机理论或失业理论。他在分析危机时期信用紧缩所造成的错觉时明确指出：“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sup>②</sup> 马克思把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认为“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sup>③</sup>

凯恩斯失业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是一种短期的静态的分析，舍象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变化这个最重要的经济因素。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则是一种长期动态分析，在考察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时，特别注意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变化等因素，并把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资本构成的变化，看作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原因。对于凯

① E·多马：《经济增长理论》（1983年中译本），第10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7页。

③ 同上，第280页。

恩斯经济理论的这种静态分析特征，甚至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哈罗德等也早已看到。他们批评这种短期静态分析方法的缺陷，主张把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力图建立动态经济学，提出各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模型。当然，西方的动态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动态分析，在目的和方法上也是根本不同的。但西方动态经济理论的发展本身，终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凯恩斯理论在方法上的局限性。

凯恩斯失业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经济分析主要不是立足于制度因素而是立足于心理因素。他把就业不足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把消费需求不足归因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把投资不足归因于心理上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利息率偏高，把利息率偏高归因于心理上的灵活偏好规律和货币数量不足。这样，“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便成为主要的“最后自变数”，它们连同工资单位及货币数量，“决定国民所得与就业数量”。<sup>①</sup>在凯恩斯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一概被抹杀了。这种方法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甚至也不同于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例如霍布森也主张消费不足论，但他却把消费不足看作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不公的必然结果，而凯恩斯却把消费不足归之于消费倾向这类先验的人性。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摒弃任何主观心理分析方法，它从客观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推导出资本主义失业的必然性和根源。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必然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凯恩斯固然承认非自愿失业靠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无法避免，但却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合理政策干预而救治。马克思则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痼疾，只能与这个制度共存亡。

<sup>①</sup>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63年中译本），第207页。

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由于帮助资本主义世界渡过了30年代大萧条，并在战后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繁荣而风行一时，但自70年代出现滞涨局面和大规模失业以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在这种背景下，不仅正统经济学中新古典派理论在新自由主义或货币学派等形式下重新流行起来，而且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一次得以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为基础的激进派的失业理论，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

激进派失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Howard L. Sherman)。激进派理论既反对保守派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自由派的凯恩斯主义，既批判保守主义的投资过度论，也批判自由主义的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者把萧条和失业归因于工资过低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认为提高工资以增加消费需求便可避免萧条，但没有看到工资不仅是消费需求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是成本的最大组成部分，提高工资引起成本上升必然降低成本利润，加剧萧条。而投资过剩论者把萧条和失业归因于投资过多所引起的成本上升，认为压低工资和原料价格以降低生产成本即可避免萧条，但没有看到工资不仅是成本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是需求的最大组成部分，降低工资引起需求下降同时会带来销售困难和利润减少，也不能避免萧条。“萧条既起因于需求有限(消费不足)也起因于高成本(投资过剩)的理论是激进派的理论”。<sup>①</sup>

激进派失业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危机的原因。这种理论似乎只承认周期性失业，对消费不足论和投资过剩论的批评，以及自身论点的阐述，都是在周期分析的框架内进行的。他们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利润率下降，而后者又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扩张阶段后期，投资过剩

<sup>①</sup> H. J. 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105页。

从供给方面起作用，通过工资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生产成本提高，同时消费不足从需求方面起作用，限制了商品价格的相应上涨。结果是，“在繁荣的顶点有限的消费需求和增长的单位成本一起作用使利润缩减并阻滞着经济循环。在萧条的低点，消费需求下降终止和单位成本下降使利润增长并刺激着经济活动”。<sup>①</sup>

这种激进派理论作为危机理论，应被看作是对马克思危机学说的具体发展的一种努力，或许包含着较多的真理性。但作为失业理论，则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有很大距离。这种理论只强调危机和萧条时期存在失业，只限于周期分析的方法。而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则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常现象，虽然其规模在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马克思采用的方法首先是一种长期趋势分析，而后才是周期波动分析。两种理论由于分析方法的区别，尽管都肯定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在解释其形成机制时却大不相同。马克思强调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变化所造成的劳动市场上需求与供给的对抗性矛盾，激进派则强调周期过程一定阶段上所形成的商品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对抗性矛盾。

对比了以上三种最主要的失业理论，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作一简要概括。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制度的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对资本主义失业原因的揭示，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剖析，而摒弃一切非经济非历史的因素，一切主观主义的心理分析。它把资本主义失业看作是一种相对的人口过剩，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并认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作为它的必然伴侣的失业现象。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分析方法。与学院派新古典理论崇拜资本

<sup>①</sup> H. J. 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105页。

主义制度自发调节机制和强调均衡分析相反，马克思看到的和强调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对抗性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供给和需求的矛盾，部门比例失调的矛盾等等，归根到底要在积累过程中，通过人口过剩、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等各种反常形式，强制地表现出来。妄图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又消除各种矛盾进而消灭失业，必然是徒劳的。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长期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把失业理论纳入资本积累学说的范围，始终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观察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和规模变动。他的失业理论不仅是一种动态分析，而且是一种长期分析；既不同于静态分析方法，也不同于周期分析方法。马克思也论述失业的周期波动，但周期分析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 3.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批评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也受到各种不同意见的批评，来自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或外部的，善意的或恶意的。这里只想评论几种最主要的批评意见。

一种批评认为，马克思的失业理论（连同危机理论）忽视了有效需求问题，不如凯恩斯的理论具有说服力。例如罗宾逊夫人指出：“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投资额是由资本家能从整个制度中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所支配的，这就是说，来自利润的储蓄率支配着投资率。竞争与技术进步引起积累的刺激，……因此，有效需求问题并不发生。虽然马克思把萨伊法则明白斥为无知妄言，他也并不比穆勒或马歇尔更多承认储蓄决定与投资决定二者间的离异。在凯恩斯体系中，这种离异是危机与失业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提供的就业量依存于现有资本额的大小，失业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去雇用所有潜存的可用劳动。当积累赶

上人口增长…，劳动的暂时相对不足刺激了节约劳动的发明，由此又使后备军得到补充。……这种失业与由于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失业是根本不同的。……但马克思却认为他的体系是无所不包的，旨在由此推究对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中发展的危机的解释。就在这里，按照凯恩斯的论证，马克思的分析显得不够充分与缺乏说服力。”<sup>①</sup>

罗宾逊夫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指出了两种失业理论的区别。凯恩斯的失业理论以有效需求分析为基础，他的逻辑是有效需求水平决定产量水平，产量水平决定就业水平。由于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决定产量水平低下和就业不足。而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不直接涉及有效需求问题，它以资本积累为线索，认为积累的增进导致资本对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从而造成失业，它并不以有效需求不足和产量水平低下为条件。但是，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是分开的，他并没有打算从失业的存在原因中“推究出对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中发展的危机的解释”。而他的危机理论并没有忽视有效需求问题，不过他不象凯恩斯那样，把投资需求提到决定性地位，倒是强调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最终的从属性和依赖性。

凯恩斯的理论似乎能更好地说明一定时期的实际失业水平，但却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失业存在的真正原因。他把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需求不足，但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他只能求助于对投资的利润预期的悲观心理。至于这种悲观心理的原因凯恩斯是无法解释的。马克思的分析不是要确定一定时期的失业水平，而在于揭示失业存在的原因和趋势。因此，他不从产量而从资本出发，不着眼于水平而着眼于变动，并在考察资本积累的数量变动时突出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动，通过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推导出失业存在和扩大的必然性。这个分析

<sup>①</sup> J·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1964年中译本），第9—10页。

把失业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起来，突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从未忽视有效需求问题。但他与凯恩斯不同，从不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投资不足即资本积累不足，也从不担心从长期看资本积累会缺乏足够的推动力。相反，他认为需求不足是资本积累自身的产物，由过度积累所引起的生产盲目扩张和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其根源在于资本积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这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引起危机和失业剧增，形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凯恩斯以为通过增加投资即可消除危机与失业，但他不懂得，这至多不过是一种暂时缓解矛盾和推迟矛盾爆发的方法，最终不但不能消除反而要加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sup>①</sup>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凯恩斯的智慧是不能理解的。

第二种批评意见认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不够完善。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批评，代表人物是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Makoto Itoh）。他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几乎把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和吸收过程中所出现的周期性变化忽略掉”，即使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定义还是过分强调过剩人口的递增形成”。<sup>②</sup>伊藤诚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主要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应“把以资本构成不变为基础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同繁荣阶段相联系以及把以资本构成的根本改变为基础的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同有规律的产业周期的萧条阶段相联系”。<sup>③</sup>由于“固定资本的特殊限制”，资本积累“在正常状态下不是按资本深化方式而是按资本扩大方式在既存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

② 伊藤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形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第171、173页。

③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08页。



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着。…在繁荣时期，资本未必能通过废弃和更新现有的固定资本来努力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sup>①</sup>他还强调，实际存在的产业后备军“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而且包括来自于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民解体过程的过剩人口”，为了阐明基本原理，就不应当“把后一部分过剩人口包括在内”。<sup>②</sup>

伊藤诚的上述论点，是为他的危机理论服务的。他批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完善，特别是它包含着两类不同的彼此难以调和的理论，一种是“商品过剩理论”，另一种是“资本过剩理论”。按照他的解释，商品过剩理论的缺陷在于强调消费不足和实现困难，是从流通过程寻找资本的困难和危机的原因。资本过剩理论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自身，是从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运动的资本自身寻找危机的根源。资本过剩引起危机的具体机制是，在经济的繁荣阶段，由于资本积累是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对劳动的需求迅速增长，过剩人口大量被吸收，于是引起市场上的劳动力不足和工资上涨，一般利润率会由于工资提高而突然下降，从而引起危机爆发。<sup>③</sup>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投资过剩论和利润挤压论。伊藤诚的过剩人口理论不过是他的危机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

伊藤诚在与威克斯的论战中指出，对于马克思的三种互相独立的有关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论述，即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第一节中所假定的资本构成不变的积累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后各节所假定的资本构成提高会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累进的生产，以

---

①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4页

② 伊藤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形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第174页。

③ 同上，第160—175页。

及同时谈到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吸收和重新形成的周期过程，应理解为：第一种假定同繁荣阶段相联系，第二种假定同萧条阶段相联系，这样，“便有了一个单一的、成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的理论”。<sup>①</sup>这个解释不一定正确。对马克思的两种假定，应从历史发展和现实运动双重角度理解。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构成不变的假定主要和手工制造业时期相联系。<sup>②</sup>马克思在论述中就曾举出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作为例证。资本构成提高的假定则主要和大机器工业时期相联系，这从马克思的下述行文可以明显看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sup>③</sup>从现实运动的角度看，在资本构成提高的总趋势中当然会出现资本构成不变甚至下降的时间间歇，但却没有根据断定，资本构成提高只和萧条阶段相联系，而资本构成不变必然出现在整个繁荣阶段。

伊藤诚强调由于固定资本的特殊限制，资本积累在繁荣阶段只能在资本构成不变的基础上进行，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获取额外利润的意图大受限制等看法，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从社会的观点看，虽然危机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但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固定资本更新的时期是各不相同的。萧条阶段开始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也有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会不同程度地延续到繁荣阶段。至于固定资本的物质形态，主要是对资本的转移形成一定限制，

① 伊藤诚：“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08页。

② 这也是威克斯的观点，但伊藤诚认为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马克思提到的工资和劳动市场的周期运动的机制正好是与产业革命之后已形成的周期有关的”。（“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07页。）但马克思在第二十三章第一节稍后所阐述的，并不是人口过剩的周期变动，而是积累变动和工资变动的真实因果关系。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2页。

却不会限制新投资采用新技术并具有更高的资本构成。资本积累就其本来含义,不是指原有资本的更新和重置,而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甚至对原有资本的部门转移来说,固定资本的限制也已在相当程度上被信用制度的发展所打破。在繁荣阶段,由于市场状况良好和商品价格上涨,现有设备确会得到充分利用,在原有技术方式下扩大生产也会有利可图,但这绝不排斥资本家仍会通过扩大积累和改进技术获得更大的额外利润。因此,断言繁荣阶段的资本积累必然具有资本构成不变的特征,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伊藤诚单纯从繁荣阶段的工资成本上升来说明利润率下降并诱发危机,也具有片面性。正如谢尔曼所指出,单从成本上升并不能论证危机的必然性,如果在成本上升同时商品价格得以相应提高,利润率则不会下降。利润率下降是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暴露出伊藤诚的危机论的片面性。他批评马克思有所谓两种危机理论,肯定所谓资本过剩理论而否定所谓商品过剩理论,表明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缺乏正确理解。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绝不是对立的,勿宁说是经济危机的两重表现。投资过度所造成的生产过分扩张,和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商品销售困难,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的双重结果,它们的对抗性矛盾最终只能通过危机求得强制的暂时解决。

伊藤诚强调区分资本积累过程内部所产生的过剩人口和外部非资本主义经济解体所产生的过剩人口,不管它在抽象的理论分析上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但在现实运动中,所有过剩人口都会产生经济影响。用这种区分来为自己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危机理论辩解,没有多大意义。

伊藤诚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要害,在于它片面强调失业的周期形式,忽视失业的长期形式。然而正是后者,是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在分析失业的长期趋势时可能过分

强调了它的累进的或递增的规模，在这点上，伊藤诚的批评包含着正确的因素，我们下面还要分析和检验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但伊藤诚把失业的周期形式提到首位，无视失业的经常存在和长期趋势，则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或经验上，都是不正确的。

第三种批评意见认为，马克思对相对过剩人口必然性的论证，没有全面考虑决定失业量的各种经济因素，因而是科学的。这种意见的代表是霍华德（M.C.Howard）和金（J.E.King）两位经济学家。他们认为，马克思从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来论证失业后备军产生的必然性，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忽略了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反作用，而剩余价值率提高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必然伴随物。有机构成提高固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剥削率增长也会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加速资本积累，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哪种力量更大并不能肯定，因而有关对劳动力需求的净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二是根本没有论述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问题。失业只有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超过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时才会产生。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如果没有劳动力供给的更快增长，也不会有失业。

他们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说明上述道理。假定可变资本的增长率等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则可变资本增长率 $g_v$ 等于新增可变资本 $\Delta v$ 与原有可变资本 $V$ 之比。再用 $\beta$ 代表总投资中用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用 $\alpha$ 代表剩余价值中用于储蓄亦即用于投资的比例，用 $e$ 代表剩余价值率，用 $s$ 代表剩余价值，则得公式：

$$g_v = \frac{\Delta v}{v} = \frac{\beta \alpha s}{v} = \beta \alpha e$$

马克思断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 $\beta$ 下降，但 $\beta$ 的下降不一定带来 $g_v$ 的下降，除非 $\alpha e$ 的增长不能抵销 $\beta$ 的下降。如果假定 $\alpha$ 不变，那么关键就在于 $e$ 的提高。只有在 $e$ 的提高慢于 $\beta$ 的下降时， $g_v$ 才可能下降。即使如此， $\alpha$ 还可能提高并抵销这种影响。

即使 $e$ 和 $\alpha$ 两个变量的增长都不能抵销 $\beta$ 的下降,从而使 $g_v$ 降低,那还要看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如何,才能确定是否会有失业产生。可见,多种变量制约着失业人口的形成和扩大。马克思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变量 $\beta$ ,而忽视其他变量如 $\alpha$ 、 $e$ 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因而他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①

霍华德和金的批评,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首先是关于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应该说,马克思关于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的命题是正确的。问题是,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量的变动,显然还要受到资本积累量的制约,而资本积累量的变动又确实与剩余价值率和投资率有关。从严格的数学意义上说,失业量是劳动力需求量小于劳动力供给量的差额,的确受到若干变量的制约,不是一个对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的命题所能推导出来的。但马克思论证的目的,并不在于确定失业量的大小,而在于揭示失业存在的根源和趋势。他要从若干变量中找出一个关键的起支配作用的变量,它能决定失业存在的必然性,这个变量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那末,有什么理论根据说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这样一个关键变量呢?或者反过来问,难道情况不会象霍华德和金所设想的那样,由于剩余价值率和投资率的充分提高,资本积累量可能迅速扩大,以致抵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而有余,并使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的供给吗?

回答是,这种情况从短期看完全可能出现,但从长期趋势看却不可能发生。因为一当这种形势出现,劳动力价格即实际工资便会由于过剩人口的减少或暂时消失而迅速上涨,直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结果必然导致剥削率和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速度放慢。这正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一节最后几段所

① M·C·霍德华、J·E·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英文版第二版),第197—198页。

着重阐明的道理。那里直接论述的虽然是积累率变动和工资率变动的关系，但同时也揭示了制约积累率的客观因素。“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sup>①</sup>与此同时，资本还必然要加速采用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以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资本构成的提高相对加快，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更加缓慢。上述双重后果表明，从长期看，资本积累率会被限制在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低于劳动力供给增长的限度内。马克思主要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来论证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并非他不懂得或未注意到积累速度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是他看到这种影响的客观限制。就这一点来说，霍华德和金对马克思的指责是不成立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提出的公式，对于确定失业的具体数量，却有参考价值。

其次是关于劳动力的供给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忽略劳动力的供给在形成失业人口中的作用。他不但假定劳动力会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增长，还强调积累本身对扩大劳动力供给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居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和女工童工的使用。在这点上正如霍德华和金所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可能相当过分地受到早期资本主义经验的影响。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使劳动力供给急剧增长的时期。资本主义部门的高效率导致它以牺牲前资本主义部门而迅速扩张。而前资本主义部门由于衰落而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远比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所能吸收的劳动力为多，这种状况又由于机械化扩大了妇女和儿童劳动的使用而加剧。但是，霍德华和金却由此得出结论说：“剩余劳动力的形成必定随着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支配而逐渐减弱，并将最终完全失去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680页。

它的重要意义”，<sup>①</sup>这就未免过于绝对和武断了。剩余劳动力的形成不仅来自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更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积累过程。居民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极限化虽然会影响到剩余劳动力形成的规模，但绝不会使这一形成过程消失。后面的经验分析将证明这一点。

## 第二节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失业人口 形成条件的若干重要变化

### 1. 决定失业规模及其变动的主要因素

上一节我们研究了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分析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失业人口存在的必然性的论证是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也存在一个缺陷，就是他在肯定失业的长期形式时，过分强调了它的递增的规模。形成这一判断的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缺乏理论逻辑的严密性，而主要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再伟大的理论家，也不能完全摆脱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要了解马克思形成这一推断的根据，首先应该简要分析决定失业规模及其变动的主要因素。这里有三个基本变量：一是资本积累量及其变动，二是资本构成状况及其变动，三是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动。前两个因素的组合决定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后一个因素代表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及其变化，最终制约着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规模和变动趋势。

马克思着重考察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因素，其中，

---

<sup>①</sup> M·C·霍德华、J·E·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英文版第二版），第199页。

又主要考察的是资本构成的变化。他这样做的根据我们已经作了分析，因为他确信，资本积累量的变动最终要被限制在劳动力需求低于劳动力供给的限度内。他正确地指出了资本构成提高在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中的决定作用。但也正是在这里，他过分地强调了资本构成提高的速度。他认为资本构成的提高“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结果是，“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从而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sup>①</sup>以这一分析为基础，马克思必然推断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增长将是相当迅速的。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显然受到当时英国和欧洲历史状况的影响。19世纪正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工业革命时期，生产过程机械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不仅积累的新增资本采用机械技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原有资本也处在大规模技术变革过程中，用机械技术代替手工技术。因此资本构成的提高非常迅速，甚至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种实际状况可能给马克思以深刻印象，使他在作出理论判断时，过高地估计了资本构成提高的加速趋势。

对于劳动力的供给这个因素，前面曾提到，马克思并非没有注意到。相反，他的失业理论包含着劳动力供给迅速增长的假定。这个假定也不是马克思的臆断，而是以当时欧洲的实际状况为依据的。十九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劳动力供给的扩大非常迅速。有两个因素起着主要作用。一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加速，使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0—691页。



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速。二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迅速侵入前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或手工生产领域，居民的无产阶级化促使劳动力供给更加急剧地扩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积累和机器的采用，“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上去”，使“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加入无产阶级队伍，<sup>①</sup>“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sup>②</sup>他在《资本论》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和描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打击下沦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大批使用如何加剧了成年男工的过剩。确实，在当时，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比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种实际情况也可能给马克思以深刻印象，使他把劳动力供给的高速增长看作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经常现象，进而影响到他作出相对过剩人口必将趋于迅速扩大的判断。

除了上述两点以外，马克思的分析还忽略了一个可能影响失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即劳务部门的发展对实物生产领域过剩人口的吸收。这里用“忽略”一词来指责马克思或许是不公正的。他曾专门研究过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家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非生产劳动者为他们服务，甚至根据1861年或1862年的工厂报告指出：联合王国真正在工厂工作的总人数只有77万，而女仆单是英格兰一处就有100万。<sup>③</sup>但是，当时服务劳动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马克思还主要是从剥削阶级消费剥削收入的角度来看待劳务活动的。在当时条件下，他很难充分预见到，劳务经济会在20世纪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以致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这一点，也不能不成为马克思对失业规模扩大趋势作出过分估计的一个原因。

---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第40、4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3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97—198页。

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条件在20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对失业规模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统计验证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条件变化作一详细分析。

## 2. 资本构成提高速度的放慢

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已经对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说明，20世纪以来，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资本构成的增长速度总的看来是趋于缓慢了，尽管50年代以后比之50年代以前在趋势或速度方面有很大不同。这一事实对失业规模变动影响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资本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的确随着资本总量扩大和资本构成提高在趋于下降，但并没有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相对过剩人口也的确在不断地产生和形成，但并没有象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同资本积累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扩大。<sup>①</sup>

这里只想着重谈一个问题，资本构成提高速度放慢，固然缓和了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的剧烈程度，以及失业人口规模增长的剧烈程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这一过程。资本构成提高仍然是相对过剩人口得以形成和经常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缓慢，因而“在资本增大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不是相对地急剧减少，而是随之增加”。<sup>②</sup>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正确判断战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实际变化，首先应该区别资本的价值构成和技术构成，看到在价值构成增长缓慢的背后，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0、691页。

<sup>②</sup> 仇启华、解德源、黄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第104页。

技术构成的提高并不缓慢。按照我们在上一章中以固定资本净存量为基础所作的计算，从1947年到1984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指数从100.0提高到200.0，技术构成指数却从100.0提高到292.4；美国全部私人经济的平均资本价值构成指数从100.0提高到151.2，平均技术构成指数则从100.0提高到208.8。当然，从这些指数看，价值构成的提高（特别是制造业）也不算很缓慢，但技术构成确实比价值构成提高快得多。而就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动来说，直接从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中即可推导出这种需求的相对下降。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意味着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代替，意味着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需要的活劳动或劳动力减少了，直接表现出实物资本对劳动力相对需求的降低。

其次，在比较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增长速度的差异时，还要注意分析价值构成提高较慢的原因，看它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贬值，还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以美国制造业为例。从1947年到1984年，固定资本净存量按1982年美元计算，由2044亿美元增长到7529亿美元，增长了268%；与之同时，职工人数从1555万扩大到1959万，仅增长了26%。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即职工平均每人分摊的固定资本存量价值，相应地从13145美元扩大到38433美元，提高了192.4%。<sup>①</sup>随着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下降了。以1982年美元计算的每一万物质固定资本所需要的职工，从1947年的0.76人，减少到1984年的0.26人，下降了66%。再看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同时期固定资本净存量按现行价格计算，由388亿美元增加到7976亿美元，增长了1956%，约十九倍半；职工工资和薪金总额由425亿美元增长到4391亿美元，增长了933%，约九倍多。<sup>②</sup>结果，资本价值构成从0.91提高到1.82，

① 资料来源：同表12的计算根据。

② 资料来源：同上。

增长了一倍。同资本技术构成相比，资本价值构成的增长慢得多。那末，这是否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实际下降程度比技术构成变动所显示的要缓慢得多呢？

乍一看似乎应作肯定回答，其实不然。这里需要研究价值构成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从前面所引的数字看，在此期间，固定资本的物质存量增长到368%，价格存量增长到2056%，表明固定资本的价格提高到559%，即增长了四倍半。而同时，职工人数从1555万扩大到1959万，工资薪金总额从425亿增加到4391亿，从而每个职工的平均工薪报酬从2733美元提高到22414美元，即增长了七倍多。将固定资本的价格上涨程度同职工即劳动力的价格上涨程度加以比较，便可看出，此期间资本价值构成比资本技术构成增长缓慢，主要不是由于固定资本的相对贬值，而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上涨。其表现形式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慢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而实质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快于劳动力的价值下降。由此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速度的减缓，不但不会减弱资本对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下降程度，反而会大大加剧这种下降。这从下列计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此期间，制造业包括固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工资薪金总额）在内的总资本量从813亿美元增长到12367亿美元提高了十四倍，而职工总数仅增长了26%。结果，每一万美国资本所需要的职工数，从1.91人减少到0.16人，下降了92%。

由此可见，某些学者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价值构成增长缓慢<sup>①</sup>，便得出结论说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不但未下降反而提高了，是何等地与事实不符。他们在这里犯了双重错误。一方

---

① 这些同志为证明战后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缓慢，引用的统计资料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的资本价值构成增长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缓慢。有关评论请参阅拙著“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第49页。

面，他们忽视了在资本价值构成相对缓慢的增长背后，资本技术构成仍在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对资本价值构成比之技术构成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忽视了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增长所引起的价值构成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不但不会增加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反而会使这种需求下降得更厉害。仅仅根据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相对缓慢这一现象便匆忙地进行推断，是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第二章研究资本有机构成问题时，强调区分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强调区分影响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不同原因并具体分析其经济后果，并不是无的放矢，它所具有的实际分析意义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

### 3.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

20世纪同19世纪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19世纪人口增长率急剧提高，但从19世纪末开始人口的增长率转向下降。这一变化不能不对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变化是人口出生率变化和死亡率变化的综合结果。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是极高的。18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sup>①</sup>虽然同时人口的出生率也很高，但由于死亡率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较低的。18世纪中期开始，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例如英国的人口死亡率在1740年至1790年期间开始降低，以后不断下降，直到1811—1820年为止。此后十年间稍有上升，但始终没有再接近18世纪中叶的水平<sup>②</sup>。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方面的

<sup>①</sup> 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扩展》（1966年英文版），第41页。

<sup>②</sup> 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1986年中译本）上卷第一分册，第82页。

进步。“天花的克服、通过沟渠疏浚而对疟疾的釜底抽薪，成为一种乡土病的坏血症的根除，使婴儿和产妇的死亡趋于减少的产科学的改良，以及医院、药房和医科学学校的普遍设立，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生命的保全。”<sup>①</sup>在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则开始得晚得多。多数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下降趋势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这样，在整个19世纪，由于人口出生率高而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高的人口增长率必然伴随着高的劳动力增长率，使19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大。这正是马克思当时所经历的实际情形。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国家从19世纪后半期（一些欧洲海外移民国家如美国等甚至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的出生率下降趋势，在19世纪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作用。“西欧国家出生率的下降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只相当于19世纪中期的大约一半。”<sup>②</sup>尽管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还在继续下降，但由于出生率的迅速降低趋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急剧地下降了。这种下降当然也不能不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

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折期和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折期所发生的两次人口革命，使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显示出三种人口变动型式，即18世纪以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型式，19世纪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型式，和20世纪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型式。这可从表25大体反映出来。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变动型式基本相似。它的人口自然增

---

① 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1986年中译本）上卷第一分册，第83页。

② 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扩展》（1966年英文版），第49页。

表 25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英国	法国	北欧国家	其他国家	英国	法国	北欧国家	其它国家	英国	法国	北欧国家	其他国家
18世纪中期	3.7	4.0	3.5		3.2		2.9		0.5		0.6	
18世纪末期	3.7	3.3	3.4	3.8 <sup>a</sup>	2.5		2.5		1.2		0.8	
19世纪中期	3.3	2.7	3.3	3.5	2.2	2.4	2.1	2.6 <sup>b</sup>	1.1	0.3	1.1	0.8 <sup>b</sup>
19世纪末期	3.0	2.2	3.0	3.2	1.8	2.1	1.7	2.0	1.2	0.1	1.2	1.2
20世纪中期	1.6	1.9	1.8	1.8	1.2	1.2	0.9	1.0	0.4	0.7	0.9	0.8

a: 仅指荷兰, b: 不包括瑞士。

其他国家指: 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

资料来源: E·博斯鲁普: 《人口和技术变化》(1981年英文版), 第114页。

长率, 18世纪末期为3.0%, 19世纪中期为1.7%, 19世纪末期为1.4%, 20世纪初期为0.9%, 20世纪中期(1950—1959)为1.6%。①这里略有不同的是, 5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有所回升, 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出生热所造成的。美国人口变动的另一特点, 是欧洲移民在加速人口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在1846—1932年期间, 洲际移出人口的95%来自欧洲, 而1821—1932年期间, 洲际移入人口的58%到了美国。②这个向美国移民的浪潮,

① S·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扩展》(1966年英文版), 第43页。

② 同上, 第53页。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至今仍未完全停止。1881—1910年期间,每10年平均移入人口的绝对数,高达590万,减去移出人口还净增长410万。<sup>①</sup>洲际移民浪潮,对19世纪欧洲的过剩人口起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却增加了美国的劳动力供应。

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相对过剩人口规模的变动。一般说来,人口增长率提高必然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加速增长,并在劳动力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加剧失业规模的扩大;反之,人口增长率下降则会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放慢,并在劳动力需求不变的条件下缓和失业人口的增长。不过这里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并不总是一致的。由于死亡率下降,劳动力的增长可能慢于人口的增长;由于出生率下降,劳动力的增长又可能比人口的增长快。二是人口增长率的变动不仅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间接地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假定劳动力需求不变是不合理的。人口迅速扩大会增加社会对食品、住房和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刺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速资本积累,扩大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但同时也会增加社会抚养人口的负担,加剧资源短缺,减少储蓄和积累。尽管影响是复杂的,但总的看来,由人口加速增长所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大约不足以抵销劳动力供给的急剧增长,其净影响仍会加剧扩大失业规模。这可能是19世纪英国存在严重失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以来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则从相反的方向影响失业规模。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缓慢的增长,肯定会减轻就业压力。人均国民收入的较快提高,则会促进储蓄和投资的相对较快的增长。这个缓和失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因素,是马克思未能充分预料也难以充分预料到的。

---

<sup>①</sup> 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扩展》(1966年英文版),第52页。



#### 4.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其他条件变化

首先,是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过程。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时期,西欧和北美仍存在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占居民人口的很大比重,美国在南北战争前还存在着黑人奴隶制度。“1831年的人口调查揭示出有九十六万一千个家庭,也就是不列颠所有家庭的28%是从事于农业的。如果再加上城镇外面那些捕鱼和海滨的家庭、乡间道路和运河上的工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任何文明条件下对最纯粹的农业生活都不可少的农村手工业者和商人——诸如铁匠、木匠、制车匠、修鞋匠、泥水匠、磨粉匠和乡村小店主等——连同许许多多乡镇上的人口,那么,无疑的,不列颠家庭的大约50%是生活在可以适当地划入农村型条件之下的。”<sup>①</sup>在资本主义关系和大机器生产迅速发展的猛烈冲击下,各种前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瓦解,农村人口急剧下降,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后不得不沦为劳动力出卖者,使雇佣劳动力的供给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并成为提高失业水平的一个因素。莱伯戈特在分析美国失业的长期变动时很形象地指出:

“奴隶是不失业的,农民是不失业的。不为雇主工作的木匠、马具工、织布工和渔夫是不失业的。总体来看,这些类别差不多占1800年劳动力的全部。到1950年,它们的比重已不到10%。”<sup>②</sup>比重下降的时间过程如表26。莱伯戈特把这一长期变动作为促使20世纪的失业率高出19世纪的一个因素。他是从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变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加入工资劳动者队伍的人数越多,可能失业的人数就越多。但如果从加剧(雇佣)劳动力供应的角度来

① J·H·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1986年中译本)上卷第一分册,第96—97页。

② S·莱伯戈特:《经济增长中的人力:1800年以来的美国记录》(1964年英文版),第171—172页。

**表 26 美国劳动力中奴隶和农民比重的下降**

	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比	
	农 民	奴 隶
1800	61	28
1850	46	24
1900	20	0
1950	7	0

资料来源：S·莱伯戈特：《经济增长中的人力：1800年以来的美国记录》（1964年英文版），第172页。

看，那末显然，比重下降越快，则雇佣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也越快。从上表可以看到，美国正是在19世纪，这一比重的下降最大。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前资本主义经济被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排挤和代替的过程，也主要是在19世纪基本完成的。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国家的严重失业问题，不能不说与这一事实有一定联系。

20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过程已越来越接近它的极限。这从农业就业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可以部分地得到反映。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英国到1913年已下降到11.0%，到1950年更下降到5.1%。<sup>①</sup>尽管下降的趋势长期存在，但比重日渐缩小，由此而增加的雇佣劳动力的供给也必然减少。

其次，是女工和童工的使用。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的贫困，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简单化，童工和女工的使用

<sup>①</sup> 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9页。

急剧地增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妇女和儿童参加到出卖劳动力的行列，成为加剧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儿童劳动力的使用已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20世纪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已有了禁止使用童工的立法。虽然农业或偏远地区仍有童工的非法使用，但数量是很小的。不但童工的使用被禁止，而且由于教育的逐渐普及和教育年限的逐渐延长，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年龄在提高。这就会相应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妇女劳动力的增加却是一个长期趋势。在美国，自立人口中妇女参加劳动力的比率，1940年不过27.4%，1970年提高到42.6%，1985年更达到54.5%。<sup>①</sup> 妇女参加劳动的增多相应提高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

越来越多的妇女出卖劳动力，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服务行业的充分发展，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务劳动电气化等等。但也有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家庭生活困难迫使更多的已婚妇女走向劳动市场。从统计数字上看，虽然美国妇女参加劳动力的比率长期趋于增长，但70年代增长幅度最大，十年提高了7.5%。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可能与下列事实相联系：70年代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几乎停滞。私人企业平均每小时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1947—1966年平均为2.4%，1966—1978年平均只有0.8%。<sup>②</sup> 私人非农业部门按不变价格计算的雇员可支配工资，70年代竟有四年下降，1979年甚至比1970年还低0.8—1.1%。<sup>③</sup> 在这种形势下有更多的妇女为维持家庭生活而要求工作，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

① 《美国统计摘要》（1986年），第398页。

② R·B·弗里曼：“美国劳动市场的演变，1948—1980”，《转变中的美国经济》（1980年英文版），第351—352页。

③ 根据《美国统计摘要》（1980年）第422页数字计算。

第三，是工人劳动时间的变化。19世纪前半期，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借助大量失业和工人贫困的巨大压力，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工作日长达12小时甚至14小时以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工作日的过度延长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包括它加剧失业的作用。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失业工人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结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①

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工人阶级斗争的迫使下，也出于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考虑，资产阶级国家相继颁布了限制工作日的立法。从此开始了缩短劳动时间的长期趋势。这是马克思已经预料到的。到本世纪前半期，不仅八小时工作制逐渐得到普及，五天工作周也逐渐实行。从1870年到1984年，工人平均每年工作的劳动时间，日本从2945小时减少到2149小时，德国从2941小时减少到1676小时，美国从2964小时减少到1632小时，英国从2984小时减少到1519小时。②英国减少最多，下降了大约50%；日本减少最少，也下降了约28%。工人劳动时间的缩短，等于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并成为本世纪缓和失业规模增长的一个因素。

### 5. 第三产业对过剩劳动力的吸收

前面曾经谈到，马克思对失业问题的分析并未十分重视劳务经济的发展对吸收过剩劳动力所起的作用。但从19世纪中期开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2、698页。

② 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6页。

始，劳务部门的发展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特别是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已成长为吸收新增劳动力和过剩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劳务部门（即服务部门）在西方通常被称为第三产业，同时农业部门被称为第一产业，<sup>①</sup>工业部门被称为第二产业。有关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在西方经济学者中似乎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主要分歧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区分。有的著作把运输业、通讯业和公用事业包括在第三产业中，有的著作则把它们包括在第二产业中，有的著作却把公用事业包括在第二产业，而把运输、通讯业包括在第三产业中。<sup>②</sup>本文没有任务深入探讨三大产业部门的划分标准问题。但考虑到运输业、通讯业和公用事业“都是依靠大量资本设备和复杂技术”的部门，<sup>③</sup>其生产过程更接近于工业而不同于其他服务业，似乎把它们列为第二产业更为合适。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首先观察按此标准所划分的美国三大产业部门的长期变动趋势。

**表 27 1870—1965年美国三大产业部门就业人数所占份额（%）**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37	1947	1956	1965
农业部门	47.3	47.1	39.7	34.7	28.4	23.8	21.9	18.8	12.1	8.3	5.7
工业部门	27.1	27.1	31.2	33.7	37.8	41.4	35.8	36.3	42.1	42.0	39.6
服务部门	25.6	25.8	29.2	31.7	33.8	34.8	42.3	44.9	45.8	49.7	54.8

资料来源：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30页表2、第34页表4。

① 有时第一产业指初级产业，包括农业和矿业部门。

② 参阅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24—27页。

③ 同上，第27页。

美国总就业人数中三大产业部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农业部门份额长期稳定下降，已从1870年的将近一半下降到1965年的不到6%。工业部门份额在1920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后在波动中稳定在40%上下。唯有服务部门份额长期稳定增长，并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加速，在1870—1920年50年间提高了36%，而在1920—1965年45年间提高了57%。这表明，1920年以前，就业部门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变动，这时工业就业所占比重也同劳务部门就业比重一同迅速增长；但1920年以后，就业部门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从实物生产部门转向劳务部门的变动，这时工业就业比重的缓慢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的迅速下降结合在一起，而劳务部门的就业比重则加速提高。<sup>①</sup>可见，从20年代开始，劳务部门已成为美国吸收剩余劳动力和维持全社会就业增长的主要经济领域。

把美国三大产业部门就业相对数和绝对数结合起来观察，上述趋势更为清晰。

**表 28 美国三大产业部门就业人数（1920—1980年）（千人）**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农业部门	13342	12497	10979	9926	7057	4523	3705
工业部门	16758	15643	16259	22540	24438	28093	30804
服务部门	10582	13766	16102	22657	29751	42787	59601

计算根据：《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号，第16、64页。

注：为使绝对数的系列延长到80年代，我们根据《基本经济统计手册》的有关数字计算出三大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这个数字与富克斯在《服务经济学》中所提供的数字不尽相同。《基本经济统计手册》在第64页所列农业就业人员数，来自农业经济局，其中包括

<sup>①</sup> 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34页。

某些从事食品加工的人员；第16页所列非农业企业就业人员数，来自劳工统计局，其中不包括业主、自雇人和家庭仆役，但在两个以上企业工作的人员会重复计算，从而会夸大就业人数。（参阅《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号第15页和第62页的说明）。而富克斯在《服务经济学》第28页表1所列数字，来源于商业经济局，其中包括领取全日工资和薪金的工作人员，加上折合为领取全日工资的非全日工作人员，再加上业主（参阅该书中译本第29页注①）。

综合观察各部门就业人数的相对变化和绝对变化，1920年以来美国三大产业就业的变动型式表现为：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相对量急剧下降，同时绝对量急剧下降；劳务部门就业人数相对量急剧上升，同时绝对量急剧上升；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相对量缓慢下降，而绝对量缓慢上升。在1920至1980年的60年间，农业部门就业减少了960万，工业部门就业增加了1400万，服务部门就业增加了4900万。在此同时期，美国的劳动力则从4170万扩大到10850万，增加了6680万。①如仅靠工业部门就业的增长，除去补偿农业部门减少的960万，只净增加440万人，根本无法解决新增6000多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际上，新增加的5000多万人的就业，几乎全部依赖于服务部门就业的扩大。如没有服务部门对新增劳动力的吸收，美国的失业规模将会达到惊人的程度。

劳务部门就业的迅速扩大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首先，工业化的发展，货物生产的集中和生产率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连续性的加强，要求商业和金融业的相应发展，以便在衔接集中的连续的生产 and 分散的多样化的需要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次，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在公共卫生、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要求地方政府在上述方面提供有效的服务；整个经济体系的日趋复杂化，也要求中央

① 《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版，第126—127页；《美国统计摘要》（1986年），第390页。

政府不断加强调节、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再次，居民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会日益扩大对零售商业、居民服务、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教育和其他专业服务的需要。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是劳务部门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缓慢。<sup>①</sup>一些研究表明，尽管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长期趋于增长，但其产值份额却基本稳定，没有明显的趋势。<sup>②</sup>因此富克斯认为：“就业变化的主要解释是，服务部门的每人产值的增长要比其他部门的慢得多。换言之，一定量的产品所需的劳动量的减少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比在服务部门快。在1929—1965年间，这三个部门每年平均的变化率如下：农业，3.4%；工业，2.2%；服务，1.1%。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变化率的差异，每年为1%多一点”。<sup>③</sup>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服务部门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有：工业部门劳动质量的提高比服务部门快得多；工业部门的人均实物资本处于比服务部门有利的地位，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可能比服务部门迅速，从日益发展的规模经济中也受益较多。<sup>④</sup>这样，一方面是对劳务的需求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增长，另一方面是劳务的生产率提高较为缓慢，其结果必然是劳务部门就业人数和就业份额的长期迅速增长，成为吸收追加劳动力和过剩劳动力的主要经济领域。

劳务部门就业量迅速扩大的趋势，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请看下表。

- 
- ① 参阅：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英文版），第150—151页；S·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六篇演讲》（1959年英文版），第62—63页；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11—12页。
- ② 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12页；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英文版），第96—97页。
- ③ V·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1987年中译本），第12页。
- ④ 同上，第13页。



表 29 六个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变化（总就业量的百分比）  
（1870—1984年）

		法国	德国	日本	荷兰	英国	美国	平均数
农业	1870	49.2	49.5	67.5	37.0	22.7	50.0	46.0
	1913	37.4	34.6	64.3	26.5	11.0	32.3	34.4
	1950	28.5	22.2	48.3	13.9	5.1	13.0	21.8
	1960	21.9	13.8	30.2	9.5	4.6	8.2	14.7
	1973	11.0	7.2	13.4	5.7	2.9	4.1	7.4
	1984	7.6	5.5	8.9	4.9	2.6	3.3	5.5
工业	1870	27.8	28.7	13.8	28.0	42.3	24.4	27.7
	1913	33.8	37.8	13.9	33.8	44.8	29.3	32.2
	1950	34.8	43.0	22.6	40.2	46.5	33.3	36.7
	1960	36.3	48.2	28.5	39.2	46.7	34.3	38.9
	1973	38.4	46.6	37.2	35.7	41.8	32.5	38.7
	1984	32.0	40.5	34.8	26.4	32.4	28.0	32.4
服务业	1870	23.0	21.8	18.7	34.0	35.0	25.6	26.4
	1913	28.8	27.6	21.8	39.7	44.2	38.4	33.4
	1950	36.7	34.8	29.1	45.9	48.2	53.7	41.4
	1960	41.8	38.0	41.3	51.3	48.7	57.5	46.4
	1973	50.6	46.2	49.3	58.6	55.3	63.4	53.9
	1984	60.4	54.0	56.3	68.7	65.0	68.7	62.2

资料来源, A·麦迪森: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减速: 数量估算方法”, 《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 第689页表A—13。

注: 农业包括农林渔业; 工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用事业; 服务业包括所余其他部门。这一产业划分与前面各表的区别在于: 将运输业和通讯业划归服务部门。

从表中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 英、法、德、日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变化, 同美国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由此可以说, 本世纪以来劳务经济的巨大发展, 确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维持一定就业水平的主要力量。

### 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分析

#### 1. 美国的失业规模和长期变动趋势

首先观察 100 多年来美国失业的基本趋势。下面是按 10 年平均计算的失业量和失业率（见表 30）。

美国从 1890 年才开始有失业量和失业率的逐年详细统计，1890 年以前的数字是由莱伯戈特估算的。在 1890 年至 1988 年的 99 年间，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两个最严重的萧条年代，因而也是 19 世纪 20 世纪失业人数最多的两个年代。只要把这两个失业高峰年代撇开来观察，那末，失业规模的增大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本世纪初的第一个 10 年，平均年失业人数不过 140 万，20 年代增加到 200 万，40 年代和 50 年代增加到 300 万，60 年代增加到 350 万，70 年代增加到 570 万，80 年代增加到 850 万。或许有人说，70 到 80 年代又是一个严重的萧条时期，在观察长期趋势时也应撇开。然而即使如此，失业人口的增长趋势仍然是明显的。

严格说来，按每 10 年平均计算年失业规模并不尽合理，由于危机间隔的年份不同，有的年代发生数次危机，有的年代却未发生危机，因而按 10 年平均计算的失业规模必然差别甚大。比较科学的是按不同周期计算平均失业人口，并观察其趋势。我们也作了这样的计算，具体方法是，以每次危机的低谷年份作为周期的起始年份，下次危机的低谷年份作为周期的终结年份，确定周期的长度，并计算各个周期的年平均失业规模。公认的中性危机则舍象掉。表 31 是计算结果。

从本世纪美国各个周期的平均失业变动来看，失业人口的扩大趋势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不是后一个周期的平均失业规模一定比前一个周期大，但总的变动趋势则明显趋于扩大。

表30

美国按十年平均计算的失业量和失业率

	失业量(百万)	失业率(%)
1800—1809		1—3
1810—1819		1—3
1820—1829		1—3
1830—1839		1—3
1840—1849		3—3
1850—1859		3—6
1860—1869		3—6
1870—1879		10
1880—1889		4
1890—1899	2.68	10.4
1900—1909	1.41	4.4
1910—1919	1.95	5.0
1920—1929	2.05	4.7
1930—1939	9.57	18.2
1940—1949	2.97	5.2
1950—1959	2.95	4.5
1960—1969	3.53	4.8
1970—1979	5.73	6.2
1980—1988	8.50	7.5

资料来源和计算根据：1889年以前的数字，引自S·莱伯戈特：《经济增长中的人力》（1960年英文版），第189页；1890年以后的数字，根据下列刊物提供的统计数计算：《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第135页；《美国统计摘要》（1980年），第394页；《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91、296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9年8月，第98页。

**表 31 美国二十世纪按周期计算的平均失业人口**

周期起始和终结年份	周期长度(年)	平均年失业人口(千人)
1900—1908	9	1367
1908—1914	7	2260
1914—1921	8	2315
1921—1932	12	3562
1932—1938	7	10566
1938—1949	12	4124
1949—1958	10	2929
1958—1970	13	3664
1970—1975	6	5240
1975—1982	8	7657
1982—1988*		8658

• 1988年不是最近这个周期的终结年份。

计算根据：同表30。

失业率的动态不象失业量那样明显。按照莱伯戈特提供的1890年以前的估算数字，我们把美国的失业率追溯到19世纪初。在这长达180年的历史时期内，尽管各个年代的数字由于周期的变动而波动很大，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高，但按十年平均计算的失业率仍然有增长的趋势。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工业人口的比重较小，所以失业率也不高，波动在1—3%或3—6%之间。1861年到1865年内战以后，美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从19世纪

表 32 美国的年平均失业率 (%) (1890—1988年)

1890	4.0	1910	5.9	1930	8.7	1950	5.3	1970	4.9
1891	5.4	1911	6.7	1931	15.9	1951	3.3	1971	5.9
1892	3.0	1912	4.6	1932	23.6	1952	3.0	1972	5.6
1893	11.7	1913	4.3	1933	24.9	1953	2.9	1973	4.9
1894	18.4	1914	7.9	1934	21.7	1954	5.5	1974	5.6
1895	13.7	1915	8.5	1935	20.1	1955	4.4	1975	8.5
1896	14.4	1916	5.1	1936	16.9	1956	4.1	1976	7.7
1897	14.5	1917	4.6	1937	14.3	1957	4.3	1977	7.1
1898	12.4	1918	1.4	1938	19.0	1958	6.8	1978	6.1
1899	6.5	1919	1.4	1939	17.2	1959	5.5	1979	5.8
1900	5.0	1920	5.2	1940	14.6	1960	5.5	1980	7.1
1901	4.0	1921	11.7	1941	9.9	1961	6.7	1981	7.6
1902	3.7	1922	6.7	1942	4.7	1962	5.5	1982	9.7
1903	3.9	1923	2.4	1943	1.9	1963	5.7	1983	9.6
1904	5.4	1924	5.0	1944	1.2	1964	5.2	1984	7.5
1905	4.3	1925	3.2	1945	1.9	1965	4.5	1985	7.2
1906	1.7	1926	1.8	1946	3.9	1966	3.8	1986	7.0
1907	2.8	1927	3.3	1947	3.9	1967	3.8	1987	6.2
1908	8.0	1928	4.2	1948	3.8	1968	3.6	1988	5.5
1909	5.1	1929	3.2	1949	5.9	1969	3.5		

资料来源：同表30。

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的工业化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危机也逐渐深化，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萧条和高

失业率，但从多数年份来看，平均失业率波动于4—5%之间。经过本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之后，从40年代到80年代，平均失业率则波动在4.5—8.1%之间。莱伯戈特指出：

“如果仅仅注意到1800年以来平均失业状况的趋势，那末数据虽不够精确，但还是显示出10年平均失业率的轻微的长期增长。”<sup>①</sup>

其次，再对近百年来美国的失业规模作一估量和分析。表32是自1890年以来美国官方的逐年失业率统计。

按照美国官方的统计，在1890至1988的99年中，年平均失业率在4%以下的年份有27年，在4.1—4.9%的年份有13年，在5%以上的年份有59年。这就是说，即使根据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和政府为所谓“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所规定的4%的标准，那末，也只有27%的年份，即大约四分之一的年份，达到了所谓充分就业。而在这27个所谓充分就业的年份里，还有11年处于战争时期，即1918, 1943—1945, 1951—1953, 1966—1969等年份，这11个年份的所谓充分就业，只是靠战争才勉强维持的。另一方面，在这99年中却有60%的年份，失业率在5%以上，大大超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公认水平。<sup>②</sup>

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家一贯认为，“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有失业，或者说，一定量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理由是，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磨擦性失业必然存在。所谓磨擦性失业，是指雇佣工人放弃或失去一种工作而寻求另一种工作时所经历的暂时的失业状态。“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就是以最低限度的磨擦性失业率为根据确定的。问题在于，最低限度的磨擦性失业率应该是多少？1962年，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sup>①</sup> S·莱伯戈特：《经济增长中的人力》（1960年英文版），第189页。

<sup>②</sup> 美国经济学家杜博夫首先从这个角度估量美国的失业规模。参阅R·B·杜博夫：“美国的失业”，《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4期。

在年度报告中首次把4%的失业率作为官方规定的“充分就业”指标时，民主党的经济学家正在谈论磨擦性失业率应为3.5%—4%。然而，磨擦性失业的多少和总的经济状况决不是没有关系的。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总需求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对劳动需求的增长，会减少磨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只要需求的增长会降低求职者获得职业信息和进行地区搬迁的代价，或者使厂商放宽他们的雇工条件。”<sup>①</sup>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由于战争经济的刺激，劳动市场上的需求极高，美国的失业率曾降到1.2%的最低水平，这表明当时的磨擦性失业率不过1%左右。然而大战结束后不久，杜鲁门政府的民主党经济学家开始说，磨擦性失业应为1.5%—2%。随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共和党的经济学家又认为磨擦性失业应是2.5%—3%。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期间，民主党经济学家又在谈论3.5%—4%的磨擦性失业。到尼克松时期，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磨擦性失业应为4.5%—5%。而到福特时期，经济学家竟宣称磨擦性失业应为6%—8%。<sup>②</sup>随着磨擦性失业的估计不断加码，所谓“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这使人不能不怀疑，官方经济学家不断提高磨擦性失业率估计和“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标准，究竟目的何在？它们的客观效果，显然在于掩盖美国日趋严重的失业状况，把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归入某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的”范围。其实，即使4%的所谓“充分就业”失业率，从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观点来看也是过高的。如果按照肯尼迪政府以前人们通常承认的2%或3%的“充分就业”失业率标准，那末，在前述99年中，只有12年达到所谓充分就业（以3%的失业率为标准），其

① D·贝南特、M·杰克逊：《劳动经济学，劳动市场的选择》（1979年英文版），第265页。

② H·J·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25页。

中还有5年处于战争时期；或者，只有7年达到所谓充分就业（以2%的失业率为标准），其中还有4年处于战争时期。

第三，还有必要指出，前面关于失业规模的分析 and 估量，主要是根据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作出的，而官方的失业统计大大缩小了实际的失业规模，远没有反映出失业的真实程度。美国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至少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没有包括非自愿的半失业状况，二是没有包括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的失望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美国的官方就业和失业统计主要是由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根据普查局的人口普查资料每月发布的，统计以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具体方法是：通过调查先推算出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两者相加即等于民用劳动力数，再加上军事人员即等于全部劳动力数；用失业人数除以民用劳动力数便得出官方的失业率。就业的定义是：有职位并在工作或有职位但未工作。失业的定义是：没有职位但正在寻找工作。这样，一切没有职位而又没有寻求工作的人，便都不算作失业者，因而也没有包括在劳动力大军之内。但实际上，在那些既无职位也未求职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并要求工作，只是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才放弃求职的。这些人被称为失望工人，实际上是隐蔽的失业者，但他们既没有算作失业大军的一员，也根本没有计入劳动力大军之内，这就缩小了实际的失业规模。除此以外，相当大一部分非自愿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被笼统地算作就业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实际的失业规模。

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根据官方统计资料，以1975年第二季度为例重算了美国的失业率。<sup>①</sup>该季度的官方统计是：在9257万个劳动力中，就业人数为8438万，失业人数为819万，失业率为

<sup>①</sup> H·J·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12—16页。



8.8%；同时有5853万成年人不在劳动力之内。据劳工部调查，这5800多万人中的大部分人，约5335万人当时不需要工作，另有约518万人是当时需要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求职的。当调查中询问这500多人放弃找工作的原因时，回答是：因上学的，139万；因病残的，63万；因家务在身的，114万；因认为找不到工作的，115万，因其他原因的，87万。可见，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115万因认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去求职者，毫无疑问属于失望工人，应被算作失业者。把他们包括在劳动力内，季度失业率便从官方公布的8.8%上升到10%。按照更实际的估计，这518万人都应属于失望工人。因为前提是他们当时都要求工作，可能是由于找不到工作才去上学或从事家务，因而所有这些失去信心的人都可能是非自愿的失业者。如果把他们全部归于劳动力和失业者一类，失业率便从官方公布的8.8%上升到13.7%，即总数达到1337万人。

此外，劳工部的调查资料还表明，1975年第二季度有1350万非全日就业人员，其中又有388万人希望能有全日工作，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只能找到非全日工作。这些人显然是非自愿的非全日就业人员，其平均工作时数每周只有21小时，约为全日制平均周工作时数的一半，实际上是半就业。因此，388万人的一半，即194万人也应算作失业者。如把这个数字加上，失业率就从官方公布的8.8%上升到10.9%。

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谢尔曼重算了1975年第二季度的美国失业规模，调整后的最小值为1128万，最大值为1532万。他由此得出结论：“按十分保守的调整，应把1975年第二季度8.8%的官方失业率提到12%，即增加将近一半。而更符合实际的调整则表明失业率为15.7%，几乎为官方数字的两倍。”<sup>①</sup>

<sup>①</sup> H·J·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16页。

国美经济学家杜博夫也依据官方统计资料，重算了有关失业的较长时期的调整数字。他的方法和谢尔曼基本相同，即把半失业者和失去信心而放弃求职的隐蔽失业者这两类人加到官方数字上去，调整了从1967到1976共10年的失业率。调整后的数字也分为两组，较保守的一组修正数，增加的失业工人只限于“认为由于劳动市场的原因而无法找到工作”从而放弃求职的人，较高的一组修正数，则又加上“认为由于个人原因而无法找到工作”从而放弃求职的人。从杜博夫重算的数字来看，这10年的官方失业率至少少算了1.3%到2.4%。10年的官方失业率平均为5.4%，按照较高的修正数平均少算了2.0%，按照较低的修正数也平均少算了1.7%。换句话说，官方数字比实际数字至少低了三分之一。<sup>①</sup>

由于美国官方的就业和失业统计方法，失望工人这一隐蔽的失业队伍对实际的失业规模起了特殊的掩盖作用。失望工人的数字也随着周期的波动而波动，但在衰退和萧条年份，它的增长比失业人数增长得快，从而自动降低了失业率。大批人员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失去工作而又求职无望，不得不放弃寻找工作，结果作为失望工人退出劳动力大军，被排除在失业队伍之外。在1945—1946年的经济转变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就业的大规模下降并没有带来同等数量的大规模失业增长。一个更近的例子是，在1975年1—2月，就业人数下降了150万，失业率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官方的劳动力按同一数字减少了。表33是某些选择年份失望工人估计数字的变化与失业数字变化的比较。

比较表33的数字可以看出，失望工人和失业规模有着相似的周期波动型式。然而在经济状况恶化时期，失望工人数比失业人数的增长要快得多。从1979年到1982年，失业人数增长了74%，

---

<sup>①</sup> R·β·杜博夫：“美国的失业”，《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4期，第22页。

**表 33 失望工人数和失业人数 (1971—1982年) (千人)**

	1971	1973	1975	1979	1980	1981	1982
失望工人数	774	679	1082	750	971	1103	1568
官方失业人数	5016	4365	7929	6137	7637	8273	10678
官方失业率%	5.9	4.9	8.5	5.8	7.1	7.6	9.7

资料来源：J·J休斯、R·帕尔曼：《失业的经济学—英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1984年英文版），第18页。

而失望工人数却增长了109%。这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失业者退出了劳动力，从而压低了失业率的提高程度。

对劳工统计局的失业数字的批评以及关于这些数字的解释的不同意见，多次导致建立委员会来重新估价失业统计和按照变化了的劳动市场需要重新检查基础定义和概念。战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6年三次建立的专门委员会都提出了大量有关就业、失业和劳动力统计的改进性建议，有些被采纳而有些未被采纳。①考虑到任何单独一种衡量失业的方法都不能满足各种不同的分析需要和意识形态兴趣，劳工统计局从1976年开始发布七种不同的失业率，即在原有的官方失业率以外同时提供六种其他的失业衡量指标。以1979年为例（见表34）。劳工统计局正式公布 $U_0$ 和 $U_7$ 作为失业测量的参考数据，表明它终于不得不承认对传统的官方失业率的批评，也意味着对按照半失业和失望工人所作的失业率调整的实际认可。根据谢尔曼比较保守的调整数字，1975年第二季度的实际失业率比官方失业率高36.4%，根据杜博

① J·J休顿、R·帕尔曼：《失业的经济学—英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1984年英文版），第16—18页。

**表 34 不同的失业衡量指标：美国1979年第一季度**

	%
U <sub>1</sub> 失业15周以上的人占民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1.2
U <sub>2</sub> 失去工作的人占民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2.4
U <sub>3</sub> 25岁以上的失业者与25岁以上的民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3.9
U <sub>4</sub> 寻找全时工作的失业者占全时劳动力的百分比	5.2
U <sub>5</sub> 官方失业率——16岁以上的失业者与16岁以上的民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5.7
U <sub>6</sub> 寻找全时工作的人数,加上寻求非全时工作人数的一半,再加上由于经济原因而从事非全时工作人数的一半,占减去一半非全时劳动力后的民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7.2
U <sub>7</sub> U <sub>6</sub> 的分子加上失望工人占U <sub>5</sub> 的分母加上失望工人的百分比	7.9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就业情况（新闻发布）表A—7，1979年6月1日；转引自《失业的经济学——英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1984年英文版），第22页。

夫的保守的修正数字，1967到1976年10年平均的实际失业率比官方的平均失业率高31.5%；而根据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7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失业率U<sub>7</sub>比官方失业率U<sub>5</sub>高出38.6%。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即使按照被官方默认的保守估计，美国战后的实际失业规模比官方失业率所显示的规模，至少要大三分之一左右。依据这一比例来折算，美国战后的实际失业率，除朝鲜战争时期的3年外，从未低于4.5%；按10年平均计算的失业率，不包括80年代，则大体在6.0%到8.2%之间。

## 2. 美国失业人口趋于扩大的原因分析

前面已经谈到，决定失业人口实际变动的经济变量有三个：资本积累量变动、资本构成变动和劳动力数量变动。因此，要考

察美国失业人口趋于增长的一般原因，首先应该比较和分析这三个变量的长期动态。

**表 35 美国私人国内经济的物质资本存量、资本技术构成和全部劳动力动态 (1890—1984年)**

	物质资本存量 (不变价格表示)		资本技术构成(工人 平均占用的物质资本 存量)		劳动力	
	全部资本 存量10亿 (1929年 美元)	1890=100	(1929年 美元)	1890=100	百万	1890=100
(1890—1929)						
1890	49.0	100.0	2270	100.0	23.3	100.0
1929	186.3	380.2	4155	183.0	49.4	212.0
(1929—1984)	固定资本 存量10亿 (1982年 美元)	1929=100	(1982年 美元)	1929=100		1929=100
1929	1022.4	100.0	21479	100.0	49.4	100.0
1984	3442.8	336.7	32789	152.7	115.2	233.2

计算根据：J·N·肯德里克：《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323—324页；《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第127页；J·C·莫斯格雷夫：“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第63页；《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号，第13页。

因为现有资料计算资本存量所使用的不变美元的年份不同，我们只好分两个时期来比较上述三个变量的动态，这不会妨碍对长期趋势的观察。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到，无论是1890到1929年的40年间还是1929到1984年的56年间，美国私人企业的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还是比较迅速的，前40年增长了280%，将

近三倍；后56年也增长了236%，将近两倍半。同时期，全国劳动力分别增长了112%和133%。相比之下，物质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如果资本的构成不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和资本量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资本积累将足以吸收全部增加的劳动力而有余。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资本的构成随着资本积累过程而提高了。全部私人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在前40年提高了83%，后56年提高了52%，这就降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按1929年不变美元计算，每一万美国物质资本存量所需要的劳动力，在1890年是4.4人，在1929年是2.4人，下降了近一半；按1982年不变美元计算，每一万美国物质固定资本存量所需要的劳动力，在1929年是0.47人，在1984年是0.30人，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资本构成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积累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增长，使这种增长大大地放慢了。从1890年到1929年，全部私人企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增长了280%，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提高了108% ( $380.2 + 183.0 \times \frac{100}{100} = 207.7\%$ )。而从1929年到1984年，全部私人企业的物质固

定资本存量增长了23.6%，但固定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提高了120% ( $336.7 + 152.7 \times \frac{100}{100} = 220.4\%$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sup>①</sup>结果，美国资本积累的速度虽然超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但由于资本构成提高的抵销性影响，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终究赶不上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对于上面的分析应强调两点。第一点，比较这三个变量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构成提高对于减少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作用。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02页。

用，而不在于两个时期各个变量的具体增长率的测算。只要时期划分有所不同从而起始年份和终结年份选择不同，各个变量的增长就会有差别，其中道理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但不管具体的增长率比较有何不同，其中反映的基本趋势，即资本构成提高必然降低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是始终存在的。第二点，上表因资料限制只计算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决定于资本的物质存量，而是决定于资本的价值，只有价值构成的变化才能较准确地衡量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从第二章的统计证明和分析，可以推断这两个时期的资本价值构成增长

**表 36 二十世纪美国的劳动力和就业按各年代  
计算的平均年增长率**

	全部劳动力平 均年增长量 (万)	民用劳动力平 均年增长量 (万)	就业人数平均 年增长量 (万)
1901—1909 <sup>*</sup>	82	81	77
1910—1919	53	40	53
1920—1929	68	81	70
1930—1939	76	74	-5
1940—1949	73	61	119
1950—1959	80	71	70
1960—1969	133	123	133
1970—1979	208	222	190
1980—1986 <sup>**</sup>	185	184	155

• 九年平均数， •• 七年平均数。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版，第126—127页，〈美国统计摘要〉(1980年)，第396页；1988年，第364页。

速度肯定慢于资本技术构成增长速度。根据本章第二节的分析,这种价值构成提高较慢的原因又主要在于生产资料的贬值程度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程度(其表现形式则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慢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由此所引起的价值构成提高缓慢,只会加剧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因此,美国私人企业资本对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下降程度,比我们这里的数据所显示的下降程度,实际上要更大。

我们再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即比较按各年代计算的劳动力平均年增长量和就业者平均年增长量,看看是否确实存在就业增长赶不上劳动力增长的情况(见表36)。

在1900到1986的87年中,只有三个10年,就业人数的平均年增长量超过民用劳动力的平均年增长量。这三个10年我们还应注意到:第一,其中有两个10年,即1910—1919和1960—1969,就业平均年增长量虽超过民用劳动力平均年增长量,但并未超过全部劳动力平均年增长量。第二,这三个时期都包含着战争,1910—1919年包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1949年包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60—1969年包含着侵越战争。正是靠战争刺激起来的经济繁荣才使就业的增长勉强达到或超过劳动力增长的水平。除了这三个10年以外,从大多数年代来看,就业的增长都落后于劳动力的增长,这些差额逐渐积累,必然使失业人口趋于膨胀。1900年时,美国有劳动力2850万,就业人口2696万,军队12万,失业人口142万。<sup>①</sup>到1984年,劳动力扩大到11520万,净增长8670万,而就业扩大到10500万,净增长7804万。<sup>②</sup>留下866万剩余劳动力,去掉170万军队,还有近700万人无事可做,结果是失业人口增加到800万人以上。

① 《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版,第126页,

② 《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第13页。



由此可见，美国失业人口趋于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落后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又在于资本构成的提高。下面我们再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的需求两个方面，分别作一具体考察。

首先分析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美国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的原因，从以下的比较中可以窥其端倪：

**表 37 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长期变动比较**

	总人口(百万)	自立人口(百万)	劳动力(百万)	劳动力参加率
1940	132.1	100.4	56.2	55.7*
1950	152.3	106.2	63.4	59.7
1960	180.7	119.1	71.5	60.0
1970	205.1	139.2	84.9	61.0
1980	227.7	169.3	108.5	64.1
1984	236.7	178.1	115.2	64.7

● 民用劳动力参加率。

资料来源：《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第12页。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88页。

自立人口指16岁以上（在1947年以前为14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从自立人口和总人口的变动看，在1940—1984年的整个期间其变动率相差不多，但在1940—1960和1960—1984两个分时期其变动率却有所不同。1940—1960年期间，总人口增长了36.8%，自立人口仅增长了18.6%，而在1960—1984年期间，总人口增长了31.0%，自立人口却增长了49.5%。这个差别主要是由两个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的不同所造成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出生热，使40年代后期特别是50年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上升，由1940年的0.9%，到1950年的1.7%，到1955年的

1.8%，<sup>①</sup>从而使此期间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自立人口的增长速度。而60年代以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由1960年的1.6%，到1970年的1.3%，到1980年的1.1%，<sup>②</sup>又反过来使自立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立人口增长速度不同，必然影响劳动力增长速度不同。这一情况对于60年代以后美国劳动力供给的加速增长不是没有影响的。

从劳动力变动和自立人口变动的比较看，二者增长速度的差别是明显的。从1940年到1984年，自立人口增长了77.4%，年平均增长率为1.3%，而劳动力却增长了105.0%，年平均增长率为1.6%。劳动力增长快于自立人口的增长，必然表现为劳动力参加率的提高。劳动力参加率是劳动力在自立人口中所占比率，这个比率已从40年代末的56%左右提高到80年代中期的65%左右。劳动力参加率的增长趋势应主要归因于妇女参加劳动力的大幅度提高。从1948年到1985年，20岁以上的男性民用劳动力参加率实际上从88.6%下降到98.1%，而20岁以上女性的民用劳动力参加率却从31.8%上升到54.7%。<sup>③</sup>马克思所说的妇女出卖劳动力的增长趋势今天仍在发生作用，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4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的增长率比全部人口和自立人口的增长率平均每年快0.3%，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尤其是60年代以后自立人口增长率加速和劳动力参加率提高结合在一起，使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这对于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美国失业规模的扩大，是一个直接的促进因素。

其次，分析劳动力的需求方面。资本构成变动虽然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劳

---

① 《美国统计摘要》(1989年)，第7页。

② 同上。

③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92页。民用劳动力参加率是民用劳动力占民用自立人口的百分比。这个比率比劳动力参加率略低。

动力需求的具体数量和变化，是由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和资本构成质的变化这两个因素共同制约的。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组合情况，具体规定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状况。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同资本积累量的变动有一定的相关性，人们常常更直接地把劳动力的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联系起来。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不同时期这几个因素的不同结合情况。

**表 38 美国不同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资本构成增长率和就业、失业增长率**

	经济增 长率	国内私人非住 宅固定资本投 资增长率	资本技术 构成增长 率	就业 增长率	失业增长率
1889—1929	3.7	3.3 <sup>*</sup>	1.6	1.9 <sup>**</sup>	1.4 <sup>**</sup>
1929—1939	0.1	-5.4	-5.4	-0.1	19.9
1939—1949	5.1	10.9	-2.0	3.0	-16.0
1949—1969	3.8	3.7	2.5	1.4	0.9
1969—1984	2.5	3.2	1.2	2.0	7.6

• 包括住宅资本。 • • 1890—1929年平均数。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54、290页。《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1975年版，第135页；《美国的生产率趋势》（1961年英文版），第290—291、293—294页；本书第二章表17。

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是一目了然的。一般说来，投资增长率较高即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较快；投资增长率较低则经济增长也较慢；投资为负增长的30年代经济增长则几乎等于零。但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多，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只存在着大体的相关性，并非完全成比例。

投资变动率与资本构成变动率也有密切的相关性，和上述情

况类似。但1939—1947年期间的变动似乎有些反常和令人费解，最高的投资增长却和资本构成最大的负增长结合在一起。这是统计上形成的假象。实际上，在大战期间，私人投资受到限制，从1939年到1944年，私人投资乃至资本存量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2%。私人投资的大幅度上升是从1945年开始的，1945—1947年三年，私人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2.3%，<sup>①</sup>这就把1939—1947年整个时期的私人投资增长率大大抬高了。同时期显示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超高速增长，实际发生在1939至1945年期间（1946—1947年因经济改组，国民生产总值反而下降了）。由战争刺激起来的国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带动了就业的高速增长，但这一切并不是靠扩大私人投资和资本积累，而是靠逐步提高大萧条年代严重闲置的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来实现的。由此便不难了解，为什么资本投资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会伴随有资本技术构成的下降。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的变动如何共同制约着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的变动。除掉刚才谈到的第二次大战前后的特殊情况外，美国几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尽管资本构成下降，但由于投资同时下降，国民经济近乎零增长，从而造成就业绝对下降，失业猛增，例如1929到1939年时期。孤立地看，资本构成降低似乎会扩大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但这个时期的资本构成下降不是由工人的相对增加所导致，而是由资本的绝对减少所导致，整个经济处于危机或停滞状态，结果必然是资本对劳动的需求急剧下降。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迅速积累，经济迅速增长，但因为资本构成同时提高很快，造成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就业增长相对缓慢，例如1947到1969年时期。3.7%的投资增长率和3.8%的经济增长率，却只带来1.4%的就业增长率。这里充分显示出资本构成提

<sup>①</sup>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54页。

高所起的抵销作用。第三种情况是：同前一种情况相比，资本积累相对较慢，经济增长相对较慢，但由于资本构成提高速度大大降低，结果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反而相对较快，就业的增长反而相对较快，尽管其增长速度仍落后于资本积累速度，例如1889至1929年时期或1969至1984年时期。至于有的时期就业增长较快而同时失业也增长较快，或者两个时期就业增长率相近但失业增长率却差别很大，这就与不同时期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别有关。前面列举的几种不同结合情况只是为了说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具体规模和变动，并非决定于资本构成一个因素，而是决定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两个因素。资本构成迅速提高固然会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急剧下降，而资本积累缓慢和经济停滞同样是造成这种下降的重要原因。

上面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对过剩人口形成原因的一般性考察。具体到不同经济部门，也会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变动的不同结合状况，形成产生过剩人口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积累产生过剩人口，可以“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也可以“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sup>①</sup>这两种形式不但在周期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而且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企业和部门。就一个企业或部门来说，究竟哪种形式占上风，决定于资本积累量的变动和资本构成质的变化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出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提高较快，以至资本积累所增加的就业机会少于资本构成提高所减少的就业机会，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相对下降而且绝对下降，就业人数因而绝对减少。美国的矿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代表这种类型。以农业部门为例。在1929—1984年的55年中，按1982年美元计算的固定资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1页。

本存量，由595亿美元扩大到1654亿美元，增长了178%，不到两倍；而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由人均5667美元扩大到50121美元，增长了784%，将近八倍。<sup>①</sup>农业劳动生产率，按每个农业劳动小时平均生产的农业产量计算，提高了十四倍。<sup>②</sup>结果造成大量劳动者被排挤，从业人员急剧下降，从1929年的1045万减少到1984年的332万，<sup>③</sup>下降了三分之二有余。被排斥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大都流入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沦为失业者。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积累制造过剩人口的露骨的形式。

第二种类型是，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提高较慢，资本积累所增加的就业机会大于资本构成提高所减少的就业机会，因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相对减少但却绝对增加，就业人数也绝对增加，不过增长缓慢，落后于资本积累的速度。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在1929到1984年期间，制造业按1982年美元计算的固定资本存量，由1605亿美元扩大到7529亿美元，增长了370%，将近四倍，而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由人均15000美元扩大到38433美元，增长了156%，约一倍半。<sup>④</sup>结果，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量增加了，但增长速度大大慢于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同时期制造业职工由1070万人扩大到1959万人，增长了83%，<sup>⑤</sup>不到一倍。由于资本构成提高的抵销作用，制造业吸收追加人口的渠道变得狭窄了，使许多本来可以在制造业找到工作的追加劳动力变成了失业者。在这里，我们则看到资本积累制造过剩人口的较隐蔽的形式。

资本积累产生过剩人口的两种形式，归根到底，是以相对

---

① 计算根据：同本书表12。

②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2月)，第361页。

③ 资料来源：同上，第288页。

④ 计算根据：同本书表12。

⑤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2月)，第16—17页。

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资本构成提高趋势派生出来的。在总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原有资本的资本构成提高必然排斥已有的就业者，追加资本的资本构成提高必然减少追加的就业机会，它们之间的错综结合，决定着总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究竟是相对下降还是绝对下降。

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或绝对下降必然引起就业的相对下降或绝对下降，形成失业人口。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另一角度，把就业的变化分解为产量变化和生产率变化两个因素。总产量既然是就业人数和人均产量的乘积，就业人数因而与总产量的变化成正比，与人均产量（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这种分解的确能够更直接更精确地说明就业变化。考虑到产量的变化同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资本构成质的变化密切相关，两种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

### 3. 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料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统计资料，除美国外，属英国的时间系列最长。所以我们首先观察英国失业的长期变动情况。

从长期看，英国的失业率表现出很大的波动。按10年平均计算的失业率依次为：1890—1899，4.56，1900—1909，4.83，1910—1919，2.17，1920—1929，11.13，1930—1939，16.46，1940—1949，2.00，1950—1959，1.66，1960—1969，1.93，1970—1979，4.08。1980—1988年平均失业率为10.27。在这近100年的时期内，1910—1919年和1940—1949年分别包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借助军事动员和战争经济维持着高就业水平，因而失业率很低。如果观察和平时期，那末，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失业率是趋于上升的，在大萧条时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出现了近

表 39 英国的年失业量和失业率 (1888—1988年)

年份	失业量(千人)	失业率 %	失业率 <sup>a</sup> %	年份	失业量(千人)	失业率 %	失业率 <sup>a</sup> %
1888		4.9		1915		1.1	
1889		2.1		1916		0.4	
1890		2.1		1917		0.7	
1891		3.5		1918		0.8	
1892		6.3		1919		2.4	
1893		7.5		1920		2.4	
1894		6.9		1921		14.8	
1895		5.8		1922	1543	15.2	
1896		3.3		1923	1275	11.3	
1897		3.3		1924	1130	10.9	
1898		2.8		1925	1226	11.2	
1899		2.0		1926	1385	12.7	
1900		2.5		1927	1088	10.6	
1901		3.3		1928	1217	11.2	
1902		4.0		1929	1216	11.0	
1903		4.7		1930	1917	14.6	
1904		6.0		1931	2630	21.5	
1905		5.0		1932	2745	22.5	
1906		3.6		1933	2521	21.3	
1907		3.7		1934	2159	17.7	
1908		7.8		1935	2036	16.4	
1909		7.7		1936	1755	14.3	
1910		4.7		1937	1484	11.3	
1911		3.0		1938	1791	13.3	
1912		3.2		1939	1514	11.7	
1913		2.1		1940	963	6.0	
1914		3.3		1941	350	2.2	



续表

1942	123	0.8		1966	361	1.4	2.3
1943	82	0.6		1967	559	2.3	3.4
1944	75	0.5		1968	586	2.5	3.3
1945	137	1.3		1969	581	2.5	3.0
1946	374	2.5		1970	618	2.6	3.1
1947	480	3.1		1971	799	3.5	3.8
1948	310	1.5		1972	876	3.8	4.1
1949	308	1.5		1973	619	2.7	2.9
1950	314	1.5	2.5	1974	615	2.6	2.9
1951	253	1.2	2.2	1975	978	4.2	4.1
1952	414	2.0	3.0	1976	1229	5.3	5.6
1953	342	1.6	2.6	1977	1313	5.5	6.2
1954	285	1.3	2.3	1978	1299	5.5	5.5
1955	232	1.1	2.1	1979	1227	5.1	5.1
1956	258	1.2	2.2	1980	1561	6.4	
1957	327	1.4	2.4	1981	2420	10.0	
1958	451	2.1	3.0	1982	2793	11.7	
1959	480	2.2	3.0	1983	2970	12.4	
1960	377	1.6	2.2	1984		11.1	
1961	347	1.5	2.0	1985		11.3	
1962	467	2.0	2.8	1986		11.4	
1963	558	2.5	3.4	1987		10.0	
1964	404	1.6	2.5	1988		8.1	
1965	347	1.4	2.2	1989			

资料来源：《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5》（1980年英文版），第176、179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统计,1964—1983》（1984年英文版），第622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3月号,第158页,1989年5月号,第164页；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208页。

a：此栏的失业率计算包括北爱尔兰,引自麦迪森的著作附录C。

20年的高就业时期,50年代和6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都在2%以下,被认为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失业率从1967年开始逐步上升,70年代上半期的年平均数是3.04,70年代下半期是5.12,80年代前5年是10.32,后4年是10.20。在失业率达到双位数时,失业量也十分惊人,1982年的平均失业人数高达279万,超过了大萧条时期1932年的274万,打破了历史记录。关于英国的长期失业变动,需要说明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战后约20年的低失业水平是借助什么力量达到的?人们都知道,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已落后于美德等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20年代的英国经济即陷入长期停滞,出口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高于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经过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英国经济进一步衰落,国家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因而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提到了首位。借助美国资本的扶持和英国政府的宏观调节,依靠工业技术改造和人民提高消费水平的迫切需要,英国战后的资本积累加速了,私人投资有大幅度增长,加上对住宅建筑的公共投资,以及对出口商品的较大需求,使英国经济在战后到60年代中期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1950到197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8%。<sup>①</sup>正是国民经济相对稳定和较快的发展,维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降低了失业率。

如果把这一时期英国的情况同美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因为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国民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美国为3.6%,英国为2.8%,慢于美国;<sup>②</sup>而劳动生产率的

---

<sup>①</sup> 计算根据: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32年英文版),第1页。

<sup>②</sup> 同上,第177页。

平均年增长率，美国为2.5%，英国为2.9%，快于美国。<sup>①</sup>按理说，英国的就业增长率应该低于美国，失业率应该比美国高。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美国的失业水平反倒高于英国，当英国的平均年失业率不到2%时，美国的平均年失业率却在4%以上。这除了两个国家因经济条件不同而在磨擦性失业率方面存在着某些经常差别以外，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不同。战后时期美国的人口增长比英国快得多，1950—1959年期间美国的人口净增长率每年达到千分之十六，而英国只有千分之四。<sup>②</sup>同时，从英国和欧洲向外移民的过程还在继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居美国。由于这些原因，英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慢得多，所以尽管英国的经济增长慢于美国而生产率增长快于美国，还是能够维持相对较低的失业水平。

第二，70至80年代英国失业状况的急剧恶化，究竟是一种偏离战后常规的暂时现象，还是英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应该说，这不是由某种外生因素所引起的偶然现象，而是趋于衰落的英国经济的必然表现。早在30年代以前，英国已越过它的鼎盛时期而走向没落，以过时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工业部门的羁绊使英国经济停滞不前。经过30年代大危机后开始的经济结构变革，以及战后约2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英国的工业技术状况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与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相对落后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随着日本和西欧大陆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某些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甚至下降了。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对外贸易状况的恶化，金融市场不稳的冲击，使英国经济在70年代再次陷入停滞，1973—

<sup>①</sup> 计算根据：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32年英文版），第212页。

<sup>②</sup> 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和扩张》（1966年英文版），第42—43页。

1984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已降到只有1.0%<sup>①</sup>，通货膨胀率却常常是双位数。传统生产部门的衰落和新兴部门加速采用新技术，必然导致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就业的急剧下降；由于节约劳动的新技术已逐渐在服务业推行，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已不足以吸收从工业部门中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可见70年代以来英国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是英国经济进一步趋于衰落的表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代表英国失业变动长期趋势的不是50至60年代的低失业水平，而是70年代以来的高失业水平。

下面，我们再观察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失业变动（见表40）。

由于资料的限制，多数国家的失业统计只能回溯到本世纪20年代，时期较短，因而还看不出明显的长期趋势。这里只能作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多数国家的失业变动虽然没有显著的长期趋势，但却有共同的变动型式。这就是，战前20年代的失业率较低，30年代的失业率剧增；战后50年代至60年代的失业率很低，70年代至80年代的失业率上升。除个别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外，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都具有这种失业变动型式。这种共同的失业变动型式，实际上，不过是本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波动的一种反映。和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相适应的，必然是空前严重的高失业水平；而和70至80年代新的经济萧条相适应，也必然是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失业率的高低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一个晴雨表，一个测量器。

第二，在战后50年代至60年代，确实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西德、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他们都有15—20年左右时间，

---

<sup>①</sup> 计算根据：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2页。

**表 40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年失业率%**  
(1920—1984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比利时	荷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1920—1924	2.8			2.3	2.7	4.5	5.3	
1925—1929	4.9			0.8	2.0	2.8	6.0	
1930—1934	12.7		4.8	8.7	6.9	14.4	16.5	
1935—1938	3.8			8.9	10.9	11.9	9.7	
1950—1954	6.9	2.4	7.7	5.0	3.3	3.3	1.8	1.9
1955—1959	3.1	1.8	6.8	3.3	1.8	5.0	2.2	2.2
1960—1964	0.7	1.4	3.3	2.2	0.9	5.9	2.1	1.4
1965—1969	0.9	1.8	5.2	2.0	1.9	3.9	1.7	1.2
1970—1974	1.1	2.6	5.2	2.1	3.2	5.7	2.2	1.3
1975—1979	3.9	5.7	6.3	6.0	6.2	7.5	5.5	2.0
1980—1984	7.0	8.4*	9.0	15.9	12.3	9.9	7.6	2.4
1985—1988	9.2	10.3	11.3	16.0	14.5	9.2	7.9	2.7

计算根据：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206—207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统计，1964—1983》（1984年英文版），第28、110、142、215、344、424、459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3月号，1989年5月号。

● 1982—1983两年平均数。其它三年数字暂缺。

把失业率压到2%左右甚至1%以下。考虑到西欧发达国家曾有大量来自欧洲落后国家的外籍工人，它们当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已经超过国内的劳动力供应。如此长时期出现劳动市场上的供不应求形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种经济形势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后恢复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巨大需求，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生产发展的强有力推动，各国政府普遍实行的经济刺激和宏观调节政策，造成资本主义世界近20年的相对稳定和经济迅速增长。然而到了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经济相对繁荣时期所潜伏的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终于爆发出来。事实说明，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会因为某个时期特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超常规现象而消失，也不会由于国家的人为干预而失去作用。

第三，个别国家的情况与我们的理论分析似乎不一致。例如日本，在战后整个时期，它的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技术构成提高快于所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它的失业率却是最低的。在1950—1984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和资本技术构成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2%和6.9%，而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长最快的西德分别为5.0%和4.8%，增长最慢的美国分别只有2.0%和1.8%。<sup>①</sup>但从失业状况来看，日本的年平均失业率最高年份不过2.7%，最低年份只有1.1%。这似乎是一个谜。其实这个谜不难解开。关键是日本极高的经济增长率维持着对劳动力的充分需求。在此时期，日本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5%，而同时期德国为4.5%，美国为3.3%。<sup>②</sup>我们多次指出，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资本积累量的变动和资本构成质的变动共同决定的，或者说，是由总产量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共同决定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则与日本产品因各种经济因素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有关。当我们从理论上抽象分析一个国家的积累过程时，我们认为资本的迅速积累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可能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长

<sup>①②</sup> 见本书表19。

期超过劳动对资本的供给，这在舍象掉国外市场时是言之成理的。因为在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实际工资因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涨并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时，为保证一定利润的商品价格的相应提高终究会受到市场相对不足的限制。但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可以突破这种限制。战后日本经济正是利用它的高效率和低工资的相对优势，不断占据和扩大国外市场，实现了在较长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不过，一个国家靠占据更大的世界市场来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意味着某些其他国家丧失部分市场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个别国家的这种好处也不是无限期存在的。事实上从7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大减速，而失业率正在逐步上升。任何国家都不能彻底摆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 4. 评所谓补偿理论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变动特别是战后时期的失业变动，为分析所谓补偿理论提供了经验资料。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补偿理论由来已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对当时的补偿理论进行过深入的批判。不过各种各样的补偿理论从未销声匿迹。

补偿理论有几种主要论点。第一，技术进步和机器的使用在排挤工人的同时，会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第二，技术变革和机器的应用，会引起制造机器和有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扩大，被机器替代而失业的工人就能在这些生产部门重新就业。第三，技术进步可以是生产设备的改进也可以是产品的创新。产品的重大变革会直接带动制造新产品的新工业部门迅速兴起，从而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和增加就业。第四，技术变革也会推动现有生产部门增加产量，从而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和就业。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一个部门生产方法的改进和新机器的采用，会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而使

市场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降低产品的均衡价格和提高均衡产量。同时，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意味着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增长，这也会刺激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提高这些产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总之，技术进步和采用机器，虽然在部分企业或在近期具有排挤工人和扩大失业的效应，但从整个经济或从长期看，这种对工人的不利影响会因各种因素而得到补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会增加，被排挤的工人会重新被雇用，因而失业的存在决不是必然的。

严格意义上的补偿理论，是指被新技术和机器所排挤的工人，会由于采用新技术和机器本身所节省的资本而全部重新被雇用。这种理论的错误与荒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6节已经作了详尽而有力的批判。但广义的补偿理论，则强调新技术和机器的采用会刺激新的追加投资，推动新生产部门和现有生产部门产量的增长，从而扩大就业，补偿被新技术和机器所代替的失业工人。这种观点换一个说法就是：资本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由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所扩大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完全补偿。对于这种补偿理论，我们应该着重分析。

本章第一节曾经评论过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的观点。他们设想，由于剩余价值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资本积累有可能迅速扩大，不仅抵销资本构成提高的消极影响，而且有可能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的供给。他们批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只强调了资本有机构成这一因素，而忽视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等其他因素。他们的这种批评，实质上也是建立在补偿理论基础上的。我们当时曾经指出：霍华德和金所设想的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完全可能出现，但不可能长期如此。因为如果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较长时期超过劳动力的供给，必然出现工资迅速上升和利润下降，由此导致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和资本构成提高相对



加快，失业人口的重新扩大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变化，生动地显示了这一过程。为了探讨这一变化过程背后的原因，有必要分析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在战后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请看表41。

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用非住宅固定资本物质存量

**表 41 西欧四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变动（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950—1984年）**

	1950—1960		1960—1973		1950—1973		1973—1984	
	资本积累	资本构成	资本积累	资本构成	资本积累	资本构成	资本积累	资本构成
英国	3.2	2.4	4.7	4.5	4.0	3.6	2.3	2.7
西德	6.4	4.2	6.4	6.1	6.4	5.3	3.2	3.8
法国	3.0	2.7	5.9	5.2	4.6	4.1	4.0	4.0
荷兰	3.7	2.4	4.8	3.8	4.3	3.2	3.6	3.0
四国平均	4.1	2.9	5.5	4.9	4.8	4.1	3.3	3.4

计算根据：A·麦迪森：“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减速，数量估算方法”，《经济文献杂志》1987年6月号，第685、691页。

计算说明：资本积累指非住宅固定资本物质存量变动，资本构成指从业人员平均占用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麦迪森提供了上述国家在有关年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指数”，以及各国在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计算方法是，先将各国各年份就业人数换算成同期指数，再用就业人员指数除资本存量指数，求得就业人员平均占用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指数。最后按指数算出两个数值在各个时期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的变动代表资本积累状况，并只能算出按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构成的增长，在战后时期都经历了一个从加速到减速，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变动过程。但是，使我们感兴趣的重要事实在于这两个变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按照四个国家的平均数字，在1950—1960年期间，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比资本构成的增长速度快1.2%；在1960—1973年期间，在两者加速的同时，差距缩小了，资本积累仅比资本构成的增长快0.6%；而在1973—1984年期间，在两者减速的同时，关系甚至颠倒过来，资本积累反而比资本构成的增长慢0.1%。这一过程在英国和西德两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两个变量的差数在上述三个时期的变动，在英国分别为0.8%，0.2%，-0.4%；在西德分别为2.2%，0.3%，-0.6%。

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动对劳动市场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当资本积累的速度很高并快于资本构成的增长速度时，积累量的增长对资本构成提高产生的就业负效应所起的补偿作用是比较强大的，从而保持了资本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并有可能压低失业率甚至暂时实现充分就业。但是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发展，积累量增长的相对优势趋于消失，它的补偿作用逐渐减弱，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也随之放慢甚至转为下降，失业问题也必然重新加剧。这种变化在制造业部门中最为明显，并且集中表现在投资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相互关系上（见表12）。

和整个经济比较起来，制造业中表现出来的情况要尖锐得多。从60年代上半期到下半期，这三个国家每年新投资的平均增长加速了，但就业的增长却反而放慢，英国甚至是负增长。这说明，为维持一定量就业所必需的投资量提高了。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的下降并不是在投资增长率下降时才发生的，而是在投资增长率加速的6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但随着投资的下降而加剧。劳动需求下降和就业下降的直接原因，显然是生产或劳动过程中

**表 42 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  
(括号中是就业增长率) (1960—1975年)

	1960—1965	1965—1970	1970—1975
英 国	3.7 (0.3)	4.2 (-0.5)	-4.6 (-2.1)
西 德	3.2 (1.4)	5.2 (0.4)	-7.3 (-1.9)
法 国	6.9 (1.1)	9.6 (0.5)	3.5 (0.4)

资料来源：C·弗里曼、J·克拉克、L·索埃特，《失业和技术革新》  
(1982年英文版)，第158页。

越来越多地采用资本集约化的设备和方法，越来越多地用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以致资本构成的提高越来越不能由积累的增长所补偿。这是西欧主要国家整个经济中普遍发生的过程，不过在制造业中较为严重罢了。

深入理解资本积累过程对就业的影响，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积累量和资本构成对比关系的变化与投资性质的联系。

资本积累是指物质资本量的累积，表现为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扩大。投资则是指每年新投入的资本，是一个流量，在西方称之为资本形式，其主体部分是固定资本投资。每年的固定资本投资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更新已经磨损掉的物质资本，另一部分用来增添新的资本设备。更新资本的方法可以有两种：或者用同样的设备替换已废弃的设备，或者用更先进的设备更换旧设备。追加的新投资也可能有各种用途：或者按原有的技术条件增加设备，或者购买更新型的技术设备扩大生产，或者投向新兴的

生产部门。这样，投资就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类型。重置型投资：用同样的设备更新旧设备；深化型投资：用更先进的设备更新旧设备；扩展型投资：增加新设备以扩大生产能力；创业型投资：购置生产设备投资于新企业或新兴生产部门。后两类投资，从企业的角度看，分别代表现有企业扩大投资和新建企业的投资；从部门的角度看，分别代表投资于现有生产部门和投资于新兴生产部门。

这四种类型投资的就业效应是不同的。重置型投资不会改变对劳动的需求，深化型投资通常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扩展型和创业型投资必然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但增加的程度视追加投资的资本集约化程度而定。在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本的更新通常和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结合在一起。因而上述四种性质的投资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深化型和扩展型。深化型投资的结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伴随着单位产量和单位资本对劳动需求的下降；扩展型投资的结果是生产能力的扩大，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一个社会或一个生产部门来考察，一定时期资本积累量和资本构成变动的对比关系，进而对就业的影响，要看这两大类型投资究竟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如果扩展型投资占主导地位，积累量的增长将较大地超过资本构成的提高，补偿作用较强，就业的增长也必定较快。反之，如果深化型投资占主导地位，积累量的增长将较小地超过甚至可能落后于资本构成的提高，这时的补偿作用将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而就业的扩大也必然放慢，甚至出现绝对量的缩减。

那末，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保证在积累过程中扩展型投资相对于深化型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呢？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分析影响投资的若干主要因素。

首先，从供给的方面考察，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变革是影响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技术变革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改变现有

产品的生产方法，用较少的投入生产更多产品；另一种是生产新产品，创造并满足新的需要。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不论涉及哪种类型，都会引起生产条件和部门结构的巨大变化，带动若干新兴部门的迅速发展，同时推动现有生产部门增加产量。新兴生产部门的发展和现有生产部门产量的急剧扩大，意味着资本的迅速积累和扩展型投资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通过资本量和产量的增长可能足以补偿资本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这正是相信补偿理论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

不难看出，技术变革对投资及其就业效应的影响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才能诱使资本家扩大投资。而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是同资本构成的提高相联系的，他们所带来的是就业替代效应，减少单位产量和单位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但是在技术变革过程中，正如前面所说，也会由于产量的增长和投资的扩大而具有就业创造效应。问题在于，因产量和资本的扩大而增加的就业机会能不能充分补偿因生产率和资本构成提高而减少的就业机会。

技术进步所以会推动产量的扩大，也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传导其作用。经济学家索尔特尔（W·E·G·Salter）通过对1924—1950年期间英国23个工业部门经验材料的研究发现，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技术进步扩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别，进而通过价格变动影响产量。他所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不同部门的产量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有密切的正相关联系，而这又是由于生产率增长率与价格增长率负相关，价格增长率与产量增长率负相关。<sup>①</sup>弗里曼（C·Freeman）等经济学家指出：按照索尔特尔的模式，不同生产率增长的总的就业效应，依存于决定性的两组弹性：产量（或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价格的

<sup>①</sup> W·E·G·索尔特尔：《生产率和技术变化》（1960年英文版），第八章、第九章。

生产率弹性。虽然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下降，也可能提高利润和工资，但是，生产率增长对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如果有足够大的价格弹性和生产率弹性，生产率增长就能够充分推动产量的扩大，提高或至少是维持已达到的就业水平。

然而，生产率增长并非任何时候都具有这种理想的就业效果。雷格（R·Wragg）和罗伯逊（T·Robertson）的研究表明，战后英国制造业部门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已不存在这样密切的相关性，甚至产量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联系也大大削弱了。弗里曼等由此认为，上述就业增长和生产率及产量增长之间关系的变化似乎表明，战后以来，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价格的生产率弹性已经下降。

为了探讨价格的生产率弹性变化的原因，弗里曼等分析了技术变革和它所推动的工业发展的过程。在一组重大技术变革的初期阶段，会有若干新兴工业部门产生和迅速发展，新厂商以很高的速率大量涌现，这时率先革新的厂商还没有多少力量阻止模仿者进入。由于竞争比较激烈，产品价格随着生产率增长而下降的可能性也较大。价格下降迅速开辟了市场，企业也都急剧地扩大生产能力以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扩展型投资一般占有主要地位，并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具有较强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技术和新工业部门的发展走向成熟阶段，工业集中的趋势也逐渐加强，新企业的进入变得困难了，竞争受到一定阻碍，最大厂商的定价和价格协定形成了少数制造商的一定程度的价格控制，这时大企业有更大的可能把生产率增长的好处留给自己的雇主或雇员，而不是通过降低价格转移给消费者。因此，价格的生产率弹性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大企业已经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得不更多地转向在加工技术方面节约成本的革新，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深

化型投资将逐渐代替扩展型投资占据主导地位，资本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就业的增长也会随之放慢甚至可能完全停止。<sup>①</sup> 弗里曼等人是以熊彼特的理论为基础，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期波动的角度来分析战后失业问题的，但即使暂不涉及复杂的长波问题，仅仅考虑技术革新过程对投资类型的影响，也足以说明不同发展阶段上投资所具有的就业效应的变化。

其次，是需求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旺盛的社会需求是刺激资本家迅速扩大生产和投资的最有力的因素，每个资本家都争相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来获取更多利润，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时生产能力急剧扩大，扩展型投资成为投资的主导形式。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长期而经常地保持这种相对充足的社会需求，有各种因素会影响社会需求的变化。

就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来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既然资本家进行生产和扩大投资的目的是利润，广大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就会被限制在保证资本利润的限度内。不管工人的实际工资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有多大提高，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终究赶不上生产的急剧扩大。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对投资的障碍。此外，许多消费品的需求都有一个从迅速扩大到逐渐饱和的过程，并非总以相同的速度不断增长。例如家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现代炊具等）的需求在战后曾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扩大，带动了若干生产部门的发展，但到六、七十年代，其需求趋向饱和，逐渐失去了对生产发展的推动力。总之，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需求扩张和生产迅速发展之后，社会的有效需求会变得相对不足，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障碍，投资增长率将因此而下降。由于投资需求是社会总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增长的放慢进一步限制了总需求的

<sup>①</sup> 以上分析请参阅C·弗里曼、J·克拉克、L·索埃特合著《失业和技术革新》（1982年英文版），第2章和第7章。

扩大，使整个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或相对停滞阶段。在这种需求严重约束的条件下，投资的性质不能不受到影响。较低的投资率本身，就意味着总投资中有较大的比重用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重置。面对需求不足和不确定的市场预期，资本家也不会急于扩大生产能力；为了提高利润和加强竞争能力，他们主要致力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用更先进的设备替换旧设备。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高度发达的战后时期，普遍的需求不足必然加剧国际竞争，迫使资本家加紧提高生产率。总之，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扩展型投资必然退居次要地位，深化型投资则成为投资的主导形式。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一种内在机制，保证扩展型投资在积累过程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勿宁说，情况正好相反，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恰恰是资本深化的趋势。资本对劳动的替换，资本集约化程度的加强，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构成的提高，始终是积累过程中限制就业迅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资本量和产量的扩大可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限制，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经济学家佩特尔（P. Patel）和索埃特（L. Soete）在一篇研究英国制造业就业问题的论文中提供了二十多个制造业部门有关战后的长期统计资料，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工业部门的具体分析来验证上述结论。限于篇幅，我们只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部门列表如下（见表43、44、45）。

分析上述三个部门的有关变量，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三个部门的就业变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类型。计算机部门（即办公室机器和资料处理设备部门）的就业长期增长，29年中平均年增长率为1.5%；化学工业部门的就业长期停滞，36年中几乎没有增减；皮革鞋类服装部门的就业长期趋于下降，36年中平均年增长率为-2.2%。这表明，三个部门在战后英国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计算机工业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工业部门。而皮革鞋类服装工业则代表着一种衰落的工业



**表 43 办公室机器、资料处理设备工业部门**  
(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1955—1984年)

	就业	净产量	劳动生产率	资本存量	资本/劳动比率
1955—1984	1.5	11.0	9.4	7.0	5.4
1955—1963	4.8	8.4	3.5	6.4	1.5
1963—1973	1.0	10.1	9.1	9.4	8.3
1973—1979	-0.7	10.9	11.7	5.4	6.1
1979—1984	0.2	17.4	17.1	5.1	4.9

**表 44 化学工业部门(平均年复合增长率%)(1948—1984年)**

	就业	净产量	劳动生产率	资本存量	资本/劳动比率
1948—1984	0.0	4.9	4.9	5.0	5.0
1948—1955	2.2	6.4	4.1	6.4	4.1
1955—1963	0.8	6.0	5.3	6.7	5.9
1963—1973	-0.2	6.7	6.9	5.5	5.7
1973—1979	0.1	2.3	2.2	3.5	3.4
1979—1984	-3.7	0.8	4.6	1.3	5.1

部门。第二，就业的变动，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是产量变动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综合结果，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是资本量变动和资本构成变动的综合结果。就业的变动率，等于这两组变量各自变动率的差额。第三，资本构成提高趋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趋势始终是制约就业迅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个期

**表 45 皮革鞋类和服装工业部门（平均年复合增长率%）  
（1948—1984年）**

	就业	净产量	劳动生产率	资本存量	资本/劳动比率
1948—1984	-2.2	0.6	2.9	1.3	3.6
1948—1955	0.3	1.9	1.6	0.1	-0.2
1955—1963	-1.4	-0.1	1.4	0.5	2.0
1963—1973	-1.7	2.0	3.8	3.1	4.9
1973—1979	-2.4	0.6	3.0	1.8	4.3
1979—1984	-7.4	-2.5	5.3	0.2	8.2

说明：佩特尔等在论文附录中提供了各部门按不变英镑计算的净产量、投资、资本存量的逐年数字和就业的逐年数字。我们分别用就业人数除净产量和资本存量求得各年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率，然后计算出五项指标在各个时期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时期划分的根据是，除1948和1984年外，均以高峰年份为界。三个表的计算根据：P·佩特尔、L·索埃特：“英国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趋势和就业”，《技术变化和充分就业》（1987年英文版），第151—152、155、163—164页。

间，计算机部门资本量的高速增长和产量的超高速增长只带来就业的低速增长，化学工业部门资本量和产量的高速增长却使就业处于停滞状态，皮革鞋类服装工业部门资本量和产量的低速增长反而导致就业长期趋于下降。在这几种场合，都是资本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的限制作用。第四，三个部门的就业变动表现出一种趋势：或者增长率逐渐放慢，或者由增长逐渐转为负增长，或者下降速度逐渐加快。这反映了决定就业的两组因素本身对比关系的时期变动。总的说来，由于经济气候的变化，战后发展的前期，产量和资本量的增长率一般快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构成的增长率，而发展的后期，劳动生产率和资本

构成的增长率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产量和资本量的增长率。以上几点，和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不应从上述几个部门的实证考察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就业的下降只是在产量和资本量缓慢增长或者绝对缩减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经济学家马西(D·Massey)和米甘(R·Meegan)为了探究就业下降的机制，曾对英国制造业中三十一个部门在1968至1973年期间的就业下降作了分析，归纳出三种生产改组的具体形式。一种形式他们称之为“合理化”，指生产能力的实际缩小，包括关闭工厂，废弃资本设备和削减劳动力。这通常是因为缺乏赢利和生产能力过剩，废弃部分工厂和设备是为了提高余留的生产能力的使用率和生产率，增加资本收益。采用“合理化”的九个部门中有六个部门产量下降，三个部门产量上升。可见，即使“合理化”也不只是简单地和产量缩减相联系，但对就业的影响必然是严重的，其减少的劳动力占原就业的20%以上。另一种形式称为“集约化”，指在不增加大量新投资和不进行重大技术变革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集约化”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加强竞争能力和改善利润状况。采用这种方法的六个部门，少数产量略有减少，多数产量略有增加，但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并快于产量的增长，结果使就业普遍下降。第三种形式称之为“投资和技术变化”，这是指进行重大的技术革新以及相联系地进行大量新投资。大规模投资对就业的净影响，决定于产量变化和 investment 之间的均衡状态，产量增长越缓慢，伴随技术变化发生就业下降的可能性就越大。采用这种方法的十六个部门，除一个部门外劳动生产率都有较大程度提高，但其中有九个部门产量或者下降或者增长甚微，导致就业大幅度下降；另有七个部门产量增长较快，但由于劳动生产率比产量提高得更快，就业还是下降了，只是下降的幅度较小。作者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甚至在产量迅速增长的场合，大规模劳动节约型的资本投资也可能

导致就业下降”，因此，“认为就业下降必然和积累不足相联系，显然是错误的”。<sup>①</sup>

归结以上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我们认为：战后欧洲主要国家一度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证明补偿理论是正确的或者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已经失效。积累量和产量的增长的确可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资本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起到补偿作用，完全否认这种补偿作用并不符合事实。但是，这种补偿作用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制约着积累量和资本构成的对比关系，使之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失业现象，也不能长期保持失业率的低水平。

####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的若干新特点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状况与战前相比，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某些特点。我们简要分析其中的一些重要变化。

第一，失业的周期波动幅度大大缩小了。从前面引用的失业率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战前时期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的周期波动减弱了。在衰退或萧条年代，失业率的升高已经缓和得多，远不象战前那样严重和剧烈。30年代大危机时期那样高的失业率，战后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在失业率周期波动缩小的背后，有两种情况引人注目。

一是有些国家尽管衰退年份失业率相对战前有所降低，但高涨年份失业率相对战前却有所提高。换句话说，经常性的失业水平提高了。这在美国的失业率变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sup>①</sup> D·马西、R·米甘：《就业下降的剖析》（1982年英文版），第67—68页。

**表 46 美国各周期的最低失业率和最高失业率(1892—1982年)**

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1892	3.0	1921	11.7	1960	5.5
1894	18.4	1926	1.8	1961	6.7
1902	3.7	1933	24.9	1969	3.5
1904	5.4	1944	1.2	1971	5.9
1906	1.7	1949	5.9	1973	4.9
1908	8.0	1953	2.9	1975	8.5
1913	4.3	1954	5.5	1979	5.8
1915	8.5	1956	4.1	1982	9.7
1918	1.4	1958	6.8		
		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	
低点平均失业率		2.4		4.5	
高点平均失业率		11.8		7.2	
幅度		9.4		2.7	

资料来源：同表32。

上表数字说明，在1949年以前，尽管周期平均最高失业率达到11.8%，但平均最低失业率只有2.4%。1949年以后则不同。尽管平均最高失业率下降低到7.2%，但平均最低失业率却上升到4.5%，高于所谓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水平。根据这一变化，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周期性失业已经变成为慢性长期失业。”<sup>①</sup>

<sup>①</sup> 《西方国家的失业》（国际经济协会会议论文汇编）（1980年英文版），第207页。

战后美国不但在非危机年代甚至繁荣时期经常保持着较多的失业人口，而且失业规模还在逐渐扩大。战后各周期非危机年代的平均失业率是：1946—1948年3.9%，1950—1953年3.6%，1955—1957年4.3%，1959—1960年5.5%，1962—1969年4.5%，1971—1973年5.5%，1976—1979年6.6%，1983—1988年7.2%。显然有一种增长的趋势。

二是许多国家战后的失业率波动幅度虽然较小，但平均水平却在提高。

**表 47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失业波动中的高点平均失业率和低点平均失业率（1950—1970和1971—1983）**

		英国	西德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时
1950	高点平均失业率	2.1	4.3	5.5	7.5	4.3
	低点平均失业率	1.3	1.4	3.7	5.5	2.7
1970	幅度	0.8	2.9	1.8	2.0	1.6
1970	高点平均失业率	7.2	6.6	8.8	1974年后无波动	1971年后无波动
	低点平均失业率	3.9	3.3	6.4	从1974年的4.8直线上升到1983年的9.9	从1971年的1.7直线上升到1983年的18.4
1983	幅度	3.3	3.3	2.4		

计算根据：同表39、表40。

注：此表中高点和低点平均失业率，不是严格按照各周期中的最高和最低失业率计算的，而是按照失业波动中高点失业率和低点失业率计算的。

上面五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失业波动，虽然总的说来波动幅度都不大，但70年代以前和以后有十分显著的区别。50年代和60年代的失业率波动非常小，英、德、比利时等国的高点失

业率和低点失业率的平均水平也都很低。70年代以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失业波动加剧了，波动幅度扩大了，而且这种波动的加剧是在高点失业率和低点失业率的平均水平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英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以后的低点平均失业率竟然高于它们在70年代以前的高点平均失业率。更为严重的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失业波动在70年代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甚至暂时消失了。意大利的失业率从1974年开始10年直线上升，比利时的失业率从1971年开始13年直线上升，这种现象即使在大萧条的30年代也未见过。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在这个时期里，失业的周期波动确实已被慢性长期的失业增长所代替。

战后失业周期波动幅度缩小这一特点，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调节有关。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几乎普遍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力图通过财政金融手段调节国民经济，施行反危机措施，以“熨平”周期波动，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它们的这些经济干预措施确实起到一定作用，连同其他若干经济因素的影响，实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增长，周期波动的剧烈程度减弱了，在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充分就业目标。但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并未因此而消失，它们只是暂时有所缓和，或者被强制地推迟了爆发时间，或者以新的形式逐渐累积起来。有些国家，危机的深度虽有缓和，但危机和频度却在加剧，高涨的强度则大为削弱；这种情况下失业的周期波动幅度必然会缩小，但随着危机的深度转化为危机频繁和高涨乏力，危机时期失业人口的急剧增长也转化为非危机时期较大规模失业人口的经常存在。另一些国家，在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到一定时期便爆发出来，转化为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和长期停滞，失业人口也必然随之迅速扩大，甚至出现失业人口的长期增长趋势。

第二，失业人口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别，即某些类别的劳动力，例如妇女、青年、少数民族等等，其失业率经常高于平均水平。这种结构性差别在美国最为突出（见表48）。

平均说来，美国战后时期青年失业率高出总失业率约两倍，黑人失业率高出白人失业率约一倍，妇女失业率高出男性失业率约30%。虽然有的国家妇女失业率低于男性失业率，如英国，但青年失业率和少数民族失业率高出平均失业水平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表49是除美国外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80至1983年期间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失业率的比较。

事实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青年失业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为什么战后失业人口在年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会出现结构性差别？这要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由于妇女的劳动力参加率不断提高，以及战后初期的出生热和人口的相对迅速增长，引起劳动力在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上发生巨大变化。例如从1947年到1977年，美国35岁以下的劳动力从43%上升到50%，妇女劳动力从28%上升到41%。1979年，美国全部劳动中有五分之二是妇女；有近一半在35岁以下，其中大约四分之一在16岁至24岁之间；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sup>①</sup>劳动力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失业人口构成的变化，使失业队伍中青年和妇女的比重增大。

但是，造成失业率差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时期，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如电子技术、核能技术、空间技术、合成化工技术等等得到飞速发展，工业部门中的机械化生产过程

---

<sup>①</sup> R·B·弗里曼：“美国劳动市场的演变，1948—80”，《转变中的美国经济》（1980年英文版），第356、358页。



表 48

美国劳动人口中失业率的结构性差别 (1952—1982年)

	总失业率	青年失业率 (16—19岁)	青年失业 率与总失 业率之比	男性失业率	妇女失业率	妇女失业 率与男性 失业率之 比	白人失业率	黑人失业率	黑人失业 率与白人 失业率之 比
1952	3.0	8.5	2.8	2.8	3.6	1.3	2.8	5.4	1.9
1954	5.5	11.8	2.1	5.3	6.0	1.1	5.0	9.9	2.0
1956	4.1	11.1	2.7	3.8	4.8	1.3	3.6	8.3	2.3
1958	6.8	15.9	2.3	6.8	6.8	1.0	6.1	12.6	2.1
1960	5.5	14.7	2.7	5.4	5.9	1.1	4.9	10.2	2.1
1962	5.5	14.6	2.7	5.2	6.2	1.2	4.9	10.9	2.2
1964	5.2	16.2	3.1	4.6	6.2	1.3	4.6	9.6	2.1
1966	3.8	12.7	3.3	3.2	4.8	1.5	3.3	7.3	2.2
1968	3.6	12.7	3.5	2.9	4.8	1.7	3.2	6.7	2.1
1970	4.9	15.3	3.1	4.4	5.9	1.3	4.5	8.2	1.8
1972	5.6	16.2	2.9	5.0	6.6	1.3	5.0	10.0	2.0
1974	5.6	16.0	2.9	4.9	6.7	1.4	5.0	9.9	2.0
1976	7.7	19.0	2.5	7.1	8.6	1.2	7.0	13.1	1.9
1978	6.0	16.3	2.7	5.3	7.2	1.4	5.2	11.9	2.3
1980	7.1	20.0	2.8	6.9	7.4	1.1	6.3	13.1	2.1
1982	9.7	23.2	2.4	9.9	9.4	0.9	8.6	17.5	2.0

资料来源: J. J. 休斯, R. 帕尔曼: 《失业的经济学—英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1984年英文版), 第187页。

表 49 若干发达国家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失业率(1980—1983年)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法国	西德	英国	意大利
1980年	青少年	16.2	17.1	4.2	25.9	3.5	15.7	18.4
	20—24岁	11.0	8.9	3.3	13.0	3.5	10.3	12.1
	25岁以上	5.4	3.7	1.8	4.3	2.4	4.9	1.7
1981年	青少年	16.2	15.6	5.6	29.1	4.3	21.1	20.9
	20—24岁	11.2	8.2	3.7	15.1	5.1	15.9	13.0
	25岁以上	5.6	3.7	2.0	5.0	3.3	7.9	1.9
1982年	青少年	21.9	18.5	5.6	31.3	6.9	24.1	23.7
	20—24岁	16.8	10.4	4.0	17.3	8.0	18.0	14.2
	25岁以上	8.4	4.7	2.1	5.6	4.8	9.3	2.1
1983年	青少年	22.2	23.6	6.4	30.7		23.4	26.6
	20—24岁	18.5	14.6	4.1	18.8		18.2	15.6
	25岁以上	9.4	6.9	2.4	5.8		9.1	2.5

注：青少年一栏，法国、英国指16—19岁；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西德指15—19岁；意大利指14—19岁。

资料来源：M·杰霍达：“失业：事实，经历和社会后果”，C·弗里曼、L·索埃特主编：《技术变化和充分就业》（1987年英文版），第10页。

逐渐向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过程转变。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不但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对雇佣劳动力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与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不

同，新的科技革命不是使劳动过程简单化，而是使劳动过程复杂化，要求劳动者有更高的文化程度、科学知识和操作技能。与此同时，一批传统工业部门不断衰落，而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工业部门则迅速发展。这一切，都使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复杂劳动和熟练劳动的重要性不断增长。1950年，美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白领工人占36%，专业人员占8%；到1978年，两类人员的比重已分别上升到50%和15%。<sup>①</sup>对劳动力需求的上述结构变化，不能不对就业产生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和开始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他们或者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工作经验较少，因而通常所从事的大都是不需要多少技能或只需要较低技能的工作。对这部分劳动的需求相对于总劳动需求的下降，特别加剧了这些类别劳动者的就业困难。迅速发展的服务行业，由于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较低，本来是战后吸收青年和妇女就业的主要部门，但近年来由于使用电子计算机和实行经营管理的合理化，也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作职位的需求。总之，对于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劳动力来说，一方面是供给的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需求的相对下降，这就难怪他们的失业问题特别严重，失业率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一般水平了。

经济的结构变化固然会造成失业人口的若干结构性特征，但它并不是失业存在或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在1958年至1964年期间，美国曾有一场围绕失业原因的争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一派被称为结构变化论者或结构主义者，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失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活动和职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由于货物生产部门的相对缩小和服务部门的不断扩大，引起某些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锐减而另一些部门的劳动供给不足；又由于生产自动化和技术变化步伐的加速，导致蓝领职业的急剧缩小和白

---

<sup>①</sup> R·B·弗里曼：“美国劳动市场的演变，1948—80”，《转变中的美国经济》（1980年英文版），第364页。

领工作、技术工作和专业工作职位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因素再加上经济活动的地区变化，便造成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失衡，一边是大量工人失业，另一边是大量空位存在。在他们看来，工作职位是足够的，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是使劳动的供给能够适合于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派被称为需求不足论者，他们承认结构因素的存在，但认为当时失业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总量需求不足，因为所有职业类别的就业机会都下降了。在他们看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提高总量需求；如果有足够的工作职位存在，工人终究会设法找到工作并使自己胜任这项工作。

这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哪一种相对说来更符合实际呢？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需求不足论更有说服力。罗斯在当时评论这场争论时指出：“无论需求不足是不是一个首要原因，但它显然是近来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是说生产已经下降，相反，自1950年以来，按现行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创记录，按不变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除两年外每年都在达到新的高度。但是，这种经济增长还不够大，还不足以平衡导致单位产量所需劳动下降的生产率提高，以及构成追加劳动供应的劳动人口的增长。”<sup>①</sup>20年后两位经济学家在回顾这场争论时也说：“证据似乎支持需求不足论者，因为，在1964年减税和由于越南战争升级而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以后，失业率终于相继四年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结构主义者所援引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类别的失业率也都有所降低。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加速了通货膨胀，而当七十年代失业水平又一次开始上升时，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类别的失业率也再一次不相称地提高了。”<sup>②</sup>

① R·M·罗斯：“引言：失业问题”，《失业与美国经济》（1964年英文版），第11页。

② J·J·休斯、R·帕尔曼：《失业的经济学—英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1984年英文版），第163页。

由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所引起的失业，通常称之为结构性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新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sup>①</sup>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不过在20世纪的今天，结构性失业的具体内容和严重程度都与19世纪中期大不相同了。尽管结构性失业的严重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总的说来，它并不能成为失业存在的首要原因。按照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似乎大量失业的存在不是因为劳动的需求赶不上劳动的供给，而是因为劳动的供给未能在职业、技能和地区上恰好符合对劳动的需求；似乎只要加强就业指导，提供就业信息，加强技能培训，促进人员地区流动等等，即可消灭非自愿失业。这不但大大低估了当今资本主义失业的严重性，也完全歪曲了失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检验结构主义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把失业的数量与空位的数量进行比较。可惜的是，美国没有关于空位的系统统计。但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澳大利亚等都有关于空位的系列统计。我们先以英国为例对失业数量和空位数量进行比较（见表50）。

英国在1964至1987年的24年中，空位从未超过失业人数。空位占失业人数的比例，除五年外从未达到50%，比例最大的1965年不过79%，比例最小的1982年仅仅4%，24年平均数也只有13%。不仅如此，在1975年以后，随着失业数量的急剧上升，空位的相对比重则大大下降，80年代已降到10%以下。从这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3—704页。

**表 50 英国官方的失业与空位统计(1964—1987年)(千人)**

年份	失业	空位	年份	失业	空位	年份	失业	空位
1964	394	222	1972	826	147	1980	1561	143
1965	339	267	1973	591	307	1981	2420	97
1966	353	257	1974	591	303	1982	2793	111
1967	547	175	1975	902	150	1983	2970	145
1968	574	190	1976	1229	121	1984	3047	150
1969	566	202	1977	1313	158	1985	3163	162
1970	602	188	1978	1299	210	1986	3185	188
1971	744	131	1979	1227	241	1987	2880	235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统计，1964—1983》，第622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3月号，第158页。

些数据出发，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断言，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

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与英国有所不同？让我们再看看有空位统计的其他几个国家的情况（见表51）。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取了若干年份的数字，但也可看出大体情况。西德和荷兰在60年代由于实现充分就业，空位数量超过失业数量，实际上处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态。但从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动态完全相似，在失业迅速增长的同时，空位的比重也急剧下降，到80年代中期已降到极低水平，比重较高的日本只有25.7%，比重最小的法国仅仅1.9%，其他国家也都在10%以下。可见，在大量失业存在时，结构性失业只是其中的一

表 51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与空位比较  
(1964—1985年) (千人)

	法国		西德		荷兰		日本		澳大利亚	
	失业	空位	失业	空位	失业	空位	失业	空位	失业	空位
1964	98	45	169	609	22	131	550	394	63	
1970	262	93	149	795	46	127	590	521	91	
1975	840	109	1074	236	260	47	1000	338	303	55
1980	1451	89	889	308	325	54	1140	390	406	33
1985	2458	46	2304	110	761	25	1563	401	598	54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统计，1964—1983》，第110、112、143、300、342、344、458、460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3月号，  
第96、100、118、124、138页。

个较小的部分，结构性因素并不能成为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

结构性失业和失业人口的结构特征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结构性失业是由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失业。结构变化使一些部门、职业和地区的就业机会下降，同时使另一些部门、职业和地区的就业机会上升，形成失业和空位并存，它反映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部门、职业、地区上的不一致。而失业人口的结构特征则有所不同，它不仅由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动方面的原因，还有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原因，它反映的是劳动人口本身由于年龄、性别或种族不同而具有的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因此尽管经济结构变动并不是战后失业的主要原因，但它却是失业人口具有结构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表 52 美国的失业率和消费物价指数年变化率(1914-1980年)

	物价变 动率%	失业 率 (%)		物价变 动率%	失业 率 (%)		物价变 动率 (%)	失业 率 (%)		物价 变动 率 (%)	失业 率 (%)
1914	1.3	7.0	1931	-9.2	15.9	1948	7.4	3.8	1965	1.7	4.5
1915	1.0	8.5	1932	-10.8	23.6	1949	-1.0	5.9	1966	3.1	3.8
1916	7.3	5.1	1933	-5.3	24.9	1950	1.0	5.3	1967	2.6	3.8
1917	16.1	4.6	1934	3.3	21.7	1951	7.6	3.3	1968	4.2	3.6
1918	16.1	1.4	1935	2.5	20.1	1952	2.2	3.0	1969	5.4	3.5
1919	13.8	1.4	1936	1.0	16.9	1953	0.8	2.9	1970	5.9	4.9
1920	14.7	5.2	1937	3.6	14.3	1954	0.4	5.5	1971	4.3	5.9
1921	-11.3	11.7	1938	-1.9	19.0	1955	-0.2	4.4	1972	3.3	5.6
1922	-6.6	6.7	1939	-1.4	17.2	1956	1.4	4.1	1973	6.2	4.9
1923	1.8	2.4	1940	1.0	14.6	1957	3.6	4.3	1974	11.0	5.6
1924	0.2	5.0	1941	4.9	9.9	1958	2.7	6.8	1975	9.1	8.5
1925	2.5	3.2	1942	10.1	4.7	1959	0.9	5.5	1976	5.8	7.7
1926	0.9	1.8	1943	6.0	1.9	1960	1.5	5.5	1977	6.5	7.0
1927	-1.9	3.3	1944	1.7	1.2	1961	1.1	6.7	1978	7.7	6.0
1928	-1.4	4.2	1945	2.3	1.9	1962	1.1	5.5	1979	11.3	5.8
1929	0	3.2	1946	8.2	3.9	1963	1.2	5.7	1980	13.5	7.1
1930	-2.6	8.7	1947	13.4	3.9	1964	1.2	5.2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失业》(1980年英文版),第306—307页；数字按《基本经济统计手册》、《美国统计摘要》和《每月劳工评论》校正并补充。



第三，出现了高失业率和 high 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的一般规律是：经济扩张时期失业率下降，物价则上涨；经济收缩时期失业率上升，物价则下降。但战后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70年代，出现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趋于增长的现象

我们首先看美国的情况（见表52和表53）。

**表 53 美国平均年物价变动率和平均年失业率(1920-1979年)**

	平均年物价变动率 %	平均年失业率 %
1920—1924	-0.24	6.20
1925—1929	-0.02	3.14
1930—1934	-4.92	18.96
1935—1939	0.76	17.50
1940—1944	4.74	6.46
1945—1949	6.06	3.88
1950—1954	2.40	4.00
1955—1959	1.68	5.02
1960—1964	1.22	5.72
1965—1969	3.40	3.84
1970—1974	6.14	5.38
1975—1979	8.08	7.00

计算根据：表52。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1960年以前，一般说来，消费物价指数与失业率大都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在重要的萧条或衰退年份，

当失业率急剧上升时，商品价格便下降，如1921年，1929—1933年，1938—1939年，1949年，1955年等年份。但自1958年的衰退开始，出现了令人惊奇的现象，衰退期间商品价格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而后从60年代至70年代，这种现象日益显著，日趋发展，如1966—1961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等衰退年份，在失业率提高的同时，物价也在上涨，并且上涨的幅度越来越大。如果不从个别年份而从各个时期来看，则60年代中期以后物价指数和失业率同方向变动的情况反映得更为清楚。

按5年平均计算的物价变动率和失业率，在60年代后半期以前，每5年和前5年相比，大都是按相反的方向变动，一个上升则另一个下降，反之亦然。但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两者同时趋于增长，随着失业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也不断加速。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是不是美国特有的呢？不是的。它是这个时期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

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美国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在70年代失业率显著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上升。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新现象，即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和物价迅速上涨同时发生的现象，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停滞膨胀”。

70年代的“滞胀”现象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在学院派经济学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他们大多数人把70年代的滞胀特别是物价上涨，归因于工资成本先期上升过快和由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石油价格猛增。这就把主要责任推到工会和劳工方面，或推到石油生产国方面。但激进派的看法不同。西方激进派经济学家认为，滞胀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垄断资本为追逐和保持高额垄断利润，即使在衰退时期，也力图依靠它们的垄断地位，通过削减生产的办法，维持商品的高价。“垄断部门就这样以生产大幅度减少和大规模失业为代价保持它的价格和平均每单位的利润。…因此，一

**表 54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年消费物价变动率  
和失业率 (1950—1980年)**

国 别	消费物价指数平均年变动率 %			平均年失业率 %	
加拿大	2.2	2.6	7.5	5.1	7.2
法 国	5.6	3.8	8.8	2.4	4.8
意大利	3.0	3.8	12.2	5.7	6.7
日 本	4.0	5.4	8.7	1.2	1.9
英 国	3.6	3.6	12.4	3.5	5.6
西 德	1.9	2.5	4.9	1.0	3.2

资料来源：L·N·林德伯格、C·S·梅尔编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政治学》（1985年英文版），第11—12页。

个高垄断的经济，比较容易在每次衰退中引起高失业率”，<sup>①</sup>同时物价则下降较少，甚至可能不下降乃至上升。

引起滞胀局面的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前面曾经谈到，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节，为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力图通过膨胀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提高社会的总有效需求。这对维持战后20多年的经济相对繁荣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代价之一便是政府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的飞速增长。

60年代与30年代相比，联邦政府总支出增长了十八倍，其中军事开支增长了五十六倍。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政府开支增长之巨也是令人瞠目的。这还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庞大开支。

<sup>①</sup> H. J. 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164页。

**表 55 美国联邦政府的平均年支出和军事支出(1920-1969年)**

	平均年总支出(百万美元)	平均年军事支出(百万美元)
1920—1929	3677	1008
1930—1939	6130	974
1940—1949	52032	37869
1950—1959	66510	39393
1960—1969	116547	55681 <sup>*</sup>

• 为1960—1967年八年平均数，以后年份数字暂缺。

计算根据：《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5年5月，第214页。

与此同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则要慢得多，因而政府开支和军费支出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于提高。“衡量军费支出的最重要尺度是它们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从1947年到1971年，它在最低点1948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1%和最高点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9%之间波动。越南战争中的高峰年份1967年和1968年，分别为13.5%和13.2%，以后又慢慢降到1969年的12.6%，1970年的11.6%和1971年的11.1%（1972年又有一次大的增长）。在1947—1971年整个时期内，直接军事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3.2%。现在，如果我们相当保守地假定间接的影响只与直接影响一样大，这样可以看出，直接的军事费用和间接的军事费用加在一起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6.4%。”<sup>①</sup>

如果政府开支不管怎样扩大都无损于经济而只有益于经济，

① H. J. 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84年中译本），第203页。

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庞大的政府开支虽然从近期看有助于维持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并刺激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经常的财政赤字，大量的政府债务和过多的通货发行，成为60年代后财政、金融不稳定因素日趋积累的重要根源。从军事开支来看，军事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真正的军火生产既不提供生产资料也不提供消费资料，但却要占用和消耗大量社会已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而同时，军火企业把产品卖给政府，得到大量货币收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的货币被投到市场上而没有相应的物质产品投入市场，自然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总之，扩大政府开支和军费支出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剂毫无副作用的良药。使用到一定程度，不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减退，必须不断加重剂量，同时也带来日益严重的不良后果，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货膨胀即是一个重要表现。

70年代高失业率和 high 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表现出失业问题潜在的严重性质。乐观的西方观察家们常常认为，70年代的失业率虽高但仍大大低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他们没有考虑到，30年代的超高失业率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前出现的，当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微不足道；而7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却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广泛调节经济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时政府救治失业的各种方法已越来越不能奏效。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在低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的“滞胀”形势下，对付失业的办法已越来越少，越来越受到限制。按照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理论，失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大引起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发生。而政府的政策选择通常是，失业严重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总需求的生长；通货膨胀严重时采取紧缩政策，抑制总需求的扩大。两种病症的救治方法是截然相反的。但滞胀却表明，两种病

症同时发生，这使政府的宏观调节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用扩大总需求来压低失业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用紧缩总需求来降低通货膨胀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失业。这就是70年代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两难处境。

进入80年代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如何呢？请看表56。

进入80年代以后，情况确实有了变化。最显著的一点，是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到1986年，已降低到比较正常的水平，西德甚至出现消费物价的轻微下降，美国的消费物价变动率只有1.6%，达到196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这一变化，许多经济学家宣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摆脱了滞胀局面，走出了70年代的经济困境。我们认为，笼统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克服了滞胀，并不符合实际。“滞”和“胀”同时并存的状况到80年代中期确实已暂时摆脱，但是，“胀”虽然暂时消除了，“滞”却依然存在着。整个80年代的前八年，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大都低于70年代；而且，失业率除日本仍保持较低水平，美国在1984年后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国家均继续保持高失业率，平均水平比70年代急剧增长。以1980—1987年时期与1971—1979年时期相比，平均年失业率的变动是：美国从7.0%提高到7.7%，英国从5.1%提高到10.6%，西德从3.9%提高到7.8%，意大利从6.3%提高到9.5%，加拿大从7.5%提高到9.8%，法国从5.7%提高到10.3%（1984—1987年平均数）。一些国家已达到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

80年代的情况变化并不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出了它们的两难处境，恰恰相反，它证明了这种两难处境的存在及其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节所带来的限制。1974—1975年的危机和70年代的滞胀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作用”之一，在于结束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货币和社会政策的

表 56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和消费物价变动率 (1980—1987年)

		英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失 业 率 %	1980	6.4		3.8	7.6	7.5	7.1	2.9
	1981	10.0		5.5	8.4	7.6	7.6	2.2
	1982	11.7		7.5	9.1	11.0	9.7	2.4
	1983	12.4		9.1	9.9	11.9	9.6	2.7
	1984	11.1	9.9	9.1	10.0	11.3	7.5	2.7
	1985	11.3	10.2	9.3	10.1	10.5	7.2	2.6
	1986	11.5	10.4	9.0	11.1	9.6	7.0	2.8
	1987	10.4	10.6	8.9		8.9	6.2	2.8
消 费 物 价 指 数 变 动 率 %	1980	18.3		5.5	21.1	10.1	13.5	7.8
	1981	11.9		5.9	18.7	12.5	10.2	4.9
	1982	8.5		5.3	16.3	10.8	6.0	2.8
	1983	4.7		3.0	15.0	5.9	3.1	1.9
	1984	4.7		3.0	10.6	4.3	3.5	2.3
	1985	6.4		2.2	8.6	3.9	3.5	2.0
	1986	3.3		-0.2	6.1	4.2	1.6	0.6
	1987	4.1		0.2	4.6	4.4	3.6	0.1

资料来源和计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历史统计，1964—1983》第28、35、70、77、110、118、344、351、622、627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3月，第96、88、118、124、134、158页。

优先目标，而把反通货膨胀的任务提到首位。当时一位在美国的瑞士经济学家卡尔·布鲁勒曾直言不讳地说：“要消除通货膨胀，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失业。”<sup>①</sup>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各国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再加上石油价格下降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消费物价的迅速上涨暂时得到控制和平息；但同时也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胀”的暂时消除正是以“滞”的加剧为代价的。严重的失业又一次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号社会问题，困扰着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而诊治失业和调节经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

<sup>①</sup> 转引自E·曼德尔：《第二次萧条》（1980年英文版），第87页。



## 第四章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 规律理论

### 第一节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理论的形成和争论

#### 1.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由来和形成

对利润率下降问题的研究，并非始于马克思。在他以前和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8世纪和19世纪，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从而一般利息率的下降，是经济学家们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对这种下降的趋势似乎没有人怀疑。人们思考、研究并力图加以说明的，是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原因，以及利润率下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家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sup>①</sup>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斯密和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的现象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却有很大区别。斯密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8页。

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sup>①</sup>并用16世纪至18世纪英国利息率倾向下降的事实来证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斯密认为，资本积累必然使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进而促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资本的利润降低。“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sup>②</sup>他还通过法国和英国的比较以及英格兰和荷兰的比较来说明，一个相对发达和富裕的国家，工资相对较高，而利润和利息相对较低。<sup>③</sup>总之，斯密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竞争加剧和工资上涨。

李嘉图的观点与斯密不同，李嘉图虽然也把利润率的下降看作是工资上升的直接结果，但他认为，工资的上升并不是由于竞争的加剧，而是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谷物价格的上涨又是因为人口增长和土地收益递减，使谷物生产耗费越来越多的劳动。他批评说：“亚当·斯密总是把利润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积累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从未提及为追加资本所需雇用的更多的劳动者提供食物的日益增加的困难。”“除非有某种长期存在的原因使工资提高，否则资本积累就不会持久地降低利润”。<sup>④</sup>李嘉图从他信奉的萨伊法则和人口规律出发，认为积累和竞争只会引起工资的暂时上涨，并不是工资长期趋于上涨的原因，工资趋于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决定劳动价格的一种主要商品谷物的价格的持续上

---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2年中译本）上卷，第81页。

② 同上，第80—81页。

③ 同上，第83—84页。

④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62年中译本），第246页。

涨。而且，李嘉图所说的工资上涨，是指货币工资而不是指实际工资。工人“确将得到更多的货币工资，但谷物工资却减少了。不仅是他能够支配的谷物减少了，而且一般生活状况都将恶化”。<sup>①</sup>但谷物价格上涨却使地租提高并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利益。“地租的货币价值上涨时，它在产品中所占份额也会随之增加。不仅是地主的货币地租增加了，而且谷物地租也会增加。”<sup>②</sup>在这里，李嘉图经济理论的阶级含义表现得十分清楚。他不但看到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对立，而且强调了他们二者与地主阶级利益的对立。

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影响如何？乐观的斯密和悲观的李嘉图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斯密从未对利润率下降表示过不安，从不以为利润率下降会危害资本积累。“利润率尽管减低，资本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加迅速。就此点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都一样。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sup>③</sup>他甚至认为低利润反而对产业的发展有利，因为在纯利润率很低从而这种利润所能负担的市场利息率也很低的情况下，“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几乎一切人都得成为实业家，都有从事某种产业的必要”。<sup>④</sup>而且，由于高工资可以由低利润弥补，它们的商品“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sup>⑤</sup>具有同样的竞争能力。

相比之下，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趋势则怀着深切的忧虑。作

---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62年中译本），第85页。

② 同上。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2年中译本）上卷，第85页。

④ 同上，第89页。

⑤ 同上，第90页。

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李嘉图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在他看来，“没有积累的动机就没有积累，…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者没有利润也是一样。他们的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一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动机就会全然终止。”<sup>①</sup>对于李嘉图的这种看法，马克思评论道：“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sup>②</sup>

斯密和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分析，显然都是错误的。斯密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竞争加剧。但是，不同部门资本之间的竞争只会使利润率平均化，而不会降低利润率的一般水平。部门内部资本之间的竞争虽然会使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和价格下降，但商品总量中所包含的利润总量并不一定减少，仅从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斯密的本意或许是：资本的积累使资本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快，以致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经常超过劳动的供给，使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不断提高，而商品的价格却会降低，结果使利润率下降。然而在李嘉图看来，“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李嘉图不是一个相信这种寓言的乐观主义者”。<sup>③</sup>李嘉图并非不承认这种现象会发生，但他认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62年中译本），第10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0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97页。

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提高，是由于人口增加以前基金的增加所引起的”。<sup>①</sup>李嘉图坚信工资决定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即“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sup>②</sup>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即使劳动供不应求而工资上涨，“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sup>③</sup>所以积累和竞争并不是工资持久上涨的根本原因。李嘉图也断然否定积累会遇到需求不足的困难，以致形成资本过剩而使利润跌落。“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都不会不能得到使用。”<sup>④</sup>李嘉图就是这样批判了斯密在利润率下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然而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李嘉图的批判所依据的理论同样是错误的。他所用的批判武器，一个是后来被拉萨尔发展为叫做“工资铁律”的那个教条，认为工资的变动由工人人口绝对量的变动来调节；另一个则是众所周知的“萨伊定律”，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即为本身创造需求。对这两种教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有详细的批判，<sup>⑤</sup>我们不再重复。

李嘉图不仅在批判斯密时犯了理论错误，他自己对利润率下降原因的说明也是错误的。李嘉图的逻辑推论是：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必需品的价格又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食物是由农业生产的，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收益递减，为满足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劣等的和更劣等的土地不断投入耕作，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农业生产条件愈来愈差，

---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62年中译本），第246页。

② 同上，第77页。

③ 同上，第78页。

④ 同上，第247页。

⑤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第699—701页。

农业劳动生产力不断下降，从而使农产品价格趋于上涨，并成为工资持续上升和利润倾向下降的根本原因。按照这一逻辑，李嘉图事实上把利润率下降的最终原因归咎于自然界，归咎于物质生产本身，从而看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忽视了由利润率下降所施加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实际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从李嘉图的论点来看，除去错误的地租理论不谈，它的主要错误，在于混同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李嘉图的全部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等同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他从未从利润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从未独立于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范畴来分析剩余价值一般，这是他的方法的一个根本缺陷。他在分析利润时，从未想到探索它的起源和本质，而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利润。他把利润理解为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扣除工资以后的余留部分，而这种同工资相比较的价值余额，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不过李嘉图从未意识到而已。混同了利润和剩余价值，也就必然要混同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李嘉图自以为考察了利润率，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剩余价值率，而且只是考查了工作日的内含和延都是不变量这个前提下的剩余价值率。”<sup>①</sup>正是由于这种混同，李嘉图总是把可能促使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原因看作是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并且用前者来说明后者。当李嘉图用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时，他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当作了利润率的下降。“因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指相对剩余价值率，因为李嘉图假定工作日不变）在李嘉图看来是等同的，所以，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或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他只能用决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作日中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的那一部分）不断下降或下降趋势的同样原因来说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9页。

明。”<sup>①</sup>

斯密和李嘉图的共同错误，是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尽管他们对工资提高的含义和工资提高的原因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现代“利润挤压论”的先驱。他们的理论特别是斯密的论点，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被那些坚持认为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资提高所挤压的经济学家所推崇。其实，无论是斯密所说的实际工资上升也好，还是李嘉图所说的货币工资上升也好，都不能成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充足理由。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工资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剩余价值率降低，这要视工作日是否变化，劳动强度是否变化，劳动生产率是否变化和变化程度大小等因素而定。进一步说，即使剩余价值率降低，也并不意味着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因为利润率是减去成本后的价值余额同全部资本之比率，而不是同作为可变资本的工资总额之比率；剩余价值率降低表明单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即利润量）减少了，但如果一定量总资本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增多，利润总量仍然可以增大，利润率仍然可能提高，这就涉及到总资本构成变动等因素。总之，单纯用工资变动或剩余价值率变动来说明利润率的变动，在理论上逻辑上都是有缺陷的。

早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反复指出李嘉图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错误，而这一决定性进展，又是以马克思深刻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科学地探明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这个伟大成果为基础的。在手稿的“资本章”第一篇，马克思舍象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而研究了剩余价值一般的生产过程。由于弄清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本质区别，以及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科学地区别了剩余价值和利

<sup>①</sup>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97—498页。

润，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他指出：“实际的问题在于：（1）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例怎样；（2）用工资，即用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小时购得的剩余劳动有多少。”<sup>①</sup>假定总资本100塔勒，其中的 $\frac{3}{5}$ 即60塔勒是工具和原料， $\frac{2}{5}$ 即40塔勒是工资，用40塔勒物化劳动时间购得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50塔勒的物化劳动，那末，“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虽然只是10塔勒，但是按实际的比率来说，这10塔勒在计算时应该同40塔勒相比，而不应该同100塔勒相比。60塔勒价值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而是工作日创造了新价值。因此，工人是把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增加了25%，而不是增加了10%。…可见，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表示活劳动使物化劳动增长的比率”。<sup>②</sup>在这个理论上，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凯里和巴师夏等经济学家用工资上升或工人收入份额的增大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错误。

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后来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单独出版的专论理论史的那部分手稿，在全面清算李嘉图错误的理论体系时，进一步批判了李嘉图在利润率下降问题上的错误，剖析了这一错误的理论根源。马克思深刻指出：“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这个根本性的方法论缺陷决定了，对于“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误规律等等”。<sup>③</sup>马克思还分析了李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45页。

② 同上，第345—346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23页。



嘉图错误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和他的错误的地租理论的联系。李嘉图不但认为谷物价格的上涨是工资提高和利润下降的直接原因，而且把谷物价格的上涨归因于土地追加投资收益递减和耕地扩大必然从优等地向劣等地推移，归因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并把这一现象作为级差地租存在和增长的前提。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的下降和地租率的提高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农业生产率的降低则是两种现象的共同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李嘉图错误的地租理论成为他利润率下降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之一。由于李嘉图对地租的理解是错误的，“因而，他用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根据之一也就不能成立”。①

马克思自己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弄清了一般利润率倾向下降的内在机制。他把这个规律“简短地概括如下：实际剩余价值取决于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而剩余价值在利润的形式上，则是按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来计算的。因此，利润率取决于—假定剩余价值不变，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不变—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以原料和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这样一来，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越少，利润率就越低。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②他还特别指出：“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③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I，第498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5页。

③ 同上，第267页。

上面的这个简单表述，已经概括了利润率下降的核心机制，后来的手稿特别是《资本论》中的详尽分析，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我们没有必要重复马克思有关理论的所有方面，一切重要的论点后面都要涉及；在这里，只须把它同李嘉图的理论作一对比，简略地提出若干要点。

第一，从整个理论分析的基础来看，同李嘉图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根本错误相对立，马克思全部分析的立足点，在于严格区别利润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区别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强调利润率可以独立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而变动。

第二，李嘉图从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变化来论证一般利润率的变化，断言利润率的下降同地租率的提高必然同时发生。与此不同，马克思则从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变化，通过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说明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必然性，而不把地租理论作为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前提。“这种趋势是必然的，而完全用不着考虑地租。”<sup>①</sup>

第三，李嘉图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农业生产力的降低，马克思的分析却表明，利润率下降恰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sup>②</sup>

第四，李嘉图认为工资的上升是利润率下降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是用剩余价值率的下降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断然否定这种看法，认为利润率的下降不但可能而且必然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同时发生。“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3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98页。

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①

第五，李嘉图断言利润下降是由于工资上升，这表明他把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减少视为同一过程。马克思则强调，由于总资本扩大和剥削率提高，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和利润量的增长结合在一起。“造成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而引起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②

第六，李嘉图在用食品价格上涨解释工资上升和利润下降时，尽管谈到农业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遏制作用，但既然认为农业生产力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便意指利润率下降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直到积累停止。马克思则详细分析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强调利润率下降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③

第七，李嘉图把利润率下降的最终原因归之于农业生产力下降的自然趋势，从而把利润率下降所表现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归因于自然。“他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④马克思则指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过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⑥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49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0页。

③ 同上，第266页。

④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3页。

⑤ 同②，第237页。

⑥ 同②，第278页。

## 2. 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批评

自从《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以来，围绕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命题能否成立，另一个是资本有机构成变动和剩余价值率变动的相互关系。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问题，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讨论。这里将主要围绕第二个焦点问题进行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因素对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起决定作用，即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和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西方经济学家经常使用下面这个利润率的演变公式来反映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P' = \frac{S}{C+V} = \frac{\frac{S}{V}}{\frac{C+V}{V}} = \frac{\frac{S}{V}}{\frac{C}{V} + 1}$$
$$= \frac{\text{剩余价值率}}{1 + \text{资本有机构成}}$$

公式表明，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按正方向变化，同资本有机构成按反方向变化。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固然会降低一般利润率，但剩余价值率的普遍增长却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因此，即使证明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还不能充分证明一般利润率必然具有下降趋势，必须同时分析剩余价值率这一变量。

大多数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持批判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批评马克思的论证在处理剩余价值率问题上犯有错误。但这些批评受到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反驳。主要批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

<sup>①</sup> J. M. 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18页；R. 米克：“利润率下降”，《科学与社会》，1960年第1期，第37页。

三点。

第一点批评：马克思是在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来阐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这导致了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同义反复”。持这种批评意见的经济学家断言：马克思有一种理论，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如果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那末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在日益增长的净产量中将会得到一个固定的份额，实际工资必然随之上升。这样，“马克思只有放弃他的实际工资不变的论点，才能证明利润的下降趋势。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严重的前后矛盾，因为当他讨论利润的下降趋势时，完全没有提到它带来的实际工资的增长趋势”。<sup>①</sup> 不仅如此。按照上述假定，“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剥削率不变，利润率随人均资本量的增长而下降。”<sup>②</sup> 这种解释“什么也没有说明”。<sup>③</sup>

对于上述批评，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

首先，马克思在论证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是否把剩余价值率不变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假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他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找到关于剩余价值率不变或剥削程度不变的假定。但这只存在于他的论证的一定阶段。熟悉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人都知道，他的论证常常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他在分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时，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中，开始先假定剥削程度不变，就是为了突出决定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针对李嘉图的错误，强调即使舍象掉剩余价值率变动的因素，利润率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但是，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实际上否定了这个假定。他在说明利润率的下降决不排斥利润量的增大时，不但指出资本总量和资本支配的劳动总量会扩大，而且强调资本“在它们所支配的工人人

<sup>①②</sup> J·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6年英文第2版），第36页。

<sup>③</sup> 同上，第42页。

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sup>①</sup>这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不止一次地指出：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一个同样的甚至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sup>②</sup>。直到第十四章末尾，为了避免误解，马克思还再次强调：“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sup>③</sup>这些引文足以表明，说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率不变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假定条件是没有根据的。罗斯道尔斯基在反驳罗宾逊夫人时很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并不打算把利润率下降规律限制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场合。“既然马克思并没有将他的规律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受到‘自相矛盾’或‘同义反复’的责难。”<sup>④</sup>

其次，马克思是否有一种理论，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趋于不变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如果不局限于马克思的某些早期著作，不局限于他在分析特定问题而有意识地暂时舍象掉工资变动的某些场合，而从他的成熟著作和整个理论体系着眼，那就必须说，马克思承认工人的实际工资是趋于提高的。这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证明。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1页。

② 同上，第237、240页。

③ 同上，第267页。

④ R·罗斯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79年英文版），第401、402页。

看，他认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sup>①</sup>工人“所谓自然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所达到的文明程度”。<sup>②</sup>这个论点的潜在含义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扩大。从马克思的工资变动趋势理论来看，他认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虽然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趋于下降，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却趋于上升。“不应该因为在某个国家中劳动的相对价值随该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就认为在不同国家中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情况恰恰相反。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同其它国家相比，生产率越高，它的工资也就越高。在英国，不仅名义工资比大陆高，实际工资也比大陆高。”<sup>③</sup>这里直接论述的是不同国家之比，但显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比较。再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来看，他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并不排斥工人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剩余的存在和增长根本不要求工人的生活状况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根本不要求他的平均工资总是只给他提供同一的、量和质既定的生活资料。……相对剩余价值甚至可以不断增长，因而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就是平均工资的价值可以不断下降，但生活资料范围、从而工人的生活享受仍然可以不断扩大。”<sup>④</sup>以上几个方面的引证说明，马克思并不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趋于不变的。在当时，在19世纪中期，工人实际工资刚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译本），第156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页。

④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78—27页。

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还不象20世纪特别是战后时期那样显著和迅速，所以马克思并没有非常突出和强调这个论点。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并且从理论上说明了，工资的价值和工资所体现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工人生活的改善即实际工资提高可以和劳动力价值下降即剥削程度提高同时发生，它们二者又可以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

第二点批评：马克思不应该把剥削程度的提高作为利润率下降的一种抵销因素来分析。“把生产率提高过程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抵销因素来处理似乎是不明智的；更好的方法是从一开始便确认生产率增长会随之带来剩余价值率提高。而马克思通常正是这样做的。”<sup>②</sup>斯威齐提出的这个批评，第二句话完全正确，马克思的确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但他似乎不能理解并提出责难的是，为什么在分析利润率下降问题时，马克思要把由生产率增长同时引起但对利润率变动起不同作用的两种因素割裂开，先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强调有机构成提高会使利润率降低，然后再把剥削率提高看作一种起反作用的原因？

从一方面看，这个批评似乎无的放矢，因为马克思分析利润率下降原因时并不是以剩余价值率不变为前提，他比谁都更清楚有机构成提高和剩余价值率上升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增长的两重结果，并未把它们分离或割裂开。且不说《资本论》中的分析，早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有明确而透彻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即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上；还表现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组成部分同资本总量相比的减少上。或者换一种说法，表现在对使用的活劳动进行较大的剥削上……，也表现在普遍使用的活的劳动时间相对量的减少上，也就是表现在活的劳动时间量与推动它的

<sup>②</sup> P. W.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01页。



资本相比的减少上。这两种变动不仅齐头并进，它们互相制约，并且不过是同一规律所表现的不同形式和现象。然而，就利润率来看，它们按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sup>①</sup>

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在论证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原因以后，在分析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时，确实又首先谈到剥削程度的提高。这应如何理解呢？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是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唯一因素，也就是说，剥削程度的提高并非只能由生产率增长所引起，只能和资本有机构成直接相关或同时并进。罗斯道尔斯基和米克都正确指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马克思在“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那一节分析“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时，着重论述的是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等方法，而这些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法与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并无关系，它们“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sup>②</sup>简言之，马克思在第十三章对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率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割裂开；而独立出来在第十四章加以考察的，只是那些同资本构成变动基本无关的提高剥削程度的方法。因此，“如果批评家们没有注意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在方法论上的区别，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着手研究时的先入之见，而与这些章节相当复杂的结构无关。”<sup>③</sup>

第三点批评：既然生产力发展会同时引起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提高，利润率的变动方向就是不确定的，马克思对利润

---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9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0—261页。

③ R·罗斯道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77年英文版），第405页。

率下降趋势规律的阐述也不能令人信服。至多人们只能说，“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比例小于总资本中可变资本份额的下降比例，利润率将下降”。但是没有根据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相对说来会比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大得多，以至于能支配利润率的运动。相反，似乎必须把这两个变量看作具有大体上同等的重要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剩余价值率提高的进程是同步的”。<sup>①</sup>

对于斯威齐的这一责难，我们说，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中，而且早在1857—1858年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从理论上作了论证。他的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利润率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下降被剥削率提高所带来的剩余价值量增长所抵销是可能的，但有某种不可超越的界限。“为了使利润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受剥削的率）就必须随着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的相对下降，或者说，随着不变资本量的相对增长，以相同的比例增长。从一种唯一的情况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情况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可能的，反过来宁可说，占统治地位的必定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或者说，剩余价值额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而相对下降——这一点已为经验所证明。……如果正常工作日等于12小时那么，2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所追加的决不会多于24个小时……，这24小时中有一定的部分补偿工人的工资，他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这24小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如果既定量的资本（与资本的既定量成比例）不再雇用24个工人，而只雇用2个工人，……那么，如果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等于总工作日的 $1/12$ ，或等于24个工人中每人1小时，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能使——不管他们如何提高剩余劳动时间的率——2个工人所提供

<sup>①</sup> P. M.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02、104页。

的剩余价值量同旧生产力方式下的24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sup>①</sup>这一命题在《资本论》中被概括为：“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sup>②</sup>由此得出结论：“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sup>③</sup>

其次，资本主义越发展和已达到的剥削程度越高，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会变得越困难。“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在这种提高以前已经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内运动。属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值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值就越困难。”<sup>④</sup>马克思用简单的数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假定原来必要劳动时间占工作日的 $1/2$ ，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则必要劳动缩减到 $1/4$ ，剩余劳动新增 $1/4$ ，共占 $3/4$ 。而当必要工作日为 $1/4$ 时，生产力提高一倍，则必要劳动缩减到 $1/8$ ，剩余劳动新增 $1/8$ ，共占 $7/8$ 。假定必要工作日已缩减为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99—30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6页。

④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5页。

1/16, 生产力再提高一倍, 则必要劳动进一步缩减到1/32, 剩余劳动新增1/32, 共占31/32。同是提高生产力一倍, 在第一场合, 剩余价值增加了1/4即8/32, 在第二场合, 剩余价值只增加1/8即4/32; 在第三场合, 剩余价值仅增加1/32。<sup>①</sup> 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 因而生产力越发展, 用提高剩余价值率来补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变动影响的可能性也变得越小。“现有的剥削率越是高, 利润率对剥削率的进一步变化就越是不敏感。”<sup>②</sup> 因此, 从长期看,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终究不能抵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 改变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第三, 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价值的下降比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慢得多, 从而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比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要慢得多。前面的数例还是假定, 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实际上, “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的”。<sup>③</sup> 因为, “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也会在一切不(直接或者间接)生产必需品的部门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 而不引起劳动价值的任何变化”。<sup>④</sup> 其次, “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是, 它发展工业比农业快。……但是, 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sup>⑤</sup> 此外, “还会有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 例如, 工人本身虽不能阻止工资下降(就价值来说), 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绝对降到最低限度, 反而会努力争取在量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2—303页。

② E. O. 顿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31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331页。

④ 同上,第331—332页。

⑤ 同上,第332页。

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包含两个论点。一个论点是：农产品作为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慢于工业，所以劳动力价值的下降慢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第二个论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必然要努力争取提高实际工资，分享增长的财富，从而使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变得缓慢。这两个论点从19世纪中后期的情况来看，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那末20世纪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这需要作具体分析。第一个论点就其本身来说，似乎已经失去效力。20世纪以来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大提高，已经超过工业，而且农产品在工人必需消费品中所占比重也大大下降，已不构成工资货物的主要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劳务在工人消费中的重要性加强了。以美国工人的个人消费构成变化为例，仅在1929年到1969年期间，农产品比重已从41.9%下降到25.3%，工业品从22.6%上升到38.9%，劳务产品则从32.5%上升到35.8%。<sup>②</sup>而同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提高376%，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80%，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提高44%。<sup>③</sup>农产品作为工人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慢于工业等事实的确已经变化。但是，马克思说明的问题却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劳务产品在工人必需消费品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却大大慢于工农业生产部门。由于这个原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仍然要比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较为缓慢。

至于第二个论点，其正确性已为20世纪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345页。

② 石德宏：“资本主义劳动力价值变动的长期趋势”（未发表的硕士论文，1988年8月），第59—60页。

③ 同上。

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从19世纪中期开始显示出它的力量。19世纪下半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开始缓慢增长。20世纪以来，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大大加速了。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提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抵销因素，使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变得更加缓慢。

总结以上分析可知，某些西方学者断言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学说缺乏理论分析，指责他在处理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上犯了错误，是没有根据的。

### 3. 围绕“技术选择”问题的争论

在反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西方学者中，有人直接从资本家的技术选择出发进行证明，作为立论的基础。据帕里吉斯介绍，早在本世纪初到第二次大战前，已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类论点，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鲍特凯维奇、莫斯科斯卡等。但在战后影响较大并成为70年代以来讨论焦点的，当推日本经济学者置盐信雄（N. Okishio）于1961年在《神户大学经济评论（英文版）》上发表的文章：“技术变化和利润率”。

置盐的论点主要采用数学证明，被称为“置盐原理”（Okishio's Theorem）。他的论点可用文字简述如下：在完全竞争的经济条件下，单个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不是看它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看它能否降低生产成本，“成本标准”不同于“生产率标准”，只有降低成本的技术革新才是可行的，才能被资本家采用。按照“成本标准”，一个部门的个别资本家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单位产品的成本价格必然下降，这时产品的生产价格未变，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利润必定增加，单位产品中利润与成本之比率即利润率必然提高，因此，企业首先采用新技术后的过渡利润率（Transitional Rate of Profit）必定相应上升，高于一般利润率。但是，一当这种新技术在该部门得到普遍

应用而成为正常生产条件后，该部门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将下降；随着竞争的展开和资本的转移，整个经济中将形成新的平均利润率。如果采用新技术的部门是生产工资品和有关生产资料的“基本产业部门”（Basic Industries），那末，在通行的工人实际工资率不变的条件下，基本产业部门产品价格下降将导致工资价值相应降低，新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必然提高；如果采用新技术的生产部门是生产奢侈品的“非基本产业部门”（Non—Basic Industries），一般利润率则不受任何影响。结论是：“不管资本有机构成可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只要新技术的采用满足成本标准而同时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一般利润率则无例外地必定上升。”<sup>①</sup>

置盐原理被大多数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经济学家所推崇。但也有许多人认为，置盐的论证受到某些前提条件的限制。首先，它只适用于没有固定资本的经济。在置盐的分析中，计算利润率的基础是转移到产品中的资本即耗费资本，只有在没有固定资本的假定条件下，耗费资本才和预付资本一致。其次，它只适用于工人实际工资率不变的前提条件。失去这个前提，论证就可能不成立。置盐自己也明确地说：“基本产业部门资本家采用任何技术革新必然提高一般利润率，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的上升”。<sup>②</sup>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看，这两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不能设想有一个没有固定资本的经济，假定工人实际工资长期不变也完全不现实。前提不符合实际，论证本身的严密性便失去了意义。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怀疑置盐论点的有效性或持保留态度，但

---

① 置盐信雄：“技术变化和利润率”，《神户大学经济评论》（英文版）1961年第7期，第92页。

② 同上。

对它直接发起争论的是赛克。赛克认为置盐原理并未驳倒马克思的论点，勿宁说，“置盐是正确的，但马克思也是正确的”。<sup>①</sup>赛克的批评包含两个关键命题。第一，区别利润率和“成本利润边际”（Profit—Margin on Costs），前者是利润与预付资本之比，表现为利润流量与资本存量之比率；后者是利润与耗费资本之比，表现为利润流量与资本流量之比率。赛克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代价，是使用更多的机器和更加“迂回”的生产方法，这意味着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和单位产品的预付资本存量；单位产品成本价格的下降是通过单位产品投资成本的增长而取得的。这样，假定实际工资不变，降低成本的技术革新虽然会提高平均的利润边际，但同时也会降低平均利润率，这二重结果不过是同一矛盾过程的不同方面。第二，区别选择新技术的“竞争标准”和“最佳标准”（Optimality Criterion），前者指采用新技术以降低成本在竞争中取胜，后者指采用新技术以提高过渡利润率。赛克指出：置盐否定利润率下降的结论，似乎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证明，即：资本家既然追求较高的利润率，他们当然只会采用那些能提高过渡利润率的新技术，在这个前提下，新技术的采用最终必然导致和既定实际工资相应的更高的平均利润率。这就涉及到选择技术的两种不同标准：以降低成本为主要考虑的竞争标准，和以提高过渡利润率为主要考虑的最佳标准。对比这两种标准，赛克的想法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虽然资本家偏爱更高的利润率，但不能由此推导出资本家的技术选择必然由这种抽象的偏爱所支配。因为在同类企业的竞争中，一个企业首先采用某种新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就可以提高成本利润边际，尽管利润率可能稍低。例如，假定一种不使用固定资本的手工生产方法A，单位产品价格为120元，单位成本价格为

<sup>①</sup> A·赛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评多布的危机理论”，《剑桥经济学杂志》1979年第2期，第242页。



100元，成本利润边际和利润率均为20%。如果有一种机械化的技术B能把单位成本价格降低到50元，假定产品价格不变，成本利润边际上升到140%，但由于大量固定资本投资，利润率可能下降到18%。一旦某个企业首先采用这种较低廉的生产方法，它就有可能降低产品价格以扩大销售（比如按99元出售商品），同时仍可从每件商品上赚得49元利润，成本利润边际仍高达98%。这时使用旧生产方法的企业仍按原价格出卖商品必将丧失市场，如降价到90元又会亏本，因而不得不被迫转而采用新技术，否则将在竞争中被淘汰。总之，资本家在选择技术时尽管“愿意”采用利润率标准，但在竞争战中却不得不以降低成本为主要考虑，因而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新技术的采用在提高成本利润边际的同时，必然降低企业的过渡利润率和社会的平均利润率。<sup>①</sup>

赛克的分析受到帕里吉斯的反驳。帕里吉斯认为赛克对置盐的批评是没有完成的，因为他没有讨论降低利润率的革新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而在论述进行革新的工业部门的过渡利润率下降后便停止了；但进行革新的工业部门的过渡利润率下降，只有当该部门产品价格下降并不提高其他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情况下，才意味着一般利润率的降低。<sup>②</sup>帕里吉斯还认为，赛克也没有充分证明，在竞争条件下，资本家为什么要采用一种资本集约化的技术，使自己的利润率低于一般利润率。如果资本家有可支配的额外资本，他不如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扩大生产，或者投资到其它部门获得一般利润率，或者至少可以购置有保证的金融资产而得到均衡利息率。如果资本家靠借入资本进行投资，那末，避免过渡利润率低于利息率就不只是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

① A·赛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评多布的危机理论”，《剑桥经济学杂志》1978年第2期，第242—246页。

② P·V·帕里吉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年春季号，第14页注39。

的问题；由于均衡利息率低于一般利润率，这就为资本家留下较小的余地，使他在采用能提高利润边际但却会降低利润率的技术革新时，不至于使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蒙受损失。“因此，在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所进行的技术革新，必定带来高于起始利润率的过渡利润率。”<sup>①</sup>

对于这个争论，我们有以下初步看法。

首先，从个别资本家的技术选择来看，他们采用一种新技术的直接目的当然不在于节省社会劳动，而在于追逐更大利润，因此，这种新技术和生产方法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率。那末，资本家追求的较高利润率是按预付资本计算的投资利润率，还是按耗费资本计算的成本利润率，即赛克所说的成本利润边际？一般说来，当然应该是投资利润率。在这点上，帕里吉斯似乎讲得更有道理。赛克强调竞争战会迫使个别资本家使用带来较低投资利润率的新技术，但这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即供给严重超过需求的市场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很难设想，率先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会自愿地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而不充分利用按现有价格出卖商品的有利时机，获取大量额外利润。即使新技术使单位产品成本从100降低到50，如果商品按120的价格仍然畅销，资本家决不会自动降低到99出售。只有当较多的资本家相继采用这种新技术，产量的急剧增长严重超过需求后，部门内部竞争的激化才会迫使商品价格下降。只有这时，其他企业才会被迫选择这种新技术，赛克所说的竞争标准才起作用。

其次，赛克强调资本利润率和成本利润边际的区别是正确的，直接触及到置盐信雄的“纯流动资本模式”的缺陷。但他认为如舍象了固定资本，成本利润边际和利润率将一致，则显然不

<sup>①</sup> P·V·帕里吉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年春季号，第11页。

对。成本利润边际是利润与成本即耗费资本之比，利润率是利润与预付资本之比，在纯流动资本条件下，由于流动资本年周转次数通常大于一，预付资本小于耗费资本，两个比率也不会相同。在引入固定资本以后，两个比率当然差别更大。但赛克断言，开始采用新技术的个别资本家在提高成本利润边际的同时会使利润率降低，也未必是必然的。进行技术革新涉及固定资本投资，但在产品价格没有变动以前，由于成本急剧下降和额外利润猛增，投资利润率仍然可能上升。直到新技术在部门内普及，资本构成普遍提高，产品价格下降，额外利润消失，利润率才会降下来并低于原来的一般利润率水平。这是一个通过部门内部竞争而实现的社会过程，是违背开始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的初衷的。这里应区别两种过渡利润率，一种是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个别资本的过渡利润率，它应高于一般利润率水平。另一种是新技术普及后一个部门的资本的过渡利润率，它应低于一般利润率水平。赛克的分析没有分清这两种情况。

第三，一个部门普遍采用新技术后的价格变化和利润率变化，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重新形成的社会一般利润率的影响究竟如何？置盐认为工资品（及与之有关的生产资料）部门普及新技术后，产品价格下降使所有部门的利润率提高，新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必然上升。赛克则认为进行技术革新的部门的过渡利润率会下降，从而一般利润率也会下降。帕里吉斯反驳赛克说，即使革新的部门的过渡利润率下降，一般利润率也不一定必然下降，因为其他部门的利润率可能提高。如果我们肯定，采用新技术的个别资本的过渡利润率提高，而普及新技术的部门资本的过渡利润率降低，同时又假定，工资品价格下降因实际工资率不变而提高剩余价值率，那末，争论的焦点便又归结到一个老命题：剩余价值率提高能否抵销由资本构成提高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前面的分析至少已从一般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如

果肯定技术革新部门的过渡利润率会下降，而工资品价格下降和剩余价值率提高并不能加以补偿，那末，区分基本产业部门和非基本产业部门便不再有意义。非基本产业部门普及某种新技术，除了过渡利润率降低外，甚至不会有因价格下降而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效应，新的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更加成为必然的了。

第四，置盐“原理”假定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不变，表明他的方法是相对静态的；但他的论证包含着从个别企业选择新技术到新技术在部门中普及，从企业和部门的过渡利润率变动到社会新的一般利润率的再形成，却又是一个动态过程。这是他的分析方法中的矛盾。为了和动态过程相适应，假定实际工资率增长或许更为合理。不过，是否改变这一假定对于问题的论证并不重要。如果工资品的价格下降和实际工资率的提高程度相一致，则剩余价值率不变；如果工资品的价值下降较实际工资率的增长程度为大，则剩余价值率提高。后一种情况可能更符合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因此，假定实际工资率不变或增长，只涉及到剩余价值率提高程度的差别。实际工资率趋于增长的假定，不过意味着剥削率的提高更为缓慢，抵销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可能性更小而已。

## 第二节 论证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不同观点和方法

### 1. 对一般利润率下降原因的几种主要解释

我们扼要评述了围绕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若干主要争论，可以看出，仍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但是在这些经济学家中，对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他们的几种主要观点。

#### (1) 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主要代表有曼德尔、赛克、耶菲等人。他们大多坚持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认为《资本论》的理论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仍然基本适用。在他们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机械化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使资本有机构成继续趋于提高，这种提高作为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仍然在起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坚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的经济学者中，有人提出了新的论证方法，其中之一便是所谓“最大限度利润率”下降的推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先提出这种证明的不是别人，而是以否定利润率必然下降的“置盐原理”而著名的置盐信雄；而进一步宣扬这种论证的经济学家，又恰恰是对“置盐原理”发起挑战的赛克。所谓“最大限度利润率”下降的论证是这样的：资本有机构成可以看作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与推动生产资料的活劳动之比，即C/N（C=不变资本价值，代表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量，N=工人在生产中所支出的劳动量）；这个比例的倒数，N/C，就是工人的全部活劳动与资本价值之比，它相当于可变资本等于零时的资本利润率，即最大限度利润率。资本有机构成C/N趋于提高，意味着最大限度利润率N/C趋于下降；而随着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下降，实际利润率最终必然下降。设r代表利润率，v代表C/N，这个命题可简明表示如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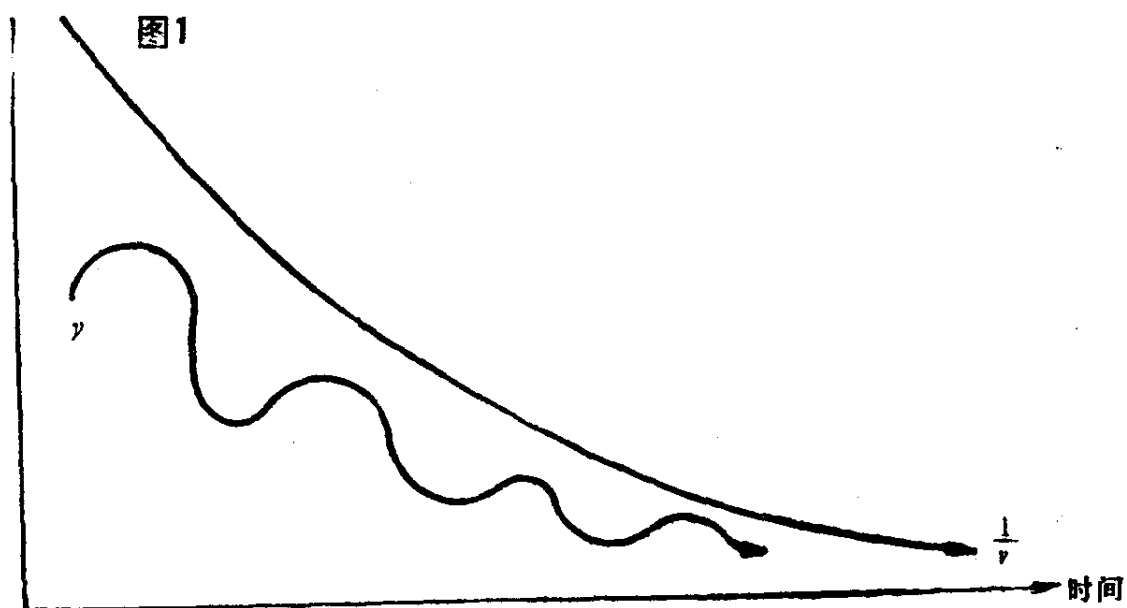
$$r = \frac{M}{C+V} < \frac{M+V}{C} = \frac{N}{C} = \frac{1}{v}$$

变动趋势如第286页图1。②

用所谓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下降来论证实际利润率的下降，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突破。我们早已指出，把资本有机构成归结

① 置盐信雄：“对马克思的两个原理的正式证明”，《神户大学经济评论》（英文版）1972年第18期，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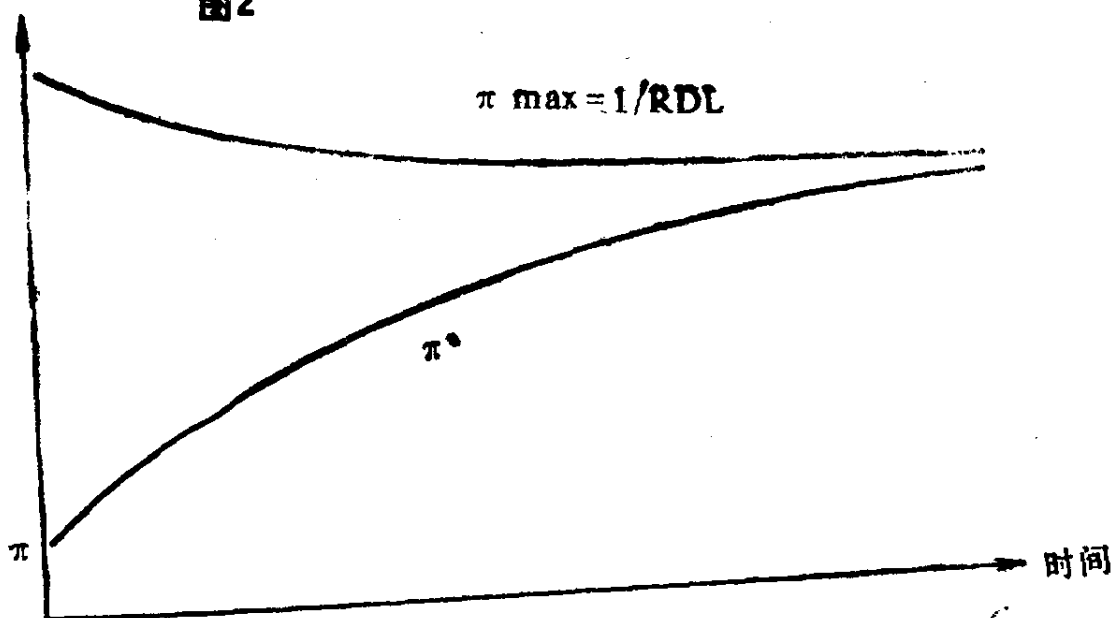
② 同上，第4页。



为生产中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率，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即使假定最大限度利润率概念可以成立，也不能从它的下降趋势中推导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必然性。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或伴随着实际利润率的下降。前者可以一直下降，同时后者却可以不断上升，如下图所显示。①

1/RDL

图2



① P·V·帕里吉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年春季号，第5—6页，图中 $\pi_{max}$ 代表最大限度利润率， $\pi^*$ 代表均衡利润率，RDL代表按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比所计算的资本有机构成。

假定初期阶段C与N之比为20/10，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为 $9V:1m$ ，则最大限度利润率为 $10/20=50\%$ ，实际利润率为 $1/20=5\%$ ；经过长期发展，如果C与N之比提高为100/10，V与m之比变化为 $3V:7m$ ，那末，最大限度利润率将下降为10%，实际利润率反而上升到7%。抽象地说，似乎终究有一天，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下降会迫使实际利润率下降，否则，前者下降而后者上升，两种利润率将靠近和会聚，这意味着，或者实际工资趋于零，或者工资品的价值趋于零，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若从实际情况看，早期由于资本构成很低，可变资本在活劳动中所占比重极大，最大限度利润率与实际均衡利润率之间存在着宽阔的变动区域，而利润率的长期变动又是相当缓慢的。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说，最大限度利润率的下降导致实际利润率下降，是在未来某一时刻最终必然发生的事，但“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实际利润率能够上升、下降或波动。单以这个论点为基础，不能说明实际利润率的变动方向。这个论点本身也没有为实际利润率的变动或工资的变动提供任何解释。”<sup>①</sup>

因此，关于最大限度利润率下降的论证，并不是很成功的。

## (2) 认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是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从垄断阶段实现问题的尖锐化引伸出非生产费用的增长及其对剩余价值的侵蚀，可以称之为“非生产费用侵蚀论”，主要代表是吉尔曼。吉尔曼在他的专著《利润率下降》中，首先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有关统计资料，按照马克思的公式，对涉及利润率下降理论的三个主要变量进行了检验。经验验证发现，在1880至1919年期间，资本价值构成迅速提高，剩余价值率趋于增长，利润率趋于下降，三个变量的动态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论断；但是在1919至1952年期间，某些指标的动态变得与马克思的分析

<sup>①</sup> D·J·哈里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剑桥经济学杂志》1983年第7期，第314页。

不一致：资本价值构成趋于下降，剩余价值率缓慢提高，利润率转向上升。针对这个事实，吉尔曼评论了可能采取的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已不再起作用；另一种则是提出问题：按照传统的理解，公式的各个项目是否能够充分反映本世纪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情况？吉尔曼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努力探讨变化的原因，寻求新的解释。他首先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由于包括应用科学管理在内的生产技术革命，极大地节约了不变资本的耗费，阻碍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同时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发展使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继续提高，结果改变了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从下降转向上升。

但是，吉尔曼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研究了影响传统公式有关变量内含的新的变化。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公式，剩余价值等于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减去工资后的余额，构成资本家的全部利润。但在实际经营中，这个余额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和利息），而且有产品售卖的全部成本（如销售和广告费用，一般办公费用和职员薪金等）和各种税收（如联邦货物税、州和地方的不动产税和营业税，以及所得税等）。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马克思的公式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各种销售和管理成本以及税收都很少，可以忽略不计，资本家既是企业主又是管理者和销售人。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日趋复杂，马克思公式中的个人资本家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资本家或公司。这时，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再全部归他个人所有，除支付利息和地租外，还必须和大批管理人员分享。不仅如此，随着日益加强的工业集中和垄断，售卖、广告、推销和各种管理费用不断增长，这些费用占销售价格的比重也日益提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费用属于非生产支出，只能由剩余价值来补偿。就整个经济来说，不断增长的非生产支出会蚕食剩余价



值,使资本家所实现的净剩余价值率下降,从而使净利润率下降。

根据上述分析,吉尔曼认为,为了揭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应对传统的利润率公式( $S/C$ )加以修改。设 $U$ 代表非生产职工的薪金和工资,以及所有销售、广告和管理费用等非生产开支,传统的 $s$ 可以看作是“已实现的总剩余价值”, $S-U$ 则是“已实现的净剩余价值”, $U$ 成为剩余价值实现的费用。由于当今剩余价值的实现非常依赖于“政治气候”,税收和国债等政府费用也变成了 $U$ 的一部分。根据总剩余价值和净剩余价值的这一区分,也应该区分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按存量基数计算的净利润率就等于 $S-U/C$ 。这样,就可以把“垄断时期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重新表示为 $S-U/C$ 的下降趋势”。“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于 $U$ 在剩余价值实现中是一个可以相对忽略的因素,规律的基础在于 $C/V$ 比 $S/V$ 提高得更快。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新技术不断采用,非生产开支日益增长,由于 $C/V$ 相对稳定,规律的基础则在于 $U/V$ 较之 $S/V$ 的更快的增长”。<sup>①</sup>

吉尔曼的论点的重要含义,是把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纳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他明确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已主要成为一个净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理解这个命题的困难在于,在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效法马克思,主要从剩余价值生产方面来论述利润率下降问题,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多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但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个本来是辩证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看作是毫无联系的。他指出,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然后要求有‘第二个行为’来完成这一过程,这就是卖掉所生产的‘全部商品’。这在垄断时期同它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是真实的。”

“如果有证据表明,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变得越来越紧迫,以致使企业内部成本日益增长和政府费用不断

<sup>①</sup> 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89—90页。

扩大，那末我们就不能忽视它，尽管我们仍然认为剩余价值只有首先生产出来才能被实现。”<sup>①</sup>

吉尔曼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受到保罗·马蒂克的严厉批评。在马蒂克看来，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实际的资本形成过程没有直接联系，价值模式和现实生活的区别必须保持分明。资本扩张的抽象的价值模式只是表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在资本生产的两重性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了一种限制因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扩大和价值生产的冲突。马蒂克对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张的价值模式应用于资本形成的实际分析不以为然。他认为利润率下降问题只能从理论方面进行讨论，而吉尔曼却企图从理论和历史统计两个方面来研究它。“吉尔曼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重新阐述不幸是一个错误的说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甚至假定不存在实现问题时，利润率也会下降。这是一个生产扩张和价值扩张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实现问题。剩余价值实现是一个具体的市场条件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分析问题。但是，从开始直至全书，吉尔曼从抽象的价值分析滑向具体的生产和分配关系，或者反过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不能允许的。他没有注意到，他对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分同利润率趋向下降没有关系，因为后者涉及的是‘总资本’，假定对资本发展的所有阶段都有效，而不考虑垄断和竞争问题。”<sup>②</sup>马蒂克还批评吉尔曼把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停止下降归结为反趋势的作用变化，并断言，谈论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对这种下降的反作用，意味着同时按照价值分析和具体实际谈论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所列举的“抵销作用”同抽象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没有直接联

---

① 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86—87页。

② P·马蒂克：“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1期，第34页。

系，它们只是表明了《资本论》第三卷作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所具有的杂乱无章的特点。<sup>①</sup>

马蒂克的批评涉及到价值理论和积累理论的关系以及积累理论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分析的意义。的确，资本积累理论以价值分析为基础，是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价值理论和积累理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性。但是，认为以抽象的价值分析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理论与实际的资本运动无关，不能应用于资本形成的实际分析，未免过于极端。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各种趋势，如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利润率趋向下降等等，都是实际资本运动所产生的经济现象的概括。积累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sup>②</sup>，但是决不能说，积累理论与现实毫无联系，积累规律所揭示的各种趋势不能在实际资本运动中得到表现，不能通过历史统计资料加以检验。把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这样截然分开的观点是很奇特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马蒂克认为分析利润率下降趋势根本不能涉及价值实现问题，这个论点也值得研究。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研究，已经越过了剩余价值一般的抽象层次，体现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利润形态本身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并由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一系列因素而表现为总资本的产物。不能笼统地说，利润率变动只是一个抽象的价值分析和剩余价值生产问题，而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无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本身时，确实舍象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没有涉及实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与实现问题毫无联系。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体现在利润率的周期波动和周期下降过程中。在研究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的第十五章，由于

<sup>①</sup> P·马蒂：“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科学与社会》1959年第1期，35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涉及到利润率变动所体现的各种矛盾的周期爆发和利润率下降在危机中的周期表现，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对抗便成了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把剩余价值实现仅仅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市场条件问题是片面的，它首先是从抽象的价值分析中引伸出来的；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和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统一和矛盾，都是抽象的价值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本质内容，同资本和利润率的一般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总之，认为利润率下降问题同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毫无联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吉尔曼在研究垄断阶段的利润率变动趋势时把实现问题作为一个长期因素而不是周期因素纳入分析，也无可非议。

吉尔曼的研究以他的经验分析为基础，他的经验分析又局限于1880年至1952年美国制造业的统计资料，他是从1919至1952年的统计分析不能证明马克思的推论而提出问题的。正是在这里，我们有理由发生疑问：仅仅用美国制造业在1919到1952年时期的统计资料能不能否定马克思所得出的一般推论？美国制造业能否代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经济发展？1919至1952年这个时期有没有它的特殊历史条件？如果把统计数列延长到70年代或80年代是否会显示出不同的动态？当然，要求吉尔曼在50年代预见到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是不公正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吉尔曼难免受到历史背景的限制，他根据当时的统计分析所得出的某些论断，可能并不代表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前面关于资本有机构成长期变动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利润率长期变动的经验证明，将在下一节进行。

吉尔曼提出垄断阶段实现问题尖锐化和实现费用的巨大增长，是有重大意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曾论述过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非生产性就业的增长问题。吉尔曼的贡献在于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因素纳入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分析。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能否把所有销售费用（包括销售人员的薪

金)、所有管理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薪金)、所有资本家的纳税都列为非生产开支,看作仅仅是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费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销售活动中包含着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运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等,这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与之相关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应看作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管理活动也具有两重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工作和管理人员,认为他们统统属于非生产劳动者也是不正确的。资本家交纳的各种税收也不都是用于维持国家机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作为转移支付流到劳动人民手里,实际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开支部分。因此,吉尔曼把垄断阶段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资本税收的增长全部归入非生产支出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的扣除,显然是不恰当的。如何正确估算非生产开支的增长及其对剩余价值的侵蚀程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3) 认为工资成本上涨侵蚀利润是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以“利润挤压论”而闻名。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和鲍勃·萨特克利夫(Bob Sutcliffe)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被称为“格林—萨特克利夫命题”。格林等以英国为典型研究了第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变化,特别是资本利润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后果。他们认为:国民收入中归于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份额几乎完全由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相对实力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繁荣时期较高的就业率和设备开工率,意味着较高的利润率;那时在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时也有剩余劳动力,或者即使工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增长,也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补偿。但是战后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经常存在着熟练劳动力不足,工人变得更加有组织,工会更加强大,工会成员也更富于战斗性,他们推动着工资的不断上涨。而另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巨型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国际竞争

空前激烈，这时一个国家的商品价格如果提高过大，国内市场就会被进口商品所占据，国外的销售也会减少，这将严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因而商品价格往往不能上涨到足以支持和提高利润的程度。简言之，战后时期英国和大多数国家实现充分就业所意味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利润挤压。“基本论点在于：组织强大的工会能够促使货币工资上升，而同时不断发展的国际竞争却使得企业难以从提高价格上得到全部补偿，其结果便是利润率趋向下降。流行的观点没有看到，高工资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物价，而且物价膨胀带来的关键问题也不是中央银行的困难而是销售额的损失。没有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工资增长完全能够和稳定的物价同时并存，但利润必然被挤压。”<sup>①</sup>

从理论上说，利润挤压论的核心是用工资上涨说明利润减少，用工资份额的上升说明利润份额的降低，实际上就是用剩余价值率的降低说明利润率的下降。他们认为利润是扣除工资后的新价值余额，和工资的变动成反比；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完全决定于两个阶级在分配领域中的力量对比。正是这些关于利润和工资关系的基本观点，使他们得到“新李嘉图主义”的称号。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把利润率变动仅仅归因于工资率变动是过于简单化了。利润率的决定和变动不只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复杂的经济过程的综合结果。影响利润率的因素至少包括：第一，围绕实际工资的斗争；第二，工资货物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品的价格，以上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第三，围绕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的斗争，以上三个因素决定剩余价值率；第四，资本的有机构成，以上四个因素决定利润率。<sup>②</sup>无论如何，利润挤压论者在利润率决定问题上确实过于强调了分配问题而忽视了

---

① E·J·内尔：“美国的利润侵蚀”，A·格林、B·萨特克利夫：《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绪言（1972年英文版），第4—5页。

② E·O·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50—151页。

生产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用工资变动说明利润率变化也不仅仅是李嘉图理论的特点。赛克指出，利润挤压论在某种意义上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惯于宣扬利润下降是工人在国民产品中“份额”提高的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sup>①</sup> 在他评论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时说，尽管“他们承认利润率有随着生产资本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一事实，但是，这一点他们是直截了当用下面这样一种情况来解释的：劳动份额即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价值增长了”。<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的利润挤压论者并不是没有经验材料作依据，他们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的。但是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他们的经验观察存在着表面化和简单化的错误。他们按公司净收入计算利润，按雇员净收入计算工资，把这种直接观察到的利润和工资等同于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把按此计算的利润/工资比率等同于剩余价值率，并由此认为，利润的减少是剥削率下降的表现，而剥削率下降又只能是工资过分增长的结果。这样，利润挤压论者就把现象范畴和本质范畴混同了。一种批评从利润方面提出问题，认为能够代表剩余价值量的不是公司的净利润而是公司的总利润。企业总销售利润等于总销售额减去生产成本，企业净利润（净收入）等于总利润再减去销售开支和间接税。只有企业总销售利润才大体代表剩余产品的货币等价物，只有总利润对工资之比才大体相当于剩余价值率。由于销售费用和间接税只能从剩余价值补偿，并且有日益增长的趋势，按净利润计算的利润/工资比率不但大大低于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它的变动相对于实际剥削率变动也有一种日益压低的倾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7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74页。

因此，利润挤压论者所计算的利润/工资比率，既不能代表实际剥削率的变动趋势，也不能对实际利润率的变动提供正确的解释。①另一种批评则从工资方面提出问题，认为能够代表可变资本量的不是全部雇员的工资而是生产工人的工资。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所有劳动力都被生产性地雇用，非生产劳动者不但不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他们的工资也只能用生产劳动者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补偿，并通过扣除剩余价值而降低资本家的实际利润率。利润挤压论者没有分清两种情况：利润可能由于工资上升而被挤压，也可能由于非生产劳动的增长而被挤压。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变动显然包含着工资变动和非生产劳动者数量变动两重过程。既然非生产劳动在垄断阶段存在着增长的趋势，那末，即使国民收入中出现劳动份额上升和利润份额下降，也许和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有效斗争并没有什么关系。②以上两种批评虽然着眼点不同，实际理论含义是一样的：利润挤压论者所说的利润/工资比率下降，可能是由于非生产费用对剩余价值的扣除，并不能代表或解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实际动态。

利润挤压论的分析方法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希梅尔威特 (S. Himmelweit) 的观点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位经济学家宣称：新李嘉图主义的生产价格模式表明，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反向联系：工资上升则利润率必定下降，反之亦然。根据这一命题他认为，只要技术条件不变，工资率提高是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是，工资率上升会引导各个资本家采用新技术以求得补偿，从而在总体上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水平。因此，生产率提高实际上是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后者又是由工资率上升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

---

① A·赛克：“危机理论史导论”，《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第238页—239页。

② E·O·顿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9年英文版），第151—153页。



高并不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一种抵销因素，是对工资上升作出的反应，并使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变得缓慢。<sup>①</sup>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分析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同，结论会如何大相径庭。希梅尔威特把技术状况不变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把作为一种分配现象的工资变动作为首要的推动力，而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构成提高等等统统被看成是工资上升所派生的现象。对工资变动的原因和规律都完全没有做科学的说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与此根本不同。在他看来，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资本积累的根本推动力，技术变革、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构成提高都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本质因素，这是分析的出发点；而工资和利润率的变动，则是由积累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所制约的。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工资率的变动不过是积累过程的派生物，由积累的变动通过产业后备军的伸缩来进行调节。<sup>②</sup>对比之下，两种分析方法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利润挤压论有一定的理论渊源。这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多布194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就积累理论来说，这部著作在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引入危机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上传播了某些错误观点。多布认为，马克思虽然确信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而下降，却没有对下降趋势必然压倒反趋势提供一种证明，这可能是经过考虑后的有意安排，以避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作技术性的机械式的解释。马克思把趋势和反趋势看作是互相冲突的因素，而制度的一般运动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形成的。为了说明趋势有可能压倒反趋势的条件，多布设想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存在，这时

<sup>①</sup> 转引自B·法因、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68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681页。

的资本积累可依赖过剩劳动力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扩大，不会带来工资上涨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利润率也不会下降，即使技术变化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于不变资本低廉化和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的抵销作用，利润率的下降也不是必然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市场形势，或者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较小，或者工人阶级有效地组织起来抵抗降低工资的压力并争取提高工资，这时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和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劳动力价格即工资将趋于上涨，新资本必然采用新技术而越来越多地投向不变资本，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又由于劳动市场的短缺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构成的变化才会和利润率的下降相联系。① 多布的这种论述，实际上把积累过程中因特定劳动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上涨，看作是利润率下降的最终原因，工资上涨一方面导致资本家采用节约劳动的新技术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另一方面限制资本家使之难以充分提高剥削率来求得补偿，结果只能是利润率的下降。赛克在评论多布的这种观点时指出，多布的分析包含着两个惊人的颠倒的论点：第一，由于多布认为前一种情况相当于竞争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后一种情况相当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事实上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并不适用马克思得出这个规律的时期，而只适用于现代时期。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颠倒！第二，多布断言只有当新技术的采用不能充分提高剥削率以补偿实际工资增长和有机构成提高时，有机构成提高才会和利润率的下降相联系，而这两者的变动又都是由实际工资的增长所引起的。这样，多布实际上就把有机构成提高看成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这是一个甚至更加惊人的颠倒！② 从多布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希梅尔威特分析方法的影子，看到

① M·H·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45年英文版），第108—114页。

② A·赛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评多布的危机理论”，《剑桥经济学杂志》，1978年第2期，第236页。

利润挤压论的某种现代理论渊源。

## 2. 方法论上的若干分歧

西方经济学家围绕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争论，涉及到分析这个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下面就来讨论他们提出的一些主要的方法论主张。

一种主张以耶菲为代表，认为分析应限于资本的生产领域，出发点应是“资本一般”和资本概念本身，而不应考虑资本之间的关系和竞争。耶菲依据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的若干论述强调，资本积累的规律产生于资本概念本身，不弄清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别是关于“资本一般”的概念，分析积累过程是不可能的。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他认为用竞争的强制和降低成本的需要来说明是不够的，必须从资本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来追寻其根源。<sup>①</sup>他在这方面的具体论证虽然并不成功（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有所阐述），但他提出的方法论本身还值得进一步分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确实突出了“资本一般”这个范畴，认为要探讨资本的内在规律，必须从“资本一般”出发，舍象竞争。他指出竞争“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sup>②</sup>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离开了资本的相互关系和竞争，就不会有这些规律的实际存在和实际作用。例如，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规律，

① D·S·耶菲：“马克思的危机、资本和国家理论”，《经济与社会》1973年第2期，第188—190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页。

就只有在竞争中才能确立。马克思还指出：“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质，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sup>①</sup> 这些看法，使马克思逐渐扩大了他所提出的“资本一般”的考察范围，把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竞争也包括在内。这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看得很清楚。这部手稿有一个小标题《第三章，资本一般》，其中的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包含有对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等问题的详细考察；而早些时候，这些内容被认为是属于竞争篇的。

耶菲所提出的方法论主张，在突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强调从资本一般和资本的本质出发来分析积累规律等方面，是正确的。但他在排除考察资本竞争的问题上过于绝对化了。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本质上包含着两重根本关系：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及由此所决定的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把竞争排除于资本概念的本质之外是不正确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许多重要内容，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的平均化和变动趋势等问题，只有从剥削关系和竞争关系这两重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出发，才能得到深刻的阐明。

另一种方法论主张以迈克尔·利伯维茨 (Michael A. Lebowitz) 为代表，强调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他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按照生产和流通两个因素的统一来确立资本概念，两个因素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资本论》的结论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路，第一卷考察资本的生产，第二卷考察资本

<sup>①</sup>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97—398页。

的流通，第三卷在逻辑上则应归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然而，“关于利润率下降的全部讨论一直是在仿佛没有第二卷的情况下进行的。论证中使用的所有概念（例如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等等）都属于第一卷。似乎第二卷从来没有写过。好象经济学家能够做出资本做不到的事情——无视流通过程”。<sup>①</sup>利伯维茨强调，研究利润率变化必须考虑到第二卷所提出的论点，引入周转期间，年剩余价值率，流通费用等概念。而流通时间这个资本的障碍对利润率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相对减少必要劳动和工人数量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努力，引起资本实现的困难，由此带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差距的扩大，反映为资本流通时间的延长。流通时间延长会产生非自愿的存货投资和减少现金流动，增加束缚在流通中的资本并降低剩余价值的周转，这一切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然而利伯维茨并未到此为止。在他看来由流通时间延长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显然是一种周期现象而不是一种长期趋势，这种下降在危机中周期地得到表现并得到克服，对资本来说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限制。那末是否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呢？利伯维茨认为，资本为克服利润率下降这种障碍所作的努力，必然创造使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条件。他列举了资本家的三种努力。一是改善和革新生产过程，相应的手段包括生产集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提高剩余价值率等等，而这些克服障碍的方法只会使利润率下降不断重新出现。二是改善流通过程，通过增加销售人员和销售开支来缩短流通时间和扩大市场份额；但当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时，个别资本首先改善流通过程所得到的利益会消失，剩下的只是销售费用的增长和生产资本的相对减少，结果也只能是利润率的下降。三是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新的需求以扩

<sup>①</sup> M·A·利伯维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一种辩证观点”，《加拿大经济学杂志》1976年9月号，第245—249页。

大销售，但由于工人群众是主要消费者，创造新需求的努力最终只会提高工人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率，从而降低利润率。总之，正是资本为克服利润率周期下降这种障碍所进行的努力，产生了资本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sup>①</sup>

利伯维茨强调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同时也就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纳入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吉尔曼的研究方法有共同之处。不过，他们在论证的具体途径方面却不相同。吉尔曼强调实现的困难引起非生产费用的增长，利伯维茨则强调实现的困难引起资本流通时间的延长。吉尔曼把非生产费用不断扩大看作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出现的新的结构性因素，利伯维茨则认为资本流通时间延长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出现的现象，而把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归结为资本为克服这个障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资本运动规律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这是无疑义的。马克思指出：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密切联系而互相影响的四个方面——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但生产是基础，它决定着再生产过程的其他方面。“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②</sup>资本主义生产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质上就包含着交换过程和流通过程。资本作为一种价值的运动，既离不开生产也离不开流通。《资本论》对资本运动规律的考察，正是贯彻了这个基本思想；只是不要忽略，生产和流通并非处于同等地位，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仍是全书的基础。资本积累规律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确立的。利润和利润率范畴也是这样，它们首先在本质

---

① M·A·利伯维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一种辩证观点”，《加拿大经济学杂志》1976年9月号，第245—249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

形态上，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被考察；然后加进了流通过程，作为年剩余价值率被考察；最后在总过程的基础上作为利润和利润率被考察。马克思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既定时，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利润率的差别和变动，一个是资本有机构成，一个是资本周转时间，前者属于生产过程，后者则包括流通过程。那末，为什么马克思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时没有谈到流通过程和周转时间的影响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涉及的是总资本和长期趋势。周转时间长短的部门差别虽然重要，但与总资本无关，周转速度快慢在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有显著差别，但与长期趋势无关，所以这些应该舍象。利伯维茨批评人们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没有引入资本周转的因素，但这正是马克思的方法，而马克思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忽视流通过程。他突出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因素对一般利润率长期变动的影晌是合理的。

利伯维茨虽然主张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必须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出发，但他在实际分析中却把重心放在了流通过程。他强调，生产过程中引起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可能被起反作用的力量（如不变资本的节约）所抵销，所以在资本运动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生产过程中，利润率下降只是一个可能被克服的障碍，而不是一种内在的限制。<sup>①</sup>这样，资本运动的第二个行为就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决定性的因素被归之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实现困难，归之于流通对生产的限制，归之于流通时间的延长。即使从引进实现问题这个方面来看，利伯维茨的推论也不如吉尔曼的论证相对说来合乎逻辑。吉尔曼把由实现困难所引起的非生产费用的巨大增长作为垄断阶段一种新的结构性因素和长期性因素纳入分析，利伯维茨却把由实现困难

<sup>①</sup> M·A·利伯维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一种辩证观点”，《加拿大经济学杂志》1976年9月号，第244页。

所引起的资本周转时间延长这个周期性现象看得具有决定意义。

尽管利伯维茨认为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根源于资本为克服利润率周期下降所作的努力，但这仍然意味着他把利润率的周期下降看作是基础，而流通时间的延长则是引起利润率周期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在研究周期发生的危机现象时，如果把它归结为实现问题尖锐化，流通时间的延长也只是实现困难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因此，即使分析利润率的周期下降，把流通时间的变化看作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不正确的。

再一种主张以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为代表，强调按照不同的抽象水平来理解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分析的结构。他们认为：《资本论》在方法上包含着互相重迭的两套结构：一套结构按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等级联系安排，一套结构按抽象程度的不同层次安排。《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分析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结构，也应该按照不同的抽象水平来把握。第十三章考察规律本身，舍象了所有的分配变化和不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变动所引起的价值变化，舍象了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分配，而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归结为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换句话说，规律本身是从许多复杂因素中抽象出来的。第十四章考察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开始分析这些复杂因素，引入了积累对分配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进一步把生产和交换、分配联结起来。起反作用的因素并不是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基础上产生的，勿宁说他们二者都是资本积累及其必然伴随物技术构成提高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处于相同的抽象水平。第十五章进而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反作用因素的矛盾对社会表层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危机等等，这些概念则处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它们不单纯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用的结果或者反作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复杂



矛盾和冲突。因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仅仅是一种“抽象趋势”，并不预示着利润率的实际下降。利润率的实际运动取决于下降趋势和抵销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精确地说，马克思揭示的这一规律应该表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抵销因素起反作用趋势的规律”。①

法田和哈里斯依据上述推论，对所谓“新李嘉图主义者”（霍奇森，希梅尔威特等）和“原教旨主义者”（耶菲，考格伊等）进行批评，指责这两个学派都误解了马克思的方法和规律的意义，都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解为实际利润率的下降，又把这种下降归结为技术构成提高的简单结果。新李嘉图主义者为了反驳这个命题，强调反趋势的抵销作用，如不变资本的低廉化可能阻止资本价值构成提高，以及有关工资斗争的分配变化等等。原教旨主义者则力图维护这一命题，断言技术构成提高必然引起价值构成提高，反趋势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利润率的实际下降会不断地重复出现。两个学派都把什么是规律什么只是反作用归结为一个经验事实问题。法田和哈里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抵销因素的存在，在它们都是资本积累必然产物的意义上，是一个规律。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相对的经验逻辑重要性不同，只在于马克思把它们分别看作是积累的不同结果。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经济学家们所公认的。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分卷和分篇的总体结构上，体现在范畴体系的逻辑安排上。至于各篇内部各章的结构，则要作具体分析。法田和哈里斯断定第三卷第三篇各章之间的

① B·法田、L·哈里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争论问题”，《社会主义记录》（1976年英文版），第141—145，159—163页；《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61—65页。

② B·法田、L·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第75页。

结构也要按照这种方法来理解，就显得牵强附会。不论从第三卷第三篇的总体地位看，还是从各章的具体内容看，都不能说第十三章完全舍象了交换过程和分配变化，第十四章才进一步把生产和交换、分配联结起来。在第十三章中，马克思不但明确讲到利润率趋向下降可以和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发生，还详细分析了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增长的规律会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下降和出售商品所实现的利润相对增加。从这些内容看，怎么能说舍象了分配和交换呢？当然，十三章和十四章的内容有所不同。十三章主要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必然性，揭示它的内在机制，这里已经涉及到起反作用的力量，但没有展开。十四章则进一步分析各种抵销因素的作用，着重说明利润率的下降为什么缓慢，只具有趋势的性质。有侧重就有取舍，理论分析当然离不开抽象力的运用。但不能象法因和哈里斯那样机械地搬用《资本论》的总体结构去理解这两章的结构。

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在推动利润率下降和推动利润率上升的两种力量的冲突中贯彻的，因此可以说，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已经包含了抵销因素的作用，体现了趋势和反趋势的矛盾。互相冲突的这两种力量，确实都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的不同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两种力量可以不分主次处于同等地位。在法因和哈里斯看来，既然两种力量都是积累过程的产物，就不存在哪种力量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实际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根本不能确定，一切决定于两种力量的复杂联系。但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利润率下降趋势本身。因为如果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不占优势，就根本谈不到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也没有抵销作用和反趋势可言。可见，法因和哈里斯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解释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

### 第三节 经验资料的分析

#### 1. 美国剩余价值率的长期动态

我们多次谈过，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影响利润率动态的两个主要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本书第二章已经详细讨论了资本构成问题。现在，在检验利润率的长期变动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剥削率的长期动态。

到目前为止，有关剥削率长期变动的经验研究，大多是关于美国的。我们将着重介绍和评论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美国经济中剥削率长期变动的经验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们计算方法上的差别及其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较早对美国制造业剥削率变动进行经验分析的是吉尔曼，这是他检验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吉尔曼计算剩余价值率的基本方法是：取生产工人工资代表可变资本V的流量，取生产中消耗的原材料价值和固定资本折旧价值代表不变资本C的流量；用产品价值减去制造业增加值（Value Added by Manufacture）求得原材料消耗价值；用制造业增加值减去固定资本折旧求得制造业创造的新价值，再从中减去生产工人工资求得制造业创造的剩余价值；用这个剩余价值量除以可变资本量即得剩余价值率。他所计算的一组主要数值如表57。

这组数值所显示的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情况是：1880年—1912年上升，1912—1921年下降，1921—1929年上升，1929—1937年下降，1939—1947年下降，1947—1952年在波动中基本稳定。如果从较长历史时期来观察：剩余价值率在1880到1929年期间趋于上升，1929到1947年期间趋于下降，1947到1952年期间无明显趋势。

表 57 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 (1880—1952年)

年 份	剩余价值率%	年 份	剩余价值率%
1880	102	1931	147
1890	114	1933	150
1900	132	1935	130
1912	137	1937	130
1919	125	1939	151
1921	103	1947	129
1923	121	1949	129
1925	136	1950	141
1927	139	1951	133
1929	159	1952	132

资料来源：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55—56页。

曼德尔根据吉尔曼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也计算了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他在资料的使用上作了某些改进，计算了四个数字系列，全部计算也都以官方资料为依据。四个系列的差别是：系列 I 的剩余价值等于制造业增加值减去生产工人工资，系列 II 的剩余价值等于增加值减去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工人工资，系列 III 的剩余价值等于增加值减去生产工人工资和50%的非生产雇员薪金，系列 IV 的剩余价值等于增加值减去固定资本折旧、生产工人工资和50%的非生产雇员薪金。在系列 III 和系列 IV 中，50%的非生产雇员薪金也算作可变资本。四个系列的数值见表58。

曼德尔指出：四个系列的变动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从本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剩余价值率逐渐下降，然后，在1923

**表 58 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 (%) (1904—1966年)**

	系列 I	系列 II	系列 III	系列 IV
1904	146	134	117	97
1914	149	127	108	94
1919	146	125	108	94
1923	142	127	106	84
1929	180	163	135	113
1935	153	135	124	97
1939	182	154	.....	.....
1947	146	129	113	98
1950	159	140	118	102
1954	151	143	112	96
1958	185	165	121	106
1963	209	192	137	124
1966	219	200	146	131

资料来源,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83年中译本), 第194页。

—1929年的繁荣时期直线上升, 在大萧条时期, 它又下降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 它经历了一个不规则的波动; 最后, 从50年代中叶开始, 它又开始大大上升。曼德尔的数字系列在战后时期比吉尔曼的系列延长了14年, 到60年代中期。他计算的剩余价值率在本世纪初到1929年和1929年到50年代初这两个较长时期中的趋势和吉尔曼的系列基本一致, 新的补充则是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新的上升趋势。

表 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  
(不同经济学家的数据) (1947—1977年)

	莫斯里	韦斯科 普夫	赛 克		沃尔夫		姚廷纲
			I	II	I	II	
1947	1.26	0.21	1.20		2.43	2.25	
1948	1.35	0.23	1.26				2.37
1949	1.51	0.22	1.33				2.42
1950	1.43	0.24	1.31				2.41
1951	1.45	0.24	1.29				2.43
1952	1.42	0.21	1.23	1.42			2.39
1953	1.36	0.20	1.18				2.29
1954	1.47	0.19	1.25				2.3
1955	1.54	0.22	1.30				2.37
1956	1.45	0.20	1.27				2.30
1957	1.51	0.19	1.30				2.34
1958	1.59	0.17	1.30		2.85	2.67	2.37
1959	1.62	0.20	1.34				2.44
1960	1.63	0.19	1.35				2.48
1961	1.68	0.18	1.37	1.46			2.52
1962	1.73	0.20	1.37				2.58
1963	1.72	0.20	1.41		3.03	2.80	2.64
1964	1.74	0.22	1.44				2.61
1965	1.74	0.23	1.47				2.66
1966	1.73	0.22	1.46				2.61
1967	1.73	0.21	1.45				2.60
1968	1.70	0.20	1.45		3.14	3.02	2.65
1969	1.63	0.18	1.40				2.62
1970	1.62	0.15	1.40				2.55
1971	1.71	0.16	1.41				2.60
1972	1.69	0.17	1.39	1.51			2.66
1973	1.63	0.17					2.61
1974	1.58	0.15					2.59
1975	1.73	0.16					2.73
1976	1.68	0.17					2.78
1977	1.68	0.17					2.81

资料来源：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82—183页；章嘉琳、姚廷纲主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1981年版），第322页。

对美国战后时期剩余价值率长期变动所进行的经验研究比较丰富。这包括西方左派经济学家沃尔夫、赛克、韦斯科普夫 (T. E. Weisskopf)、莫斯里 (F. Moseley) 和中国经济学家姚廷纲。他们不但把计算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整个产业部门, 而且采用了更复杂更精细的计算方法。下面先将他们各自算出的数据综合列表如下 (见表59), 以便比较, 然后再介绍和评论他们计算方法上的差别。

以上各个经济学家的计算范围是基本一致的: 美国整个产业部门或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 但由于计算方法不同, 得出的数据也不一样。计算方法上的差别反映了他们对剩余价值、可变资本等概念的理论解释不同。这些差别, 按照莫里斯的概括, 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概念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劳动量还是指可以观察到的货币量或价格? 这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剩余价值率的估算, 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经验研究的一般性质。一些经济学家如沃尔夫等认为: 马克思的概念所涉及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具体地说, 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概念, 是分别指包含在剩余产品中的劳动量和包含在工资货物中的劳动量。因此, 为了估算剩余价值率, 必须首先估算包含在剩余产品和工资货物中的劳动量。沃尔夫的数据就是用这种方法求得的。他的计算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 按价格项计算出剩余价值率的“价格类似物” (Price Analog); 第二步, 借助劳动系数矢量 (Labor Coefficient Vector) 把剩余价值率的“价格类似物”转换为用劳动量衡量的剩余价值率, 劳动系数矢量表示生产一美元各类商品所需要的实际劳动量。如果剩余产品部门的平均资本构成和工资货物部门的平均资本构成不等, 或者说, 如果一美元剩余产品的平均劳动含量和一美元工资货物的平均劳动含量不等, 那末, 按劳动量衡量的剩余价

值率和它的“价格类似物”将在数量上不同。由于推算劳动系数矢量所必需的美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当时只有四个年份可以得到，沃尔夫只计算出这四个年份（1947、1958、1963和1967）的数字。上表中沃尔夫的数据Ⅰ是剩余价值率的“价格类似物”，数据Ⅱ是按劳动量衡量的剩余价值率。

对于沃尔夫的这种观点和方法，莫斯里持批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概念所涉及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应该是指作为资本起作用的货币量。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的定义，资本是通过自身循环运动而增殖的货币，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概念，不过是这个作为资本循环的货币总量的具有理论含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建立在一个根本假定的基础上，这个货币总量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总量所决定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体”，货币则是商品价值的“必然的现象形式”。但是，马克思的假定并不能直接检验，因为抽象劳动是直接观察不到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能够直接观察和计算的劳动是实际的具体形态的劳动，它们具有不同的技能水平和劳动强度。因此，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实际劳动量通常并不等同于包括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也不是后者可靠的近似值。莫斯里对沃尔夫的研究结果也表示怀疑。他指出沃尔夫在推算劳动系数矢量时，没有考虑不同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强度，没有把实际劳动转换为等一的抽象劳动量，因此，沃尔夫的数据不能看作是关于抽象劳动量的可靠的估算。<sup>①</sup>

我认为莫斯里的这个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即作为商品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是不能观察和计量的。形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不仅是个别劳动的一般化，而且是不同劳动的均等化。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只有化为等一的简单劳动才能成为商品价值的实体。这

<sup>①</sup>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69—170、176页。



就是困难所在。这个过程，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背后进行的，因而价值只能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如果抽象劳动能够直接计量，它就不会采取迂回的价值形态。因此，沃尔夫所估算的生产各类商品实际花费的劳动量，同凝结在各类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是不一致的。但是，从沃尔夫的计算程序来看，与其说他企图把价格还原为劳动时间，勿宁说他企图把生产价格还原为价值。他通过劳动系数矢量所要矫正的，是各类商品部门生产中由于资本构成同社会平均资本构成不一致而造成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他的意图是要消除由于生产价格偏离价值所造成的计算上的不精确。因此可以说，莫斯里对沃尔夫的批评似乎没有抓住要点。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部门的资本转移受到垄断资本一定程度的阻碍，远不象自由竞争时期那样自由和充分；尽管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仍然有高有低，但是否能够形成社会统一的平均利润率，从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造成不同部门产品生产价格同价值的不一致，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再考虑到计算本身的复杂性和资料来源的局限性，沃尔夫的方法似乎并不可取。

比较沃尔夫的两项数据以及沃尔夫的数据和莫斯里的数据，它们虽然绝对值不同，但变动趋势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从1947年到1969年，沃尔夫估算的剩余价值率从2.25提高到3.02，增长了34%；它们的“价格类似物”从2.43提高到3.14，增长了29%，而莫斯里估算的剩余价值率从1.26提高到1.73，增长了37%。都是上升的趋势，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可见计算方法上的这一区别，对于研究战后美国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影响并不很大。

第二，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概念是指工人所得到的货币工资还是指工人所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这关系到如何处理工人所缴纳的税收和从政府所得到的福利补助。有些经济学家主张：工人工资中所缴纳的税收部分应从可变资本中扣除，而工人从政府转移支

付中获得的收入应算作可变资本。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是，可变资本应该定义为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但莫斯里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可变资本应该从资本循环的观点来定义。从这个观点出发，用于购买生产劳动的货币总量都在执行资本的职能，它们既然是获取货币增值的手段，在占有剩余价值之前也必须从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得到补偿；至于作为可变资本支出的这个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因纳税而未能成为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与这个货币总量所执行的资本职能无关。另一方面，为生产工人提供补充实际收入的政府开支，并不起资本的作用，也不通过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因而不能算作可变资本的一部分。<sup>①</sup>

我不同意莫斯里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可变资本的作用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以使工人通过劳动实现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有工人实际得到的可支配收入才构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也才能够和应该算作可变资本。莫斯里从资本循环的观点出发，认为即使工人工资中的纳税部分也在执行资本的职能，也应属于可变资本；而政府对工人的福利开支则因不起资本的作用而应排除在可变资本之外。这是从个别资本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那末，政府支付给工人的福利开支实际来自工人的纳税负担，这不过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采取了国民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迂回形式，反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如果工人纳税负担的一部分没有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而收回，那只是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这一部分已被资产阶级扣除，已转化为剩余价值，而不能再算作可变资本。因此，从理论上说，计算可变资本时从生产工人工资中减掉各种税收而加上福利开支，是合理的。

在具体计算上，确切估算工人所交纳的各种税收以及工人所

---

<sup>①</sup>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73页。

得到的各种补助，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常常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在西方，赛克是试图这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但由于有关数字的估算非常困难，赛克提供了两套剩余价值率估算结果。第一套估算不考虑税收和福利开支，结果为上表中赛克的数据 I。第二套估算考虑到这两个因素，但只算出1952、1961和1972三年数字，即表中赛克的数据 II，其方法是，先算出各年生产工人的净税收负担（生产工人纳税负担减去他们从政府得到的福利收入），再将净纳税从可变资本的估算中扣除，加到剩余价值的估算上，然后再计算剩余价值率。赛克的两组计算结果在绝对值上有些差别，但都显示了上升的趋势，在这点上和莫斯里的估算结果也没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们的数据所表现出来的上升程度却有差别。从1952年到1972年，莫斯里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19%，赛克的数据 I 提高了13%，数据 II 提高了6.3%。由于我们没有看到赛克的论文，不知道他的具体加减项目是什么，所以还无法对上述区别作出解释。

和赛克相比较，我国经济学家姚廷纲所作的估算要详细得多。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工人工资为基础，详尽地估算了生产工人所交纳的各种税收和从政府所得到的各种福利收入，减项为个人所得税、间接税和社会保险费，加项为社会保险津贴和福利补助金，教育医疗保健经费，私人退休金和其他福利金，从而求得生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作为可变资本，在此基础上计算了从1948年到1977年逐年的剩余价值率。比较姚廷纲和莫斯里的计算结果，两者在长期变动上也都是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程度不同。在1948至1979年期间，莫斯里的数据提高了24%，姚廷纲的数据只提高了19%。这是因为，战后时期美国生产工人可支配收入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提高，或者换句话说，工人的净纳税负担趋于减轻。根据姚廷纲提供的资料计算，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占生产劳动者工资

的比重，1948年为85.9%，1960年为90.0%，1970年为93.2%，1979年为99.3%。<sup>①</sup>这样，和用工资代表可变资本相对而言，用实际可支配收入代表可变资本所计算的剩余价值率，在早期较高（因为可变资本相对较小而剩余价值相对较大），从而整个时期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程度也必然较小。赛克数据Ⅱ的提高程度所以小于数据Ⅰ，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第三，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概念是指资本主义企业所有雇员的工资薪金还是仅仅指生产劳动者的工资？这涉及到生产劳动概念和可变资本概念之间的联系。有些经济学家如格林、萨特克里夫、韦斯科普夫等，在理论分析上并不考虑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在经验研究中把可变资本等同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全部工薪开支，把剩余价值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收入。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吉尔曼、耶菲、沃尔夫、赛克、莫斯里等，则对上述观点持批评态度。他们都十分重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认为可变资本只是指资本主义企业中生产劳动者的工资，而不是全部工资和薪金支出。按照莫斯里的看法，资本所雇佣的非生产劳动包括两个主要类别：一是执行与商品购销有关职能的流通劳动（Circulation Labour），包括销售、核算、广告、信贷、金融分析和法律咨询等；二是执行与控制雇佣劳动者使其劳动强度最大化有关职能的监督劳动（Supervisory Labour）。根据这种理解，莫斯里不同意区别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他认为，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纯粹属于非生产劳动部门外，其他通常被认为是生产部门（如制造业）的也有非生产劳动，通常被认为是非生产部门（如商业）的也有生产劳动。<sup>②</sup>因此，他计算生产劳动和可变资本的方法主要不是以部门为标准

---

① 《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1981年版），第316页。

②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对韦斯科普夫估算的批评”，《剑桥经济学杂志》1985年3月号，第59—60页。

而是以劳动性质为标准。

从理论上说，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正确的。但在经验分析中把这种区分具体化，关系到许多复杂的估价和计算问题，各人的做法就很不相同。例如莫斯里，他在估算生产劳动上所做的工作是最精细的。他所估算的生产劳动者包括：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的生产工人，运输业、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非管理雇员，批发和零售商业中非管理雇员的一半，农林渔业中的全部雇员。<sup>①</sup>这样，他就把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中拿薪金的雇员全部排斥在生产劳动者之外。在这点上，莫斯里和吉尔曼、姚廷纲等的做法一样，但我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企业中，除极少数企业高级雇员外，绝大多数拿薪金的职员（与拿工资的工人相区别，有时也称白领工人）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他们虽然不在车间直接劳动，但他们的劳动是整个商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他们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是不合理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上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企业雇员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不把他们的薪金算作可变资本，既会人为地抬高剥削率，也可能歪曲剥削率的实际变动趋势。

如果把莫斯里的计算结果和韦斯科普夫的计算结果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变动趋势存在着根本区别。从1947年到1977年，莫斯里的数据显示了上升的趋势，提高了33%，而韦斯科普夫的数据却显示了下降的趋势，降低了19%。需要说明的是，确切地讲，韦斯科普夫所计算的并不是剩余价值率，而是利润份额，前者的公式是 $S/V$ ，后者的公式是 $S/V + S$ 。但从考察趋势的角度看，只要计算的根据和方法相同，两个变量的数值虽有差别，动态肯定是一致的。因此，韦斯科普夫所计算的利润份

<sup>①</sup>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对韦斯科普夫估算的批评”附录B，《剑桥经济学杂志》1985年3月号。

额，完全可以代表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莫斯里由此得出结论：“在定义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时处理非生产劳动工资的不同方法，对于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趋势具有很重大的影响”。<sup>①</sup>换句话说，前面谈到的关于剩余价值率计算方法上的三点分歧，只有第三点差别，才会真正影响计算结果的变动趋势。

同是考虑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为什么姚廷纲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比莫斯里的计算结果高得多？这除了姚廷纲用可支配收入代替生产工人工资作为可变资本外，更重要的是，他在计算生产劳动者工资这个基数时存在问题。一方面，他计算的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净值，除了制造业、矿业、建筑业、公用事业等货物生产部门的全部产值外，<sup>②</sup>还包括商业部门的全部产值，<sup>③</sup>以及运输业、邮电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和政府企业等部门的部分产值。不管后面这些部门的产值份额取舍是否得当，他所说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国民收入或净产值，是指除农村渔业以外全部社会经济的，不限于货物生产部门。因此他的这项数值和莫斯里的数值相比尽管计算方法不同，但在量上差别不大。但另一方面，他计算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劳动者工资，却只限于制造业、矿业、建筑业、公用事业、部分运输业和邮电业中的生产工人的工资。<sup>④</sup>因此他计算的生产劳动者工资总

①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79页。

② 姚廷纲说明：因农林渔业中工人和家属帮工创造的价值无法分开，难以估算由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故将该部门排除。

③ 姚廷纲解释说，批发零售商业虽非物质生产部门，但其产值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在商业部门实现的，其全部产值也应计入国民收入。但这样一来，岂不重复计算了产值？令人不解。

④ 章嘉琳、姚廷纲主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1981年版），第317—318页。

额比莫斯里计算的数值小得多，只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二左右。这样，由于姚廷纲计算产值的口径和计算生产工人工资的口径不一致，他就人为地缩小了可变资本和夸大了剩余价值，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水平也人为地抬高了。

为了确切估计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实际水平和长期动态，我们重新计算了1929年到198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基本数据如表60。

我们之所以选择制造业而不是范围更宽的经济部门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和其他基本变量，主要是考虑到在更宽的范围内难以恰当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部门，如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其中究竟包含多少生产性劳动，很难确切限定。在实际处理上，不同经济学家的做法差别很大。例如莫斯里认为服务业中的“非管理雇员”属于生产劳动，商业中“非管理雇员”的一半属于生产劳动，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全部雇员都属于非生产劳动。姚廷纲则断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大部分属于非生产劳动，将其生产性产值限定为四分之一，同时却把商业产值全部计入生产性产值。莫斯里在计算雇员报酬时精细地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雇员，但计算产值时却比较笼统。姚廷纲在计算产值时详细考虑了不同部门生产性产值和非生产性产值的比例，但计算雇员报酬时又把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部门的职工工资全部排除在外。所有这些做法，都显得比较武断而缺乏根据。既然许多部门如何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那末，在进行经验分析时暂时舍象掉这些部门或许更为合适。比较理想的考察范围是“物质生产部门”或货物生产部门。但制造业以外的分部门原始统计资料不全，给计算带来实际困难。考虑到制造业作为最大的货物生产部门，不仅在整個物质生产和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有关变量的基本动态大体上可以代表物

**表 60 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 (1959—1985年)**

年份	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①	生产性雇员工资薪金收入(V)(亿美元) ②	折旧(亿美元) ③	剩余价值(S) (亿美元) ①-②-③=④	剩余价值率 (S/V) ④/②=⑤
1929	306	126	17	165	1.31
1933	140	56	13	71	1.27
1935	186	85	14	87	1.02
1937	252	115	15	122	1.06
1939	245	109	15	121	1.11
1947	743	350	30	363	1.04
1949	754	359	39	356	0.99
1950	898	406	43	449	1.11
1951	1021	478	50	493	1.03
1952	1092	517	54	521	1.01
1953	1217	578	58	581	1.01
1954	1170	538	61	571	1.06
1955	1350	592	65	693	1.17
1956	1449	630	74	745	1.18
1957	1478	645	83	750	1.16
1958	1415	618	88	709	1.15
1959	1615	680	91	844	1.24
1960	1640	697	94	849	1.22
1961	1643	693	96	854	1.23
1962	1791	745	99	947	1.27
1963	1921	777	102	1042	1.34
1964	2062	822	106	1134	1.38
1965	2269	891	113	1265	1.42
1966	2509	978	124	1407	1.44
1967	2620	1025	136	1459	1.42
1968	2851	1101	149	1601	1.45



续表

1969	3044	1181	164	1699	1.44
1970	3002	1168	182	1652	1.41
1971	3140	1245	196	1699	1.36
1972	3540	1400	207	1933	1.38
1973	4040	1555	224	2261	1.45
1974	4520	1665	260	2595	1.56
1975	4420	1655	305	2460	1.49
1976	5110	1855	326	2925	1.58
1977	5850	2105	357	3388	1.61
1978	6570	2375	404	3791	1.60
1979	7480	2610	501	4369	1.67
1980	7740	2740	580	4420	1.61
1981	8380	2955	657	4768	1.61
1982	8240	2925	714	4601	1.57
1983	8820	3035	694	5091	1.68
1984	9840	3305	717	5818	1.76
1985	9990	3395	746	5849	1.72

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90年》，第666、682—683页；  
《美国统计摘要》1976年，第729页；1977年，第757页；1978年，  
第793、797页；1979年，第797、801页；1984年，第764页；  
1986年，第752页；1988年，第701、710页。

质生产部门的基本动态，因此，我们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经验分析的对象。

对美国制造业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我们基本上采用吉尔曼和曼德尔的方法，用增加值减去折旧代表制造业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用生产工人工资加上50%的非生产雇员薪金代表生产性雇员工薪收入即可变资本；从新价值中减去生产性雇员工薪即为剩余价值。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把非生产雇员薪金的一半纳

入可变资本的问题。前面曾经谈到，许多经济学家把物质生产部门非生产雇员的薪金全部算作非生产劳动的报酬而排除在可变资本之外，是不正确的。由于生产劳动概念的扩大，不直接从事生产操作的拿薪金的职员有相当一部分肯定属于生产劳动者，问题是这一部分有多大。莫斯里在他一篇文章的附录中承认，由于他未把货物生产部门的非生产雇员列入生产劳动者，可能引起剩余价值率计算数值上的偏差。他在估量由此所引起的误差时谈到：根据劳工统计局未公布的产业部门详细职业分类资料，非生产雇员报酬中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在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中分别为20%、30%和15%；此外在这些部门中，管理人员和领班的报酬占非生产雇员报酬的比重高限约在50%。<sup>①</sup>但莫斯里认为管理人员和领班的劳动最多只有25%是生产性的，这个估计未免太低。例如他把管理人员中进行复杂的工资核算和详细的操作记录的劳动都算作是非生产性职能，在我看来就不合理。按莫斯里引用的劳工统计局未发表的资料推断，既然制造业非生产雇员总报酬中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领班占了大约70%，那么，拿出职员薪金的50%作为他们的生产性劳动报酬，决不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把我们的计算结果和前面所列举的数据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以下若干共同特征。

首先，凡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概念所计算的剩余价值率，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较长时期内，都表现出增长的趋势。只是由于具体估算方法不同，数据的绝对值有高有低，增长趋势有快有慢。

其次，所有数据都表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是直线的而是波动的。从一定时期看，剩余价值率可能基本稳定，也可能下

---

<sup>①</sup>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对韦斯科普夫估算的批评”，附录C，《剑桥经济学杂志》1985年3月号，第78—79页。

降。例如30年代大萧条时期，第二次大战期间，60年代后半期越南战争升级期间等等，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降低。实际情况和传统教科书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不同的。

第三，造成剩余价值率波动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或许是失业率的变动。一般说来，较低的失业率会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加速，有可能降低剩余价值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由于战争繁荣，失业率一度降到很低水平，1941至1945年平均失业率为3.9%，1943至1945年甚至只有1.7%，结果剩余价值率下降了。<sup>①</sup>战后的情况继续证明了这种联系。请看1949年以后的数据变动（见表61）。

实际情况说明，正是在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才出现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现象。失业率变动和剩余价值率变动相互联系的一般机制显然是：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的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剩余价值率变动与工资增长率的一定程度的负相关。马克思曾指出：工资的一般变动由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sup>②</sup>这个有关周期波动的论断，当然也适用于经济的中期和长期波动。

最后，谈一下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韦斯科普夫在对莫斯里批评文章的答辩中认为：就分析按常规定义的利润率的变动来说，利润份额这个变量比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剩余价值率，对资本家及其经济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sup>③</sup>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剩余价值率这个抽象的经济变量是否对现实经济行为没有什么影响？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暗示，似乎马克思的抽象范畴与实际经济活动毫无关系。这是不正确

① 战前1929年至1935年时期或许是一个特例。按说，当时异常高的失业率应导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由于经济的大萧条使制造业产值的下降超过了雇员工薪的下降程度，结果反而使剩余价值率降低了。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9页。

③ E·韦斯科普夫：“对莫斯里批评的答复”，《剑桥经济学杂志》1985年3月号，第82页。

**表61 美国战后不同时期剩余价值率变动与失业率变动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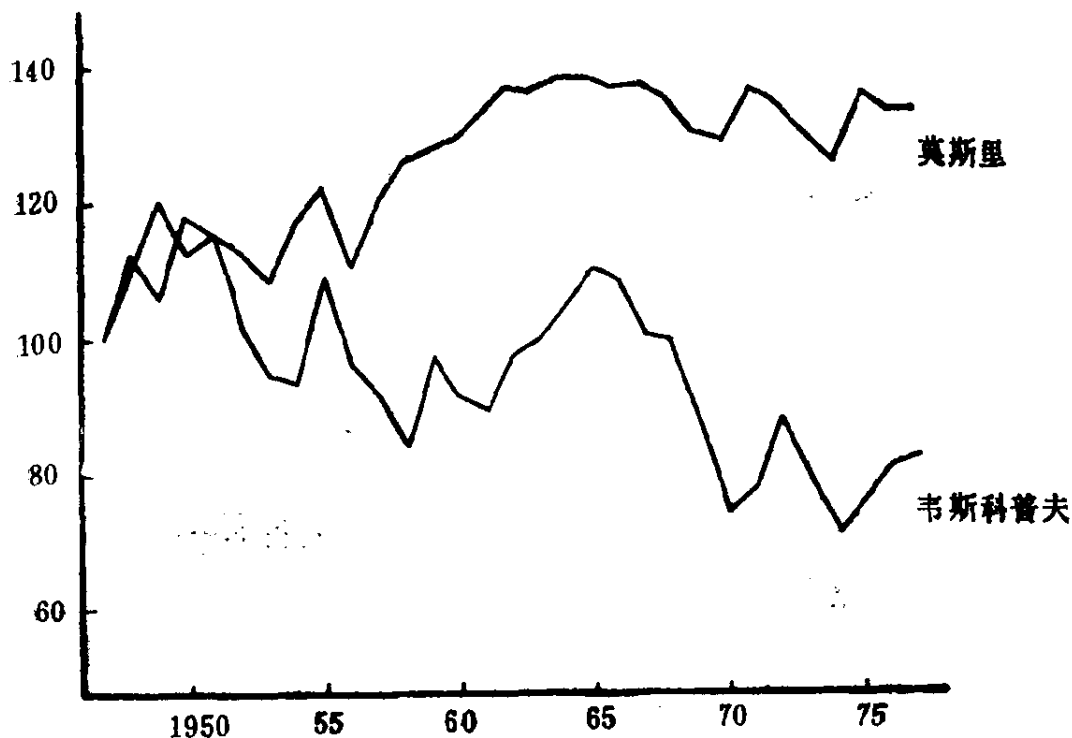
莫斯里的数据			高峰的数据		
时期	剩余价值率变动	平均年失业率	时期	剩余价值率变动	平均年失业率
1949—1953	1.51—1.36	4.1	1950—1953	1.11—1.01	3.6
1953—1965	1.36—1.74	5.1	1953—1966	1.01—1.44	5.0
1965—1970	1.74—1.62	4.0	1966—1971	1.44—1.36	4.3
1970—1977	1.62—1.68	6.3	1971—1977	1.36—1.61	6.5
			1977—1984	1.61—1.76	7.6

计算根据：本书第三章表32；第四章表59、表60。

的。就拿剩余价值率来说，它和利润份额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有密切联系。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概念，和按照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所计算的雇员工资薪金和利润概念，是不同的。雇员工资薪金（W）中既包含生产劳动者的报酬，这相当于可变资本（V），也包含非生产劳动雇员的报酬（U），这应从剩余价值来补偿。因为， $W = V + U$ ， $V = W - U$ 。同样，资本利润（ $\Pi$ ）并没有包括非生产雇员的劳动报酬（U），而它们却应包含在剩余价值（S）之中。所以， $S = \Pi + U$ ， $\Pi = S - U$ 。根据这种关系，传统的利润份额（ $\Pi/W + \Pi$ ）或利润/工薪比率（ $\Pi/W$ ）的变动（两者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必然同时受到剩余价值率（ $S/V$ ）和非生产劳动对可变资本比率（ $U/V$ ）两个因素的影响。莫斯里用下列公式证明了这个命题：

$$\frac{\Pi}{W} = \frac{S - U}{V + U} = \frac{S/V - U/V}{1 + U/V}$$

图3 莫斯里计算的剩余价值率和韦斯科普夫计算的利润份额的变动比较



可见，利润/工薪比率（及按同一方向变动的利润份额）的变动正向联系于剩余价值率（ $S/V$ ）的变动，反向联系于非生产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 $U/V$ ）的变动。<sup>①</sup>粗略一看，似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与利润份额的变动无关，因为莫斯里的剩余价值率数据和韦斯科普夫的利润份额数据的变动趋势正好相反。但只要仔细观察两个数据的波动情况，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显示出来。图3是莫斯里根据两个数据系列所绘制的波动曲线。

可以看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的波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撇开小的变动不说，1947年到1949年（或1950年），两者同时上升；1949（或1950年）到1953年，两者同时下降；1953年到1965年，两者在波动中同时上升；1965年到1970年，两者同时下降；

① F·莫斯里：“战后美国经济中剩余价值率的估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178页。

1970年到1977年，两者又在波动中同时缓慢上升。这表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是支配利润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两者的变动同时受着某些经济因素的共同支配。既然如此，为什么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不同呢？这要归因于非生产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提高的影响。由于这个因素，剩余价值率在某些时期的上升程度超过了某些时期的下降程度，形成了提高的长期趋势；而利润份额在某些时期的下降程度超过了某些时期的上升程度，形成了降低的长期趋势。这种不同的长期变动趋势，并不能否定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变动的内在联系，只不过掩盖了这种联系。可见，剩余价值率这个经济范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表现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既然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也是多种现实经济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就业和失业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变动，劳动生产率和消费品价格变动等等），它就不可能不影响到其他经济变量和资本家的现实经济行为。总之，剩余价值率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变量之一。

## 2. 美国利润率的长期动态

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资本之比，决定于剩余价值量和资本量两个变量，因此，不仅有一个如何计算剩余价值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计算资本量的问题。这后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资本有机构成的一章中曾经有所讨论，现在则要放在考察利润率的前提下重新加以分析。

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利润率变动趋势进行长期经验分析的是吉尔曼。他计算了美国制造业从1880年到1952年的利润率变化。同前面引用过的剩余价值率相对应的一组数据见表62。

从这组数据看，利润率的变动情况是：1880—1912年下降，1912—1929年上升，1929—1933年下降，1933—1947年上升，

表 62

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 (1880—1952年)

年 份	利润率%	年 份	利润率%
1880	69	1931	25
1890	60	1933	22
1900	50	1935	28
1912	42	1937	33
1919	29	1939	35
1921	18	1947	39
1923	29	1949	34
1925	32	1950	40
1927	32	1951	38
1929	36	1952	37

资料来源：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第55—56页。

1947—1952年在波动中无大变化。从长时期看：利润率在1880到1921年期间是下降的趋势，而在1921年到1952年期间除了30年代以外，基本上是上升的趋势。后一时期利润率的这种变动趋势同马克思的论述和预想是相背离的。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吉尔曼重新考虑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变化，并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出新的解释。

关于吉尔曼的计算方法。他计算剩余价值量的程序前面已经介绍。至于资本量，他在这组数据中所采用的是不变资本的预付量，即固定资本价值和存货价值之和。在四组数据中，这个资本量的采用相对说来是最合理的。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概念，利润

**表 63 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变动 (1859—1981年)**

年份	资本价值 (百万美元) ①	剩余价值 (百万美元) ②	利润率 (%) ②/①=③	指数 (1859=100) ④
1859	2421	475	19.6	100.0
1869	4307	697	16.2	82.7
1879	7135	948	13.3	67.9
1889	14004	1739	12.4	63.3
1899	19935	2647	13.3	67.0
1904	23901	2642	11.1	56.6
1909	34319	3514	10.2	52.0
1914	41699	3907	9.4	48.0
1919	93016	10215	11.0	56.1
1925	79699	11210	14.1	71.9
1929	86087	14607	17.0	86.7
1935	64806	7588	11.7	59.7
1939	76962	10281	13.4	68.4
1947	182205	31595	17.3	88.3
1949	198815	29985	15.1	77.0
1955	335174	59426	17.7	90.3
1959	418868	71232	17.0	86.7
1965	575703	108997	18.9	96.4
1970	894058	145396	16.3	83.2
1975	1410300	200400	14.2	72.4
1979	2250400	363900	16.2	82.7
1980	2536100	360500	14.2	72.4
1981	2889200	384800	13.3	67.9

资料来源：王庭笑“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变动的长期趋势”，《南开学报》1988年第4期，第47页。

率是利润（即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仅仅是与不变资本之比。从这点看，吉尔曼所采用的资本量仍是有缺陷的。

我国经济学工作者王庭笑也计算了美国制造业利润率的长期



变动。他沿用吉尔曼的方法计算剩余价值量，但资本量采用的是全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而不仅仅是不变资本，这是一个改进。另外，他把计算时间扩大到1859年到1981年，长达120多年，这使人们对20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利润率的长期动态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表63是王庭笑所提供的计算数据。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不考虑小的波动，利润率在1859—1919年期间下降，在1919—1929年期间上升，在1929—1939年期间下降，在1939—1947年期间和1947—1965年期间上升，在1965—1981年期间下降。如从较长时期观察，在1859至1919年的长时期内，利润率趋于下降，在1919至1965年的长时期内，除大萧条年代外，是停滞或提高的趋势占上风，在1965至1981年期间，利润率又重新趋于下降。

在计算方法上，王庭笑虽然采用了总资本量而不是不变资本量，但他的总资本是按使用资本量计算的，即固定资本按存量计价值，流动不变资本按全年耗费的原材料计价值，可变资本按全年支付的工资薪金总额计价值。在研究资本有机构成的一章中我们曾经谈过，从理论上说，按使用资本计算资本构成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样计算的资本构成最接近反映生产技术的实际水平，最符合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但是计算利润率就不同了。利润率既然是利润量与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资本量就应该按预付资本计算，而不应按使用资本计算，也不应按耗费资本计算。因此，为了更确切地观察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我们重新计算了1929年到1984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数据请看表64。

我们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预付不变资本量取制造业各年的固定资本净存量价值和存货价值之和。存货或库存（Inventory）包括企业在一定时点所存有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大体相当于流动不变资本的预付价值。用制造业各年的产品价值减去制

表 64

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 (1929—1984年)

年份	预付 不变资本量 (亿美元) ①	预付 可变资本量 (亿美元) ②	预付资本 总量 (亿美元) ①+②=③	剩余价值量 (亿美元) ④	利润率 ④/③=⑤
1929	299	47	346	165	0.48
1933	205	29	234	71	0.30
1935	218	30	248	87	0.35
1937	279	41	320	122	0.38
1939	268	39	307	121	0.39
1947	663	85	748	363	0.49
1949	764	94	858	356	0.41
1950	815	97	912	449	0.49
1951	953	120	1073	493	0.46
1952	1014	133	1147	521	0.45
1953	1070	145	1215	581	0.48
1954	1076	138	1214	571	0.47
1955	1170	148	1318	693	0.53
1956	1324	170	1496	745	0.50
1957	1403	170	1573	750	0.48
1958	1400	167	1567	709	0.45
1959	1449	179	1628	844	0.52
1960	1483	183	1666	849	0.51
1961	1514	182	1696	854	0.50
1962	1583	196	1779	947	0.53
1963	1641	204	1845	1042	0.56

续表

1964	1736	216	1952	1134	0.58
1965	1891	228	2119	1265	0.60
1966	2159	264	2423	1407	0.58
1967	2369	293	2662	1459	0.55
1968	2596	315	2911	1601	0.55
1969	2837	337	3174	1699	0.54
1970	3050	354	3404	1652	0.49
1971	3222	356	3578	1699	0.47
1972	3415	378	3793	1933	0.51
1973	3796	409	4205	2261	0.54
1974	4711	463	5174	2595	0.50
1975	5111	447	5558	2460	0.44
1976	5574	476	6050	2925	0.48
1977	6133	513	6646	3388	0.51
1978	7028	579	7607	3791	0.50
1979	7899	637	8536	4369	0.51
1980	8956	668	9620	4420	0.46
1981	9929	704	10633	4768	0.45
1982	10132	713	10845	4601	0.42
1983	10256	674	10930	5091	0.47
1984	10796	718	11514	5818	0.51
1985					

计算根据：J·C·莫斯格雷夫：“美国可再生产固定有形财富的修订估算”，《商业现况》1986年1月号，第61页；J·M·吉尔曼，《利润率下降》（1957年英文版）附录4；《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第681页；《美国统计摘要》（1986年），第752页；其他同表60。

制造业增加值，得到每年所耗费的原材料价值，相当于流动不变资本的年周转额；再用存货除每年耗费的原材料价值，即求得各年流动不变资本的周转次数。由于流动不变资本的周转速度可以代表可变资本的同转速度，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除各年的生产性雇员工薪，便是可变资本的预付价值。<sup>①</sup>由此即可得到各年的预付总资本价值。关于各年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计算剩余价值率时已经说明，不再赘述。

这组数据同样显示了制造业利润率的若干大的波动：1929—1939年期间下降，1939—1947年期间上升，1947—1958年期间轻微下降，1958—1965年期间又迅速上升，1965—1982年期间再度迅速下降，而后又略有上升。两个明显的利润率上升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的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但多数年代仍然是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起主导作用。

以上几项经验分析虽然在计算方法上有差别，利润率的绝对值也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变动趋势和变动型式却非常接近。总的印象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近60年的长时期中，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是明显的。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这后60多年中，利润率的波动加强了，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出现过三次上升的势头，从整个时期看，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仍在顽强地表现自身，只是不象前60年那样清晰和引人注目了。

以上按马克思主义口径所计算的资本利润率，和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所计算的利润率，在变动型式上究竟有多大的近似程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传统方法所计算的利润率主要有两种：一是销售利润率，用公司利润量除以公司的净销售额；一是股本利润

---

<sup>①</sup> 吉尔曼在《利润率下降》一书中曾经用这种方法计算过流动不变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但他没有进一步利用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去计算可变资本预付价值。我国第一个用这种方法计算预付可变资本量的是葛亮。

率，用公司利润量除以公司的股本价值。它们又分别分为纳税前利润率和纳税后利润率。从理论上考虑，这四种利润率，纳税前股本利润率相对说来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概念。就分母说，销售额比预付资本量大，而股本价值与预付资本量比较接近，就分子说，所得税当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应该采用纳税前利润量。尽管如此，由于这个纳税前利润量并未包括企业在销售和管理方面的非生产费用，比企业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小得多。我们说税前股本利润率比较接近马克思的利润率概念，只是就这四种利润率互相比对相对而言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战后美国制造业纳税前股本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的长期动态（见表65）。

这两组官方利润率的绝对值差别甚大是必然的，因为公司的销售额比公司的股本价值大得多。销售利润率显然大大缩小了实际的利润率水平。我们列出它来只是想说明，尽管销售利润率绝对值上不同于股本利润率，但两者的变动型式是一致的。如果拿官方的税前股本利润率与我们按马克思主义概念计算的利润率相比较，那末，前者必然小于后者，因为股本利润率的分子并未包括企业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官方利润率和按马克思主义方法计算的利润率在变动型式上究竟有没有相同之处？

经过仔细的逐年比较，我们发现，美国制造业按传统方法计算的纳税前股本利润率与我们按马克思主义方法所计算的利润率，至少在战后时期，在变动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1950—1954年下降，1954—1955年骤升，1955—1961年下降（其间1958—1959年上升），1961—1965（66）年上升，1965（66）—1971（70）年下降，1971（70）—1973（74）年上升，1973（74）—1975年下降，1975—1979年上升，1979—1982年下降，1982—1984年上升。从大的波动看：1950—1958年趋于下降，1958—1966年趋于

**表 65 美国制造业的纳税前股本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  
(1950—1984年)**

年份	股本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	年份	股本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
1950	27.9	12.8	1968	20.8	8.8
1951	27.9	11.2	1969	20.0	8.4
1952	22.1	9.2	1970	15.7	6.8
1953	22.6	9.2	1971	16.5	7.0
1954	18.5	8.4	1972	18.4	7.4
1955	23.8	10.3	1973	21.8	8.0
1956	22.6	9.7	1974	23.3	8.7
1957	20.0	8.8	1975	18.9	7.5
1958	15.4	7.4	1976	22.7	8.7
1959	18.9	8.8	1977	23.2	8.7
1960	16.6	8.0	1978	24.5	9
1961	15.9	7.7	1979	25.7	8.9
1962	17.6	8.2	1980	21.8	7.6
1963	18.4	8.5	1981	21.3	7.4
1964	19.8	8.9	1982	14.0	5.3
1965	22.0	9.4	1983	16.4	6.3
1966	22.5	9.3	1984	19.2	7.1
1967	19.3	8.3	1985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54页。

说明：从1974年开始为新的系列，由于计算方法的某些改变而影响到利润量、股本价值和销费额等数值，由此而计算的利润率比旧的系列抬高了。所以严格地说，1974年前后的数据是不可比的。

上升，1966—1982年又趋于下降。总的看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仍然占上风。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范畴尽管比较抽象，但和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利润率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勿宁说，前者正是在后者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基本力量。

### 3. 多种变量的综合观察

现在，我们有必要从经验方面进一步检验各种变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看看它们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仍然以美国制造业为重点。和前面的经验考察相反，这次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分析放在后面，而是放在开始。

表66包括了三个主要变量。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前面已经作了说明，这里只谈一下资本价值构成的计算。我们在第二章曾经详细讨论过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方法，并指出：按使用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最接近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状况，符合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探讨有关变量的变动关系，因而各个变量的计算方法应该尽可能一致。既然利润率是利润量（即剩余价值量）对总预付资本量的比率，那末影响利润率的资本价值构成也应该按预付资本计算。因此，这里的资本价值构成采用预付不变资本与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与我们在第二章中的计算方法以及所得出的数值有所不同。关于预付不变资本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在上一节分析利润率时已经说明，不再重复。

我们首先观察1929到1939年和1939到1947年这两个时期的基本动态。乍一看，这两个时期的动态有些令人费解。例如1929到1939年，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甚微，剩余价值率下降，利润率也下降。考虑到大萧条期间失业率急剧上升和工人工资大幅度削减，剥削率为什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降低了呢？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大萧条时期市场的极端萎缩，造成产品价格的急剧跌落，由于产

**表66 美国制造业若干基本变量的长期动态 (1929—1984年)**

年 份	资本价值构成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1929	6.36	1.31	0.48
1933	7.07	1.27	0.30
1935	7.27	1.02	0.35
1937	6.80	1.06	0.38
1939	6.87	1.11	0.39
1947	7.80	1.04	0.49
1949	8.13	0.99	0.41
1950	8.40	1.11	0.49
1951	7.94	1.03	0.46
1952	7.62	1.01	0.45
1953	7.40	1.01	0.48
1954	7.80	1.06	0.47
1955	7.91	1.17	0.53
1956	7.79	1.18	0.50
1957	8.25	1.16	0.48
1958	8.38	1.15	0.45
1959	8.09	1.24	0.52
1960	8.10	1.22	0.51
1961	8.32	1.23	0.50
1962	8.08	1.27	0.53
1963	8.04	1.34	0.56
1964	8.04	1.38	0.58



续表

1965	8.29	1.42	0.60
1966	8.18	1.44	0.58
1967	8.09	1.42	0.55
1968	8.24	1.45	0.55
1969	8.42	1.44	0.54
1970	8.62	1.41	0.49
1971	9.05	1.36	0.47
1972	9.03	1.38	0.51
1973	9.28	1.45	0.54
1974	10.17	1.56	0.50
1975	11.43	1.49	0.44
1976	11.71	1.58	0.48
1977	11.96	1.61	0.51
1978	12.14	1.60	0.50
1979	12.40	1.67	0.51
1980	13.41	1.61	0.46
1981	14.10	1.61	0.45
1982	14.21	1.57	0.42
1983	15.22	1.68	0.47
1984	15.04	1.76	0.51
1985			
1986			
1987			
1988			

资料来源和计算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第135页；《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96、307页，其他同表60、表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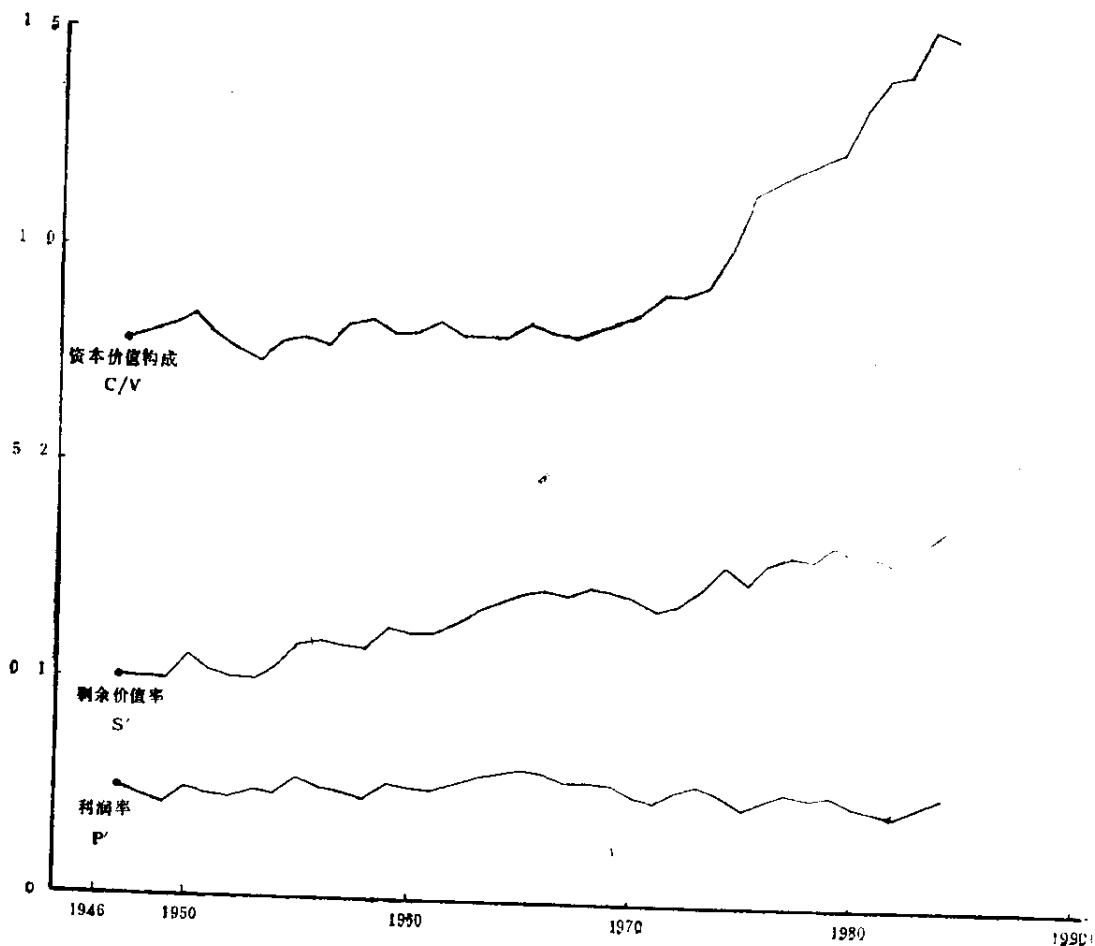
品价格的下降程度超过了工人工资的下降程度，使得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量相对减少，从而带来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实际情况是违反常规的：不是剥削率的下降造成利润率降低，而是利润率的降低造成剩余价值率下降，而利润率的降低又主要是由于实现条件的极端恶化。这说明在特定时期内，产品的实现困难可以成为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再看1939年到1947年，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剩余价值率下降，利润率上升。这里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资本价值构成怎么会提高？我们第二章的经验分析曾经表明，这个期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是下降的，因为30年代有大批设备被闲置，大战期间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主要不是靠增加新投资，而是靠提高设备利用率实现的，而同时期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增长却非常迅速，这必然造成资本构成的降低。那末现在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为什么在动态趋势上发生了变化呢？这是因为：这里的资本价值构成是按预付资本计算的，由于40年代大战期间特殊繁荣的经济和市场状况，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大大加快（从1939年的2.8次提高到1947年的4.1次），按预付价值计算的可变资本量必然大大缩小，从而按预付资本计算的资本价值构成反而呈现上升的势态。这证实了我们在第二章中的一个论断：按预付资本计算资本构成会受到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并在资本周转速度加快时夸大资本构成的实际水平。第二个问题，既然资本构成提高，剥削率降低，利润率理应下降，为什么反而提高了呢？但正如前面所说，这里的资本价值构成上升完全是按预付资本计算所造成的结果，并未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实际动态，大战期间资本构成实际上是下降了，这是促使利润率上升的一个直接因素。同时，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大大加速了流动资本的周转，这是促使年利润率提高的另一个直接因素。尽管工人工资上升和剥削率下降会损害资本家的利润，但它抵销不了上述两个因素对提高利润率的积

极作用，因而总的结果仍然是利润率的上升。这又一次说明，在特定时期内，产品的实现条件对利润率有重大影响。

当我们将特殊的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了简略的分析以后，现在可以详细观察战后时期美国制造业三个变量的长期动态。先请看图4。

**图4 美国制造业战后的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变动比较**



为了深入分析战后时期利润率变动的的原因，还有必要引入一个经济因素：生产能力利润率。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通常不能全部利用，设备利用率的波动很大。我们现有的资本构成的计算，就受到能力利用率变动的的影响。在能力利用率降低的年份，闲置的固定资本数量相对增大，但却被算在总的资本存量之中，因而会虚假地提高资本构成的水平。在能力利用率上升的年份情况则正好相反。确切地说，现有资本构成的计算包含着能力利用率变动的的影响，并不完全反映生产技术和要素价值的实际变动。资本构成的变动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件事：前者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变化和要素价值的变化，后者的原因却在于市场需求和产品实现条件的变化。因此，在经验分析中应该把这两个经济因素区别开。我们在第二章中对资本构成变动进行经验考察时没有剔除设备利用率变动的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缺乏能力利用率长期变动的统计资料。现在，当我们分析美国制造业战后时期利润率及有关变量的动态时，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来进一步把现有的资本价值构成计算分解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和实际资本价值构成两个变量。我们有美国官方公布的制造业从战后1949年起各个年度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统计。用这个能力利用率将各年的固定资本存量调整为实际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再来计算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即为剔除了能力利用率影响后的实际资本价值构成。表67是各年的有关数字。

能力利用率和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变动见图5。

把上面两个曲线图结合起来观察，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剩余价值率、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这三个变量的长期动态及其对利润率变动的共同影响。在1949到1958年期间，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在波动中基本稳定，而剩余价值率先下降后上升，能力利润率先上升后下降，由于后两个因素大体相当的抵销作用，利润率在波动中也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十分明显的趋势。

**表 67 美国制造业的能力利用率和实际资本价值构成  
(1949—1984年)**

年份	固定资本存量(亿美元) ①	能力利用率% ②	实际使用的固定资本存量(亿美元) ①×②=③	流动不变资本量(预付额)(亿美元) ④	预付不变资本量(亿美元) ③+④=⑤	预付可变资本量(亿美元) ⑥	资本价值构成 ⑤/⑥=⑦
1949	457	74.2	339	307	646	94	6.87
1950	500	82.8	414	315	729	97	7.52
1951	561	85.8	481	392	873	120	7.28
1952	599	85.4	512	415	927	133	6.97
1953	628	89.3	561	442	1003	145	6.92
1954	658	80.1	527	418	945	138	6.85
1955	718	87.0	625	452	1077	148	7.28
1956	817	86.1	703	507	1210	170	7.12
1957	884	83.6	739	519	1258	170	7.40
1958	900	75.0	675	500	1175	167	7.04
1959	922	81.6	752	527	1279	179	7.15
1960	947	80.1	759	536	1295	183	7.08
1961	967	77.3	747	547	1294	182	7.11
1962	1002	81.4	816	581	1397	196	7.13
1963	1042	83.5	870	599	1469	204	7.20
1964	1103	85.6	944	633	1577	216	7.30
1965	1211	89.5	1084	680	1764	228	7.74
1966	1382	91.1	1259	777	2036	264	7.71
1967	1525	86.7	1322	844	2166	293	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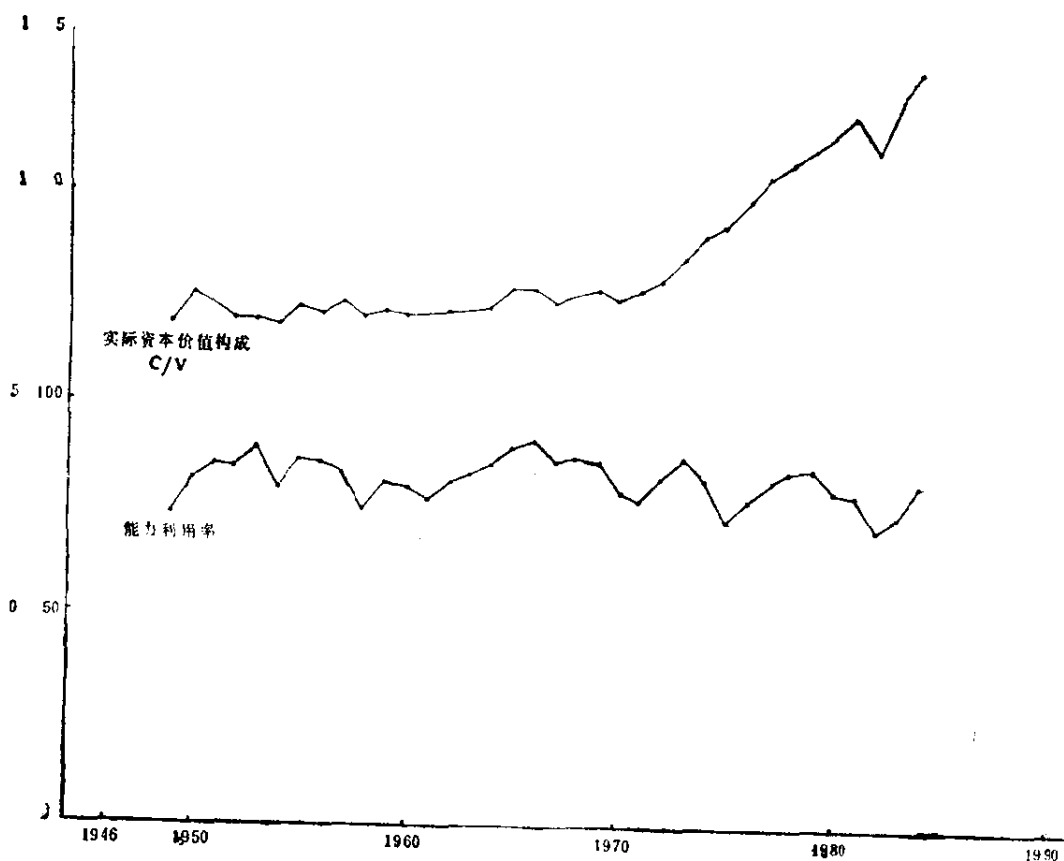
续表

1968	1694	87.0	1474	902	2376	315	7.54
1969	1860	86.7	1613	977	2590	337	7.69
1970	2038	79.2	1614	1012	2626	354	7.42
1971	2199	77.4	1702	1023	2725	356	7.65
1972	2336	82.8	1934	1079	3013	378	7.97
1973	2553	87.0	2221	1243	3464	409	8.47
1974	3135	82.6	2590	1576	4166	463	9.00
1975	3513	72.3	2540	1598	4138	447	9.26
1976	3825	77.4	2961	1749	4710	476	9.89
1977	4249	81.4	3459	1884	5343	513	10.42
1978	4937	84.2	4157	2091	6248	579	10.79
1979	5508	84.6	4660	2391	7051	637	11.07
1980	6339	79.3	5027	2617	7644	668	11.44
1981	7134	78.3	5586	2795	8381	704	11.90
1982	7512	70.3	5281	2620	7901	713	11.08
1983	7680	74.0	5683	2576	8259	674	12.25
1984	7976	80.8	6445	2820	9265	718	12.90
1985							

资料来源和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07页，  
其他同表64。

在1958到1965年期间，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开始缓慢上升，但迅速提高的剩余价值率和急剧扩大的能力利用率结合在一起，推动利润率显著地提高了。在1965到1971年期间，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又趋于稳定，而同时剩余价值率轻微下降。能力利用状况逐渐恶化，其结果则是利润率的急剧下降，在1971到1982年期间，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开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趋

**图5 美国制造业战后的能力利用率和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变动比较**



于提高，能力利用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资本构成和能力利用率变动对利润率的消极作用显然超过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对利润率的积极作用，促使利润率在波动中继续表现出下降的趋势。1982年

以后的数据由于时间太短，我们还不好作出确切的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肯定，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和生产能力利用率三个经济因素都对利润率产生直接影响。三个变量的合力决定了利润率在一定时期的实际动态。从考察利润率下降的角度看，三个变量都曾对1965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1965至1971年期间，由于实际资本构成基本稳定，推动利润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力量是剥削率的降低和能力利用率的降低。1971至1982年期间，剥削率趋于增长，因而实际资本构成的急剧上升和能力利用率的波动下降成为利润率继续降低的主要推动力。从这个经验分析中我们得出的基本看法是：考察利润率下降，不应只强调单一因素的作用。上一节曾经指出，西方左派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原因的解释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派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派强调产品实现困难，一派强调工资上涨挤压利润。这三派各自强调的经济因素，和我们上述经验分析中所涉及的三个自主变量有不同程度的直接联系。实际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是直接相关的。剩余价值率的变动决定于工资变动和消费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对比关系，它和利润份额的变动也是基本上一致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化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市场状况和产品实现条件的变化。战后时期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变动的经验分析表明，利润率的下降不能仅仅归因于某一经济因素，而是不同程度地同三种经济因素有关。从长期趋势看，实际资本价值构成趋于上升，生产能力利用率趋于下降，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剩余价值率的长期上升趋势则同利润率的下降不一致。但这并不否认，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在一定时期确实能够成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1965到1971年期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时期利润率下降的幅度最大，对战后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又要归因于剩余价值率下降



和能力利用率下降的共同作用。

上面，我们对美国制造业战后时期有关变量的长期动态作了综合分析。下面，我们再对几位西方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作一简要考察。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韦斯科普夫的经验分析。他在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中，深入研究了战后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动和周期波动及其原因。作为经验分析的理论前提，韦斯科普夫首先提出了一个有关利润率的基本模型：

$$= \frac{\Pi}{K} = \frac{\Pi}{Y} \cdot \frac{Y}{Z} \cdot \frac{Z}{K} = \sigma \pi \varphi \zeta$$

在这个基本方程中， $\rho$ 代表利润率， $\pi$ 测量利润量， $K$ 测量资本总量， $Y$ 测量实际产量（或收入）， $Z$ 测量潜在产量即生产能力。因此利润率等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 $\sigma\pi$ ）、生产能力利用率（ $\varphi$ ）和生产能力/资本比率（ $\zeta$ ）三者的乘积。借助这个基本方程，韦斯科普夫把利润率变动的分析同说明利润率变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流派联系起来。这三个流派的侧重点分别为：技术变化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状态；阶级斗争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产品全部价值的实现问题。每一种流派偏重于把方程中的某个变量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第一种流派是“提高有机构成流派（“ROC”流派—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这个流派和基本方程的联系在于：假定剥削率不变，从而利润份额和工资份额不变，同时也假定能力利用率不变，则资本有机构成 $v (= K/W)$ 提高必然引起能力/资本比率 $\zeta$ 的下降。这可以从下列方程中相对份额和能力利用率的不变性

得出： $v = \frac{K}{W} = \frac{K}{Z} \cdot \frac{Z}{Y} \cdot \frac{Y}{W} = \frac{1}{\zeta} \cdot \frac{1}{\varphi} \cdot \frac{1}{\sigma w}$ （在这个方程中， $W$ 代表工资总量， $\sigma w$ 代表收入中的工资份额）。根据这个流派，正是

基本方程中第三项 $\zeta$ 的下降构成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第二种流派是“劳工实力增强流派”（“RSL”流派—Rising Strength of Labours）。这个流派认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加强，必然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而工资份额提高便意味着利润份额缩小。因此，根据这个流派，基本方程中的第一项 $\sigma\pi$ 的下降便成为利润率下降的起源。第三种流派是“实现失败流派”（“RF”流派—Realization Failure）。这个流派假定：积累过程中势必产生商品需求落后于商品生产能力的不平衡，这种需求不足迫使资本家或者限制生产水平或者限制价格水平。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部门中阻碍了价格的降低，资本家主要靠减少生产从而降低生产能力利用率来对付消费不足。因此，根据这个流派，基本方程中的第二项 $\varphi$ 的下降便成为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韦斯科普夫的经验分析以美国全部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Non—Financial Corporate Business Sector）为考察对象。他认为：NFCB部门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不包括小型非公司产业，也排除了金融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由于这个产业部门实际上包括了全部重要的私营厂商，是美国经济中最有生气的产业，因而足以代表整个美国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韦斯科普夫编制经验数据时所作的指标选择是：利润 $\Pi$  = 纳税前的净资本收入（包括公司利润加净利息），工资 $W$  = 全部雇员报酬，部门净收入 $Y = \Pi + W$ ，资本 $K$  = 资本净存量（包括固定资本加库存），利润率 $\rho = \Pi/K$ 。这项经验考察的时期选择是从1949年4月到1975年1月，包含五个完整的周期。韦斯科普夫经验分析的重点是利润率的周期波动，但也涉及到长期趋势。我们这里主要观察他所提供的长期数据。

<sup>①</sup>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61—167页。

韦斯科普夫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利润率的变化而不是利润率的水平，因而以变化率的形式提供了有关数据。他把上述基本方程转变为一个“增长核算方程”，从而把任何时期里利润率  $\rho$  的变化分解为三个组成变量 ( $\sigma\pi$ 、 $\varphi$  和  $\zeta$ ) 变动之和。下面是他所计算的各个变量在整个时期的变动率。

表 68 基本变量平均年增长率 (%) (1949.4—1975.1)

	整个时期
利润率 $\rho$	-1.20
利润份额 $\sigma\pi$	-1.24
生产能力利用率 $\varphi$	+0.02
生产能力/资本比率 $\zeta$	+0.02

资料来源：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3页。

经过一种更精细的分析，韦斯科普夫进而指出，利润份额的降低 ( $\sigma\pi = 1 - \sigma_w$ ) 不仅和劳工实力增强相联系，而且受能力利用率变化的影响。当能力利用率降低到最佳运转率以下时，生产工人的“直接劳动”总时数容易削减到与产量成比例，但管理雇员的“间接劳动”总时数却不易改变，以致造成工资份额上升。为此，韦斯科普夫把工资份额  $\sigma_w$  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变量：一个是真正的工资份额  $\sigma_w^*$ ，即真正需要的工资额（实际需要的直接劳动工资加上与能力利用率变动相适应应该需要的间接劳动薪金）与实际产量之比 ( $W^*/Y$ )；确切反映劳工实力变动对工资份额的作用；另一个是工资额需要率  $\eta_w$ ，即真正需要的工资额

与实际工资额之比 ( $W^*/W$ ) ;反映了能力利用率变动的“利用效果”和实现条件变化的影响。按照更详尽的分析,韦斯科普夫提供了更精确的经验数据,这套数据和前一套数据的唯一区别,在于能力利用率变动对工资份额从而利润份额的利用效果已从劳工实力变动影响中除去,而转移到实现条件变动影响本身。按照修正后的数据,整个时期利润率的变动率仍为年平均增长-1.20,影响利润率的三个基值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劳工实力,-1.13;实现条件,-0.09;资本构成,+0.02(负值反映对利润率有消极作用的变化,即劳工实力增强,实现条件恶化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正值反映对利润率有积极作用的相反变化)。<sup>①</sup>根据这些数据,韦斯科普夫得出结论:“从1949到1975年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劳工实力增强对利润份额的压低作用”。<sup>②</sup>

韦斯科普夫的数据和结论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差别甚大。问题何在呢?在我看来,除了考察范围不同以外,主要在于有关变量计算方法上的差异。我们在讨论剩余价值率时已经谈到,韦斯科普夫的计算完全没有考虑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有关指标选择也不严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把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等同于资产阶级纳税前的财产收入,把作为可变资本的工资等同于企业的全部雇员报酬,把上述二者之和等同于企业的净收入。这就从两方面低估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态的利润量以及利润量的增长程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净产值在转化为雇员收入和雇主收入之前,有一部分要用于与销售有关的开支上,它们属于非生产性的“不变”费用,只能从剩余价值中补偿;另

---

①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5—178、188—189页。

② 同上,第189页。

一方面，企业雇员中有一部分人从事与纯购销职能和监督职能有关的活动，他们的薪金报酬属于非生产性的“可变”费用，也只能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补偿。这两部分非生产费用实际上属于剩余价值和与其相当的利润范畴，韦斯科普夫却把它们排除在利润量之外，这就低估了利润量。不仅如此，由于这两部分非生产费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于增大，韦斯科普夫的计算方法也必然要低估利润量的增长程度。

计算方法上的原则区别不能不影响到计算结果和结论。首先，韦斯科普夫的计算缩小了利润率的实际水平。由于大大低估了利润量，尽管用不变资本代替全部资本作为分母，他计算的利润率仍然比我们计算的利润率低得多。韦斯科普夫算出的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在整个时期的平均值为12.1%，<sup>①</sup>而我们算出的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相应时期的平均值为50.7%。<sup>②</sup>这样大的差别决不仅仅是因为考察范围不同，而主要是因为计算方法不同所致。此外，韦斯科普夫计算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下降幅度也较大。而我们计算的利润率则显示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这也可能和计算方法有关。顺便说一句，在1986年韦斯科普夫和鲍尔斯及戈登合写的论文中，根据计算数据所绘制的利润率变动趋势图已不同于韦斯科普夫1979年文章中的图形，<sup>③</sup>而与我们绘制的图形相似。第二，韦斯科普夫的计算也歪曲了利润份额以及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他既然没有把补偿非生产费用的大量剩余价值计入利润，所以一方面夸大了可变资本量，另一方面缩小了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鉴

①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2页。

② 计算根据：本书表64。

③ S·鲍尔斯、D·M·戈登、T·E·韦斯科普夫：“实力和利润：战后美国经济中的社会积累结构和赢利性”，《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136页。

于雇员报酬中的非生产费用比重有增大的趋势，把这部分费用计入可变资本还是计入剩余价值，算出的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将有根本区别。这说明了为什么莫斯里计算的剩余价值率呈现上升趋势，韦斯科普夫计算的利润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剩余价值率和利润份额在某些时期的下降的确对利润率的降低起过作用，但韦斯科普夫把战后美国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完全或主要归因于利润份额（从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连同他的计算数据，是值得怀疑的。第三，韦斯科普夫所计算的生产能力/资本比率在整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02%，似乎没有明显的长期趋势，但这一数据并不能确切判定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变动情况。我们早已指出：只有在劳动生产率（产量/劳动比率）不变时，资本生产率即产量/资本比率的上升（即资本/产量比率的下降）才意味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下降。<sup>①</sup>既然美国战后1949至1975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有了迅速增长，那末，韦斯科普夫计算的生产能力/资本比率（即潜在的资本生产率）的相对稳定，只能表明资本/劳动比率存在着提高的趋势。关于资本价值构成的动态当然还要考虑到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情况，但我们受资料限制无法检验韦斯科普夫的计算结果。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经济学家希尔（T.P.Hill）的经验研究成果。在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希尔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利润率在1955至1976年期间的水平和变动作了经验考察和比较分析。他考察的企业范围分为两组：一组是制造业；一组是工业加运输及通讯业（All Industry Plus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用事业和运输及通讯业。为了排除一切小型非公司企业占大量的经济部门，以及金融、政府服务和住宅拥有等部门，希尔认为用工业加运输及通讯业代表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

<sup>①</sup> 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4小节。

作为考察对象更为合适。只是美国例外，由于资料的限制，美国工业加交通及通讯业一组还包括商业和杂项服务业。希尔的统计分析涉及利润、收入和资本三个基本变量，各项变量的指标选择是：利润P = 包括利息在内的企业经营剩余 (Operating Surplus)，收入Y = 企业的价值增加值，资本K = 资本存量，不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和非耐用货物。各项变量都分别计算总值和净值，并按总值和净值分别算出毛利润率 (Gross Rate of Return) 和净利润率 (Net Rate of Return)

表69是希尔提供的有关美国的数据。

希尔的经验分析以下列恒等式为基础：<sup>①</sup>

$$\frac{P}{K} \equiv \frac{P}{Y} \cdot \frac{Y}{K}$$

这个恒等式把利润率分解为两个变量(利润份额P/Y和资本生产率Y/K)的乘积。希尔的这个恒等式与韦斯科普夫的基本方程是一致的，只是韦斯科普夫的方程式把Y/K又分解为Y/Z和Z/K两个变量。Y/Z是生产能力利用率，Z/K是生产能力/资本比率，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资本生产率。现实的资本生产率便决定于潜在的资本生产率和生产能力利用率两个因素，但希尔没有进一步分解资本生产率这个变量。资本生产率(Y/K)的倒数是资本/产量比率(K/Y)，在劳动生产率不变和工资份额不变的前提下，资本价值构成将和资本/产量比率同方向同比例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构成的变动和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观察希尔提供的数据，从制造业部门看，利润率的变动和我们计算结果的变动型式非常相似：1955到1958年下降，1958年到1966年上升，1966到1975年下降。在波动中有缓慢的下降趋势。希尔计算的利润份额是相对稳定的，没有明显的趋势，既和我们

<sup>①</sup> T·P·希尔：《利润和利润率》(1979年英文版)，第115页。

表 69 美国有关部门的净利润率 (1955—1976年)

年份	制 造 业			工业加运输业*		
	利润份额 P/Y	资本生产 率 Y/K	利润率 P/K	利润份额 P/Y	资本生产 率 Y/K	利润率 P/K
1955	23.2	148.1	34.3	28.6	93.0	26.6
1956	20.7	140.2	29.0	26.8	89.0	23.9
1957	19.6	132.1	25.9	26.2	84.3	22.1
1958	17.0	117.9	20.0	25.2	77.3	19.5
1959	20.4	134.8	27.5	26.7	83.4	22.3
1960	21.5	140.6	30.3	26.0	83.5	21.7
1961	20.9	138.3	29.0	25.9	82.2	21.3
1962	21.5	148.8	32.0	26.1	85.4	22.2
1963	22.3	153.3	34.2	26.4	86.6	22.9
1964	23.0	159.1	36.6	27.0	89.3	24.1
1965	24.8	164.8	40.9	27.7	90.8	25.2
1966	24.5	166.4	40.8	27.3	91.0	24.8
1967	22.5	153.1	34.4	26.1	86.3	22.5
1968	22.5	152.1	34.2	25.8	85.6	22.1
1969	20.2	144.9	29.2	24.0	82.4	19.8
1970	17.1	128.7	22.0	21.9	75.8	16.6
1971	18.6	125.8	23.4	22.4	73.9	16.6
1972	20.1	133.7	26.9	22.7	75.6	17.2
1973	19.8	139.3	27.6	22.3	77.0	17.2
1974	17.4	127.3	22.2	20.8	73.3	15.2
1975	20.4	124.3	25.4	23.3	70.6	16.2
1976	22.8	135.1	30.8	24.2	74.8	18.1

\* 实际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用事业、运输及通讯业、商业、杂项服务业。  
资料来源：T·P·希尔：《利润和利润率》（1979年英文版），第123、125页。



计算的剩余价值率上升趋势不同，也和韦斯科普夫计算的利润份额下降趋势不同。希尔的资本生产率数据和我们计算的未剔除能力利用率影响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相比较，其变动趋势在1955至1966年期间略有差别（后者在波动中相对稳定，前者略有提高），但在1966至1975年期间，我们的资本价值构成迅速上升和希尔的资本生产率急剧下降则是基本上一致的。

从工业和运输业等部门看（这个考察范围和韦斯科普夫的非金融公司产业部门比较接近），希尔提供的利润率数据，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利润份额也有轻微的下降，但幅度极小，这和韦斯科普夫利润份额的大幅度下降，很不相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很显著，并且主要发生在1966年以后，和韦斯科普夫的生产能力/资本比率相对稳定的状况相比，也有差别。

希尔的数据在变动趋势和程度上之所以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或韦斯科普夫的数据有某些区别，原因在于计算方法上的差异。希尔计算中的利润量等于企业经营剩余，即企业的价值增加值减去雇员报酬、间接税（加津贴）和固定资本折旧。这个程序和我们的方法比较相近。其余额作为经营剩余，虽然还要进一步扣除地租、利息、杂项支付和公司税及所得税等，才能作为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员可支配的剩余，但把整个经营剩余看作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代表，相对于韦斯科普夫的做法，比较合理。韦斯科普夫把利润等同于企业利润加利息，显然低估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总额。由于这种差别，希尔计算的利润率不但比韦斯科普夫的数值大，下降也比较缓慢。同时，希尔的利润份额也比韦斯科普夫的数值高，下降也远不是那样明显。但是也要看到，希尔在计算中完全没有考虑非生产劳动问题，实际上把全部雇员报酬等同于可变资本，在这点上他和韦斯科普夫的方法一样，而与我们的方法不同。既然非生产性雇员的报酬应由剩余价值补偿，希尔的计算必定低估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量，这不但

使他计算的利润率低于我们计算的利润率水平，而且使他计算的利润份额的变动趋势和我们计算的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趋势有了根本区别。

尽管希尔的计算方法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经验研究同时考察了若干主要发达国家，数据有可比性，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4. 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料

希尔根据资料的可得性，同时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十个国家。其中三个国家(澳大利亚、荷兰和丹麦)由于资料限制，只计算了利润份额；其他七个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瑞典和日本)则同时计算了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三个变量。虽然时期稍短，但希尔的数据涉及若干发达国家，计算方法统一，可以比较，所以我们首先观察希尔的计算结果。

表70和表71是除美国以外其他六国按制造业和工业加运输通讯业分别计算的净利润率及有关变量的具体数据。

希尔的数据所反映的各个变量的基本动态可概括如下：

关于制造业部门：

首先是利润率的变动：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除日本表现为较大的波动而没有显著的趋势外，其他五个国家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英国和西德的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利润份额的变动：同样，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下降趋势是相当显著而一贯的。第三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日本和意大利的趋势不明显，其他国家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尤以英国的下降最为剧烈。

关于工业加运输及通讯业部门：

首先是利润率的变动：除日本外，其他国家都下降了，但下

表 70 六国制造业部门的净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 (1955—1976年)

	加拿大			英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1955	30.8	82.1	25.3	29.6	66.2	19.6	36.8	84.5	31.1	30.9	46.9	14.5	36.6	56.9	20.9	25.0	55.5	13.9
1956	31.7	82.3	26.1	27.5	63.3	17.4	35.0	81.3	28.5	30.0	45.6	13.7	36.4	61.7	22.4	25.5	54.2	13.8
1957	29.2	75.3	22.0	27.3	61.4	16.7	34.5	78.0	26.9	29.9	43.4	13.0	42.9	67.2	28.8	26.4	54.8	14.5
1958	28.1	68.6	19.2	27.0	59.4	16.0	34.5	75.8	26.2	29.5	42.6	12.6	39.7	64.2	25.5	25.6	54.5	13.9
1959	28.3	69.9	19.8	27.6	60.7	16.8	34.7	76.2	26.5	31.4	44.2	13.9	39.1	67.8	26.5	27.7	54.0	14.9
1960	27.2	67.2	18.2	28.5	63.6	18.1	33.3	77.2	25.7	31.6	46.4	14.7	44.7	78.4	35.0	26.2	54.1	14.2
1961	27.2	65.1	17.7	25.2	60.4	15.2	31.3	74.8	23.4	30.7	46.6	14.3	44.0	76.9	33.8	23.9	53.5	12.8
1962	28.9	67.9	19.6	23.8	56.5	13.4	28.1	71.3	20.0	27.5	46.3	12.7	40.7	71.1	28.9	22.1	53.4	11.8
1963	29.6	68.8	20.3	25.4	55.8	14.1	27.0	67.1	18.2	22.6	45.5	10.3	40.0	70.4	28.2	19.9	50.0	9.9
1964	30.4	69.7	21.2	26.0	57.8	15.0	28.5	69.4	19.8	19.5	42.8	8.3	39.7	69.5	27.6	22.5	51.8	11.7
1965	27.9	66.4	18.5	24.9	57.9	14.4	28.9	70.5	20.4	23.1	42.0	9.7	37.0	64.8	23.9	23.1	52.6	12.2

续表

1966	26.3	64.8	17.0	22.5	55.8	12.5	25.8	67.8	17.5	26.2	44.5	11.7	37.7	65.9	24.9	20.8	50.8	10.6
1967	24.2	63.2	15.3	22.8	53.5	12.2	26.9	65.1	17.5	24.4	47.3	11.6	40.3	71.4	28.8	20.6	49.9	10.3
1968	25.7	66.3	17.0	22.7	53.7	12.2	29.6	72.0	21.3	25.2	46.7	11.8	41.9	75.2	31.5	21.6	50.7	10.9
1969	25.3	66.4	16.8	21.8	53.5	11.6	27.9	74.4	20.7	25.1	48.6	12.2	41.3	73.9	30.6	23.4	52.0	12.2
1970	22.7	60.9	13.8	18.4	52.2	9.6	24.8	73.2	18.2	22.5	51.1	11.5	40.9	68.7	28.1	26.8	54.6	14.6
1971	23.7	60.1	14.3	18.5	50.3	9.3	22.5	69.3	15.6	19.4	48.6	9.4	37.7	62.3	23.5	21.0	49.0	10.3
1972	25.3	63.2	16.0	19.3	48.5	9.3	19.8	67.7	13.4	20.1	48.9	9.9	35.4	57.2	20.2	20.4	47.8	9.8
1973	27.6	67.5	18.6	16.1	47.1	7.6	18.3	70.4	12.9				31.8	49.3	15.7	27.4	48.4	13.3
1974	28.3	66.3	18.7	11.1	43.1	4.8	18.1	70.0	12.7				28.2	46.4	13.1	32.4	52.1	16.9
1975	25.9	59.8	15.5	7.1	41.1	2.9	15.2	65.5	10.0				29.5	47.2	13.9	23.3	50.1	11.7
1976	23.7	59.7	14.1	7.3	38.6	2.8	16.5	69.5	11.4							17.0	48.1	8.2

表 71 六国工业加运输通讯业部门的净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 (1955—1976年)

	加拿大			英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瑞典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P/Y	Y/K	P/K
1955	31.4	50.2	15.8	23.7	49.1	11.6	43.2	89.2	38.5	38.7	58.5	22.7	31.5	38.6	12.2	26.9	39.4	10.6
1956	31.9	50.3	16.0	22.5	48.4	10.9	42.6	86.5	36.9	38.1	57.6	21.9	32.5	40.3	13.1	27.7	38.6	10.7
1957	29.6	46.1	13.6	21.8	47.1	10.3	42.6	83.8	35.7	38.6	56.2	21.7	37.3	43.3	16.2	28.1	36.7	10.9
1958	28.3	41.3	11.7	21.3	45.4	9.7	41.8	80.4	33.6	38.8	56.1	21.7	34.3	43.5	14.9	27.7	38.3	10.6
1959	28.9	41.1	11.9	22.5	46.0	10.4	42.7	80.1	34.2	40.0	58.2	23.3	34.4	46.1	15.8	28.7	37.5	10.8
1960	28.0	39.5	11.1	24.7	48.5	12.0	42.4	79.9	33.9	39.3	60.6	23.8	39.0	51.7	20.2	27.1	37.2	10.1
1961	28.5	38.7	11.0	22.2	46.9	10.4	40.3	76.0	30.6	38.6	61.3	23.7	39.4	53.3	21.0	26.1	37.0	9.7
1962	29.3	39.2	11.5	21.0	45.3	9.5	38.6	72.1	27.9	36.2	61.9	22.4	36.4	52.3	19.0	24.1	37.0	8.9
1963	30.3	39.6	12.0	22.9	45.3	10.4	37.6	67.8	25.5	31.9	61.3	19.5	36.1	53.0	19.1	22.3	35.3	7.9
1964	31.5	40.7	12.8	23.6	46.5	11.0	37.3	67.0	25.0	30.6	58.7	17.9	35.1	53.9	18.9	24.0	36.4	8.7
1965	29.9	40.2	12.0	22.7	46.2	10.5	37.8	67.8	25.6	33.4	57.2	19.1	31.7	50.9	16.1	24.9	37.4	9.3

续表

1966	28.9	40.1	11.6	21.0	44.4	9.3	36.9	65.9	24.3	34.9	59.2	20.7	32.2	51.7	16.7	22.5	36.5	8.2
1967	27.2	39.0	10.6	21.4	42.4	9.1	37.5	62.4	23.4	33.0	62.3	20.6	34.5	54.4	18.8	22.4	36.3	8.1
1968	28.3	39.6	11.2	22.5	42.3	9.5	38.8	66.3	25.8	34.1	60.7	20.7	36.6	57.4	21.0	22.7	36.5	8.3
1969	27.6	38.9	10.7	22.4	41.5	9.3	37.7	66.1	24.9	34.5	63.2	21.8	36.8	57.6	21.2	24.0	37.1	8.9
1970	26.1	36.5	9.5	19.3	40.1	7.8	36.4	66.1	24.0	29.7	63.9	19.0	36.9	54.7	20.1	24.4	37.1	9.0
1971	25.8	35.9	9.3	19.2	38.9	7.5	35.4	63.5	22.5	25.9	58.8	15.2	33.9	51.5	17.5	18.8	33.2	6.2
1972	27.2	36.2	9.8	20.6	38.6	7.9	35.0	62.5	21.9	26.3	58.4	15.3	31.9	47.9	15.3	19.4	32.8	6.3
1973	29.8	38.9	11.6	20.0	38.4	7.7	33.8	63.0	21.3				28.7	41.0	11.8	23.8	31.9	7.6
1974	30.0	38.3	11.5	17.1	35.7	6.1	33.2	61.6	20.4				24.9	38.7	9.6	24.7	31.9	7.9
1975	27.0	34.9	9.4	13.0	34.7	4.5	33.0	58.8	19.4				25.6	40.9	10.5	16.1	32.1	5.0
1976	26.8	34.9	9.3	14.4	32.9	4.7	34.6	60.8	21.0							10.2	30.3	3.1

资料来源：T·P·希尔：《利润和利润率》（1979年英文版），第123、125页。

降速度一般比制造业部门较为缓慢，只有瑞典例外。其次是利润份额的变动：日本和加拿大的趋势不明显，其他国家则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同制造业部门相比下降程度也较缓和。第三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动：除日本和意大利略有上升外，其他国家都是下降的趋势。

归结欧洲和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希尔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是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和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同时相联系的，但还不能合理推断，究竟哪个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sup>①</sup>英国左派经济学家阿罗诺维奇(S·Aaronovitch)等对希尔的数据和看法持肯定态度。他们依据希尔的研究结果指出：利润率下降可能由利润占产值的比率下降(例如由于工资提高)而引起，也可能由产值/资本比率下降(由于投资效率降低或者由于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而引起。这两个比率又分别同剥削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倒数有一定联系。“所有材料似乎表明利润率的下降或多或少是由于剥削率的降低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两者具有同样的重要性”。<sup>②</sup>

希尔的数据和阿罗诺维奇等经济学家的论断，在某些方面，是支持我们的分析的。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确实是下降了，而造成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资本生产率的降低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虽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他们把利润份额的下降看作是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我们关于美国制造业的分析似乎不一致。不过，尽管希尔计算利润份额的方法和我们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但若考虑到欧洲国家的特定情况，在此期间发生利润份额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是完全可

<sup>①</sup> T·P·希尔：《利润和利润率》(1979年英文版)，第121页。

<sup>②</sup> S·阿罗诺维奇、R·史密斯：《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88年中译本)，第271、231页。

能的。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英国、西德、法国等主要西欧国家的失业率都降得很低，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充分就业，因而工资的增长很快，完全有可能压低利润份额和剩余价值率。这是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即使按照希尔的计算，美国和加拿大的利润份额的变动也不象西欧国家那样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两个国家的利润份额只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才趋于下降，而西欧国家利润份额的下降趋势却在整个时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表 72 加拿大制造业若干经济指标的平均年百分比变动  
(1950—1981年)**

	1950— 1953	1953— 1956	1956— 1969	1969— 1974	1974— 1979	1979—1981
制造业总产量	+6.52	+5.45	+5.31	+5.19	+0.28	-0.08
净资本存量	+6.63	+4.42	+4.26	+4.54	+3.23	+3.83
实际工资	+5.12	+3.74	+2.79	+3.57	+2.14	-1.07
资本技术构成	+3.28	+4.51	+3.27	+3.72	+3.07	+2.80
消费资料价值	-3.37	-4.86	-2.55	-3.56	-1.72	+0.68
劳动力价值	+1.59	-1.30	+0.16	-0.10	+0.37	-0.39
每小时产量(劳动生产率)	+3.38	+5.06	+4.21	+4.29	+1.98	-1.49
生产资料价值	-3.66	+1.22	-1.24	-1.85	+0.02	-1.14
资本价值构成	-2.06	+7.18	+1.82	+1.97	+2.71	+2.00
年周转次数	-1.30	+3.93	+0.75	+0.85	+0.97	-3.40
利润率	-2.02	-0.39	-1.19	-0.85	-2.17	-4.62

资料来源：M·J·威伯、D·L·赖比：“加拿大制造业的利润率，1950—1981”，《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44页。



下面，我们再介绍几位左派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成果。

首先是经济学家威伯(M·J·Webber)和赖比(D·L·Rigby)对加拿大战后时期利润率变动的经验分析。这两位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的概念和方法，考察了1950—1981年期间加拿大制造业的利润率及其有关变量的长期动态，计算结果见表72。

上表中的数字表现出各主要指标在战后时期的长期变动趋势：第一，50年代和60年代制造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实际工资从1950到1979年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资料价值的下降，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相应上升。在整个期间，劳动力价值仅仅提高了3.5%，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显著地降低剩余价值率。第二，在1950至1981年期间，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近三倍。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下降。但是，生产资料贬值并未能阻止资本价值构成上升，而只是使其上升较为缓慢，整个期间，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了约182%，而资本价值构成提高了91%。第三，制造业流动资本的年周转次数约为4次。在1953至1979年期间，周转速度略有加快。第四，制造业的年利润率在整个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从1950年的45%降低到1981年的28%，下降了38%。<sup>①</sup>

根据经验资料，威伯和赖比认为：整个时期有两个因素促使利润率下降，一是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二是工人实际工资的上涨。起反作用的因素则有：消费资料单位价值的下降，已抵销实际工资上涨并阻止劳动力价值有较大上升；周转速度加快，这减

---

① 这一段中的具体数字分别引自M·J·威伯、D·L·赖比：“加拿大制造业、的利润率，1950—1981”，《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48、46、49、50、51页。

少了生产一定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资本；不变资本货物单位价值的下降，但未能抵销资本技术构成的上升并改变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趋势。利润率的变动是上述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的净影响表现为年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sup>①</sup>威伯和赖比的经验分析，由于证明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提高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

其次是经济学家雷蒂(A·Reati)对西德战后时期利润率变动的经验分析。他详细考察了1960—1981年期间西德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有关变量的变动趋势。其结果总括在下表中。

**表 73 西德工业中利润率及有关变量的变动趋势**  
(平均年百分比变动) (1960—1981年)

	利润率 P	利润/工资比率 S/W	资本有机构成 1+q	流动资本周转速度 r
投资货物	-2.65	-4.11	-0.89	0.58
中间投入品	-2.91	-3.06	0.29	0.45
消费品	-2.00	-2.69	0.21	0.91
制造业	-2.97	-4.09	-0.76	0.36
全部工业	-2.73	-3.54	-0.39	0.42

资料来源：A·雷蒂：“1960至1981年西德工业中的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75页。

依据经验资料，雷蒂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雷蒂指出：人们确实看到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趋势’，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没有提高，而是保持稳定甚至下降了”。因此，德国的例证必定会

<sup>①</sup> M·J·威伯、D·L·赖比：“加拿大制造业的利润率，1950—1981”，《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50—51页。

影响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争论。“它进一步证实：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只是一种可能的现象，并不是必然的。”由于资本积累过程本身的性质，“资本技术构成有提高的趋势，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的论断也是合理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变化方面的某种结果，能够极大地改变来自技术构成的推动力”。<sup>①</sup>

雷蒂的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分析是不一致的。由于我们没有计算过西德的资本构成，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或否定他的经验研究结果。从理论上说，也不能排除在一定时期出现这种可能：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造成生产资料的较大程度贬值，和由于实际工资迅速上涨造成劳动力价值的上升，使得资本的价值构成趋于稳定甚至下降。但雷蒂把他的经验分析推广为一般结论，来否定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上升趋势及其在促使利润率下降中的作用，则是值得研究的。雷蒂的经验分析本身至少有两点应该指出。第一点是，某些部门资本有机构成在整个时期的平均负增长率，掩盖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动趋势。事实上，在此期间，制造业或者全部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在1960到1968年间是趋于上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1968年以后，特别是在1968—1970年和1976—1978年这4年间。这从他绘制的曲线图中看得很清楚。因此，这个平均负增长率并不意味着在21年长时期内始终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下降趋势。第二点是，雷蒂的计算方法中完全没有考虑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他用工资和薪金总额代表可变资本，从而把一个比重日益增大的非生产劳动者的报酬包括在可变资本中，这不能不压低资本构成的水平和增长程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评论韦斯科普夫关于美国的经验分析时已经指出过。可以设想，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引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

<sup>①</sup> A. 雷蒂：“1960至1981年西德工业中的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78—79、80页。

劳动的区分，计算的结果便可能有所不同。

第二，雷蒂认为：比较整个时期的利润率趋势，清晰地显示了利润/工资比率变动对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影响。由于整个时期人均实际工资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全部工业中工资份额从67.2%上升到84.6%，利润/工资比率则以平均每年3.54%的速度下降。<sup>①</sup>可见，利润份额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雷蒂的这个分析可能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当然，如果在计算方法上考虑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在此期间利润份额和利润/工资比率的下降程度必定会减少，但未必能改变其下降的趋势。根据雷蒂的资料，在1960—1967年和1967—1975年期间，全部工业中雇员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很高，分别为4.5%和5.9%。<sup>②</sup>这和60年代及70年代上半期西德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只有1%左右）的情况是相吻合的。但随着70年代后期失业率的迅速上升，实际工资增长率也急剧下降，在1975—1981年期间已降到3.1%。<sup>③</sup>从这些情况看，利润份额和剥削率的降低，很可能是60至70年代促使西德工业中利润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四节 一般利润率变动的内在机制

### 1. 利润率长期变动的分析

经验分析告诉我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并不是一个持续不断

---

① A·雷蒂：“1960至1981年西德工业中的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74—75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

的过程，而是在波动中贯彻的。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战后时期，利润率的波动加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和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利润率上升的时期，虽然程度不同和时期长短不等。美国的利润率在1947到1958年期间没有明显的趋势，1958年开始急剧提高，1965年前后转向下降。其他国家利润率向下转折的时间同美国略有差别，从希尔的资料看，可能是：西德发生在1955年，加拿大发生在1956年，英国发生在1960年，意大利发生在1961年，日本发生在1969年。<sup>①</sup>这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促使利润率上升的内在动因是什么？第二，迫使利润率下降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研究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一度趋于上升的内在动因，首先必须考虑这个时期总的经济形势。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率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几乎是空前的。美国私人国内经济实际总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1889—1919年为3.9%，1919—1948年为2.8%，1948—1966年为4.0%。<sup>②</sup>1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1870—1913年为2.5%，1913—1950年为1.9%，1950—1973年高达4.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则分别为：1.4%、1.2%和3.8%。<sup>③</sup>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这个繁荣时期不是偶然的，下面

---

① 参见表70和表71。

② J·肯德里克：《美国战后的生产率趋势，1948—1969》（1973年英文版），第41页。

③ 参见表21。

几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战后时期社会总需求的急剧扩大。大战期间，各国为了保证军事需要和军需品的优先供应，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被压抑和推迟了。因而战后对消费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破坏，建筑物和生产设施被毁坏，固定资本的更新被搁置，旧设备的改进被推迟，因而战后时期的投资需求也迅速增长。恢复经济和改善生活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为生产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其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早在大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特别是原子技术和电子技术。大战结束后，立即兴起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新技术不但在美国得到迅速推广，其他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国家也把经济的重建和利用美国的技术以赶超先进结合起来。这场技术革命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业部门的自动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由机械化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发展。二是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和新部门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而投资需求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扩大，又反过来带动了消费需求和消费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资本高速积累，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近20年高速增长的直接动力。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理解战后的经济繁荣，不可忽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作用。战前30年代持久的经济萧条，战争对许多国家的毁灭性破坏，严重削弱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力，表明私人资本已无法靠自身力量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更不能适应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自身许可的限度内进行局部调整，垄断资本主义终于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经济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开始作为经济基础的

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与私人资本全面结合,系统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以财政收入的资本化为基础,通过国有化、军火生产、加工定货、减税和补贴、金融资助、计划导向、转移支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财政金融手段,帮助私人垄断资本加速积累,扩大市场。没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时期的科学技术革命和高速资本积累,以及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难以想象的。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下列原因,促进了利润率的上升。

首先是生产能力利用率比较高。社会需求旺盛和经济迅速增长,使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保持着相对较高的设备利用率。例如美国制造业的能力利用率,50年代为83.7%,60年代为84.9%,大大高于70年代以后的水平。①一般说来,较高的能力利用率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单位固定资本的产量,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本成本,而且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根据韦斯科普夫的分析,企业从事“直接劳动”的大多数生产工人通常按生产的实际产量被雇佣,而从事“间接劳动”的行政管理和监督雇员的雇佣则大体上与企业的生产能力成比例。②因此,当实际产量和能力利用率降低到企业最佳运转率以下时,雇佣职工的减少将慢于产量的下降,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降低;而当产量迅速增长和能力利用率水平较高时,雇员的增加又将慢于产量的增长,职工的劳动力得到较充分的利用,这会反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韦斯科普夫的论述是就周期变动的短期情况而言的,但似乎也应该适用于较长时期的变动分析。因此,战后50至60年代,较高的生产能力利用

①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07页。

②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6页。

率，有利于降低产品的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提高资本的利润率。

其次是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战后初期，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和一支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这不但保证了经济迅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使经济繁荣初期阶段工人工资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人的实际工资确实也在提高，但并不是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提高得很快。但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却为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新技术的普遍采用，人均资本存量的急剧扩大，规模经济效益的日渐增加，全员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一段时期。按照麦迪森提供的资料，1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复合增长率，1870—1913年为1.6%，1913—1950年为1.8%，1950—1973年为4.5%。<sup>①</sup>因此，在战后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后的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工资份额趋于下降，剩余价值率趋于提高。例如美国，在1948—1966年期间，私人非农业产业部门雇员每周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1%，<sup>②</sup>而全部私人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0%，<sup>③</sup>这决定了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基本趋势。资本剥削率的提高，也是促使利润率增长的直接原因。

第三是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缓慢。战后50年代到60年代，在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浪潮的推动下，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本来很快，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据

---

① A·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1982年英文版），第96页。

②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01页。

③ J·肯德里克：《美国战后的生产率趋势，1948—1969》（1973年英文版），第41页。



麦迪森估算，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按人时平均计算的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的平均复合增长率，1870—1913年为1.9%，1913—1950年为1.8%，而1950—1973年高达4.8%。<sup>①</sup>按职工或按人时计算的资本存量，很可能还低估了实际的资本技术构成状况。因为在产量迅速增长时，不仅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有更多的企业实行多班生产。以法国为例：从1957年到1979年，职工中轮班制工人所占的比重，冶金业由28%上升到77%，机器制造业由8%上升到39%，纺织业由34%上升到50%，整个制造业部门从14%上升到31%。<sup>②</sup>因此，每个工人实际推动的机器设备和固定资本，比按职工或人时计算的固定资本存量，肯定要更多。但是，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很迅速，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资本价值构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在战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率也有较快的增长，因而生产设备价值的下降程度也比较大，虽然这种下降通常慢于消费品，也不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比例。第二点，从战后到60年代末，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上升，更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控制，世界市场上原料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这两个因素，从价值方面大大抵销了按职工或人时计算的物质资本量的增长，使得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的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甚至趋于停滞。这就大大减轻或者暂时消除了资本构成变动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压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简略分析可以看到，在战后高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一定时期内，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力量被缓冲，而促

<sup>①</sup> 参见表22。

<sup>②</sup> A·利皮茨：“危机的背后：一种积累方法的耗尽，关于法国经验研究的‘调节学派’观点”，《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季号，第23页。

使利润率上升的力量却比较强大。利润率的上升和资本积累的加速是互相作用的。利润率提高加强了资本家的乐观预期，是扩大投资的主要推动力，利润量的增长又为加速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因而趋于上升的利润率又反过来成为资本高速积累的一个根本条件。正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它们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并不能保证永久的繁荣。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资本积累的条件必然发生变化，一度促使利润率上升的各种力量逐渐减弱，最终走向自身的反面。现在，我们就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看看究竟有哪些内在因素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积累势头的转折，重新引起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第一，社会需求条件的变化。前面已经指出，急剧扩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曾经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积累和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这种对资本十分有利的需求形势并不是长期不变的。由于被战争所推迟的购买力逐渐被满足，由于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日趋饱和，更重要的，由于同经济繁荣和利润增长相伴随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落后于生产的急剧扩张，变得相对不足，进而成为资本迅速积累的障碍。另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新兴生产部门，作为资本高速积累的主要支柱，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充分发展以后，对扩大投资的带动作用也显著减弱。投资需求因而受到技术变革推力不足和消费需求拉力不足的双重扼制，其增长也必然放慢。这样，资本积累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利的社会需求条件将消失，对于已经急剧扩大的生产能力及其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来说，社会的总有效需求终于变得相对不足。

社会需求不足必然造成产品价值实现的困难，使生产的增长速度放慢，这会从几个方面对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一个影响是

促使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这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必然结果。例如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965和1966年达到5.8%的高水平后<sup>①</sup>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也于1966年达到91.1%的战后最高水平后开始下降，并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能力利用率从60年代的84.9%下降到70年代的80.9%，又下降到80年代上半期的76.5%。<sup>②</sup>能力利用率降低必然提高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侵蚀利润。另一个影响是扼制产品价格的充分上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商品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必然加剧，资本家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补偿生产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也不能不受到限制。当然，垄断组织会竭力维持高价格，但它们也不能完全不受需求不足和竞争加剧的影响。在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需求不足对价格提高的限制，是通过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产品成本上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从另一个方面损害了利润。再一种影响是加剧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的竞争。面对需求不足，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更加努力提高生产率以降低成本，这将促进深化型投资；提高资本集约程度，最终导致资本构成的更快增长，加剧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第二，资本剥削条件的变化。在战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定时期内，实际工资缓慢增长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剥削率，为利润率上升和资本加速积累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在市场急剧扩大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新技术的采用促进了深化型投资，提高了资本构成，但扩展型投资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占主导地位，因而积累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比较快，其结果是产业后备军重新被吸引，农业人口进一步向

① 这是战后以来除1951年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②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255、307页。

工业转移，妇女参加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以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降到较低水平，甚至暂时实现充分就业或出现劳动力不足。劳动市场上的这种变化，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实力和谈判地位。一方面，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甚至可能加速；另一方面，工人有更大的力量来抵制企业主提高劳动强度和强化劳动纪律的企图。这样，实际工资的增长就可能逐渐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资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由此而引起的剥削率的下降，往往成为利润率长期波动中向下转折的重要原因。

战后积累过程中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强度，北美和西欧有些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较高和大批移民，劳动力的供给相对说来比较充裕。在繁荣的50年代和60年代，它们的失业率虽比战前为低，但仍保持着一定水平，美国分别为4.5%和4.8%，加拿大分别为4.1%和4.9%。<sup>①</sup>而西欧主要国家如英国、西德、法国等，却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它们都有15至20年时间，把失业率降到2%或1%左右。<sup>②</sup>西欧国家的这种形势，使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更为迅速，工资份额的上升也更为显著和持久，进而对利润率下降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这一点从希尔的数据中看得很清楚。而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始终存在着一定规模的产业后备军，实际工资的增长不如西欧国家那样快，工资份额的上升也不象西欧国家那样显著和持续。但是，即使在美国，1966—1971年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对利润率变动趋势的向下转折以及利润率在此期间的急剧降低，也仍然起了巨大作用。

工资份额上升和剥削率下降是实际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因而依存于两个因素变动的对比关系。主张利润挤压

<sup>①</sup> 参见表30。

<sup>②</sup> 参见表39和表40。

论的一些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劳动市场日益绷紧会促使实际工资增长率自行加速，把这看作是工资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工资份额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实际工资增长的加速，而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他们强调的不是分配领域而是生产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战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高速积累之后，大约从60年代中期或末期开始，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确实先后出现减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新技术已经得到充分利用，强化劳动过程的作用已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已不再增长，生产能力利用率已趋向下降，非熟练工人的比重已显著增大，工人对加强劳动强度的抵抗已更为强烈，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因此，即使对于利润挤压也应区别两种类型：一种是“工资推进”（Wage-push）的利润挤压，另一种是“生产率拉退”（productivity—pull）的利润挤压。<sup>①</sup>从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强调生产率增长下降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例如美国，60年代后半期与前半期相比，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小时货币报酬增长率确实加速了（从平均每年4.0%提高到5.8%），但由于消费物价指数的突然上升（从平均每年1.2%猛增到3.4%），雇员的小时实际报酬增长率反而降低了（从平均每年2.7%下降到2.3%）。在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却更为急剧（从平均每年3.0%降低到1.8%）。<sup>②</sup>这样，实际工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对比关系就发生逆转，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工资份额上升和剩余价值率下降，形成对利润的挤压。不过，在这一转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实际工资增长的加速，而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

① A·利皮茨：“危机的背后：一种积累方法的耗尽，关于法国经验研究的‘调节学派’观点”，《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22页。

②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03、320页。

工资份额上升在利润率长期变动的向下转折中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能否象利润挤压论者所断言，工资上涨导致利润份额提高是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从理论上说，在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由于投资的需求和动力不足，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失业大军将重新集结，进而抑制实际工资的继续增长。这就可能再次出现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增长的形势，使剩余价值率由下降转为上升。美国的官方统计至少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从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急剧上升，实际工资的变动随即陷入停滞或下降状态。私人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年变动率，70年代上半期为0.1%，70年代下半期为-0.6%，80年代上半期为-1.1%。而同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虽然也已降低，仍为正数。<sup>①</sup> 我们的计算数据也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经过1966到1971年的下降后，在1971到1984年期间又出现上升的趋势。<sup>②</sup> 剥削率上升是有利于提高赢利率的，但由于其他因素更强大的作用，并未能扭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第三，资本构成的变化。在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和资本高速积累相伴随的曾经是资本价值构成的相对停滞或缓慢提高，形成了有利于利润率增长的经济条件。但这种情况也不是能够长期保持的。先看技术构成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资本的高速积累，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一直是相当迅速的。不过相对说来，在发展的前期，存在着若干抑制因素。一是扩展性投资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类投资属于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本构成不变基础上的积累。二是生产能力利用不断扩大和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增加，有可能提高资本的生产率，抑制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但是，一当生产能力达到最佳利用，

<sup>①</sup>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01、303页。

<sup>②</sup> 参见表60和图4。

轮班生产受到生产过程过分绷紧的限制，规模经济的效益已经充分获取，促使资本生产率上升的力量也随之消失。资本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会使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进一步加速。利皮茨所引用的色尼耳的资料，大体上反映出战后资本生产率和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这种关系。

**表 74 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资本/劳动比率 (K/L)					资本生产率 (Q/K)				
	1950 -1955	1955 -1960	1960 -1965	1965 -1970	1970 -1975	1950 -1955	1955 -1960	1960 -1965	1965 -1970	1970 -1975
西德	1.8	6.1	8.0	5.9	7.6	6.7	-0.7	-2.6	-0.5	-4.4
法国			4.1	4.9	5.0			2.0	2.1	-1.9
英国	2.3	3.8	3.7	4.3	4.6 <sup>a</sup>	-0.1	-1.8	-0.8	-1.1	-1.2 <sup>a</sup>
美国		5.0 <sup>b</sup>	2.0	3.6	4.3		-2.9	2.5	-2.6	-4.9

a, 1970—1974; b, 1956—1960.

资料来源：A·利皮茨：“危机的背后，一种积累方法的耗尽。关于法国经验研究的‘调节学派’观点”，《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6年春夏季号，第25页。

此外，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资本之间的竞争必然逐渐加剧。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不再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而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降低日益增长的工资成本，他们也会更多地使用劳动节约型技术。这样，深化型投资将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投资形式，进而促使资本技术构成相对于资本积累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问题不只在于技术构成的提高加快了，更重要的是，生产要

素价格的变化也开始向着加速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方向发展。其中原料价格的变化起了突出的作用。50和60年代原料相对价格的下降曾经是抑制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产生了比例失调。这种失调成为继续增长的严重阻力。最明显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和第三世界生产这些商品的实际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到1973年初级产品（尤其是石油）供求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丧失对这些产品供给的控制已十分明显”。<sup>①</sup>事实上，美国原料价格经过战后20多年的停滞（相对价格下降），1968年开始上涨，1972年起上涨加速，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其上涨速度超过资本设备和消费品，相对价格一直趋于增长。<sup>②</sup>随着生产资料相对价格变化趋势由下降转为上升，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速度加快了，并成为促使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力量。

总之，战后曾经推动资本迅速积累和利润率上升的各种主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统统走向自身的反面。内在的经济力量迫使利润率重新趋于下降，进而导致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减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再次进入一个发展缓慢、失业剧增、危机深化的相对停滞时期。这个事实证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在发挥作用，在强制地贯彻自身。

## 2. 利润率周期变动的分析

利润率的长期变动和周期波动是互相联系的两种动态过程。没有利润率的周期下降，就不会有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同时，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包含所反映的各种矛盾，正是在利润

---

① S·阿罗诺维奇等编：《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1988年中译本），第225页。

②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第321、322页。



率的周期下降和危机中，得以充分展开和集中表现。

近20多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在西方的复兴，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危机理论的深化。有关周期运行机制的分析，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的研究成果。他们以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为研究对象，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着力探讨各种经济因素在周期变动中的作用，揭示周期运行的内在机制。韦斯科普夫所采用的方法，是把每个周期（从产量变化的前一个低谷到后一个低谷）划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从产量开始上升到利润率达到高峰季度，属于扩张前期；B阶段，从利润率开始下降到产量达到高峰季度，属于扩张后期；C阶段，从产量开始下降到下一个低谷，属于收缩时期即危机阶段。在此基础上，将利润率分解为利润份额、生产能力利用率和生产能力/资本比率三个变量，算出各个变量在战后五次周期（从1949年4月到1957年1月）各个阶段的平均变动率和在每次周期B阶段的变动率，进而观察三个自变量对利润率变动影响作用的大小，并分析各个变量变动型式的原因。<sup>①</sup>谢尔曼把韦斯科普夫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采用了韦斯莱·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所提出的检验周期型式的方法，把每个周期进一步划分为九个阶段：开始的低谷季度为第1阶段，高峰季度为第5阶段，最后的低谷季度为第9阶段，第2、3、4阶段按照等分第1和第5阶段之间的扩张时期求得，7、8阶段则按照等分第5和第9阶段之间的收缩时期求得。然后将周期中所有季度（或月份）的平均变量规定为100，再给予九个阶段中每个阶段以与周期平均数有关的相应数值，从而观察各个变量的周期变动型式。此外，谢尔曼1984年的著作还扩展了他1979年的论文，把统计分析延长到包括美国战后的六个周期（从1949年4月到1980年3月），这不

<sup>①</sup> 参阅：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

但增强了经验分析的可靠性，还使他有可能比较50—60年代的四次周期和70—80年代的两次周期的不同特点。<sup>①</sup>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的统计分析都是以年为单位而不是以季度和月份为单位，不适合于检验周期变化。因此，下面的分析将主要利用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讨论若干他们没有充分论述到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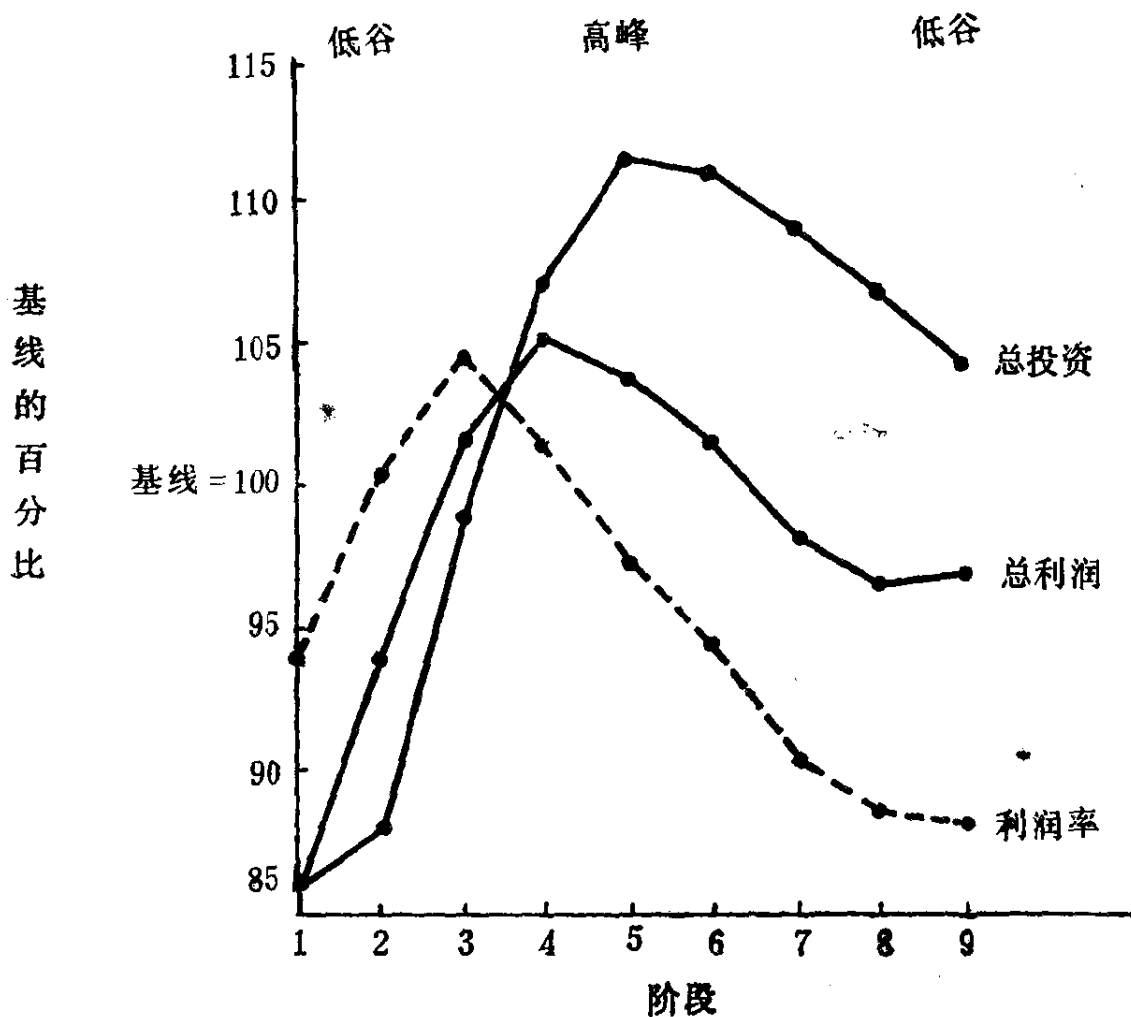
周期运行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利润率变动的转折领先产量变动的转折。正是这一特征，使韦斯科普夫能够把每个周期的扩张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他指出：对本文研究目的最有意义的是把每个周期扩张都分为两个阶段，即利润率上升时的扩张初期（A阶段）和利润率下降时的扩张后期（B阶段）。“利润率在每次周期收缩（C阶段）开始之前下降的事实，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假定的事件序列提供了某种经验上的支持：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投资支出的下降，并由此最终导致实际产量下降。”<sup>②</sup>谢尔曼进一步按照九阶段划分计算了利润率、总利润和总投资在战后六个周期中的平均变动，其变动型式如图6。

图6表明：（1）总投资在扩张时期开始时提高很缓慢，然后急剧上升，但随着接近高峰而逐渐放慢，并大体在周期的高峰阶段开始向下转折（净投资的下降肯定要早些）；在收缩时期，总投资的下降开始较慢，然后加快。（2）总利润在复苏的开始阶段增长最迅速，然后越来越慢，并在高峰前一个阶段轻微下降；在收缩时期的前半段，总利润下降最快，然后放慢，而在低谷前一

① 参阅：H·J·谢尔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H·J·谢尔曼、G·R·伊万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4年英文版）第二篇、第三篇。

② T·E·韦斯科普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第172页。

**图6 美国战后六次周期中投资、利润和利润率平均变动型式**



注：此图代表从1949到1980年六次周期的平均变动，数值根据季度资料按1972年不变美元计算，并转换为周期基线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H·J·谢尔曼、G·R·伊万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4年英文版），第164页。

个阶段甚至稍有回升。可见，利润是周期转折的一个先行指标。尽管投资的转折大体上和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恰好重合，但总利润领先投资和周期的转折点大约一至两个季度。(3) 利润率在扩张的起始阶段提高很快，而后稍微放慢，并在扩张的后期下降，领先总利润率的向下转折整整一个阶段；在收缩时期，利润率下降非常迅速，然后放慢，而恰好在周期低谷前重新回升。因此，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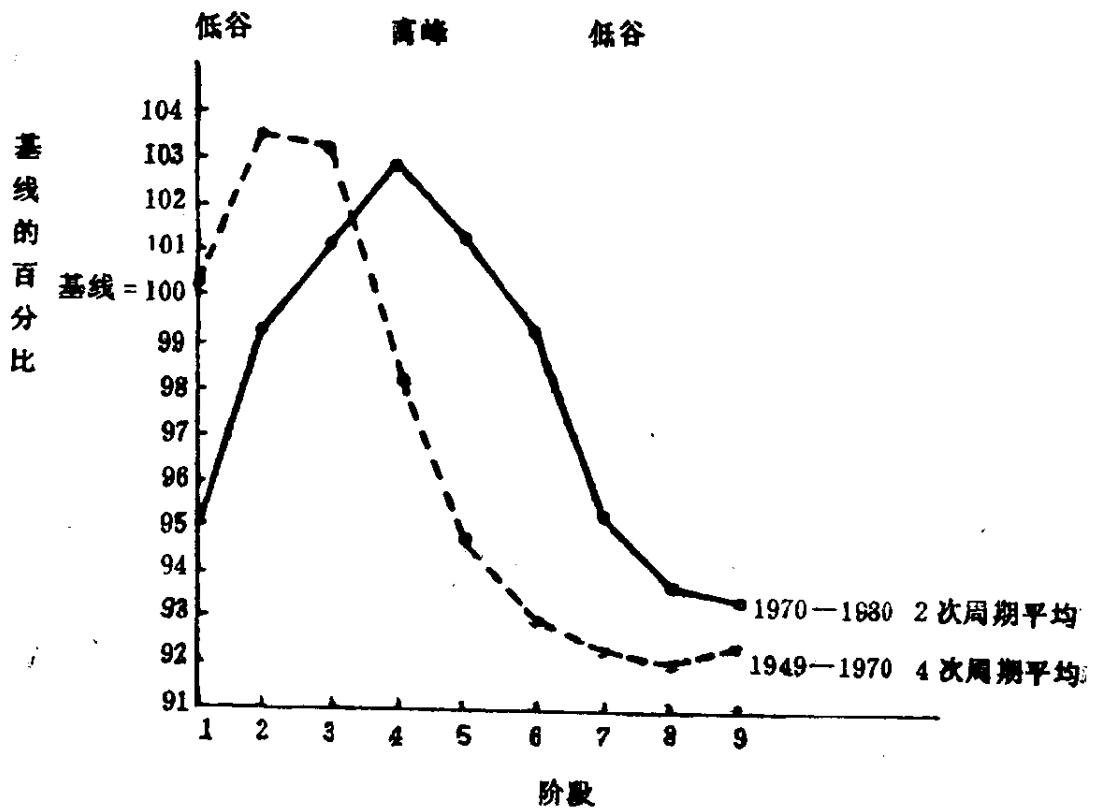
利润率是周期转折的另一个领先的指标，它的转折甚至比总利润更早些。1949到1980年的资料表明，利润率平均说来领先投资和周期大约三个季度。谢尔曼的上述经验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利润率变动领导投资变动，投资变动领导生产转折。危机的发生是由投资下降直接引起的，投资下降则是利润率下降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复苏和扩张也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来推动，而投资增长的基本动力则是利润率的上升。

那末，影响利润率周期变动的直接因素是什么？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主要分析了利润份额、能力利用率和生产能力/资本比率这三个变量在利润率周期变动中的作用。

### (1) 利润份额的周期变动

美国战后六次周期中利润份额的变动型式，见下图：

图7 利润份额的周期变动型式



资料来源：同图6，第209页。

利润份额的周期变动与利润率的周期变动型式非常相似。它们都在扩张前期上升，到扩张后期下降，在收缩前期急剧下降，到收缩末期停止下降或略有回升。在50年代和60年代比较温和的周期中，利润份额在扩张期的向下转折较早，但在收缩期的下降速度也较慢。而在70年代至80年代较强烈的周期中，利润份额在扩张期的上升时间较长，但在收缩期的下降也更猛烈。利润份额变动对利润率变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利润份额上升必将提高利润率，利润份额下降则必将压低利润率。

怎样解释利润份额的这种周期变动型式？既然利润（ $\Pi$ ）被定义为工资（ $W$ ）以外的国民收入（ $Y$ ），利润份额（ $\Pi/Y$ ）便等于 $1 - W/Y$ 。阐明了工资份额的变动也就解释了利润份额的相反变动。工资份额可以分解为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两个因素。即：

$$\frac{W}{Y} = \frac{W/N}{Y/N}$$

这里 $N$ 代表在全部经济中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数。工资份额等于小时实际工资除以小时实际产量（劳动生产率）。因此，工资份额变动与小时实际工资变动正相关，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负相关。工资份额和利润份额的周期变动，就是由这两个因素的变动共同决定的。

在扩张前期，利润份额上升或工资份额下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实际工资的增长。这个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虽然已经开始上涨，但还比较缓慢。这时经济刚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失业率仍然较高，而工人对于刚过去的衰退记忆犹新，他们还不具有争取更高工资的条件和勇气。而且，原有的工资合同可能还未到期，新一轮工资谈判可能还需要时日。此外，这时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提高实际工资相对说来也较困难。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比较迅速，除了技术进步的因素

以外，生产率的短期急剧增长主要应归因于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生产下降时期的劳动储备，包括一部分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现在随着生产的扩大而得以充分发挥作用。雇员的增加慢于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迅速提高。总之，在扩张前期，实际工资的缓慢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结合在一起，必然压低工资份额，促使利润份额上升。

在扩张后期，实际工资继续上涨，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逐渐放慢，以致落后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导致工资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利润份额由上升转为下降。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涨后期产业后备军的耗竭。失业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加强了工人的战斗性和谈判地位，使他们在争得实际工资继续增长的同时能够遏制生产过程的加速，阻碍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与此同时，就业的增长扩大了非技术非熟练工人的比率，降低了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加上大量小型低效率企业加入生产，也成为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工资份额上升和利润份额下降，对于利润率在高涨后期的先行下降，进而推动周期的向下转折，起了重要作用。

在收缩前期，尽管生产已开始迅速下降，但就业率还比较高，由于必要的劳动储备，雇员的缩减程度小于生产的下降程度，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与此同时，实际工资的下落却很缓慢，有时甚至轻微上涨，因为工人还有一定力量抵抗工资的削减，固定的劳动合同也可能暂时阻止工资的变动。这样，工资份额会继续提高，而利润份额则继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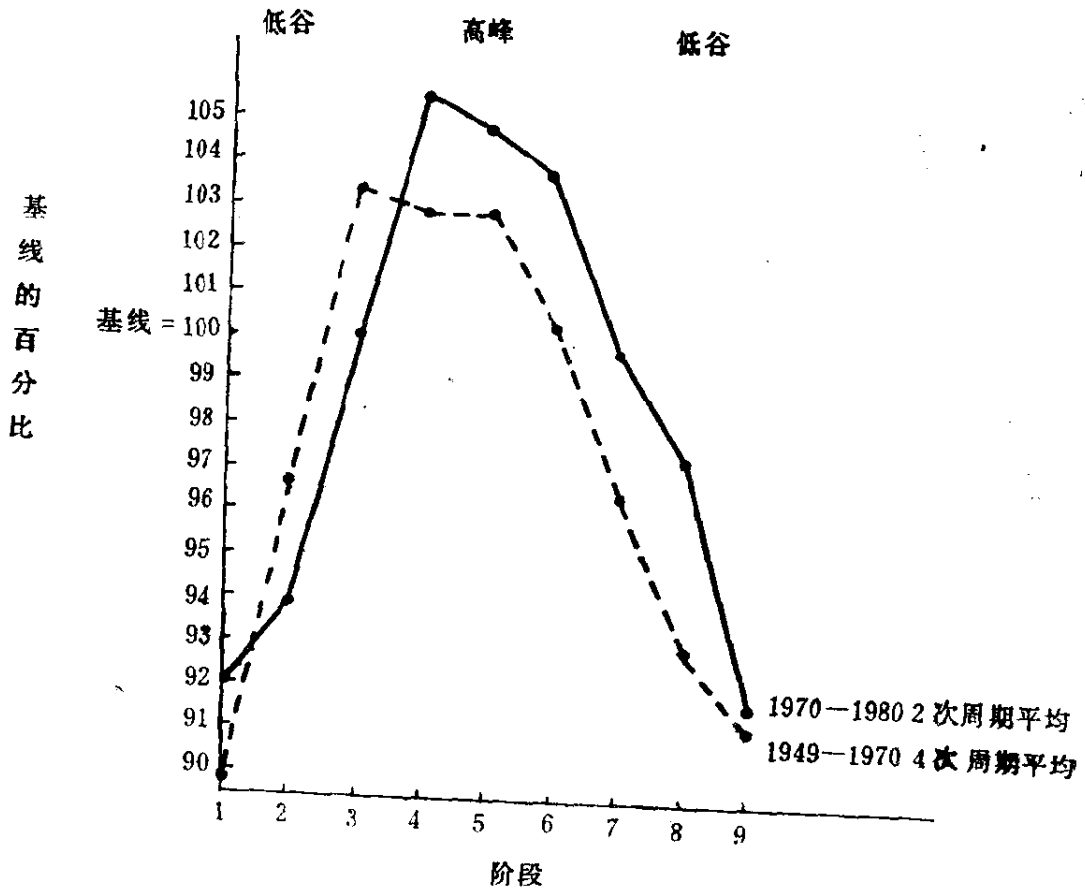
在收缩后期，企业已解雇一切可以解雇的职工，雇员的平均素质有所提高，迅速上升的失业人口则削弱了工人的战斗性和谈判力量，使资本家有可能加强劳动强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结果，到收缩阶段末期，工资份额转向下降，而利润份额重新开始上升。这一变化有助于利润率在收缩末

期的先行回升，并成为带动周期向上转折的力量。

## (2) 能力利用率的周期变动

美国战后六次周期中能力利用率的变动型式，见下图。

图8 能力利用率的周期变动型式



资料来源：同图6，第211页。

能力利用率的周期变动型式是：在扩张前期迅速上升，在扩张后期相对停滞或轻微下降，在收缩时期则急剧下降。可见，能力利用率的提高对扩张前期利润率的上升显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扩张后期，能力利用率的相对稳定或轻微降低不能成为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在收缩时期，能力利用率的急剧降低则可能是利润率迅速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能力利用率被定义为实际产量（Y）与潜在全额能力产量（Z）的比率。全额生产能力的变化是一个随投资增长而扩大的

长期过程，而能力利用率在周期过程中的短期变化主要受实际产量迅速变动的支配。实际产量的迅速变动则决定于变化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在扩张前期，能力利用率的急剧上升应主要归因于实际产量和社会需求迅速增长。这个时期工人实际工资的上涨直接推动了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消费需求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又带动了投资需求的加速发展。利润量和利润率的回升也为投资的迅速扩大提供了资金和动力。这样，消费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急剧增长便成为实际产量和能力利用迅速扩大的主要推动力。能力利用率的上升从两个方面影响利润率。一方面，较高的能力利用意味着现有物质资本的更充分的使用，这必然提高资本的生产率，直接促使利润率上升。另一方面，较高的能力利用通过加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利润份额，从而间接地帮助了利润率的上升。

在扩张后期，能力利用率的变动转为相对停滞或轻微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社会需求和实际产量的增长已经大大放慢。这时消费需求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扩张前期工资份额的下降，通过一个时延，使国民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从而减低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导致实际产量增长率下降，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需求的最终制约作用。消费需求和消费品生产增长放慢，加上利润率已经开始向下转折，又会引起投资增长的更大程度的减速，更加剧了实际产量增长率的下降。能力利用率上升的势头终于受到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的阻扼。不错，在这个阶段，工资份额开始提高，并通过一定的时延引起平均消费倾向上升，扩大消费需求，但是，这可能已经太迟。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一经开始，导致危机和收缩的趋势就很难逆转了。

扩张后期能力利用率的相对停滞似乎不能成为这个阶段利润率开始先行下降的主要解释。但是，相对停滞的能力利用反映了相对疲软的社会需求，说明这时要使已经扩大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发



展，需求已经相对不足。生产和需求的矛盾逐渐尖锐化，既阻碍了能力利用的进一步扩大，也遏制了产品价格的更快增长。这种需求形势对资本家形成一种限制，使他们在工人工资继续上涨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的条件下，不能从充分提高商品价格方面得到补偿，以阻止工资份额上升和利润份额下降。可见需求因素对于说明扩张后期利润率的先行下降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在收缩时期，随着社会需求和实际产量的急剧缩减，能力利用率也迅速下降。这时，投资的锐减在降低总需求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扩张后期工资份额上升虽然有助于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但危机阶段工人实际工资的相对停滞或下降仍使消费需求处于较低水平。能力利用率下降也从两个方面对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通过扩大闲置的物质资本而降低资本的生产率，直接压低利润率。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劳动生产率下降而降低利润份额，间接侵蚀利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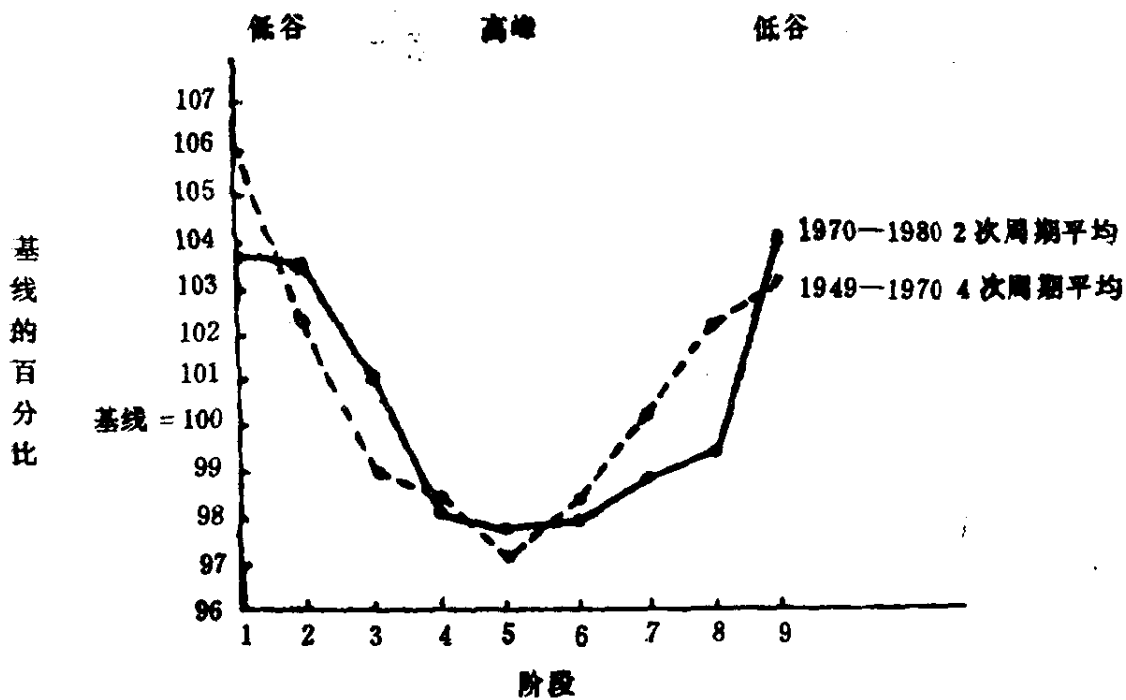
### (3) 生产能力/资本比率的周期变动

美国战后各次周期中生产能力/资本比率的周期变动型式，见图9。

生产能力/资本比率，即潜在的全额能力产量与资本存量的比率，其周期变动型式是：在整个扩张时期下降，而在整个收缩时期上升。这和利润率的周期变动恰好相反，因为利润率在扩张期的大部分时间上升，而在收缩期的大部分时间下降。这样，潜在产量/资本比率似乎不能解释利润率在周期过程中的大部分变动，而只能说明利润率在相反方向的变动为什么不更迅速。只是对于扩张后期的利润率下降和收缩末期的利润率回升，潜在产量/资本比率的变动可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生产能力/资本比率既然是全额能力所体现的潜在产量与资本存量的比率，所以是潜在的资本生产率，这与实际的资本生产率不同，后者还受到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影响。谢尔曼认为，从长

图9 生产能力/资本比率的周期变动型式



资料来源：同图6，第213页。

期看，生产能力/资本比率决定于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而生产能力/资本比率的短期变动则与能力利用率变动有密切联系，上升的能力利用率可能压低潜在产量/资本比率，较低的能力利用率则可能提高这个比率。为什么会如此？一个主要的解释是：产量和能力利用在扩张阶段的上升，使千万个新的小的和低效率的厂商利用良好的利润前景加入生产，这倾向于降低平均的潜在资本生产率；而当产量和能力利用在收缩阶段下降时，大批小型低效率企业破产，这有助于资本生产率的恢复。

谢尔曼用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化来解释潜在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他的分析中最不充分而且也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论点。我们认为，一种更好的解释可能是，把潜在产量/资本比率的周期变动与投资的周期变动联系起来。这两个变量的周期变动型式也正好相反。在投资迅速增长的扩张前期，有两个因素肯定会影响

到潜在产量 / 资本比率的上升。一个因素是，大规模投资通常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大量新设备用来更新旧设备，倾向于提高资本 / 劳动比率，并可能降低潜在的资本生产率。另一个因素是，在投资高潮中，由于固定资本的定货、安装和投产需要时日，全额能力产量的扩大一般会慢于资本存量的增长，这也倾向于降低潜在的资本生产率。到了扩张阶段的后期或末期，投资的增长逐渐减速，潜在产量 / 资本比率的下降也随之放慢。在收缩阶段，投资急剧下降导致资本存量停滞或下降，而生产能力却因前期大量投资增长，加上大批低效率企业倒闭，潜在资本生产率自然会转向上升。

在周期的大部分时间，潜在产量 / 资本比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方向确实相反，因此，它不是作为一个促进因素而是作为一个抵销因素发挥作用的。不过，它的抵销作用远不如其他因素的促进作用强大。在扩张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利润率上升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这包括：工资份额下降，能力利用率上升，社会需求扩大，商品价格上涨，资本周转加快等等。在收缩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这包括：工资份额上升，能力利用率下降，社会需求缩小，商品价格停滞或下跌，资本周转放慢等等。

#### (4) 资本有机构成的周期变动

这个问题在谢尔曼的研究中整个地被忽视了。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坚定的想法：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与利润率的短期变动无关。他同时也避开了技术变化问题，认为技术进步至多只和潜在资本生产率的长期演变有关，根本不会影响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动。这样，谢尔曼对周期机制的分析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技术变革、固定资本更新、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等问题。但是，把周期变动归结为与技术因素无关的短期变动这种论点本身是可疑的。即使按照谢尔曼对美国战后周期的划分，其中一个周期为 3 年，一

个周期为4年，三个周期为5年，一个周期为9年。在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战后时期，生产的技术条件经过四、五年即会发生很大变化，且不要说更长时间。因此，忽视技术进步及其有关因素的周期变动，是不合理的。

资本有机构成的周期变动型式究竟如何？从理论上说，在扩张阶段的大部分时期（相当于萧条、复苏和高涨前期），由于大规模投资、大量固定资本更新和新技术的迅速推广，资本有机构成会趋于提高。谢尔曼的经验研究间接证明了这个推论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谢尔曼的统计分析：第一，扩张阶段潜在的资本生产率下降，亦即潜在的资本/产量比率（资本存量与潜在全额能力产量的比率）上升；第二，扩张大部分时期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表明劳动力的增加慢于产量的增加，因而资本/劳动比率甚至比资本/产量比率提高得更快；第三，扩张阶段资本品（特别是原料）对制成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第四，扩张前期工资份额下降，表明劳动力价值下降。把这四种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可以推断，在扩张的大部分时期资本价值构成将随着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而上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损害利润率。但正如分析潜在资本生产率变化时所说，其他因素在这个阶段的更强大的作用，仍然决定了利润率的上升势头。

在扩张阶段末期，资本构成的动态可能发生变化。这时潜在资本/产量比率的提高逐渐减速，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趋于停滞甚至转为下降，因而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大大地放慢了。从价值或价格因素看，随着投资高潮的日趋消退，资本品相对价格上涨的程度可能减缓，但由于劳动生产率逐渐落后于实际工资的上涨，劳动力价格却和工资份额一起由下降转为上升。上述因素变化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这样一种可能：资本价值构成在高涨末期由上升转为下降。资本价值构成的这种下降不是由技术构成的变化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亦即由剩余价值

率的降低所引起的。因此，它不但无助于提高利润率，反而会严重损害利润率，<sup>①</sup>成为推动利润率在周期转折前先行下降的一个因素。

乍一看，上面这种分析近乎奇谈怪论。但事实上，资本价值构成在高涨末期的这种反常的变化不仅完全可能出现，甚至早已被马克思所洞察。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过剩和危机问题时指出：

“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  $C + \Delta C$  同增加  $\Delta C$  以前的资本  $C$  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sup>②</sup>

在收缩阶段（即危机阶段），资本价值构成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原因是：潜在资本 / 产量比率下降（潜在资本生产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品相对价格降低，工资份额轻微上升等等。这个阶段的资本价值构成下降也不是由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它反映的是资本存量缩减，生产资料强制贬值，劳动力实际利用率下降等因素变化。因此，资本价值构成的这种下降也不会提高而只会降低利润率，成为危机时期加剧利润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sup>①</sup> 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0页。

### (5) 资本周转速度的周期变化

周转速度变化也是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在周期分析中没有涉及的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的周转速度既然是决定年利润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在利润率周期变动中的作用理应是不可忽视的。

从理论上说，资本周转的快慢受到社会需求和市场状况的决定性影响，而后者在周期过程中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在扩张前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急剧扩大，市场兴旺，产品实现条件良好，这时资本的周转速度必然加快，从而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到了扩张后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社会需求已经相对不足，产品实现条件开始恶化，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必然随之放慢，并在推动利润率由上升转为下降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收缩时期，需求下降，市场萎缩，产品实现极端困难，这同时引起能力利用率下降、产品价格疲软、流通时间延长和资本周转缓慢，成为促使利润率在危机阶段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以上从几个方面扼要阐述了利润率周期波动的基本型式和主要原因。所描绘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轮廓，现实经济运动的一些重要因素被省略了，如金融条件的变化、政府的经济作用、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等等。完整的周期理论绝对离不开对这些因素的深入考察。不过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详尽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探讨利润率的周期波动型式，为研究周期运行机制提供一个基本线索。

利润率周期波动分析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经济危机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作为危机直接诱因的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周期激化的必然结果。以追逐利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制度所决定的各种矛盾，如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生产部类比例失调和生产要素比例失调的矛盾等等，共同起作用，推动

了利润率的下降。在这里，片面强调生产因素或流通因素，供给因素或需求因素，成本因素或价格因素，资本过剩或商品过剩等等，都不能对危机的发生作出完满的解释。曼德尔的下述论断是精辟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追求通过售卖商品实现利润的经济的危机。1. 庸俗消费不足论者肯定说，在‘高涨’最后阶段增加工人的购买力就可以避免危机。这些理论家忘记了，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售卖而是通过售卖谋取利润。可是，当利润率已在下降的时候，增加工资就可能使利润率崩溃；因此，增加工资远不能延长‘高涨’时期，反而会把它断送。2. 庸俗比例失调论者…肯定说，如果在高涨最后阶段，阻止利润率下降（例如冻结工资，降低特别高的利息率，设法避免物价波动等）就可以防止危机。但是这些理论家忘记了，即使在市场缩小时，利润率上升，也无法阻止投资减慢。事实上，使企业主发生兴趣的不是他可以从一定的工资、利息和成本率推算出来的理论上的利润，而是在成本同售卖（其商品）的可能性比较下，他预期能得到的实际利润”。① 谢尔曼也正确指出：危机既起因于需求有限（消费不足）也起因于高成本（投资过剩）。“它表明扩张和萧条的交替出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某些自由派人士相信他们能够防止萧条，办法是提高工资以增加需求，但结果忽视了成本问题。某些保守派人士设想通过降低工资和利率来防止萧条，但结果忽视了需求问题。”②

从周期分析中发现的另一个使我们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周期下降中，资本构成变动的机制作用完全不相同。在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或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利润率的周期波动中，复

① E·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1979年中译本），第389页。

② H·J·谢尔曼：《停滞膨胀—激进派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1954年中译本），第105页。

苏和高涨前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和利润率的上升并进，而当高涨后期利润率开始下降时，资本价值构成也转向停滞或下降。但这时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化不是生产技术条件变化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价值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劳动力价格提高和剥削率降低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下降，不会提高而只会严重侵害利润率。因此，在高涨后期，资本价值构成的特殊下降便成为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危机期间，利润率的急剧下降继续伴随有资本价值构成的下降。这时资本价值构成的继续下降也不是由于社会生产趋向劳动集约化，而是因为能力利用率的降低大于劳动力的相应缩减，而生产资料的贬值程度又大于劳动力的贬值程度，其结果也只能是加剧利润率的下降。

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的联系可能是这样的。推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力量主要发生在周期的扩张阶段，推动利润率下降的力量主要发生在周期的收缩阶段；尽管扩张大部分时期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并未直接导致利润率下降，而收缩时期直接推动利润率下降的力量也不是资本构成的提高。但是，扩张时期资本有机构成上升提高了整个周期生产技术和资本构成的平均水平；收缩时期资本价值构成下降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利用程度的差别和要素贬值程度的差别所造成的，一般不会退回到周期上升前的水平。当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时期到来，资本构成将在这个较高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同样，利润率在周期的收缩阶段急剧下降后，虽然在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会重新上升，但由于资本构成的平均水平已经提高，利润率不一定能恢复到前一个周期的平均水平。当然，这种联系不应绝对化，在利润率趋于上升的时期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时期，它们在周期各阶段变动的强度会有差别。利润率在周期扩张阶段的提高程度可能大于在收缩阶段的下降程度，这将形成利润率的上升趋势。反之，如果利润率在扩张阶段的提高程度小于在收缩阶段的下降程度，则会形成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这种



差别又是由一系列其他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变动上的差异所决定的。总之，正是在利润率的周期波动之中，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才得以贯彻，得以体现自身。

## 结 束 语

在本书的结尾处，我们用以下简短的结束语，作为全书的概括。

1. 在对马克思积累学说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之后，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或局限，相反，而是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他的经济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

2. 积累学说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积累过程客观趋势的反映。这些趋势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所制约的多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在周期波动和长期波动中强制贯彻的。把这些趋势理解为直线发展的过程（象一些教科书中所给予的印象）完全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

3. 20世纪和19世纪相比，积累过程中若干基本变量（如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失业率、一般利润率等等）的长期波动加剧了。各种变量背离趋势的变动可以存在较长时期。这种波动的加剧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条件变化有密切联系。

4.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经济繁荣几个特殊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大落大起过程中，资本积累的某些趋势规律的作用强度减弱了，这是不应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积累规律并未消失，各种经济变量仍在缓慢曲折地向着固有的趋势发展，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趋势规律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

5. 积累过程中各种主要变量的制约关系和机制作用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资本构成提高仍然是产生过剩人口的根本原因。失业率的高低仍然是调节工资变动和影响剩余价值率变动的重要因素。资本构成、剩余价值率和产品实现条件仍然是决定利润率的三个基本变量。利润率变动仍然是支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支配周期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分析这些变量的变动规律及其原因，仍然是科学说明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运动的基本手段。

6. 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为我们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和长期趋势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许多方面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仍然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共同任务。